

CHINA  
SPRING

# 中國之春

• 月刊 •  
1985  
七月號  
總25期

聲援北京知青爭民主爭人權的鬥爭

## 震驚中南海的北京知青大示威

### 魏京生 徐文立 傅申奇 將獲假釋？

傅申奇 · 徐文立 · 楊在行的獄中生活

### 胡耀邦「洩露軍事機密」的背後

評人民日報報導中國民聯成員的文章



難尋出路的下鄉知識青年

本期專訪

與趙紫陽——蔣經國會晤歸來  
**獨家訪問陳香梅**



本期專題

民族性  
傳統文化  
與  
專制制度

馬克思主義 何以在中國安家  
張諄痛批「愛國主義」

## 捐款獎勵訂閱中國之春

我是美國華盛頓地區的一名華僑，也是中國民聯的一名成員，一直盼望祖國走上民主、法治的康莊大道。看到中國之春民主運動在重重阻力下逐漸發展，深深感到中國民主前途有望。

最近，溫哥華僑商譚純先生捐款獎勵中國之春雜誌優秀作品及加州華僑黃雨川、郭平和楊雲捐款獎勵傑出民運人士之舉，使我深受鼓舞。為響應他們號召，我決定捐出美金約兩千元，鼓勵中國大陸留學生和各界人士訂閱中國之春雜誌。我提議的方法是：

一、幫助五十名中國大陸公費留學生、研究生和訪問學者免費訂閱中國之春。公費生生活費很少，無力個人訂閱雜誌。凡見到此通告而想閱讀中春的公費生，請寫信給中春編輯部，寫明郵寄地址并註明為公費生，以先到先得為原則（每人每年十八元，五十名共九百元）。超出五十名的公費生，我再考慮通過其它方法補助。

二、捐出壹千壹百元，做為中春有獎訂閱基金。自即日起至十一月一日止，訂閱中春者，以收據號碼為憑，均可參加抽獎。屆時抽獎儀式由我主持。獎品種類計有：

頭獎一名：今年美國至香港雙程機票一張；

二獎三名：柯達全自動照像機一架；

三獎十名：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五年全套中國之春雜誌。

三、合計約二千美金，若機票屆時漲票，捐款相應增加。

海外華僑數千萬，願大家團結起來，共做中國當代民主運動的堅強後盾。

美國華盛頓華僑陳覺文

一九八五年六月一日

自加州華僑黃雨川、楊雲、郭平倡議成立「獎勵促進中國民主法治人士基金」以來，本刊收到不少捐款。除其三人原有捐款二千五百元之外，又收到小明捐款十元、汪倫等二人五十元、張劍民，陳瑞之，王秀珠三人十元、莊心治一百元、唐先生十四元五角六分。澳洲黃有光教授捐出稿費兩百元及無名氏捐款二十四筆共一千零五元。總計至今為止，共收捐款三千捌百捌拾玖元伍角陸分。此基金將繼續接受捐款，希各讀者能踴躍響應。

又，華盛頓華僑陳覺文先生捐出美金貳千圓，鼓勵中國留學生和各界人士訂閱中國之春雜誌，本刊致以衷心感謝。



# 黃賢能放， 魏京生爲何不能放？

黃賢被放了。

黃賢，這位生於香港、深造於哈佛大學、執業於美國律師事務所的律師，四年前赴中國大陸時被北京當局拘捕，後以美國間諜罪被判十五年重刑。北京政府指控他竊取國家絕密文件四份，機密、秘密文件廿八份，內部文件和資料四百多份。

黃賢被捕後，海外輿論一時嘩然。中國民聯亦在一九八三年底的成立大會上發表一項聲明，要求北京政府公布黃賢案的全部案情，公開審判程序，並允許家屬探視。

最近，黃賢突然獲准假釋出獄。法院仍維持其原來的罪名，但稱他在「獄中表現良好，願意為四化建設服務。」

北京政府假釋黃賢，使我們想到著名民運戰士魏京生的案情，兩案在表面上有某些類似之處。

魏京生和黃賢兩人都被判處十五年徒刑，案情也都涉及洩露國家機密問題。

北京政府稱，魏京生曾告訴外國人當時中越戰爭的中方指揮官的名字——許世友和楊得志，這是「洩露國家機密」的行爲。

北京政府指控黃賢為美國中央情報局特務，曾竊取大量的中共機密文件。

我們不了解黃賢案的詳情，但魏京生一案，很多人是一清二楚的。魏京生的「洩密罪」根本不成立。因為，他們「洩露」的，決不是什麼國家機密，而是很多北京市民都知道的普

通消息。鄧小平之所以下令逮捕魏京生，乃因為民主運動的利用價值已經完畢，乃因為西單民主牆運動的發展，已威脅到現存的專制制度。

魏京生的「洩密罪」，是被強加上去的。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中國古來有之。如果魏京生說出大家都知道的事實也算是「洩密」的話，那麼，鄧小平、胡耀邦經常向外國人和港澳同胞透露一些還沒有成爲事實的重要人事安排（如胡啓立將入政治局、百分之七十以上部長級幹部今年要退休等），又應算做什麼呢？

退一萬步講，就算北京官方指控魏京生和黃賢的犯罪事實都成立的話，黃賢的罪也遠較魏京生的重得多，因北京稱黃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特務，又竊取了大量的機密文件，而魏京生乃一普通工人，并未有任何主動盜竊機密的行爲。如果北京政府實行其所宣傳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那麼，黃賢就不應該與魏京生受同樣的刑罰了。

現在，北京處理兩案的差別更加明顯：「特務」身份的黃賢已被假釋出獄，而普通工人身份的魏京生仍陷囹圄。

是什麼原因使北京政府對黃賢另眼相看呢？是黃賢「案情不實」、北京予以平反了嗎？看來不是，北京政府釋放黃賢時，仍維持原判。是海外沒有聲援過魏京生嗎？當然更不是。從魏京生一九七九年被捕以來，國際上一再掀起營救魏京生的浪潮，不少外國領導人、友好人士及僑領多次向北京表示過對魏京生案的關心。是像北京政府自己所宣傳的那樣，黃賢的

釋放，乃由於其表現良好嗎？這種說法，更不足服人，因北京方面前些日子也稱魏京生在獄中「表現良好。」

黃賢與魏京生的主要區別是他們的身份。「中央情報局特務」一說，我們不知內情，難以定論，但黃賢與美國有衆多關係，是人人皆知的。黃賢案類似於羅孚案，後者曾為中共派駐香港的「新晚報」總編輯，亦因「美國中央情報局特務」的罪名被捕，判處十年監禁。但過了不久，羅孚即被假釋了。香港青年劉山青，由於沒有什麼背景，儘管「罪名」較輕，至今仍仍在鐵窗內煎熬。

給人的印象已很明顯：凡與外國、特別是美國沾上點關係的，情況即有不同。當然，其中也有差別，與外國普通老百姓有關係者，遠不如與外國政府、特別是與中央情報局掛鉤，那麼受到「特別對待」，他們有的也坐了牢、受了苦，但最終的結局似乎還過得去，尤其是近來，中外通婚的限制已減少許多。

北京政府對黃賢案和羅孚案的特殊處理，以及對中外通婚的放寬，旨在刻意向外國塑造一個開明的形象，最終目的是向外國財主借款。為了吸引外資而挽救病入膏肓的經濟，北京已到了不擇手段的地步。「一切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當前最大的政治是四化，四化需要外匯」，黃賢獲釋是這一邏輯的必然結果。魏京生及其他一大批坐牢的民運人士，此時只有望「洋」興嘆了。

我們願奉勸北京政府，不認真在國內推行民主與法治，不尊重自己同胞的人權與自由，再向外國資本家「贈送秋波」也是無濟於事的。海內外都在問：黃賢能放，魏京生爲什麼不能放？北京中南海諸君，你們怎麼回答？

中國之春刊頭系中國民主運動先行者孫中山先生墨跡

# 中國之春 China Spring

P. O. Box 243, New York, N. Y. 10185.

Tel: (718)507-6442

(718)429-6777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機關刊物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創刊·總二十五期一九八五年六月一日出版

## 一九八五年七月號總二十五期目錄

"CHINA SPRING is published monthly for \$24 per year by China Spring Research, Inc. 67-17 Woodside Ave, Woodside, NY 11377. Second-class postage pending at Flushing, NY.

POSTMASTER: Send address changes to CHINA SPRING, P.O. BOX 4873, New York, NY 10185."

### 社論

3 ■ 黃賢能放，魏京生為何不能放？

### 讀者／作者／編者

6 ■ 人民日報已構成誹謗罪，中國之春敢於控告人民日報嗎？背景各異，理想相同。因「營私」而致「營公」。「可以理解」是何意思？「理解」並不等於「贊同」。請注意個體化與個體主義的不同。海外民運應該支持什麼？民主運動，不祇「民聯」一家。我對修改國旗的看法。

(中國大陸訪問學者·美國) 柯普復等

### 特稿

9 ■ 人民日報如何報導中國民聯成員的文章 本刊評論員

12 ■ 人民日報轉載中國之春的文章(中國大陸留學生·加拿大) 彭迺逢

14 ■ 胡耀邦「關於黨的新聞工作」一文摘要及質疑

(中國大陸訪問學者·美國) 鳴 鍵

### 向海峽兩岸建言

16 ■ 建議實行中小學課本租借制(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呂東萱

### 民運報導

17 ■ 海內外民運發展及中國民聯近期活動(中國民聯總部宣傳組)

20 ■ 北京知青示威震驚胡耀邦和南海(北京) 董旭生

23 ■ 楊在行獲釋，傳魏京生、徐文立、傅申奇將獲假釋(國內) 張琪露

25 ■ 有信自遠方來——傅申奇近況(中國大陸留學生·美洲) 虞德民

(國內) 顏如平

27 ■ 民主牆前的回憶(北京) 魏忠華

### 本期專訪

31 ■ 陳香梅談其台北——北京之行(本刊記者·大陸留學生) 陳洪林

### 國內快訊／時評

36 ■ 胡耀邦「洩密」背後的北京軍事戰略大轉移(北京) 柳 平

40 ■ 皮包公司的興衰(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黃嘉明

43 ■ 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北京球迷暴亂(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高岑

44 ■ 大陸各民主黨派壽終正寢(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劉斯杰

## 編者的話

這一期的民運報導專欄十分引人注目，有關於著名民運戰士魏京生、傅申奇、徐文立、楊在行等人的近況報告，也有富於情感的回憶民主牆的文章。此外，剛發生的北京知青的大示威，震驚了中南海高層，本刊有詳實報導。國內民運的抬頭，給了我們很大鼓舞。

陳香梅女士訪問台北、北京歸來，接受本刊獨家採訪，深切地談到：中國大陸最重要的是要變革制度。

本期柳平的報導，披露了北京軍事戰略大轉變的內情，對研究中國政治、軍事形勢的人，具有參考價值。

本期專題文章，都是頗具獨到見解的力作。上海社科院黃萬勝的演講稿，留美研究生唐文方的論文，旅法作家張諄的隨感，相信將會引起讀者的思考和議論。

關於一位留學生勝訴美國政府一案的報導，本刊應其要求暫時推延。

## 下期預告

本刊原擬就「民族性，傳統文化與專制制度」專題進行兩期討論，但我們收到的論文太多，而且愈來愈精彩，討論愈來愈深入，因此，我們不得不將此專題的討論延長一期。下期中，旅美華裔學者許莫陳的「中國民族性與道統意識」、國內林文照的「專制制度阻碍科技發展」和香港前「東方」主編寒山碧的「從中西文化探索中國的出路」等文，將把本專題的討論推到高潮。

北京高層人士正在醞釀異動，新星將要升起，下期將有最新的內幕動態報導。

下期還將有另一精彩報導吸引讀者，那就是關於王光美在香港的光大公司及其與趙紫陽合組的紫光公司「紫—趙紫陽，光—王光美」的內幕。

- 46 ■ 變調的拍手歌（中國大陸留學生·日本）黎音  
49 ■ 從給投誠份子發證書說起（中國大陸新移民·日本）童萬菁

## 本期專題

### 民族性、傳統文化與專制制度

- 50 ■ 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國內）黃萬勝  
55 ■ 中日派性之根源（中國大陸研究生·美國）唐文方  
60 ■ 巴黎的狂思——「愛國主義」質疑（中國旅法作家·巴黎）張諄  
71 ■ 文化背景與科學技術結構的演變  
——中國科學技術落後的原因（下）  
（國內）金觀濤 樊洪業 劉青峯

## 專論

- 85 ■ 改革派之堅決性與民運當務之急（澳洲社會科學院院士）黃有光  
留學生園地

- 89 ■ 代丟國格／糾正不正之風有感（中國大陸留學生·法國）林娜  
91 ■ 從高新挖人材所想到的（中國大陸研究生·加拿大）劉田剛  
92 ■ 「五講·四美·三熱愛」新義（中國大陸訪問學者·美國）余典

## 報導

- 13 ■ 中國駐巴使館黃偉榮自殺（華僑·巴西）韓志敏

## 台灣專欄

- 93 ■ 主觀的願望與客觀的事實（香港留學生）林樵清

## 大陸專欄

- 95 ■ 漫談死刑憶亡友（中國大陸訪問學者·美國）劉國平

## 文藝園地

- 97 ■ 我赤着脚在泥土上走（中國大陸新移民·美國）鍾道宏  
45 ■ 為了一個人（詩）（中國大陸新移民·美國）華旒

## 封面

面 難尋出路的下鄉知識青年，他們的前途在哪裏？  
（本刊特邀記者李同麟攝于國內。）



## 人民日報已構成誹謗罪

中國之春編輯：

讀到「中春」廿四期關於人民日報辱罵中國之春的報導，我們查閱了本校圖書館的人民日報，發現貴刊報導屬實。

我認為，人民日報攻擊中國之春的話言相當惡毒、刻薄，所涉及的問題非常嚴肅。比如，中國之春到底接受沒接受台灣津貼？中國之春有沒有貪污華僑的捐款？這是事實抑或捏造的問題。人民日報以肯定的語氣指責中國之春，如果符合事實，語氣惡毒些，中國之春也只好承受。如果不符事實，則人民日報的捏造已構成誹謗罪。

我希望你們討論一下，如果你們光明磊落的話，如果人民日報確屬有意誹謗的話，我建議你們應採取法律行動，以此說明你們的清白，並給人民日報上一堂法治課。

此致  
安好！

中國大陸留美研究生柯普復

一九八五年五月廿日

於馬利蘭州

## 中國之春敢於控告

### 人民日報嗎？

編輯先生：

今日買到貴刊廿四期，看到人民日報攻擊中國之春的內容，深感震驚。我們幾個自費生常常傳閱中春，這次我給一個同學看中春時，首先告訴他：「人民日報罵中國之春了！」他極表關切。他讀後跟我說：「這回要考驗一下中春了，如果人民日報罵的都是事實，中國之春估計不敢控告人民日報，如果人民日報是胡罵，沒有事實根據，中春應該敢於站出來起訴它。人民日報多少年來，不知道造了多少謠，從共產黨的高級領導人彭德懷、劉少奇，到普通老百姓，不知有多少人受夠了人民日報的害。希望中春這次挺身而出，為受害人講話，告它。」

現在美國告報界誹謗罪很普遍，貴刊是否了解這些官司？要控告人民日報，是在美國告？還是在中國起訴？我有一位律師朋友，如請教法律問題，我可可幫一下忙。

盼

中國大陸留學生孫達志

五月十日（紐約）

## 背景各異，理想相同

編輯先生：

看了八四、十二一八五、五共六期的「中國之春」後，心裏由衷的高興。在短短幾個月裏，可以由雜誌中發現，中春的聯繫面廣了，基礎雄厚了，尤其高興的是一些台灣、香港及海外華僑等人士都直接參加了中春的工作，有的並且成了骨幹。這象徵著中華民族的青年一代，打破了前輩所造成的隔閡，為著中國的前途，團結到一起来了。這也象徵著在國共兩黨之間，中間勢力還在慢慢的壯大起來，這將使中國人民的命運掌握到自己手裏。這同時也象徵各種背景的中國人，開始擺脫各種傳統思想的桎梏，逐步地接受一個共同的奮鬥目標：「民主、法治、自由、人權。」

中國大陸留學生

桑羊  
八五年四月

## 因「營私」而致「營公」

編輯先生：

「中春」第二十三期由汪岷先生所寫的專論「中國的多黨政治前途」是一篇很好的文章。我認為每一個中國知識份子都該一讀。

汪先生在這篇文章中有一個值得討論的論點，就是他認為「結黨可以營公」。但我的看法則是：結黨營私也沒有錯。人都是自私的。結黨營公固然是比較高超的理想，但事實上很難做到。結黨營私才是符合人性。世界上有那個不營私的黨？問題是：不能只有你一黨營私，必需要容許其他人也可以組黨營私，故在真正的民主體制中，憲法上一定要容許人民有組黨的自由。既然大家都可以組黨營私，但為了

要爭取人民，乃不得不「營公」了。這次你在台上「營私」過了頭，下次人民就不選你了。但如果只有你一黨「營私」，不容許其他人組黨營私，結果會是越營越私，像今天的國、共兩黨一樣。痛苦的則是廣大的老百姓了！

時祺

祝

讀者高平楊 四月廿五日

## 「可以理解」是何意思？

編輯先生：

貴刊第二十三期的讀者、作者、編者，林樵清答王羽唐的第二封信中，林樵清談到台灣國民黨辦黨外雜誌。其推論相當令人信服。但他又認為國民黨這樣做「在政治運作上是可以理解的。」（見其文）我請問這是什麼意思？你們尚未參與政治就竟然認為這些骯髒的權術運作是「可以理解」的！將來還用說？實在讓人對你們的心態感到悲哀！

王力軍於加拿大

四月二十日

## 「理解」並不等於「贊同」

力軍先生大鑑：

我們都理解到發財致富的捷徑之一是打劫銀行，但我們不會去做又是另一回事。對於您這手三歲看八十的功夫，我認為有重新拜師的必要。因為這並不符合科學和法治的原則。敬祝安好

林樵清

一九八五年五月一日

## 請注意個體化與

## 個體主義的不同

「中國之春」編輯先生台鑑：

貴刊第廿四期已收到，謝謝你們。這一期內容較前豐富得多，現在只看了一部份，已有目不暇接之感。金觀濤等人的文章尤其難能可貴，貴刊今後將更有起色。

對我的那篇訪問，原稿經本人塗改得很亂，因此排印出來有一些小錯誤，勢在難免。例如，「衝動」變成了「衝勁」，「養份」變成了「養傷」等等。不過，這些小錯誤並不會影響讀者了解全文原意。

全文的一個至為重要的概念是「個體化」，其英文原字為 *individuation*，在頁四三出現唯一的一處原文註明，却變成了 *individualism*（個體主義）。

*individuation* 一詞並非我所創，乃佛洛伊德以後（尤其是 Jung 一派）慣用的名詞。它是指個體從人我界線不明朗狀態中逐漸分化出來、確立理性的自我疆界之過程，與作為一種倫理主張的「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是兩回事。況且，*individualism* 既然已有一定的譯法（「個人主義」或「個體主義」），我又何必另譯成「個體化」？因此希望貴刊能於下期更正，說明「個體化」之原字乃是 *individuation*。敬祝編安

孫隆基

一九八五年五月十日

## 海外民運應該支持什麼？

編輯先生：

黃有光先生的「從市場經濟談到民運當務之急」一文（中國之春二十三期），對海外民運的策略提出了相當中肯的意見，值得我們深思。

官僚主義是當前中國經濟改革和政治民主的大敵，一切有助於限制、削弱官僚主義作用範圍的改革主張和措施，我們應該支持。「在改革派還在推行適合生產力發展的改革措施，還在同保守派進行鬥爭的階段，民主運動主要應該是打擊保守派，支持改革派的進步改革。」任何社會進步都有它的相對性，可行的東西往往不是完美的，支持、聲援一個正在艱苦推行的改革措施，會比提出幾個遙遠的目標更為切實有益。這樣看來，貴刊第二十一期社論「售地於民」，主張現在就實行土地自由買賣，這對於中國農村中經濟基礎極其薄弱的廣大貧苦農民來說，恐怕就低估了它的副作用。似有操之過急之嫌。

另外，經濟與政治，固然相輔相成，但經濟的改革，顯然更基本、更深刻、更意義深遠，更是十億人民的當務之急，因而也祇能是海外民運的聲援重點——如果民運要與它的祖國人民共命運的話。在像山一樣的頑固派保守勢力面前，改革派祇能在經濟改革這一面不斷有所推進，也實屬不易了。最近的美國「新聞週刊」說：「如果郵政成功的話，他將是本世紀對世界影響最大的人物之一。」

我相信，經濟改革如果以這樣的勢頭持續下去，必將對古老的中國社會產生不可逆轉的變化，也為「民主、法治」提供了植根的土壤和實行的可能。民主制度決不會在一個封建的

小生產社會裏產生，它祇能隨着資本主義運作方式的漫延而滋生。如果有人在中國推行資本主義因素，他也就直接或間接地把中國推向了民主的進程。

歡迎討論

中國大陸訪問學者 馬俊

於紐約

一九八五·四·十五

## 民主運動，不祇「民聯」一家

編輯諸君：

我很欣賞貴刊第二十三期上的兩篇文章：「民主運動必須步向民主」和「如何避免重蹈國共兩黨的覆轍」。我看出來，刊出這兩文，是要有一點勇氣的。

民主運動，絕不祇「民聯」一家。要不然，民運恐怕就真的沒有希望了。我想，當一個農民企業家在與國營官辦企業競爭的時候；當一個官辦企業的經理敢於起用一個「群眾有爭議」的能人的時候；當一個作家在鐵一樣的書報檢查制度下敢於發表尖銳但又巧妙的「問題作品」（「人到中年」、「高山下的花環」、「人妖之間」……）的時候；甚至當一個「不關心政治」的留學生在悉心研究西方資本主義管理結構的時候，正是他們，奠定了中國民主運動的基石。「中國之春」和其他一切以探討中國民主、推進中國現代化進程為宗旨——如果它們真有這樣宗旨的話——的刊物，都應該是他們的朋友、喉舌和後盾。

我希望在貴刊上再不要看到「一切否認、排斥中國之春的人祇能說明自己的不智與愚昧」這樣不智與愚昧的話了。

握手

中國大陸留學生 詹高白

一九八五年五月

## 我對修改國旗的看法

編輯先生：

1. 貴刊數月前關於修改國旗的建議很好，唯只把黨的一顆大星改小，似乎有商榷必要，原因是對和平統一自由治人權都很難獲得完滿的解釋。

2. (廿一期)王魯生先生投書說，國旗應改，但非其時，要等兩黨開始談判，才建議修改國旗，免得以後一改再改。這點本人並不同意，我們要天天建議兩黨實現民主、法治、自由、人權，而不應等到兩黨開始廢除人治、黨治後，我們再來建議他們實行民主法治罷！因此建議是應該的，讓好的意見提出來，公諸於國人面前，俾國人有所選擇比較，這樣才不致給貪權的政黨官僚蒙混愚弄。過去大陸人民受毛澤東愚弄、摧殘，就是因為沒有人敢建議提出修正或反對意見，現在鄧胡趙雖比毛澤東時代好多了。但是很多人都知道民主、法治、自由、人權還差得太遠，連王若水寫異化論都給打棍子，作家談人性也給套帽子。最近據說文藝比前開放多了，黨代表胡啓立出來說話給文藝界打氣了，從批右變成批左了。這是不是說已經達到民主、法治、自由、人權呢！我們都知道還早！只是框框放大了，但是誰敢挑別過時的四大堅持？誰敢出來批判毛澤東錯誤的思

想與作為呢？除了少數海外知識份子敢挑動這根帶刺的弦外！還有誰敢站在中間的立場，說出公道話嗎！？

3. 現在讓我們談談兩幅現在仍代表着中國的國旗歷史，孫中山先生推翻滿清，完成北伐的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到現在已有半世紀多的歷史。期間領導抗戰接受日本投降一直到退出聯合國算是實際代表着中華民國，而現在却大部份給共產黨取而代之了，除了少數有邦交的國家外，其餘都變了五星旗作為正式外交了。而共產黨五星旗雖有三十多年的歷史，但未進入聯合國前，除在共黨國家通行外，在世界組織上仍不能代表中國，一直到進聯合國後才算正式代表中國大陸。同時事實很明顯目前雙方的旗幟仍然保持着各不相讓的姿態，仍保持着「一黨專政」的形象。因此為了中國未來的和平競爭，或和平統一，我們均應該建議修改國旗，非但修改國旗，而且還要修改憲法。把兩黨加在憲法上的帽子拿下來，改為在憲法領導之下，實行多元政治運作。

4. 世界潮流日新月異，目前是科技資訊時代，全球交往渾然一體，不容許一本通書唸到老，說什麼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或馬克思之共而產之，或孫中山的以進大同就行得通。而是必須在憲法法制實現民主和平自由人權上方能跟得上時代，否則自吹什麼真理或一天等於二十年都沒有用。別人並不聽中國什麼十年翻兩翻，或唱什麼一國兩制之類，而是看中國實際的國防科技經濟政治是不是逐漸的眞正跟着跑上來，是不是說話算數，是不是路子跑對了就不會變，是不是人民生活眞的獲得改善，言論是否自由。這一點很難瞞騙別人的。

此致

編安

一九八五年四月 唐明憲 敬上



胡耀邦說：黨的喉舌就是人民的喉舌。是這樣嗎？請看這個例子：

# 人民日報如何報導 中國民聯成員的文章

／本刊評論員

本刊接到關心民運的中國大陸留學生彭迺逢的來稿（全文見後），現就人民日報斷章取義地報導中國民聯成員的文章一事，發表一下我們的看法，或可幫助理解胡耀邦所稱「黨的喉舌就是人民的喉舌」之涵意。

## 人民日報的確報導過 中國民聯成員的文章

人民日報今年二月十一日在第三版上，以顯著篇幅報導了楊雲先生的文章：「台灣在『祖國統一』聲中應有的變革」（以下簡稱「變革」）。

楊雲先生為美籍華人工程師，對海峽兩岸不同程度地缺乏民主和法治表示失望，他嚮往民主、法治、自由和人權，參加了中國民聯，積極支持推展海峽兩岸民主的運動。他曾多次撰文給「中國之春」雜誌（參閱十九、廿一期「中國之春」楊禎明、楊雲的文章），還曾多次捐款支援民運（參閱廿二、廿三、廿四期「中國之春」封二的捐款廣告）。

楊雲先生的「變革」一文，曾一稿兩投到「中國之春」和台灣民刊「中華雜誌」。「中國之春」於去年十二月一日出版的十九期上，



楊雲先生的手稿首頁（本刊編號310）。發表時徵得作者同意，改為楊禎明。

刊出「變革」一文。刊登時，徵得作者同意，以楊禎明的筆名發表。「中華雜誌」於一個月之後，即今年元月份，也刊出了楊雲先生的文章。

人民日報今年二月十一日在第三版上報導楊雲先生「變革」一文時，稱此文刊於「中華雜誌」，並未提及「中國之春」早於「中華雜誌」刊登此文。

## 人民日報的斷章取義

人民日報在報導楊雲先生的「變革」一文時，大量引用了「變革」一文中對台灣當局統一政策的批評文字（見影印全文）。人民日報最後說：「文章希望台灣當局能夠傾聽海內外人士的這些呼聲。」

讀完人民日報的這篇報導，如果不看楊先生原文的話，立刻給人一個假象：海外華僑和台灣人民都衷心擁護中共的統戰政策。

實際上，人民日報只是斷章取義地摘出了「變革」一文中激烈批評台灣政府的句子，對四、五千字的原作中批評北京政府的文字，一概未提。

楊雲先生在原文中，曾對北京政府不切實

際的統戰政策，有持平的評論和批評。例如他說：「筆者所反對的，不是統一，而是中共不做實質上的改進，只想做政治上層空的結合。」「中共應該了解到，若不能化解台灣對共產黨的恐懼，縱是達到了一個形式上的統一，也只能造成一個大亂後殘破的台灣。」

楊雲「變革」一文結束時，曾有一段畫龍點睛的文字：「筆者希望勸告中共，惟有內政修明，人民富庶，建立法治，實現民主，給予人民應有的自由，才能如孔子所說的君子之德如草上風。」然而，人民日報却把這精彩的一段完全「忽略」了。

人民日報報導海外刊物的文章，是極為少見的，它選中了楊雲先生的文章，加以任己所用、斷章取義地報導，目的當然如胡耀邦所說，是為黨的政策服務，是為了欺瞞國內讀不到原文的人民，使之產生「中共統戰政策獲得了海內外一致擁護」的錯覺。

## 人民日報的一貫做法

讀完人民日報的這篇報導，人們不由想到人民日報的一貫作法。人民日報自建國後，作為共產黨的喉舌，經常採取強姦民意、斷章取

## 《中華雜誌》載文敦促台灣當局 在和平統一新形勢下應有變革

凡進入大陸的  
台灣人回台后  
要受到戒嚴法  
的審理，屬於  
台灣的“海外  
電影院不得同

本報訊 由胡秋原创办的《中華雜誌》今年一月号刊登了一位台灣留美工程師最近返台探親后撰写的文章，题为《台灣在“中國統一”声中應有的變革》。该文分析了祖国和平统一的形势，并向台灣當局提出一些“因应之道”。

文章说，“任何一个中国人到了外国，都会更加爱自己的祖国，因而也渴望中国的统一”。近年来，“中共不断高唱统一，而他在世界上和海外华人中的形象因经济改革，因奥运会十五面金牌而逐渐上升之时，台湾只说‘不’，这决不是对台湾有利的政策”。

文章接着说，在“四人帮”倒台后，邓小平“一方面大刀阔斧地执行改革政策，一面要求台湾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后来，“中共搞活了农业，和美国关系逐渐稳定，收回香港的决心明确，对台湾统一的条件愈宽”。但是，台湾当局对大陆的政策“相应不理”，而今又宣布：

时放映国共的影片”。“这两项政策，在海外舆论认为是一种保守倒退而引起大的反感”，“是少见的一次很难说是明智的政策转向”。

文章强调指出，“对于中共日渐凌厉的统战攻势，台湾势必必要修改他长久坚持的一整套战略，与其不断地躲避，不如灵活地应对”。该文并提出一些“因应之道”，指出：“洛杉矶奥运会，国共双方以体育健儿未能密切往来是十分可惜的”。在其他场合下也有类似的情况，今后在“国际性活动上，国民党应力求主动进取，和大陆派遣人员多加接触”。在国内外各大院校内，“台湾与大陆留学生应先求沟通，建立感情，消弭与减低观念上的差异，让双方学生做未来统一的尖兵”。此外，还应逐渐“无条件地欢迎大陆外留学生、学者个人或组团访问台湾”。文章希望台湾当局能倾听海内外人士的这些呼声。

楊耀文

### 臺灣在「中國統一」聲中應有的變革

楊雲

胡耀邦、楊雲先生是位高名望的民主人士，最近到台北，使中共當局方面深感不安，不得不門門戶戶，嚴加防範，甚至採取戒嚴法，引起各方人士不滿。其中《中華雜誌》、《自由》、《新亞》等報刊載胡先生、楊先生所撰之文章，對中共當局提出一些建議，如：我們相信政府所提出的改革是必要的，但是，在改革中，必須注意保護人權，不得侵犯人權。這些文章，對中共當局提出嚴厲的批評，這是中共當局所不願見的。

胡耀邦先生是位高名望的民主人士，最近到台北，使中共當局方面深感不安，不得不門門戶戶，嚴加防範，甚至採取戒嚴法，引起各方人士不滿。其中《中華雜誌》、《自由》、《新亞》等報刊載胡先生、楊先生所撰之文章，對中共當局提出一些建議，如：我們相信政府所提出的改革是必要的，但是，在改革中，必須注意保護人權，不得侵犯人權。這些文章，對中共當局提出嚴厲的批評，這是中共當局所不願見的。

本報，把中國變成一個世界，少許人知道，三日一版，在國際形勢下，中國大陸上世紀的，對外國，德國的政府，對大陸與美國關係與政治狀況，要說明。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一月

上：人民日報今年二月十一日在第三版上，斷章取意地摘登了中國民聯成員楊雲先生的文章。圖為人民日報的原文。請問人民日報，你們敢把楊雲的全文刊登出來嗎？

右：中華雜誌于今年元月一日出版的一月號上，刊登了楊雲先生的文章。

黨的喉舌就是人民的喉舌嗎？且不論從建國來一系列錯誤的政治運動中，人民日報一貫充當急先鋒的角色（共產黨領袖可以說這都是過去的事了），就拿發生在眼前的人民日報片面報導楊雲先生的文章看，人民日報目前根本不配稱為人民的喉舌。

胡耀邦總書記二月份在中央書記處上關於新聞問題的談話，引起海內外的極大震撼，胡耀邦以往開明的形象頓時蒙上了巨大陰影。胡耀邦指出，共產黨必須控制新聞事業，文藝可以鬆綁，但新聞不能鬆綁。他選說，黨的喉舌就是人民的喉舌，因為黨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

黨的喉舌就是人民的喉舌嗎？且不論從建國來一系列錯誤的政治運動中，人民日報一貫充當急先鋒的角色（共產黨領袖可以說這都是過去的事了），就拿發生在眼前的人民日報片面報導楊雲先生的文章看，人民日報目前根本不配稱為人民的喉舌。

### 黨的喉舌就是人民的喉舌嗎？

義的報導手法。在五十年代「反胡風運動」和「反右派運動」中，在六十年代「三面紅旗、人民公社運動」和「四清運動」中，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文革」運動中，在八十年代「祖國統一運動」、「清除精神污染運動」中，人民日報都硬編造「人民一致擁護黨的路線和政策」的神話，發表了數不清的「毒草」，坑害了人民、坑害了國家、也坑害了共產黨自己。連曾任人民日報總編輯和社長的胡績偉先先都曾坦白地指出，人民日報會一度變為「反黨報紙」。

作為共產黨喉舌的報紙，曾一度變成「反黨工具」，這不值得共產黨自己深思嗎？

人民日報歪曲事實的報導，一旦事實真相被人民群眾了解後，便信譽掃地，這就是為什麼今天大陸人民和留學生不信任人民日報的原因。到頭來，黨的喉舌害了共產黨自己。

# 台灣

## 在「祖國統一」聲中

### 應有的變革

楊禎明



近來，由於大陸對外開放和對內經濟改革方面取得了相當的成效，由於中英聯合聲明簽署的完成，又加上在今夏奧運會中大獲勝利的形勢逐漸好轉，所以即小於一九九九年後第一屆國之大選，也不難期待到「三不」政策的實施，更出了「中國有能力對台灣統一」的話，加上近日江蘇省事件在華人社會中造成的影響，許多人都有理由「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氛。許多人都有理由「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氛。許多人都有理由「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氛。

#### 客觀歷史情勢的回顧

五不是毛澤東發動反右、大躍進與文化大革命，把中國搞成一個落後社會，只愛國五年的小康局面，按照最少需要三三三政策繼續發展，今日中國的局勢要大大的改革，人口可能控制在八億左右，農工與小企業興盛，因為沒有反右，知識界比較活躍，因為沒有文化大革命，人民教育水平普遍提高，這樣的一個社會，雖然在幾年內被毛澤東下派不民主自由，可是對於中國老百姓千百年來所渴望的民主自由，中共的政權使會趨若鶩，因為雙方經濟水平相差不遠，以黨領國的政體也趨向類似，只要雙方領導人同意，就可把南京交給國民黨領導，而黨出一種混合式的兩黨半民主制度，但遺憾的是歷史偏偏走向了反面。

67

中國之春月刊，1985年1月，總第十九期

中國之春在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一日出版的元月號上，刊登了楊雲先生的來稿，署名楊禎明。

衆所周知，「中國之春」和「中華雜誌」都屬於民刊，辦刊的人都是人民的一部份。人民日報硬是把刊登於民刊上的文章斷章取義到欺騙人民的地步，有何資格稱為人民的喉舌？這種報導法，等於先割掉模特兒的鼻子和耳朵，再把模特兒展示給人民，結果，人民錯以為這個模特兒是個怪物！

人民日報這個「模特兒變怪物」的手法太高明，把陶鑄的頭移到陳毅的身子上，就會是傑作之一，至於歪曲別人文章的例子，何止千千萬萬。連共產黨老祖宗馬克思的文章都膽敢歪曲，別人豈在話下！文章長得很，想怎麼刪就怎麼刪，想怎麼登就怎麼登，剪刀反正握在黨手裡。

如果有一天，人民日報突然報導「中國之春」上的文章，說「中國之春」是「擁護四個堅持的」，甚至是「共產黨的喉舌」，我們也不會感到奇怪。

說來可笑得很，人民日報總編輯和社長認為人民日報會變為反黨喉舌，它連黨的喉舌都不配，何配做黨和人民的共同喉舌？說穿了，人民日報只是幾個執政者的傳聲筒而已。

### 看看「中國之春」的做法吧

「中國之春」是大陸留學生創辦的刊物，宣稱為民運的喉舌之一，但從未宣稱過代表全

體人民，從未宣稱過為人民的喉舌。因為，「中國之春」畢竟只代表一部份人的意見。

「中國之春」在報導共產黨的政策時，盡量不歪曲原意。最突出的例子是我們會全文刊登中共文件、全文刊登趙紫陽總理的文章（廿二期）、全文刊登北京官方理論家蘇紹智先生的答記者問（廿三期）等。在刊登原文的同時，我們也發表自己的看法，讓人民自行評判。

請問人民日報，你們敢於全文刊登中國國民黨成員楊雲先生的「變革」一文嗎？

### 如何不再被宣佈為

#### 「反黨喉舌」

新聞自由的目的是讓大家自由發表意見，了解事物的真相，並使輿論成為制衡執政者的力量。控制新聞宣傳的目的，則是欺騙人民，推行愚民政策，維持專制統治。

在當前的中國大陸，為使人民了解真相，可採取兩種辦法。下策是人民日報全文刊登它要報導和評論的文章和談話（這樣做的效果有限），上策是開放言禁，允許民辦刊物。試想，如果「中華雜誌」和「中國之春」能夠在中國大陸自由出版發行，人民日報還敢明目張膽地採用割掉模特兒鼻子的政策嗎？

我們願忠告北京當局，為使人民日報辦得像樣一點，只有將之置於民辦刊物的監督之下。這樣做，對人民有好處，對人民日報有好處，對共產黨自身也有好處。否則，人民日報不但永遠欺騙人民，而且也會永遠坑害共產黨，永遠被新執政者宣佈為「過去的反黨喉舌」！

一心想把人民日報辦成「黨的喉舌」的共產黨領袖們，為使人民日報不再被你們的繼承者宣佈為「反黨喉舌」，你們應該知道怎麼做嗎？

# 人民日報轉載

## 中國之春的文章

(中國大陸留學生 加拿大) 彭迺逢

「中國之春」雜誌第二十四期報導了中共黨報人民日報對「中國之春」的辱罵和攻擊，並發表了評論。

可是，我這個「中國之春」的長期讀者，發現了另外一個重要的、將「中國之春」與人民日報聯繫在一起的現象：人民日報二月十一日會摘要轉載過「中國之春」第十九期上的一篇文章。

### 查證經過

去年十二月一日出版的「中國之春」雜誌第十九期，曾因「台灣專題」轟動一時。我在十二月中旬購得一本，被其內容所吸引。台灣專題中，有一篇署名台灣留學生楊禎明的文章：「台灣在『祖國統一』聲中應有的變革」（以下簡稱「變革」），對台北和北京的政策都有中肯的評論，讀後很受啓發。

今年二月下旬某一天，在免費贈閱的人民日報上（二月十一日第三版），我看到一篇相當醒目的報導：「中華雜誌」載文敦促台灣當局——在和平統一新形勢下應有變革。人民日報報導說：由（台灣）胡秋原創辦的「中華雜誌」今年一月號刊登了一位台灣留美工程師最近返台探親後撰寫的文章，題為「台灣在『祖國統一』聲中應有的變革」。該文分析了祖國和平統一的形勢，並向台灣當局提出一些「因應之道」（原文）。

我讀完這篇報導，大有似曾相識之感。爲什麼文章題目這麼眼熟？一翻「中國之春」，才發現人民日報所報導的該文內容，大都在「中國之春」第十九期楊禎明的文章中可以找到。

初步考慮是：楊先生這篇文章一稿兩投到「中華雜誌」和「中國之春」。還有另一種可

能：「中華雜誌」轉載了「中國之春」的文章，因「中華雜誌」刊載該文，較「中國之春」整整遲了一個月。

無論如何，此事使我感到奇怪：人民日報怎能扼要轉載「中國之春」的文章呢？

前些日子，我在某大圖書館裡，終於發現了台灣立法委員胡秋原先生創辦的「中華雜誌」元月號，上面果然有一篇文章：「台灣在『祖國統一』聲中應有的變革」，內容與「中國之春」上的完全一樣（僅個別段落有小的出入），但作者署名爲楊雲。

我最後決定打電話給「中國之春」編輯部查證，編輯部證實：原稿署名楊雲，後來與作者聯絡後，更名楊禎明發表。

一切都明白了：人民日報二月十一日摘要刊登的，就是「中國之春」十九期上楊禎明的文章。「中國之春」編輯部還告訴我，楊的該篇文章是一稿兩投，但「中國之春」早刊出一個月。

### 兩種可能性

人民日報摘要發表「中國之春」的這篇文章，有兩種可能：一是人民日報根本不知道這篇文章曾在「中國之春」上刊登過；二是人民日報「明知故犯」，借轉載「中華雜誌」文章之名，「曲線」報導一下「中國之春」的文章。據稱，人民日報的很多記者可以讀到「中國之春」。但我推測，第一種可能性爲大，但第二種可能性也難以完全排除。

### 幾點評論

課餘時，瀏覽海內外、左中右各種華人報刊，是一大享受，這是一種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的享受，只有在海外，才有這種享受。在國

內，像「中國之春」和「中華雜誌」這樣的刊物，只有高級特權人物才能讀到。

看着人民日報轉載「中國之春」和「中華雜誌」的文章摘要，心中浮起很多聯想。

第一，「中國之春」上的很多文章，是相當中肯的。有些人民日報今天的提法，「中國之春」雜誌上早在半年前、甚至一兩年前就提出了，但是，為什麼人民日報不轉載和報導呢？為什麼自己的留學生所辦的刊物，政府領導人竟然那麼害怕呢？記得我們出國前在北京集中時，教育部特地指示我們：到了美國，對中



國之春要採取「三不」政策，即「不接觸、不理睬、不介入」。有的領導還特別叮囑一下，中國之春是叛國集團，要十分小心。可是，領導的指示和叮囑，反而增加了大家的好奇心。我到美國第一個想找尋的刊物就是「中國之春」。得到一看，呵，果然是我們留學生自己的刊物！看得過癮極了。

其實，「中國之春」雜誌上，比「變革」一文更符合改革派胃口的文章多得很多，為什麼人民日報不加轉載和報導，反而要借江南之口，對「中國之春」大加辱罵呢？人民日報報導的「變革」一文作者楊雲先生，還在「中國之

春」第廿一期上發表過一篇很有水平的建設性文章「從美日電腦在歐洲市場的優勢簡談中國資訊工業的發展」，對中國大陸如何發展資訊工業，提出了不少建設性意見。像這樣的好文章，人民日報或其它國內報刊，不應該簡要報導一下嗎？

第二，我比較了一下「中華雜誌」和「中國之春」，持平而論，台灣出版的「中華雜誌」要比「中國之春」「右」多了，「中國之春」應該算是較為中立的。既然人民日報常介紹台灣「中華雜誌」的觀點，為什麼不能介紹一下「中國之春」的觀點？說穿了，人民日報報導「中華雜誌」，完全出於統戰需要。但是，對於「中國之春」這樣持平、中立的留學生刊物都不能容忍，台灣國民黨和海外僑胞能相信北京的統戰誠意嗎？

第三，我對照原文，檢查了一下人民日報關於楊雲先生文章的報導，發現人民日報只撿自己願聽的登，凡文章中批評北京政府的内容，一律刪除了。這樣做，給國內人民造成了一個假象：好像台灣人民和海外僑胞都「擁護」北京的統戰政策，都「願意」回到專制制度的懷抱似的。這種與事實出入太大的宣傳，等於給自己埋下禍根，將來真相大白之時，人民又有受騙的感覺。此點，請人民日報深思。

第四，「中國之春」雜誌的文章，常被各家報刊轉載，這是其影響力逐漸增大的表現。比如，人民日報屢次報導的台灣「中華雜誌」，就曾多次轉載「中國之春」的文章。這次，人民日報也「間接」地摘要轉載了「中國之春」的論文。這說明，國共兩黨中的開明派，很大程度上已認同了中國之春所標榜的「民主、法治、自由、人權」的原則，這或許是中國的希望所在吧！

## ● 報導 ●

### 駐巴西使館管制苛嚴 職員黃偉榮逼上絕路

(華僑·巴西) 韓志敏

據一位在中國駐巴西大使館內工作的朋友透露，該使館的一位三等秘書黃偉榮突于一九八五年三月三十日晚十時在使館宿舍內上吊自殺，當黃君被一使館幹部陳篤慶發現後送達巴伐利亞三軍總院急救時，黃已氣絕身亡。

中國大使館曾要求取回黃自殺時所用尼龍繩，並請求巴西官方勿就該事發佈新聞。

黃偉榮，現年卅二歲，上海人，其他背景，不詳。

據巴西警方調查透露，該使館領導對館內人員管制甚嚴，館內人員不但在工作上動輒得咎，而且在生活起居等項事上也均無自由，甚至上司動輒以「如不努力工作，即遣返國內加以處分」等語來恫嚇警告職員，因此，職員們個個謹言慎行，若有惶惶不可終日之狀。在這種長期壓制下，黃的心情越來越鬱悶。在自殺前數日，黃的情緒突顯異常不佳，精神恍惚，後來又遭上司嚴厲責罵，以致黃在三月廿九日內滴水未進，最後黃對人生意義感到絕望，遂于次日在宿舍內上吊自殺。

後來使館索回黃君遺體，將其火化後即速送返大陸。

黃偉榮之死，是繼去年十二月中國駐美國紐約使館發生的張信案之後，又一大陸人命喪領事館的案事件，這實在是中國使館史上的又一不光彩的記錄。

作為一個有同病感、尊重人權的華僑，我不能對此保持緘默。我對中國使館給予自己同胞這種非人的待遇及無視人權的行為表示強烈的氣憤！同時我也為黃偉榮表示深切的哀悼！

# 胡耀邦「關於黨的新聞工作」一文摘要及質疑

(中國大陸訪問學者·美國) 鳴 鍵

一九八五年四月十四日人民日報發表了胡耀邦於今年二月八日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的發言——「關於黨的新聞工作」。此文一經刊出，馬上引起了香港的新聞界人士及海外知識份子的強烈議論。由於香港及海外報刊都已就胡的發言發表了大量的評論文章，故筆者在此不再詳加評論。但為了使一些沒有機會看到人民日報的留學生及朋友們也能了解到胡耀邦發言的基本內容，故將其發言摘要轉登，并在每段後面，筆者再就其論點提出一些問題，以便引起大家的思考（編按：楷書字為胡耀邦的發言，宋體字為作者提問）。

## 關於喉舌問題

胡：……黨的新聞事業是黨的喉舌，自然也是黨所領導的人民政府的喉舌，同時也是人民自己的喉舌。……既然我們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黨的工作路線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那麼黨的新聞事業……就

理所當然地包含着既要使上情下達，又要使下情上達的作用，包含着黨同人民群眾的聯繫，反映人民群眾獲得信息的需要的作用。因此，從最根本的特徵來說，黨的新聞事業是黨的喉舌。

問：從表面上講，黨的新聞事業是黨的喉舌，因為所指新聞事業本身就是屬於黨的，就像張三的喉舌是屬於張三的一樣，然而，黨的新聞事業畢竟不像張三的喉舌那麼簡單。中共建國幾十年來，黨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都犯了嚴重錯誤，例如五十年代的「肅反」（肅清胡風反黨集團）、「反右」、「大躍進」，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四清」、「文革」，甚至到八十年代的「清污」等重大事件都已被中共中央否定，然而，在這每一荒謬錯誤的事件中，黨的新聞不僅未能充當人民的喉舌，而且也未全面地充當黨的喉舌，反而充當了少數野心家、陰謀家的喉舌，以致黨的新聞在一系列錯誤政策上更是火上加油，在黨和群眾的關係上進行欺上蒙下，向一大批敢講真話的幹部和知識份子扣了無數個帽子、打了無數棍子，特別在文革期間，黨的宣傳工具更被毛澤東、林彪、

四人幫等野心家、陰謀家壟斷，以致造成空前的十年浩劫，像這樣的新聞事業難道還配稱為黨的喉舌？擁有這樣的新聞事業的黨將又給人一個什麼樣的印象？僅充當黨的喉舌，為患已經夠大的了，但它還硬要充當政府和十億人民的喉舌，這將是何等的可怕？

黨自己的新聞事業既然不能保障一直正確地充當黨的喉舌，那麼它又怎能充當人民的喉舌？

黨有自己的新聞事業作為自己的喉舌，為什麼人民不能有自己的新聞事業作為人民的喉舌？

即使黨的新聞事業有資格充當黨的喉舌，那麼它也只能是黨的喉舌而已，而且人民的喉舌就是人民的喉舌，怎麼能由任何黨派來取而代之呢？即使有些時候黨的聲音和人民的聲音是一致的，那麼黨就能因此壟斷人民的喉舌嗎？例如你和一位朋友的聲音完全一樣，但你能把這位朋友的喉舌堵塞嗎？

胡先生稱黨是「為人民服務」的，是人民的「公僕」，那麼人民當然是黨和國家的主人了，請問胡先生，世上有哪個僕人能像我們的「公僕」那樣敢對他的主人說「因為我是為主

人服務的，所以我的喉舌就是主人的喉舌，而主人不必再有喉舌」？

黨的新聞事業是黨的喉舌，精確地講，胡先生是否意味着誰掌握了黨政策的最高權，它就是誰的喉舌？因為幾十年的歷史事實如此。

## 關於創作自由

胡：最近經過討論，大家認為文藝必須有充分的創作自由。新聞工作不能照搬這個口號呢？我認為不宜簡單的照搬。

提創作自由，並不等於說報刊和出版社的編輯部對於作家的不論什麼樣的作品都必須加以發表和出版。人們的自由或權利總離不了一定的責任或義務，沒有無責任的自由或無義務的權利，從來就不存在什麼絕對自由……：今天我們的作家在社會主義國家裏創作，作家當然享有完全的創作自由。但是我們黨仍然有責任在必要的時候向他們提出完全同志式的建議和勸告，社會主義國家也有它的有關出版的各種法律規定。我們的刊物、報紙、出版社的編輯部也可以有所選擇，有權決定發表或者不發表某篇作品。編輯部的決定也可能不正確……：作家總不能以自己的自由來剝奪編輯部的自由。

問：新聞和文藝的性質和職能是不同，但這就能構成限制和剝奪新聞自由權利的理由嗎？

作家若僅有創作自由而無出版和發表作品的自由，所謂創作自由不就成了無法兌現的空頭支票了嗎？

世間是不存在什麼絕對自由的，但中國人民至今連最基本的言論自由都沒有，胡先生怎能侈談所謂的絕對自由？

我國有關出版的各種法律規定的主旨若是限制人民出版自由的，那麼怎能代表人民的利益呢？

作家不能以自己的自由剝奪編輯部的自由，這在西方民主國家也是如此，但我們的刊物、報紙、出版社的編輯部的自由權能完全不受黨的限制嗎？否則，編輯部又怎能享受自己應有的自由權？

## 關於新聞形象

胡：那麼能不能把黨的新聞工作同經濟體制改革相提並論，說是既然企業要成為相對獨立的商品生產者，黨的新聞部門也照樣來辦呢？我認為這種提法也是很確切的……：無論進行什麼樣的改革，都絕不能絲毫改變黨的新聞事業的性質，改變這一工作同黨的關係……：新聞事業作為黨和政府的喉舌好不好？光彩不光彩？我認為應當明確地回答：好得很，光彩得很……：代表黨來發言，怎麼不光彩呢？……：

問：黨的新聞事業曾經為某些企圖篡奪黨權、迫害異己的野心家大造輿論，為毛澤東編造個人崇拜的神話，同時亦向人民發號施令，以階級鬥爭論蠱惑人民互相迫害，向許多革命幹部和知識份子扣帽子、打棍子，等等，難道這樣的新聞事業仍能作為黨的喉舌而還帶着它那令人恐怖的「光彩」？

## 關於不同聲音

胡……：聽說有這麼一種意見，認為既然企業可以有個體的和個體聯營的，新聞也可以照樣來辦，為什麼我們國家不可以有不同的聲

音呢？我說這要作一點政治分析。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代表官方立場的報紙一般不大受歡迎，所以辦報往往都以「非官方色彩」的「民辦」面目出現。其實有的所謂「民報」，就是報團辦的，而報團後邊是財團。在我們社會主義國家，黨和政府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至于說到不同的聲音，要看是在什麼問題上的不同的聲音。如果是在國家的政治方向和基本政策問題上，那麼，如前所說，我們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在這些根本問題上大家的聲音相同是必然和自然的，硬要發表「不同」的聲音就反而是不自然的了……：

問：不錯，西方國家的一些民辦報刊是由某些財團支持的，但胡耀邦先生知道他們的報刊必須在和人民利益保持一致的前提下才能生存下去嗎？

胡耀邦既然說黨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那麼為什麼還怕聽到不同的聲音？人民的利益若能和黨的利益一致，縱有幾點不同聲音，與黨又有何損呢？聽不到別的聲音，當然一切都是「一致」的了，偌大個中國，萬馬齊喑，難道這是自然的？

## 關於實事求是

胡：第一是真實性。我們是無產階級政黨，當然要講真實，要按照事物的本來面目認識和說明事物。所以我們歷來主張實事求是，力戒虛誇……：報紙上，大體應當是八分講成績、講光明、搞表揚，二分講缺點、講陰暗面、搞批評。

問：胡耀邦對報紙的二八分的限定符合實事求是的態度嗎？世界上有哪個國家政府能準確地預言他們的未來社會的光明與黑暗的比例？

# 建議實行中小學課本租借制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呂東萱

美國的中小學教育屬於義務教育(私立學校教育除外)，學生上學既不付學費又不要花錢買課本，課本乃是在每個學期初由學校免費借給的，但學生在期末用完後一定要如數歸還給學校。在還書時，學校有關圖書館人員對每一本書進行檢查，一旦發現誰的課本有非自然的破損或在內頁上有不允許的塗抹時，檢查員將酌情罰款。如有學生把書丟失了，那當然是照價賠償了。但這些規定早在學生入學的第一學期就由老師詳細預告和解釋了。並加以公道德法則教育，因此美國的中小學生一踏入校門就開始習慣地設法愛護自己的課本，因此也就很少有學生在還書時受到罰款或賠償。

新學期開始時，學校再把收存的課本照例借給新來的同級學生，而上期的同級學生則升高一級，借用上期較高級用過的課本，就好像學生在半年半年地往上升，而每一級的課本則只作半年半年地原地跳躍。這樣，一套課本竟能用上很多年而不重印。不過美國的出版商在裝訂書籍時，除了普通的小說等書籍外，多採用硬紙板做封皮，因此凡有價值的書籍用起來都特別易于保存，以致經久耐用。

當學生在升學時如果需要課本復習，則可到各地的圖書館去借。美國這種圖書館很普及，圖書館裏一般還都存有豐富的課外讀物及各種參考資料。

至於課本的內容，則因各州略異，但各校的領導在選用教材時必須以美國聯邦教育部規

定的教學大綱為准則。由於美國在中小學方面的教育比較偏重于學生對基礎知識、社會常識的掌握及各種實踐活動，而不太強調向中小學生過早地貫輸太抽象高深的理論，也不嚴格要求學生死背書本，但課本的編制內容及形式却很能激發學生們對知識探求和學習的積極性，因此課本用上很多年後基本上沒有因時間的變遷而出現在內容上的不適時宜，更何況學校在任何時候都可靈活地指定給學生一些必要的補充教材等。

據我後來發現，英、蘇、西德等國亦是對中小學生採取免費的租借教材。

我國是一個地大物博，人口約十億的大國，每年在校的中小學生人數約有一億，平均每人在每學期需要六本課本(小學設有政治、語文、歷史、地理、數學、物理、化學、生物等)，由於我國中小學生每學期都要購買新課本，因此國家在每六個月間就要出版、運輸約六億本中小學課本(還不算老師用的教材)。每個課本的售價平均按五角錢算，那麼每年全國中小學生花在書本上的總錢數就是六億元人民幣。每本書用紙重量平均按三百克計算，那麼每年國家用在中小學教材上的紙墨就是三億六千萬公斤或三十六萬噸。每年這筆龐大驚人的耗資倘若讓強大的美國或富強的日本等小國家來承擔，也許舉重若輕，然而它却是由一個貧而落后的中國默默担了幾十年，至今還不顯出倦意

哩！事實上，中國真的能對這個担子勝任愉快嗎？恐怕不見得吧。

記得在七十年代末期，每逢學期開始。各地的新華書店的教材都堆積如山，然而許多學校的部份學生在開課後好多天竟還領不到課本，故不得不幾個學生公用一本書。由于紙張的缺乏，甚至學生連作業簿或筆記簿都買不到。而出版印刷業的薄弱更不能滿足廣大人民對文化生活學習日益增加的需要。

爲了盡快提高我國文化教育的質和量，爲了減輕國家和人民不必要的負擔等，故建議我國教育部參考外國的教育制度，制訂出一個有長遠計劃的中小學教材租借方案。在這個方案中，有三個重要的因素不應忽視：

第一、屬於基礎知識的課本，如語文、歷史、地理、數學、物理、化學在編寫內容上應摒除政治上的摻雜，否則課本難有持久的價值，特別中國政治又是多變劇變的。但可單編政治常識課本。

第二、根據需要，全面計劃合理地在全國各地建立中小學圖書館，否則課本租借就不可能，普設圖書館還可給偏遠鄉村人民提供學習條件，實是長遠之計。

第三、課本裝訂應採用硬紙卡作封皮，否則課本難以經久耐用。

上述三項建議僅作參考。教育乃國之本，願我國政府能作百年計。



# 海內外民運發展及 中國民聯近期活動

## 中國民聯總部宣傳組

中國民聯北京成員援助知青大示威

自一九八五年四月廿六日起，北京下鄉知青發動了一場大示威，該次示威持續達八天之久，先後參加的人數達八百多人，示威者多為十幾年前下放到山西的北京知識青年。十幾年來，山西的北京知青大部份都回到北京，剩下的一萬多人，都是一點兒後門也沒有的老實人。在「沒有前途、沒有希望」的境況下，他們聚集在北京王府井市委大樓前，舉行靜坐示威。他們向大樓裏面高喊：「請問大樓裡的幹部，你們有誰的子女還在山西？」

這是一次爭民主、爭人權的正義鬭爭。這次示威不僅震驚了北京市委的領導，而且震驚了中南海高層（詳見中國之春雜誌二十四期報導）。

在這次知青大示威中，中國民聯北京的成員，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協助了知青的正義行動。中國民聯成員的活動分為如下幾個方面：

(一)積極參與示威行列。這次活動由下放到

山西的知青策劃，事發後，北京的某些待業（失業）知青也參加了行動，其中包括中國民聯的成員。在「中國之春」雜誌第二十一期內，我們曾報告了「北京待業青年組成小組，響應中國民聯」的消息，在「中國之春」雜誌第二十四期內，我們又刊登了參加中國民聯的北京知青托人帶出的數份呼籲書。這次，他們用實際行動，參與了爭民主、爭人權的鬭爭。

(二)中國民聯在京成員，將某些通過特殊渠道獲得的消息，及時轉告了示威活動的組織者，配合了他們的行動。

(三)中國民聯在京成員，利用一切機會，積極向市民傳播了這次知青示威的信息。

參與這次活動的民聯成員們，決心總結經驗，為推動更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做準備。

中國民聯與國內聯絡渠道增多

在民主運動中，彼此聯絡、互通信息是十

分重要的。尤其在今天，中國大陸的形勢發展甚快，跟不上形勢發展，則如同瞎子行路。

自中國之春運動開展及中國民聯成立以來，中國民聯總部和各分部就十分重視建立與國內的聯絡渠道。由於技術上的困難，所建立的一些渠道有些始終未能「暢通」。

近來，隨着中國大門的開放，內外聯絡的途徑日漸增多，借此東風，中國民聯也建立了一些較為「暢通」的聯絡管道。

由於管道增多，而且新建的管道較為通暢，海內外信息的溝通加強了。

比如，「中國之春」最早報告了解放軍準備恢復軍銜及第一批元帥、大將名單難產的消息。

再如，早在一九八四年八月號十四期「中國之春」內，中國民聯國內某小組即撰文報告，胡啟立已相當於中央書記處副總書記的角色，並將升任政治局委員。中國民聯國內某小組的這份資料，是根據當時胡耀邦四處奔走、與地方共青團派系幹部的談話精神匯總的。最近



四月廿二日至廿四日，即彭真訪日期間，日本政治團體「大行社」的宣傳車，載着中國民聯日本分部擬定的「中國要民主、法治、自由、人權」的標語，在東京街頭進行宣傳。

，胡耀邦正式向海外記者宣佈，胡啟立將在今年黨的特別代表大會上進入政治局。

此外，「中國之春」雜誌早在今年元月一日出版的第廿期內，就曾預報胡耀邦準備撤換上海市領導幹部的消息。這是中國民聯上海市某小組在去年十月份向總部所報告的上海市動態之一。最近，外電報導，胡耀邦已決定撤換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國棟和市長汪道涵。像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

中國民聯呼籲廣大留學生和僑胞，為海內外民主力量的聯絡工作繼續作出努力。

### 留學生歡迎中國民聯的服務工作

「中國之春」雜誌四月號及「中國之春簡訊」第四期刊出的中國民聯為留學生及外出人員服務的廣告，在廣大留學生中產生了反響，要求中國民聯幫助解決困難的公自費留學生愈來愈多。中國民聯針對情況，正在一一處理當中。

一位留學生說：「民聯是『人民的大使館』，民聯為我們留學生服務。而北京駐外使領館，只是『官方大使館』，只為外出訪問的政府高級官員服務。」的確，我國駐外使領館雖設有留學生管理處，但重點是「抓留學生的政治思想工作」，對於留學生，特別是自費生的私人事情，如打工、調換學校等，無暇顧及。至於找經濟擔保人，使領館更是無能為力，使領館工作人員自己還想找找人擔保親屬出國學習呢！

中國民聯的聯絡站、聯絡點遍於各地，我們將繼續加強服務留學生及外出人員的工作。

### 澳洲分部在胡耀邦訪澳期間的活動

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胡耀邦、書記處書記胡啟立等一行，自四月十三日至十八日訪問了澳大利亞。中國民聯澳洲分部在此期間積極展開了活動。中國民聯成員於四月十三日、十四日和十五日分別在墨爾本、悉尼和伯斯三市唐人街等處派發了大量的中英文本的「致胡耀邦的公開信」，澳洲分部還將公開信寄至澳洲政府機構、新聞機構、人權組織和中國駐澳使領館。中國民聯澳洲分部致胡耀邦總書記的公開信全文如下：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胡耀邦總書記：

我們是一群愛國的中國青年，為了尋求中國通向民主和繁榮的道路，我們投身於「中國之春」民主運動中來了。

在你來澳訪問之際，我們鄭重地向您提出如下幾點建議和認識：

- (一) 中國是中國人民的，不是共產黨的，所以黨應該還政於民！在過渡期間，允許中國人民有各項人權的權利，並承認各種民主運動組織，包括「中國民主團結聯盟」在內的合法地位。
- (二) 立即釋放所有在押政治犯，當場燒燬一切黑材料，解散一切秘密政治監獄和集中營。釋放被捕民運人士，包括魏京生在內。
- (三) 共產黨應從一切學校、工廠、機關、團體中撤出，黨不能凌駕一切，讓人民自行解決其職權。
- (四) 放棄黨高於人民的一切特權，施行公開選舉。

(五) 進一步推進經濟改革，給中國人民以更多的經濟自由，黨不管經濟，實行自由經濟計劃。

(六) 以中華民族榮辱為重，放棄武裝侵攻台灣的威脅，促進大陸與台灣的人文科學競爭，最後達成和平統一。

(七) 承擔起海外華僑的民族責任，聲援東南亞地區受歧視和壓迫的華僑。對待海外華僑的漠視不理態度，應當改變。

(八) 香港於一九九七年後，必須由香港人民自行選擇其政治道路，絕不允許重蹈西藏的悲慘收場。

願祝  
旅途愉快！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 謹啟  
澳大利亞分部委員會  
一九八五年四月十四日

### 澳洲分部致胡耀邦公開信的中英文本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澳大利亞分部  
致胡耀邦總書記公開信

CHINA ALLIANCE FOR DEMOCRACY (CHINA SPRING)  
AUSTRALIA DIVISION

14 APRIL 85  
SYDNEY, AUSTRALIA

Dear Mr. Hu Yaobang,  
We are a group of young Chinese who take part in the China Spring Movement in order to achieve a democratic local system in China.

While you are visiting Australia, we would like to express our views to you:

- The party should have to relinquish all the political power to the people. All the political parties and organizations should be allowed to compete for the political power. The party should not be the only one to have the political power. The party should not be the only one to have the political power.
- The party should have to relinquish all the political power to the people. All the political parties and organizations should be allowed to compete for the political power. The party should not be the only one to have the political power. The party should not be the only one to have the political power.
- The party should have to relinquish all the political power to the people. All the political parties and organizations should be allowed to compete for the political power. The party should not be the only one to have the political power. The party should not be the only one to have the political power.
- The party should have to relinquish all the political power to the people. All the political parties and organizations should be allowed to compete for the political power. The party should not be the only one to have the political power. The party should not be the only one to have the political power.
- Further social-economic reform is needed in the mainland. More freedom to trade should be given to the people. Family a free enterprise economic system must be allowed to exist.
- While you visit China, please let the Chinese people know that the Chinese people will not allow the Communist Party to remain in power for ever. A democratic reform is needed in the mainland.
- The responsibility to the Chinese people should not be neglected. After 1989, the Chinese people will demand their future on their own. We hope that you will have an excellent achievement while visiting Australia and your trip is successful.

China Alliance for Democracy (China Spring)  
Australia Division Committee

All Correspondence  
C/O P.O. Box 1287, Melbourne 3001  
P.O. Box 1287 Melbourne, Victoria 3001

#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日本分部

致彭真的公開信

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常務委員會 彭真委員長：

首先，我們對您前來日本進行訪問表示歡迎。您年事已高，近年又很少出國，現在有機會到日本來訪問，確實難能可貴。

以往中國的党政領導人出訪各國，多是向發達國家求經濟援助、洽談貿易、引進科技、採購軍火或進行全球性的競戰工作。我們殷切希望您此次出訪日本能增加一個重要內容，就是認真而虛心地觀察和學習發達國家的自由、民主制度與法治、人權精神。

在「文革」中，您曾遭受過殘酷迫害，吃盡失去自由、淪喪人權的苦頭。因此，我們相信，您是理解民主、法治的可貴，更明瞭自由、人權的價值。

在此，我們要再次遺憾地指出，目前的中國仍是一個一黨專制的、少數人可以任意擺佈人民命運的、沒有民主的國家。所謂的「人民民主」只是一句空話，自由被剝奪、人權被踐踏。法治被扼殺，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隨時隨地可以找到例證。這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1  
~中華高次業者，能正視現實，標榜「一黨專制」對中國民主團結聯盟的歧視偏見，允許中國民主團結聯盟在國內合法存在，允許「中國之春」雜誌在國內註冊發行，立即釋放一切在獄的民運份子及持不同政見者，摘掉他們「反革命」的政治帽子，給一切愛國者以報效國家、服務於民的機會。唯此才對國家、民族、人民真正有利，不待您曾經建國的自由、平等、博愛精神。  
願祝  
訪問成功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日本分部  
一九八五年四月 於東京  
ALLIANCE FOR DEMOCRACY

2

中國民聯日本分部致彭真的公開信。

## 日本分部在彭真訪日期間的活動

一九八五年四月廿一日至卅日，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彭真訪問了日本。

在彭真訪日期間，中國民聯日本分部向中國駐日本大使館、中國駐日各官方機構和團體組織、各大學的中國大陸留學生和日本新聞界等，散發了一封致彭真委員長的公開信。

中國民聯日本分部還與日本有關團體和友好人士聯繫，請求他們予以協助。四月廿二日至廿四日，日本政治團體大行社出動宣傳車，懸掛着我日本分部擬定的標語「中國要民主、法治、自由、人權！」，在東京鬧市區及中國大使館附近，以「致彭真公開信」為主要內容，進行了宣傳演講。

以下為日本分部致彭真公開信全文：

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常務委員會 彭真委員長：

首先，我們對您前來日本進行訪問表示歡迎。您年事已高，近年又很少出國，現在有機會到日本來訪問，確實難能可貴。

以往中國的領導人出訪各國，多是向發達國家求經濟援助、洽談貿易、引進科技、採購軍火或進行全球的統戰工作。我們殷切希望您此次出訪日本能增加一個重要內容，就是認真而虛心地觀察和學習發達國家的自由、民主制度與法治、人權精神。

在「文革」中，您曾遭受過殘酷迫害，吃過失去自由、淪喪人權的苦頭。因此，我們相信，您更理解民主、法治的可貴，更明瞭自由、人權的價值。

在此，我們要再次遺憾地指出：目前的中國仍是一個一黨專制的、少數人可以任意擺佈人民命運的、沒有民主的國家。所謂的「人民民主」只是一句空話。自由被剝奪、人權被踐踏

、法治被扼殺，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隨時隨地可以找到例證。連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也不過是「橡皮圖章」而已，您總不會否認這個事實吧？

如果您認真觀察和研究一下就不難發現，世界上一切發達國家成功的經驗，都離不開民主的社會制度這個前提。倘若沒有多元化的民主制度做保障，無論是經濟、科技、文化以及其他各方面的改革，對人民而言都將是空中樓閣。所以，中國當則急需的是政治上的開放和變革。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至今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為了祖國早日富強，中華儘快騰飛，使中國成爲一個真正具有民主、法治、自由、人權的社會，此外別無所求。我們講的一些話，你們聽起來可能不舒服，但良藥苦口、忠言逆耳，只要你們不是站在一黨私利的立場，而真正是從國家與人民利益的大局出發，去平心靜氣地想一想，就會明白我們的所作所爲都是正確的。

我們希望黨和國家的最高決策者，能正視現實，襟懷坦白，消釋對中國民主團結聯盟的狹隘偏見。允許中國民主團結聯盟在國內合法存在；允許「中國之春」雜誌在國內註冊發行；立即釋放一切在獄的民運份子及持不同政見者，摘掉他們「反革命」的政治帽子，給一切愛國者以報效國家、服務於民的機會。唯此才對國家、民族、人民真正有利，不悖您曾經追求的自由、平等、博愛精神。

願祝

訪問成功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日本分部

一九八五年四月

於東京

## 聲援北京知青爭人權的鬥爭

# 北京知青示威震驚胡耀邦和中南海

(北京)董旭生

從四月二十四日起，中共北京市委大樓前發生了一連八天的遊行靜坐及示威，參加的人先後達八百多人，時間長達八天，這是西單民主牆被關閉以來最浩大的一次群眾運動。參加者大多數是十六、七年前從北京下放到山西省各地的中學生，現在已是三十多歲的成年人，許多人已經結了婚，有了孩子；有的已經到了附近的縣城當了工人，要求回到北京定居，他們用四幅長達十多公尺的紅布作標語，表明他們是文革的受害者及他們請願的決心，並呼籲「救救我們，小平同志」。有的知青家屬和北京待業青年爲了表示同情和支持，也參加了靜坐和示威活動。

這次抗議、示威，曾經事先串聯，成立了一個領導小組，北京市民大力支援，提供了住所、食品等；中國民聯在北京的某些成員積極推動了這次示威活動，與一些「知青」代表進行了交談，替他們做了宣傳、服務工作。

事實上，從北京下放到山西省的「知青」和放下到其他各地的「知青」一樣，老早已經

不斷倒流回城，其中能「捷足先登」的，當然是享有特權的幹部子女。因此，他們在請願中質問：「請問市委大樓內的幹部，有沒有子女仍在山西？」這些倒楣的老「知青」下放十幾年，仍然不能回城與親人團聚，使他們感到沒有前途、沒有希望、沒有個人幸福，有一位請願者的家屬因爲不能和親人團聚而泣不成聲；有一位請願者說，他本人倒不在乎在山西吃苦，但希望他的孩子能回到北京，生活得好點。

### 一、事件起因

中共統治中國大陸已經長達三十多年，人民不但在政治上沒有民主、自由可言，而且生活貧困。不然，爲什麼有那麼多人不願在大陸生活，想方設法，冒生命危險往香港逃？據報導，僅去年一年，因偷渡香港而被香港當局遣返大陸者達一萬多人，而最近幾年被香港當局

遣返大陸者則達幾萬人以上。在大陸內部，城鄉之間的生活差距懸殊；大、中城市之間，中、小城市之間生活也有差別。在城市裡，只要不是黑戶黑口，就可以按戶口買到供應糧，一個成年人的供應糧是二十六斤或略多一點，也有煤、油及副食品的供應，如果有工資收入，又不亂花錢，一個人的生活就基本上有保障。但在農村則不然，在農村分配糧食的多少要看收成好壞及勞動力的強弱，燃料要靠上山砍柴，起早摸黑，終年辛苦，而往往落得衣、食不周。因此，在農村的人想到城市去生活、定居，而中、小城市的人又想到大城市去生活、定居，反之，城市居民不願到農村去定居、落戶。也就是說人口的自然流向是從農村到城市，從中、小城市到大城市，而不是相反。但是，由於中共的戶口管制極其嚴格，使這種人口的自然流向受到極大的限制，因此，城市中的黑戶黑口，越來越多，城市的人口仍然不斷膨脹。現在北京的人口已經達到九百三十萬，上海的人口則已超過一千

二百萬。中共無法解決城市人口膨脹的問題，除了採用極其嚴格的管制戶口遷徙的方法外，還採用生硬的行政手段，把城市人口「下放」農村。毛澤東說：「知識青年要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又說：「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裏是大有作爲的。」沒有在大陸生活經驗的人聽到這兩句話可能以爲無足輕重，而且可能說：「我不去就是了」他們不知儘管你心中不願意，不響應他的「號召」是不行的。事實上，全國「知青」下放農村者達一千多萬人，有的家住上海的「知青」，離別家中的親人，萬里迢迢，來到新疆，成了「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成員；有的人奔赴西藏，有的人奔赴「北大荒」，而北京市的「知青」則大多下放在山西省，人數約有四十萬左右，而現在仍在山西的，只有兩萬人了，有後門，有背景的，早已回城，不僅當了幹部，而且多了一項下鄉「鍍金」的資歷，記入履歷表，裝入檔案袋，成了「入黨」、「提幹」的政治資本。這當然引起了未能回城的「知青」的不平之鳴。因此，自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一年間，發生了廣泛的抗議活動，但由於中國的新聞封鎖，這些抗議活動鮮爲外界所知。這次北京「知青」的請願、示威則是繼一九七九年西單牆民主運動之後的又一次規模較大的爭民主、爭人權的運動。

## 二、震驚中南海高層

這次北京「知青」請願、示威事件引起了外國記者和外國通訊社的注意，外國記者紛紛報導、採訪、照像，使全世界都知道中國發生了什麼，因此震驚了中南海高層。

在四月底，中共中央書記處舉行了會議，聽取了關於事件的專門報告。據一位「通天」的人士透露，在會上，胡耀邦作了三點指示。



要求回京的下鄉知青在北京市政府階前靜坐示威，廿九日警察在現場禁止記者拍攝照片。

- 1 密切注意青年中的思想動向，加強對青年的思想教育工作。
- 2 繼續掃蕩各小報，認爲這是對青少年的毒害。
- 3 加強社會治安，防止階級敵人搗亂。

此外，胡耀邦還批評了共青團工作不力。二月一日下午胡耀邦、胡啟立、郝建秀等在中南海和「五十年代」與「八十年代」的青年代表會見時，教育青年要有到邊疆墾荒，要有堅苦奮鬥的精神，說現在是栽樹、挖井的時候，不是乘涼、享福的時候，不能「只想自己，不想國家，只想享受，不想貢獻。」還等於命令那些請願、示威，要求回到北京的「知青」仍應回到山西去。



北京警察把企圖採訪示威青年的記者攝入鏡頭。

## 三、中國當局封鎖新聞， 壓制示威

中國當局對於此次抗議、示威是不滿意的，他們不希望中、外人士知道，因爲若外國人知道了會把事件真相向全世界報導出來，中國人知道了怕引起其他地方下放「知青」的連鎖反應。但在北京有許多外國通訊社和外國記者，對長達八天的示威，他們總會看到一些，而且也很難限制他們發出報導；至於中國人，現在也不能完全封鎖。在過去，中國人竊聽英語電台，如果被發現，會說你「偷聽敵台」，成爲「反革命」。如今提倡學英語，中國人爲了學英語，准許收聽美國之音和四○的英語廣播。因此，除北京外，有許多中國人在收聽這

兩種英語廣播時，知道了這次北京「知青」請願、示威事件。

除了封鎖新聞，中國當局還採取了對事件的壓制措施：

1 派出大批警察和幹部阻擋外國記者接觸示威者；  
2 沒收示威者懸掛在北京市委大樓外的長幅標語；

3 強行阻止外國記者照像；  
4 和外國人談話的示威者被警察錄影及拍照。

在群眾壓力下，北京市委書記李錫明和市長陳希同會見了示威「知青」，但給他們扣了許多大帽子，說他們向圍觀者發表歪曲事實的演說，擾亂機關工作，阻礙交通並拒絕對他們的耐心教育。陳希同定性說，他們的行動是完全錯誤的，要求是不合理的，是有損於國家和人民利益的個人主義行為，是文革流毒的表現。

#### 四、當局讓步

歷史證明，人權和自由都是經過許多鬥爭而取得的，坐待統治者的恩賜是不現實的。這次請願、示威也使當局作了一些讓步，他們趕緊向北京市各單位發出了一個傳閱文件，表示合於某些情況的「知青」，可以返回北京：

- 1 單身者（包括未婚者和喪偶者）；
- 2 和以前的北京市民結婚，一同下放者；
- 3 配偶仍在北京者。

但與下放當地人結婚者不能回北京。

當局的讓步除了表現於回城三條件外，還表現在暫時沒有捕人這一點上，實際上，當局已經動用了警察，監視了示威者的行動，真是劍拔弩張空氣夠緊張的了。沒有在大陸生活經驗的人不知道，以為示威者並未犯罪，不能逮捕，須知在中國大陸，要給人按上一個罪名，

加以逮捕，是很容易的事，也是經常發生的事，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一九七九年北京西單民主牆的民主運動中，不是有許多民運戰士被逮捕嗎？著名民運戰士魏京生就是那時被捕的，至今沒有釋放，試問他有何罪之有？而某案件牽涉到外國人時，外國人總是沒事，坐牢的總是中國人。除魏京生案件外，例如兩年多以前有一位從印第安那州到北京作研究工作兼作英文教師的美國女士，被指控盜竊國家機密，加以逮捕，但不過幾天，就放她走了，而她的未婚夫——中國青年衣錫工則坐牢兩年多才放出來，聽說他放出來是因為他的美國未婚妻的關係，否則還不知會多坐牢幾年？此外中國女子李爽與法國青年白天祥講戀愛，李爽坐了兩年多的牢才放出來，而白天祥則沒事，何其不幸！

雖然當局暫時沒有抓人，但公安局展開了全面的調查，給很多示威者立了檔。今後是否抓人，尚不得而知。

#### 五、居住自由與「憲法」

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也就是最重要的法律，其效力高於由立法機關依照立法程序所制定的一般法律，當然也高於行政命令，國家的法律和行政命令與憲法抵觸者無效。中共自執政以來，在五十年代初就制定、公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在「憲法」中列舉了人民享有的各種權利，如言論、集會、結社、出版、宗教、信仰及遊行示威等自由權利，其中也有遷徙及居住自由權，但由於中共並不遵守他們自己制定的「憲法」，人民也就沒有享受上述各項權利。中共以後又制定了第二部、第三部和第四部「憲法」。上述權利並未刪去，但是未真正實行。當初毛澤東一聲號召下，一千萬以上的「知青」就放下了，無人敢說我有居



在北京市政府前靜坐示威的山西知青。

住自由，可以不去，現在不准你回來，你不能說我有居住自由，可以回來。明明不自由，但毛澤東說，只有中國才最自由。他說自由是有階級性的，有資產階級的自由，就沒有無產階級的自由；有無產階級的自由，也就沒有資產階級的自由。中國是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人民當家作主，人民有自由；美國是一個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資產階級有自由而無產階級沒有自由。你如果不像他那樣認識問題，他就說你的思想有問題，你就需要改造思想。知識份子的世界觀基本上屬於資產階級，因此，知識份子要特別認真改造思想，要不斷地改造，要活到老，改造到老……這次，陳希同又給知青扣上了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大帽子，把他們知青又趕回山西去了。但是，一位知青代表說得好：「請問你陳希同就沒有個人主義嗎？你為什麼不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山西農村去？請問市委大樓裏的幹部們，有誰的子女還在山西？」

在有權就有一切，無權就喪失一切的國家裏，知青到那裏尋求真理？

# 楊在行獲釋，傳魏京生、

# 徐文立、傅申奇將獲假釋

(國內)張琪露

最近，一位接近負責法制工作的中央領導人的人士透露，魏京生、徐文立、傅申奇等在押民運人士，將逐步可望獲得假釋，理由可能是獄中「表現良好」，釋後可以「使他們投身到四化建設」。另，貴州民運人士楊在行已於四月份獲釋。

如果這項內部透露的消息在不久的將來都成爲現實，我們這些日夜關心尚在獄中的民運人士命運的人，可該要買上兩瓶二鍋頭，好好慶祝一番了。

## 莫須有的罪名

魏京生是最早被捕的西單民主牆的活躍份子，被捕日期爲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九日，即發表批評鄧小平的大字報「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四天後，由鄧小平親自下令逮捕。同年

十月十六日，以「洩露國家機密」等莫須有的罪名被判處十五年徒刑。

魏京生的被捕，完全是鄧小平個人的獨裁決定。當時，北京很多高級幹部都爲魏京生打抱不平，尤其某些部隊幹部，都認爲鄧小平抓魏京生是氣量過小的表現。後來聽說，連中共元老陳雲也反對抓魏京生。但是，在「一人治」的中國，鄧大人一句話，有誰能擋得住呢？

徐文立今年四十一歲，當過解放軍戰士。西單民主牆時期，曾主持著名民刊「四五論壇」。一九八一年四月十日夜間，在鄧小平全面圍剿民刊的命令下，一群警察闖到徐文立家將其抓走，後以「反革命」罪被判十五年徒刑。傅申奇是年青有爲的上海民運活動家，一九七八年投身民運，發起組織「振興社」。後曾任全國民刊協會機關刊物「責任」的主編。在一九八一年四月的大逮捕中，被無理關押，後被秘密判處七年徒刑。

楊在行是貴州著名民運團體「啟蒙社」的負責人，該社爲一九七八年創辦。楊在一九八一年被捕，以「反革命罪」被判五年徒刑。其他著名民運人士，如劉青、王希哲、何求等，早已爲海內外所熟悉，在此不必一一介紹了。我之所以在這裏簡介一下魏京生、徐文立、傅申奇和楊在行，乃因爲中央負責法制的某位人士就透露了這幾位。是他隨口而說，還是只記得這幾個名字，抑或這些民運人士比較特殊，我就無從知曉了。

無論北京當局給這些人扣上什麼罪名，歷史終將證明他們是無辜的，他們將作爲中國新時代的開創英雄而被載入史冊。那些鎮壓他們的人，儘管今天在台上躍武揚威，但終將被歷史稱爲舊制度的附庸者。

## 難熬的單身牢房

民運人士被捕後，大都被關在陰森的單人牢房裏。比如，魏京生、徐文立都被關在北京第一監獄的單人囚房（K字樓旁），兩人斜對面，但被單獨看押，不能接觸任何犯人。傅申奇、楊在行則被分別關在上海、貴州的單人牢房中，只有在家屬探視時，才能在看守人員的陪伴下與親人講些平平常常的話。

「囚犯」並不特別害怕牢裏的其它惡劣條件（伙食差、陽光少等），最害怕的是漫長的孤獨。一個人單獨關上幾年，連性情都會發生改變。我的一位朋友被單獨囚禁了八年之後，獲得平反釋放，出獄時，雙眼呆滯，連話都講不清楚，他的妻子不得不重新教他發音說話。想一想，八年不發音，大概連聲帶都萎縮了。所以，後來有人一旦被抓，好心人就會告訴他，如被關在單人牢房，要每天自己獨自練習講話。可是，連續幾年的自言自語，恐怕有人也會精神錯亂的。

## 魏京生的近況

魏京生開始被關在北京第一監獄的獨身牢房中，他被看的最緊。一開始不允許他閱讀任何報刊、書籍，據說有一位犯人知道他是魏京生後，曾把徐文立等人也同時關在第一監獄的消息告訴他，結果這位好心人被看守發現，遭到處罰，半年多之後，魏被允許借閱監獄圖書館的書籍，監獄也偶而通知家屬來探視一下。

前年，魏京生被秘密押往青海的格爾木勞改農場。一望無際的格爾木，實際上是中國勞改犯最多的集中營，犯人從來沒少過數十萬。我的一個朋友的哥哥，曾在格爾木勞改農場醫院做醫生，他說，農場的醫院有好幾家，每個醫院都有數百張床位，工作人員與犯人的診所是分開的，由醫院的規模可見格爾木勞改農場的龐大。

魏京生自從到青海後，據說心情好了許多，因畢竟結束了獨自關押的狀況。他和其他犯人一齊勞動，也能讀報，但很多犯人並不知道他就是魏京生。

爲什麼將魏京生從北京第一監獄押往青海勞改場，北京當局並沒有合理解釋。但據北京市公安局一位人士最近透露，將魏京生押到邊遠地區，是爲了明確拒絕某些外賓探視魏京生的要求，也是爲了最大限度地減少魏京生與其家屬的聯系。

自從魏京生被遣往青海後，他再也沒有和其家屬見面，他在北京的家屬曾數次要求前往青海探視魏京生，均被遭到拒絕。

還有消息說，魏京生在青海勞改農場還可以寫文章，甚至說正在寫「支持鄧小平改革的文章」。這是真的，還是故意放出的一種空氣？我們只有見到魏京生，向他親自求證後才能知道實情。



魏京生



徐文立

## 徐文立的近況

徐文立是北京「四、五論壇」的負責人，著名的溫和派民運領袖，他的被捕、判刑和關押，都是在秘密中進行的，以至外界以前不知道他到底判了幾年刑，也不知道關在何處。

最近，一位在北京市第一監獄工作的人向我的朋友透露，徐文立關在第一監獄的單人牢房中，被判十五年徒刑，與魏京生的刑期相同。

西單民主牆時期，如果魏京生算激進派的話，徐文立則屬典型的溫和派，他主張緩進式改革，主張盡量與當局合作。他主持的「四、五論壇」，甚至撰文批評魏京生的激進作法。然而，到頭來，鄧小平並未因其溫和色彩而對他手軟。

北京第一監獄的探監並未形成制度化，或者訂了制度監獄頭頭也不執行，徐文立不能經常與其妻子康彤和女兒徐瑾見面。第一監獄的人說，每次都是監獄通知康彤，說允許她來探視，她才能來監獄一次，每次與徐能談上一小時。每次見面時，總有一兩個獄警陪伴（實爲監視），徐文立夫妻從未再單獨談上一會話。在有人監視的情況下，他倆只能互相問候一下，談些家常小事，不能交流真正感受。獄警透露，每當徐的妻子問他在獄中生活如何時，徐總是說：「很好，不用掛心」。由於探視時間不固定，徐文立的妻子只好在家日日盼、夜

夜盼，大約兩個月才能見一次面。第一監獄透露，徐文立的妻子康彤每次可以按徐文立的要求，帶些書刊給他，但要經過監獄的檢查。第一監獄的人還稱，徐文立可以在獄中向監獄圖書館借書，圖書館除馬、列、毛澤東，鄧小平的著作外，還有一些教育青年思想的書籍，但是，獄中書籍是很不全的，這怎能滿足渴求知識的民運戰士呢？

在談到徐文立時，第一監獄的人經常流露同情之意，監獄的領導及看守都說徐文立與他們相處很好，徐從不感情用事。

徐文立的女兒小瑾，今年已十二歲，既懂事，學習又好，從小就分担着媽媽的憂愁。她愛媽媽，她想爸爸，可是，她那受創傷的幼小心靈，怎能理解她的一家所遭遇的不幸呢？

## 楊在行的近況

楊在行是貴州啟蒙社負責人，啟蒙社開民運人士正式結社之先河，在民運歷史上將留下不可磨滅的功績。

楊再行被捕後，其妻王培竹一直堅定地等着他。王培竹能夠不定期地去監獄探視楊在行，給他帶去一些書籍和衣物，當然，每次探視，也須經過申請和批准。

楊在行先被關在單身牢房中，後被「寬大」勞改。楊是一個特殊的「勞改犯」，由於其學問頗佳，公安「勞改系統中一些幹部常請楊在行輔導他們的子女考大學，據說效果顯著，公安系統的一些幹部對楊頗有好感。貴州抓民運人士是中央命令的，公安局中不少人是民運的同情者，他們原來不想抓民運人士（上海的情況亦類似），但中央的命令一下，在極權的社會中，下面敢不服從嗎？

楊在行只被判五年徒刑，這在全國來說，是相當輕的。「罪名」差不多的王希哲和何求被判十四年，徐文立被判十五年，雲南民運理



論家陳爾晉被判十二年。相比可見，貴州公安系統中，可能有同情民運的力量。

貴州公安局透露，楊在行在關押期間，仍然學習努力，積極鑽研理論，並未被鐵窗生涯所壓服。

由于楊在行在服刑期間採取了較靈活的應對策略，頗令貴州公安局感到「滿意」。據中央一位負責法制的人士透露，楊在行已在今年四月份獲得釋放。但是，他並未獲得完全的自由，他被限制在監獄中從事「教學」工作。此項消息，尚待向其妻王培竹求證。

## 魏京生等將獲假釋

中央負責法制的一位人士最近透露說，魏京生、徐文立、傅申奇等人可能將要獲得假釋，具體日期他不知道，只是得到個風聲而已。這個消息是空穴來風，還是上層醞釀後放出的空氣，我們尚不知道，但無論如何是個好消息，即使到後來空歡喜一場，我們眼下還是樂意聽的。

在一個沒有法治的人治國家裏，上層領導的喜怒哀樂決定着很多人的命運。他們的許諾

# 有信自遠方來——

## 傅申奇近況

(中國大陸留學生) 虞德民

(國內) 顏如平

分別這一年多來只收到一封來信，大概「君子之交」讓我們寧可緘默，也不在筆墨上費神耗思吧？天知道。豪興看了你的信說，他寧願與你當面吵架，也不想和你打紙上官司。我想也是，你們過去見面就抬槓子的勁頭，如今靠文字來維繫，怕真要失却了耐心。

看你在美國的情形似乎也就是那麼一回事，除了每天與「外國人」說「外國話」以外，我想你執拗的脾氣不會有什麼改變。在你寄來的照片上，我感染了一些美國活生生的氣息。也許是因為你在那裏的緣故吧，我第一次覺得

只有成爲現實之後，才能令人置信。去年八、九月份，北京有風聲說，中央政治局決定特赦民運人士，以樹立開明形象，樹立國家的形象，後來不了了之。聽說是因爲在臺灣已先放了一批政治犯，北京不願邯鄲學步，就把這件事放下了。

只要魏京生等民運人士尚未出獄，我們就要積極爲他們奔走呼籲，只有形成海內外的強大輿論壓力，才能迫使當局讓步。

呼吸着自由空氣的同胞們，您能爲尚在獄中的優秀青年們做點什麼？

這塊土地不是那麼遙遠到不能想象的。你這小子胖了，再過兩年不知道會不會挺個大肚子回來。

我和我自己一樣什麼都沒變，也變不了。每天爲了那張文憑悉心用功以外，很少有其它的閒情逸致。這個學期考試特多，除了專業以外，還加上了一門馬克思經濟學說史的考試，弄得我每天不得不念「頭痛經」。現在看來繼祖宗香火的還算我虔誠。你不但開了「小差」，還成了個奔走它鄉的異教徒，真見鬼！學業方面我還是我行我素，上大課我就躲在宿舍裏睡覺。上個月，我發表了一篇談金融市場的小文章，本來還想寄給你過目指教，現在還是算了，這種東西太枯燥無味。你走後，系裏搞了一次選舉，學校還派了人來坐鎮，結果你的「老對頭」還是被選下去了，現在當行政副主任的是一個從歷史系調來的中年教師。聽說這個人還算有魅力，辦事也通情達理。反正這和你現在都沒有什麼關係。

國內的情形說變也真的變了不少。走在路上你可以感覺到上海的瘋狂勁，沿街搞有獎銷售的，跳舞大獎賽，什麼新奇的玩意都有。還

中國之春編輯部：

最近一個朋友幾經轉轉，捎來了一封信。信中談及了小傅（傅申奇）及其家人的一些近況。現在我們把原信略作刪節，給你們公開發表，使關心民運被捕同志的廣大讀者，能夠了解他們的現狀。信中提到的姓名爲安全計，我們給予了變動，請讀者鑒諒！

祝民運成功！

中國留學生虞德民

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日於美國

有就是公司開張了不少，現在上海不僅是時興西裝，而且名片也開始滿天飛。我們系畢業出去的人，現在個個都有名片。和他們打招呼現在都不願意，我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講來講去變的結果，就是萬元戶多了幾個。國家生產的東西還是這些，放鬆計劃控制以後，流通的結果就是改變了買賣的方式，會賺錢的，有門道的自然是如魚得水。現在最倒霉的大概是拿助學金的學生了，我們研究生每月五十塊錢進帳的收入，已經屬於下等公民，除了每天三頓在食堂裏吃吃小塊肉以外，餘下的錢怕連幾包煙都買不上。現在這裏的進口煙標價三元五角公開銷售，雖說不講「等級公民」，但沒有「工農兵」攢在手裏，你也只好「望洋興嘆」。上個星期小金和我一起上館店，我準備了二十來塊錢想好好地喝上一頓酒，結果走進飯店瞭了瞭菜牌，才真的知道如今這世道。二十塊錢光夠打打牙祭。一條上好的整魚就要價五十幾塊，這種排場恐怕還得等你將來回來才好應付。不瞞你說，如果我現在能夠退學，我倒也真願意和別人合伙幹買賣，我就不信學經濟的人只會紙上談兵。現在知識分子「吃香」只是說說罷了，誰不想去燒香拜財神呢？

隆平兄最近出來了，他是你走後不久又關進去的。原來我也不太清楚他的事，以爲他卷入了買賣之類的行當。這次碰到他才知道有幾個到了黃河也要游過去的人，找他們商量搞刊物。由於朋友間的面子關係，他參與了準備工作，後來不知怎麼事情捅了出去，他們幾個人一起就被弄進去。好在他們的事影響不算很大，除了比較抽象的計劃以外，別人沒有拿到十分有利的證據，結果不了了之。小傅那邊的情況我問起國凱才知道。原來我聽說小傅的哥哥

在外面很活躍，和過去一幫朋友合伙搞公司，現在我才知道其中的一些實情。在我們的朋友之中小傅是落難最深的，判刑以後，女朋友不久也跟着告吹。國凱告訴我，小傅的母親、哥哥對小傅的情形既不怨天尤人，也不擺姿態。他們認爲小傅做的事只要小傅自己不後悔就可以，他們沒有必要也無此權利作評論。我覺得一個普通人家在如此大的壓力面前，能有如此的豁達與克制真是不容易。



傅中奇

小傅現在關在上海提籃橋監獄，剛進去時做過三個月的抽紗工，以後就免去了這份「苦力」。因爲他的情形特殊，他被關在單間。看守人員不怎麼難爲他，允許他每天看大報和書籍。現在小傅家每月獲准去探望他一次，探訪人員需要在傅家戶口簿上有名字，其他的親戚朋友還不能去看他。小傅現在躲在監獄裏也開始讀起外語來了，他讀的是日語和英語。目前正在翻譯一本科技資料的書，聽說已經大部分翻譯完畢。他的精神狀態不錯，也很樂觀，打算出來以後搞一些研究。他的家人去看他，除了帶一些日用品以外，給他帶去了不少的書，看來這位東跑西顛的「活動家」，現在不得不臨窗苦讀潛心修行了。

國凱另外還告訴我，上面曾有意假釋小傅和一批搞民運的人。上海市公安局二處曾兩次

請小傅家的人吃飯，意在先吹吹風，爲以後放人準備台階。他們私下裏曾表示，關小傅也不是上海內部作的決定，完全是因爲上面的指示使然。看守人員的態度也不錯，對小傅很尊重，沒有發生逼迫反省檢查之類的事。後來這件事不知爲什麼擱淺，上面對原來放人的許諾突然緘默下來，小傅的媽媽對此很不滿意，小傅的哥哥最近在外面想請律師，爲小傅的減刑問題與當局交涉。我估計這一舉動收效不會很大，不過這樣搞一下也有好處，可以促進官方明確表態。他的哥哥現在還沒有找到律師，一部分原因是有些人不敢接受這種背景複雜的事情。好在小傅的刑不如希哲他們判得重，如果沒有提前釋放，再過兩年也會有出頭之日的。小傅的情況差不多就這些。他的哥哥原來會計劃搞個體經營，小王也給他出了一些主意，最後他們怎麼作的決定我不知道，不過小傅過去的朋友都挺關心他家，給他的母親也有不少安慰。我自己好久沒有上他家有去，不過講心裏話也很想能幫幫忙，問題就是我這個人沒什麼能耐，插手反而幫倒忙。

國凱自己的情形還不錯，上了局工大。我不知道他最近有沒有給你去信。隆平出來以後心情不怎麼樣，他最近找了一位女朋友，大概是尋找歸宿吧。我自己還沒有什麼戀愛計劃，反正先畢業再說。關於留學的情況，我樂意接受你的建議，不過這種事也不那麼容易辦，等我考慮成熟以後再具體和你商量。你要我帶的信我已轉達，大家都很惦記你，希望你多寫信回來。豪興也祝你學業早成，「大度（肚）歸鄉」，哈哈！

此致  
春安！

汝平匆匆於上海

八五年三月

前記

我用手撫摸那巨大的廣告牌後的灰色的碑牆，條條的灰縫是那樣的規律整齊；我用手撫摸那久經風雨的殘紙，她是那樣親切溫暖。這就是一九七八年底至一九七九年底中外聞名的民主牆。她已完成了她的歷史使命，她將永存在有良心的中國人的心中。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形成了巨大的力量，抵禦着封建殘餘官僚極權主義的膨脹，她是中華民族的希望。

# 民主牆前的回憶

北京  
魏忠華

回憶往事，思緒萬端，心情激蕩，起伏不平，想起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中旬，那段令人難忘的日子，人民紀念碑前，群眾自發的民主辯論會，周圍一片燈火輝煌。演講的人慷慨激昂，聽眾的口號，此起彼伏，人山人海的群眾，高呼民主萬歲。自發的演講者，有來自不同大學的學生和工廠的工人，演講者的水平雖有不同，但是總結了十年浩劫血的教訓，表達了對民主自由的嚮往。他們對維護人權、健全法制的要求和呼籲是一致的。人民的覺醒，說明在中國，民主將是不可抗拒的潮流。那時也正是我十年冤獄平反，由東北剛剛回到北京的時刻。

我站在民主牆前，那久經風雨不掉的殘紙使我想起了「一九七九年那時「啟蒙社」的詩，「沃土」的小說，「北京之春」、「四五論壇」的政治論文，夏增鑾自編的「群眾參考」、人權同盟為傅月華、魏京生的呼籲、「今天」的詩歌朗誦會通知、「探索」重刊魏京生所寫的「第五個現代化」，「今天」、「詩刊」裡舒婷的朦朧詩，以及那些出售刊物、觀看大字報、小字報、購買刊物的盛況，學生、工人、市民、幹部，真是人山人海。

我想起在白廣路的某處二樓的一間房子，一進樓道就聽見吱扭吱扭的油印機聲，來到這裏的人三五成群，有工人、學生、教員、文藝工作者以及近郊區的農民、「華盛頓郵報」、「泰晤士報」的記者。這就是「四五論壇」的編輯、印刷、辦公會客的工作室，主編徐文立一家三口，有二個小房，將其中大一點的騰出來作為「四五論壇」的工作室。一家三口只好擠在另一間小房內。為了民主運動，他把一切都貢獻出來了。

來到這裏的人三五成群，從廿歲到四十歲的人居多，大家利用工作之餘，犧牲休息的時間，來從事推油墨、配頁、裝訂等工作。刻鋼板的工作因為佔的時間長，全是拿回自己家裏面去刻的，許多人到這裏一幹就一通宵，大家勁頭十足，配合協調。

來到這裡的許多人都富有勇敢、堅定、熱情、追求真理的可愛氣質，其中還有幾對青年男女在這裡建立了緣份。我記得在七九年的下半年，曾在這房子裡參加過一對青年男女的婚禮。當時的情景至今記憶猶新。確實很熱鬧，很有意義。大桌子和沙發上擺滿了大家送給新郎、新娘的簡單的禮品，中間的圓桌上擺了一些從商店購買來的簡單的食物。記得大概有桂香村的鷄爪子、酒舖買的粉腸、小肚之類。主婚人徐文立和大家一起用酒和菜來為這對經過民主鬥爭洗禮的新郎新娘作了良好的祝願。我知道直到今天他們還是很美滿的。

但是我確實也知道有的人因為觀點不同，為了民主運動甚至犧牲了家庭。

我在「四五論壇」上看到過為遇羅克平反的呼籲；也在徐文立家中見到過他的妹妹——因「一個冬天的童話」而出名的遇羅錦女士。

徐文立又名徐庶，一九四四年出生，祖籍安徽，父親是在朝鮮戰場因公犧牲的志願軍軍醫，他曾在東北某大學讀過二年新聞系，後參軍，復員後在北京鐵路局建築科當電工。他的性格溫和、文靜、頭腦敏捷、能言善辯、為人誠懇、辦事認真、熱情，做「四五論壇」的主編，是足以勝任的。並為此付出了極大的代價和犧牲，為遇羅克烈士以及許多蒙冤者的平反、為星星畫展的展出、為陳爾晉「論無產階級專政」一文的印發、為魏京生、劉青等人的營救，他都作了許多的工作和努力。

他對國家經過十年浩劫的現狀以及當時正在進行的治標不治本的改革，深感憂慮，曾寫出「中國仍需改革」的大字報，「四五論壇」當時在種種壓力和內訌的惡劣形勢下能夠保持每月平均發行千份左右，能夠堅持到八〇年三月，是與他本人及所有同仁的共同艱苦卓絕，不畏風險的努力分不開的。他一貫主張與官方合作，相互督促，共同解決問題。八〇年「四五論壇」被迫停刊後，他曾擬促進庚申變法的建議書，並將自己堅持自寫自印的「學習通訊」、「人」等刊物免費贈送給關心民主改革的同仁，並多次帶領同仁探望劉青的老母親。平時他樂觀、積極的工作態度往往給「論壇」中的人以鼓勵。每日下班後為編輯工作、發行刊物、刻鋼板及給讀者回信，都要工作到深夜兩三點。

通宵達旦，荒廢廢食的精神令人難忘。大家多次勸他多多保重，但是他說：中國的民主道路是長期艱苦的、經眾人開拓的道路，我願作為此路的一塊鋪路石。徐文立認為海峽兩岸的事，不僅是兩邊官方政府的事，也是兩岸人民自己的事，兩岸人民都有權利和義務為民族的統一進行探討、接觸和嘗試。一九八一年四

月十日，徐文立因醞釀組織中華全國統一促進會被捕，並以莫須有的反革命罪名被判重刑十五年（因欲組織中華全國統一促進會定為組織現行反革命集團罪判徒刑十二年，因編輯「四五論壇」有所謂攻擊社會主義之言論，定其為現行反革命言論罪，服刑三年，共十五年）。目前他本人單獨監禁在一間小小的牢房裏面，不許看書，每天只發一份人民日報；不許走動，每星期放一次風，大概一小時左右；每二個月家屬才可探視一次，身體每況愈下，精神上的折磨更是異常痛苦。他的不幸遭遇使我不禁想起他那小女兒小晶晶。小晶晶那時只六七歲，很聰明，很懂禮貌，很乖，很受這些叔叔、阿姨的喜愛。她同叔叔、阿姨們都很親近，可是在她那天真幼小的心靈裏，竟也要遭受如此殘酷的打擊。如今她們母女是多麼孤寂痛苦呀！徐文立的母親曾經在北京住過一段時間，她曾說：我為有這個兒子而感到驕傲。真是一位偉大的母親啊！這不就是我們民族的驕傲嗎？

我站在這民主牆前，凝視着那牆前的土地，那裏曾經是劉青、楊靜於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日被捕前出售魏京生「法庭答辯」的地方，也使我想起十四條七十四號的兩間小東屋，那裏是「今天」詩刊編輯部，也是朦朧詩的發源地。屋內陳設簡單，除去紙張和油印機，就是桌上擺滿的全國各地寄來的民刊。房屋的主人就是劉青和劉念春。這兄弟倆，劉青原是陝北插隊的中學生，後有機會為工農兵學員，就讀於西安工業學院。畢業後分配於西安某工廠為技術員。

劉青為人性格忠厚、樸實、勇敢、剛毅、平易近人。他自己雖身為「四五論壇」的召集人，但與「今天」及「北京之春」等刊物的同仁關係也極好，深受同仁們的尊重。為了使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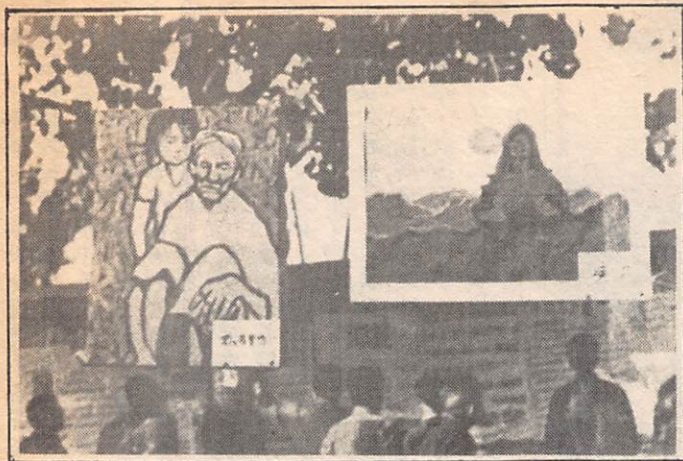
京生的辯護詞能使廣大群眾了解，自己甘擔風險，因此被捕。當時被官方判三年勞動教養，遣送陝西，但此君一去不復返，不知官方的法律以何為據。劉青的弟弟劉念春，當時是「今天」詩刊雜誌的編輯。他大學畢業後，剛剛結婚沒多久，於一九八二年因傳遞劉青在獄中的日記被捕，至今無下落。座落在七十四號的二間小屋早已是人去樓空。然劉青的獄中日記，聽說已在國外出版發行了。

同時我也想起了楊靜。楊靜是劉青的同學和至友，也是「四五論壇」的編委之一。楊靜在同劉青被捕的第二天就被西城分局放了出來，從而也就受到了「論壇」內部的猜疑，導至內部的不和與分裂。一九八〇年三月「四五論壇」被迫停刊後，楊靜偕同愛人及幾位同仁又在下半年繼續辦了一期，題為「劉青專輯」，同時為了營救劉青發起參加了營救劉青委員會。一九八二年四月被捕判八年刑。當初楊靜的被釋放可能是公安局對此施的挑撥離間之計，楊靜被捕時愛人正有身孕，以後生下來的兒子到今天還沒見過父親是什麼模樣。

這一切還使我想起了陸林。在魏京生被捕後陸林曾堅持了「探索」的編輯工作，但在那逆境中他日夜都受到公安局的人的監視，我想起在星星畫展遊行的那天，也就是業餘畫家馬德生用他那雙拐杖拄着他那殘廢的腿，用他那堅決頑強的毅力由西單與遊行隊伍共同冒雨走到台基廠市委大樓門口的那一天。我告訴陸林說，每天晚間夜裡，公安人員都在你家後窗埋伏監視你，陸林憨厚的臉只付之以輕藐的一笑說道：我早就知道會有這一着，讓他們幹他們的，我幹我的。從那以後我再也沒有見到這張樸實憨厚的臉。只知道八二年中他曾因肝炎住院，後來被捕，被判七年徒刑。

同時我也想起我參觀星星畫展的第一次展出。當時到畫舫齋參觀的人十分擁擠。印象最深的是王克平的木彫，用幾塊木疙瘩將這十幾年的政治型態刻畫的淋漓盡至！真是人民血的教訓和藝術家，智慧的結晶。還有曲磊磊的鋼筆畫，清新細膩，「法官」的兩張面孔上有一雙勢利眼，似乎在表示權大於法。「礦工」——面部漆黑的少女用她那雙渴望著光明的眸子凝視著頭頂的礦燈，立意於青春與生命，在黑暗

民主牆前的露天畫展（一九七九年九月）



的危難中渴望著光明與美好的未來。

眼望著民主牆前的那一片空地，那幾棟小樹，就是為星星畫展遊行集合的地方，眼望著這一切，使我產生沉痛與悲傷的回憶。回首望著牆上的紙跡，使我想起青島孫豐辦的「海浪花」和他那熱忱樸實憂國憂民的大字報。在我印象中，原想孫豐一定是位滿腹經綸的大學生之類的人物，然當年我有幸一見時竟是一位身著工作服胖敦敦的山東漢。那次他還給我們講了一個自己的故事（孫豐是山東省青島市草編工藝製品廠的工人，他同妹妹倆人，編輯民刊「海浪花」。當時北京是由「四五論壇」予以代銷的）。有一天晚上有兩個南方人來到孫豐家裏找孫豐，問其來意，其中一人回答說：我們二人來自川黔滇交界的十萬大山中，我們那裏有許多都是文革時期的造反派，還有各處流氓飢民，都是在走頭無路的情況下被迫上山的，但是這麼多的烏合之眾沒個領頭的是不行的，所以衆人推選我倆出來，為的是請位像你這樣有思想有抱負的人做我們的領頭人。我們是在北京西單民主牆前看到過你的大字報，才到這裡來找你的。孫豐回答說：承蒙二位看得起，但我本人確實沒有什麼才能，雖多少有些為人民民主努力的熱忱，但是要是讓我來做你們所需要的那種人確實還不夠材料。但此二人也真有三顧茅廬的精神，連着三天晚上都來進言相勸，最後一晚二位見無論如何邀請勸說都無效，出於無奈只好告辭。臨行前二位中的一位說：實在對不起，我們出來時間很長了，帶的錢都用完了，能不能借一點給我們？孫豐說：我的薪金也用完了，抽斗中有卅元錢是買刊物的錢。於是指着那抽斗說：那是我的全部家當，都在那里，你們就自己拿吧！於是二位也就不客氣地拿走了。聽完了孫豐的故事當時我們

幾個人感慨萬分，認為中國只有徹底改革現有的極權體制，建立民主體制，經濟才能有真正的發展，百姓才有真正的安寧。如今恐怕不止一個十萬大山，聽說東北老林裡也有許多種種類似的情況。同孫豐的一別已經快五年了，由於消息蔽塞，也不知他的近況如何，但是我確實聽說過關於陳爾晉在八二年在北京失蹤的消息。

陳爾晉是雲南省宣威人，一九四五年出生，父親是與周恩來等人同期赴法的勤工儉學的學生，回國後在雲南從事法律工作，在一次為搶救流行瘟疫中得病的公民，不幸染疾，在解放前早逝。陳爾晉自幼由母親洗衣撫養大，母子二人相依為命，生活十分艱苦，文革後期，陳爾晉寫了批判中共極權社會體制，一黨專政的「論無產階級民主革命」一文（聽說此論文現已有英文版）一九七七年為此被當作現行反革命被捕入獄，一九七八年平反，被分配在宣威某企業單位當文教幹事。陳爾晉為了使自己的論文能在社會流傳，使廣大群眾提高民主覺悟，七九年八月在北京「四五論壇」的協助下，印了近一千五百至二千份後，我們大家成了好朋友。記得他八〇年、八一年二次來京，都是住在我在農學院的黨員朋友那裡，我的朋友是位助教，家中是沒地方住的，但是他手裏有教員室的鑰匙，所以一到晚上十點鐘，我就陪陳爾晉去睡覺，早上天一亮，我們就走出來，我們經常一談就一通宵，很投機很有趣。陳爾晉性格正直、善良、剛毅、很富有同情心，有一次他告訴我，七八年在雲南還有為幾十斤糧，賣兒賣女的事。他為中國的現狀甚感痛心。由於同陳爾晉的交往，我才知道了一些著名的學生右派領袖之一林希翎的危運及其悲慘遭遇，使我進一步認識到中共極權統治機構無視人權、

無法無天的本質，使我對這些老右派及她本人抱有無限的同情。此後我曾經常用林希翎的遭遇去提醒那些對極權主義抱有幻想的人。

陳爾晉在經濟情況十分困難、家庭關係行將破裂（他有三個小孩，由於妻子對他不甚理解，經常爲他擔驚受怕，七九年後一直提出離婚的要求）的情況下，曾爲民主運動多次來北京、河北、上海等地，每次還要買一些書帶回去。我記得八二年三月底四月初陳爾晉到我家來是我們最後一次見面，臨走時我送了他很遠，一邊走一邊談，走了約有二站地。從那以後再也沒有見到過他了。只聽說他來京後在某人家裡住，一次騎着這位朋友的自行車出去了，一去不復返，就這麼失蹤了。也曾聽說過他在被捕後，判了十二年刑。我現在心中總在惦念他那在雲南宣威的老母和他的三個孩子。



民主牆下

送別陳爾晉不久，一九八二年四月七日中

午，我見到上海來的傅申奇，他原在上海主編「民主之聲」，後來接過在廣州辦的中華全國民刊協會的會刊「責任」。他主編的刊物，文筆流利，邏輯性、理論性都很強，在當時是深受讀者歡迎的。他的到來使我看到了「責任」的最後一期，回憶起他的文章和在工廠的競選演說，和當時看到他身穿風衣、面戴眼鏡、年輕英俊、意氣風發的一表人才的情景，心中不禁爲我們民主運動中有這樣優秀的人物感到驕傲，也爲他的遭遇深感同情和惋惜，因爲後來聽說他就在那幾天後不久就被捕了，被中共判了七年的徒刑。我記得那次第二天臨別前，我還告訴過他，原來「四五論壇」中的索忠鸞是受公安局利用的人，此人很活躍，我記得傅申奇說上海也有類似的情況，民辦刊物中也有公安局所派的眼線，臨行前他託我爲妹妹發一份電報，我照辦了，電報的內容是平安到京。

想起索忠鸞這個人我就感到十分憤恨，過去見到此人的時候印象是忠厚老實勤懇懇、熟練老成人緣很好，有五十歲左右，寫的一手好毛筆字，四五論壇的大字報多數原來都是出於他之手。八二年初才聽說原來索忠鸞七九年前後沒有正式工作，在鼓樓文化館話劇組作電工兼木工，後經公安局找他談話，答應他將工作轉爲正式工作，其代價就是索必須將「四五論壇」所能得到的一切情況，包括徐文立本人的詳情，及時地向公安局匯報。八二年底四月初他經常缺勤。他的同事聽說是公安局替他請假去執行特殊任務——「蹲坑」，所謂的「蹲坑」就是公安人員抓人前事先埋伏下的眼線的「工作」。大家知道此事爲時已遲，因當時，索忠鸞早已不到徐文立那裏去了，但是同楊靜等人，還是打得火熱。我後來經常想，如果我走

在馬路上碰上他該怎麼辦呢？揍他一頓教訓訓他？還是同他裝傻客客氣氣呢？可惜的是我一直也沒有碰上他，不過我相信索忠鸞這類的

人將來定要受到人民的唾棄的。我眼望着那一塊塊粗糙的灰磚，回憶着那一個一個剛毅清秀勇敢頑強的臉孔，是這些面孔組成了這世界聞名的牆，這些忠厚純樸、熱情積極的熱血青年，提到名字的，多已受到中共的迫害。後來聽說孫豐可能也被拘捕，一年後雖被放出，猶如軟禁；我們的四個現代化呢？在這將近十年的時間內——中共僅僅完成了一個最好的現代化，鎮壓工具現代化。首先自一九八一年起全國成立武裝警察部隊，公安人員增加一倍，從發達國家大量採購進口電子監聽、竊聽通訊照相等公安偵破器材，這就是我們國家最成功的現代化。至於草菅人命冤假錯案，比現今伊朗的宗教狂熱病有過之而無不及。

我的回憶，使我認識到：十年浩劫的結束，顯然打破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爲至高無上的神話，但中國人民仍不能擺脫專制桎梏的束縛。

我感到覺悟了的不同階層、不同職業、不同民族的中國民運戰士是中國民運多元素的特徵。那些現在正爲生活而奔波，表面顯得沉默的人確是一股不可忽視的強大的潛在力量。包括我在內。近二年來的沉悶、蔽塞、痛苦以至於麻木……但還不至於沉淪。當我聽到海外的中國之春的朋友們，在爲中國的民主而奮鬥，我真感到歡欣鼓舞。我面對着這民主牆暗暗地宣誓：我願爲中華民族的子子孫孫，甘願當你的一塊粗糙的磚或石。

一九八四年二月廿二日

於北京民主牆前

# 中國大陸的制度一定要改 否則將來定要重蹈覆轍

——陳香梅女士訪華歸來一席談——

（本刊記者·大陸留學生）陳洪林



陳香梅女士被訪問時與王炳章先生合攝。

時間：四月四日下午三點—五點  
地點：華盛頓美國總統出口委員會辦公室  
被訪者：陳香梅女士  
訪問者：中國民聯主席王炳章  
中國之春記者陳洪林

編者按：陳香梅女士是美國總統出口委員會的副主席。經常作為美國總統特使出訪亞洲及其它國家。前不久，陳香梅女士訪問了北京和台北，與兩地的政府首腦就衆所關心的問題交換了意見。陳香梅女士的這次出訪引起了大家的普遍關注。

陳香梅女士在接受「中國之春」記者訪問時，介紹了她這次出訪的一些情況，並就「統一問題、大陸改革和美中關係等問題發表了坦率的見解。陳女士認為關心「統一問題」的人，不應該鑽「台灣問題」的老套子，而應該關心大陸及中國將來發展的前途。陳女士選對大陸改革存在的問題表示擔憂，她認為：大陸若不進行制度改革，日後還將重蹈覆轍。

「中國之春」認為：陳香梅女士的看法很有見地和價值，對我們關心中國前途的留學生和華人也頗有啟發。現在我們根據錄音，把談話的記錄整理發表，以饗讀者。

## 中國當前的問題是要

### 讓兩邊的老百姓講話

王：我想在「中國之春」的雜誌上，向廣大的

留學生和關心中國前途的華僑介紹一下您的看法。由於您在美國政府中的威望，在美、中、台三方面關係中的積極作用和影響，使得大家都十分尊重您的意見，另外，您個人所經歷的人世滄桑，所目睹的宦海沉浮，也會對我們這一代年青人有很大的啟發。我想中國這一代年青人和您一樣，都希望中國有一個新的發展前途。我們打算就幾個方面的問題請教於您。

陳：中國人之間有不少「隔膜」，官與民的「隔膜」，老與少的「隔膜」。上一代人不了解下一代的人，下一代人也不能夠聽取上一代人的忠告與建議，做官的認為自己永遠都對。這個問題多少年來一直未能解決。沒有彼此的交流與溝通，人怎麼能互相交往呢？

王：對，請問您這次是什麼時候訪問北京和台北的？

陳：我這次訪問很匆忙，回來大概是二月中旬。

王：在您出訪之前，新聞界相繼作了報導，您回來以後，我注意到新聞界尚未作出反應，您能不能談談這次出訪的大致情況，您是在大陸訪問結束以後，直接從北京飛往台北的嗎？

陳：不，我是先到了北京，以後回到美國，然後再由美國飛往台北訪問。由於現在雙方對相互的關係都十分敏感，因此我不願像

有些學者一樣，一回到美國就大作文章，發表議論。

王：這次「人民日報」發表了您與趙紫陽會見的新聞，除了趙以外，您有沒有會見鄧小平？

陳：由於時間比較倉促，沒有安排訪問。

王：在台北您會見了哪些政府官員？

陳：我這次會見了蔣經國總統。

王：通過您的雙邊接觸，您是否感到，北京與台北的僵持關係將有突破的跡象和可能？

陳：這個問題十分敏感，大家也都在注意情況的發展和變化。在台灣方面，老百姓認為不能做有損台灣利益的事情。三年以前，孫運璿院長曾經說過，如果有一天，大陸的經濟好轉，老百姓的生活有所改善，台北並不拒絕談判。這個談話轉眼已有三年了，還有魏鏞提出過類似「多體制國家」的看法（MULTI-SYSTEM），但現在台北則對這個看法保持沉默，好像有不少的忌諱，這說明問題很複雜，兩邊都不容易解決這個問題。我希望現在關心中國前途的人，不要整天拿統一問題做文章，應該敦促中共政府能夠扎實地搞好改革，不要把台灣的問題當作一個問題。我覺得台灣並不是一個問題，中國將來怎麼發展才是個主要的問題，兩邊都應首先考慮這個問題。中國過去的問題是在歷史上形成的，以後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夠解決的。中共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方針是對的，中共應以這個問題為主，台灣也有自己的問題要解決。

王：北京對統戰的成效甚微，是否有所檢討和反省？

陳：早些時候，我曾就這個問題問過鄧小平。我說你有什麼可以保證類似文化大革命這

樣的事件不會再發生？鄧小平說：「這種事情絕對不會再重演了，因為大家對這種事已有了一致的看法，而且大陸現在實行了開放政策，不再閉關鎖國。共產黨本身也對很多歷史問題作了檢討，對毛澤東的錯誤也已公開承認，因此這種事絕對不會再發生了。」他們對今後的政策，只是在口頭上保證要加以改善，但這一點仍不能消除大家的顧慮。

王：對，如果大陸方面不能實行政治、保障老百姓的信仰自由和言論自由，那麼他們的統戰政策就只能是一種權宜的政策。您是否以為統一的問題是北京目前急於解決的問題？

陳：我的印象是，他們並不認為台灣的問題是如此之緊迫，我認為這只是一種外交姿態。經濟改革和四個現代化才是他們的當務之急。現在他們希望到公元兩千年能大幅度改善目前的生活狀況。他們現在的年收入是多少？

王：每人三百美元左右。

陳：到二千年還有很長的一段時間，他們翻兩番的目標，只能夠使大陸的老百姓達到小康水平。中共現在除了在經濟方面的改革以外，還有責任建立起自己的信譽。抗日的時候，講這是中華民族最後一仗，以後呢，韓戰、越戰等等。

王：目前雙方都應該有耐心，都要面對現實，盡量增進互相的了解，不要再創造新的爭端。

陳：爭執總是難免的，在這點上雙方的豁達和理智都很重要，我覺得中國當前的問題是要讓兩邊的老百姓有權講話、有自由、有法治。



## 大陸的「共產式」制度一定改，否則將來還要重蹈覆轍

王：我很同意您對統一問題的看法。我們留學生都認為：大陸現在的改革問題是個主要的問題，不要急於統一中國。您常去大陸，您對大陸現在的印象如何？

陳：我這次回到大陸，看到大陸比較喜歡照搬國外的經驗，這不行。比如現在大陸找人蓋公寓房子，說是解決住的問題，但是，蓋了讓誰來住？你蓋一個公寓房子就要解決冷、暖設備、電話和煤氣的問題，這種問題政府都應該慎重考慮，要量力而行。中國目前的改革很不平衡，我擔心以後會引起新的混亂。

王：我們的觀點也是：政治、經濟、意識形態都應該協調地加以改革，否則又成了另一



1985年2月2日，陳香梅女士在北京與趙紫陽總理合談。

種極端的經濟決定論。

陳：大陸對自己的問題不是作一個全面的研究，常常是一個領導人講幾句話，底下跟着就形成一窩風。比如現代化、工廠開放等，過了一個階段，又說這樣搞不行，大家又怎麼辦呢？

王：這是否是您對大陸改革的一個主要意見？

陳：應該說是一個基本的憂慮。當然，現在改總比不改要好，一點都不改，更加糟糕。現在不管是反共或親共的人，對改革都是很歡迎的。

王：共產黨改革一點，我們就應肯定一點。

陳：中共應抓住這個改革的機會，十億人口不可能都朝外跑。如果再不改好，老百姓怎麼辦？大陸的農村我沒去過，我也不是一个專家，在大陸有機會我常常出去走走，和路人隨便談談，我覺得改革還是有些成績的，說一點也沒有，不公平道。就舉很簡單的例子，女孩子的衣着和化粧已有了不少的變化；另外很多人出來訪問，看看別人發展的經驗和成就，對自己的認識和改革也有很大的作用。大陸從長征出來的那批幹部不願放權，中共對此制定的年齡政策，我也是贊同的。

王：您這次去北京與趙紫陽接觸，對他個人的印象如何？

陳：我並不是第一次見到他，在北京已見過三次，他去年來白宮訪問，我和他與雷根總統同坐一桌進餐。我覺得趙紫陽這個人很敏捷，對人很熱情，他比較善於找到自己所需要的東西，而且學習得很快。我想他的作風和開放的思想與他近年來到處的出訪有關係。

王：我從報紙上讀到了趙紫陽最近所作的一份

報告，在這份報告中，趙紫陽對目前的通貨膨脹和失控現象作了檢討。我們看到了北京政府對自己失誤的反省和坦率，也注意到他們求穩的發展趨向。您這次在北京，趙紫陽有沒有談到他們將要作出新的調整和計劃？

陳：趙紫陽談到了一些這方面的問題。他主要強調了東西方之間的差別。中國不可能樣仿效其它國家，比如過去一直是照搬蘇聯，現在是不是一定要向美國看齊呢？大陸現在的問題很特殊，也很複雜，出一些問題是在所難免的。我認為趙紫陽這些人對他們的改革還是頗有信心的。

王：這一點大家都是目共睹的。您常到大陸去，根據您對大陸的了解，您認為大陸現在改革問題的癥結是什麼？

陳：我覺得大陸的問題還是個制度問題。我會對北京領導人不客氣地指出：官僚一層層的疊床架屋，怎麼能有真正的改革呢？共產黨過去認為：你不做就不犯錯誤，多做就多犯錯誤，這種觀念和制度有很大的關係。現在打破了「大鍋飯」制度，這不錯，大陸的共產式制度一定要改，否則將來還要重蹈覆轍。

王：大陸仍抓住「四個堅持」不放，您有沒有針對這點向他們提出意見？

陳：我和他們講過，為什麼要提這種口號呢！如果你們不敢講走民主路線，那你總可以講走社會主義路線嘛！提這樣的口號，怎麼能讓別人相信你們的改革呢？

王：北京領導人是如何解釋這一點的？

陳：他們給了我一些暗示，現在的保守派勢力還很強，如果改革走得太遠，可能會產生不少新的磨擦和麻煩。我相信他們這些人

確實有很多顧慮和難處。除了制度以外，另外一個問題是：大陸的領導人應該要有勇氣向老百姓承認自己的錯誤，要能夠承擔責任。這樣老百姓才會歡迎和支持改革。

王：中國現在還沒有這樣一個轉折性的人物。陳：一個人如果不能承認錯誤，就一定會排斥異己形成專斷。

王：北京的領導往往喜歡把錯誤推諉給別人，或者強調客觀的原因，這是一種害怕老百姓的怯懦心理。

陳：除了觀念的問題以外，中國的科技和教育還很落後，跟不上現代發展的基本要求。王：您是否覺得傳統文化和社會心理也是很大的因素？

陳：我想是的，中國人缺乏合作精神，個人總是自掃門前雪。一個人做事都很聰明，要是叫幾個人一起做就特別難。

王：中國由於長期的專制統治，形成了老百姓明哲保身的心理和隨遇而安的哲學。

陳：我覺得中共做領導的最低限度不應爭一時之名，而要論千秋功罪。比如魏京生到現在還關着，爲什麼就不能放出來呢？

王：您有沒有對他們提過這個問題？陳：沒有，我不能事事都提。共產黨不關他，人家反而根本不知道。蘇聯很早就搞這一套，雷根總統前不久派我去蘇聯，那裡戰爭結束四十年了，老百姓的生活依然很清苦，中共爲什麼還要跟着搞呢？

## 大陸的主管部門應該

### 了解西方的經濟政策

記者：請允許我向您提個問題，您這次去北京是作爲個人訪問還是另有特殊的使命？

陳：我這次訪問北京，是代表美國政府。

記者：除了與北京官方交換「統一問題」的意見以外，有沒有舉行美中貿易關係的會談？

陳：當然，這是我訪華的根本目標，其它的問題都是私下的討論。

記者：這次的貿易會談有沒有產生實質性的結果？

陳：有一些，現在美國和大陸的貿易往來很頻繁，每個月都有互相的訪問和談判，當然這還不能與美台的貿易額相比。現在美國與台灣的貿易額是兩百億，在美國的國際貿易中，台灣已佔到第五位，大陸現在在人口那麼多，但和美國的貿易交往仍然有限。

記者：美國的企業家、銀行家，包括美國的政府在對大陸的投資方面，是否存在着很多的顧慮。

陳：當然，美國的商业界向來注重實效，無利可圖的事當然不肯幹。大陸剛剛開放時，西方對大陸的投資市場寄的希望很大，但在合作過程中，發現和大陸做生意困難和限制很多，一件事往往要拖幾年才能解決，所以有不少人就放棄了，很多的生意就因爲這樣而沒有做成。

記者：美國前不久對中國的某些進口商品採取了限制，使大陸十分不滿。根據您對這些問題的了解，您認爲中美貿易合作的前景如何？

陳：美國對中共的商品限制主要在紡織品。這個政策不是針對大陸，對韓國、台灣、香港、日本也一樣限制。因爲美國要保護自己的市場，美國已有很多的紡織品廠倒閉。但美國和北京的貿易合作，還是很有潛

力的。

記者：大陸打算在今後的五年中，計劃向西方尋求七十五億美元的投資，您認爲有沒有可能做到？

陳：這是一個很大的數額。要達到這個目標，實非易事。中共不能只是請別人來解決這種複雜的問題，大陸的主管部門需要了解西方的投資政策，同時要制定一個具體的完整的投資法。中國常常希望美國人百分之百的投資，可是美國人常常懷疑，在大陸要等多少年才能得到投資的效益？美國的公司過三、五年就要人事更換，經理兩年幹不好，老板就要請他走路。這一點和大陸完全不一樣，中共要了解這些問題。

王：前天我在華府有一個講演，談中國之經濟改革和開放政策。會後有些人對我談到：中國最近有親近蘇聯的跡象，以此來迫使美國向大陸提供先進的科學技術和貸款。您是如何看這個問題的？

陳：這不是我個人的看法，現在美國的外交政策當然不希望中國再向蘇聯靠攏。中國將在國際事務中，特別會在亞洲地區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現在除了蘇聯以外，日本對美國和西方的衝擊也很大。美國目前正在觀察，日本是否真的可以做一個盟友；再看大西洲國家，美國已經投下了很多的錢；再看中南美洲，還有中東，都不怎麼穩定，美國可以說現在是四面楚歌。美國政府現在很難制訂一個穩定的、長期的對外政策。但短期的也不見得能完全基於實用主義。台灣政府是反對美國聯中抗蘇的做法的，實際上這點已成了一個不成文的政策。現在美國把注意力轉到了亞洲，西方也是 LOOKING EAST (往東方看)。

從南、北韓，到日本、台灣、澳洲和新西蘭這整個地區都是美國日益注意的重點。

王：看來美國已把重心從歐洲移到亞洲。

陳：對美國來說，大西洋地區仍是白人文化，在傳統上有共同的背景，但美國現在要想對亞洲有一個深刻的認識，這就很不容易。我覺得中國兩邊都有一個責任，就是幫助西方和美國了解中國的文化。

王：對，同時美國是個典型的民主、法治國家，這一點值得中國好好的學習。

陳：有一次和鄧小平談話，鄧小平說，美國有那麼多的律師？我跟他開玩笑說，華盛頓也有不少，可以進口一些到中國去。

## 政府不要給留學生有恐懼感，要給他們發展的機會

王：現在大陸在美國的留學生有一萬多人，加上其它地區，總共有二萬多人，每年有四、五千留學生進出大陸。這些學成的年青人將會對中國的未來產生巨大的影響。根據您在美國近三十年的經驗，您對這些留學生有什麼建議？

陳：我常和留學生交談，美國有一個很好的學習機會。美國這個國家，雖然各種問題很多，但長處還是主要的。老百姓至少可以自由表達自己的看法和意見，也可以批評政府和總統。

王：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在這樣一個高度的信息社會和人權國家裡，當然是一個最基本的條件。

陳：對，要讓老百姓講話，否則你學成以後，社會不給你提供機會，你也沒法發展。我

認為留學生學完以後，應回去服務於自己的國家，不要學成以後就想留在這裡不走，不要給別人這種印象，中國人出來就是為貪圖這裡優裕的生活。當然不走的原因，還有一個回去後學無可用的問題、自由的問題。我認為政府不要給他們以恐懼感。要人盡其才，發揮他們的作用。另外留學生要利用這裡的條件，多了解美國的社會，不要來了以後，還是三、五個聚在一起，不願走出去和別人交往。這裡還有個經濟待遇問題、語言問題和習慣問題，但這些都是可以克服的。我發現從大陸出來的學生比較會講話，大概是因為鬭爭的時候，人人都要發言，相比之下台灣的學生比較老實。我覺得上演講課很不錯，我剛到美國就選了這門課。你不能有理由而講不清楚，特別是中國人講中國問題，要能把問題講清楚。我出去訪問，接觸了很多的學者和科學家，他們往往在表達上還不夠清晰，英語的程度還不行。

王：還有中國大陸現在派出的留學生都以學理、工科為主，學文科的很少。

陳：現在此地的中國問題專家大都是藍眼睛、金頭髮。比如基辛格，現在似乎是世界問題的專家，中國的問題他也是專家。實際上他對中國了解什麼呢？這不光是他一個人的問題，有些人到中國只去了兩三次，回來就成了一個專家。

王：這次我去了費城，在那裡舉行的三十七屆亞洲研究年會上，我看到只有少數幾個亞洲學者發表演講。

陳：問題是洋人不請你去，現在西方有很多人利用中國問題大作文章來賺錢，為什麼中國問題的講座，整天都要請洋人來講，這

裡還有一個自己看不起自己的問題，似乎是本地薑不辣，覺得洋人講得都對，而自己的意見却不怎麼尊重。我覺得現在留學生在這裡除了要學習西方的科技以外，還要學習別人的政治、法律和外交，這樣才可以培養出各種不同專業的人才。

王：您對我們留學生的民主運動，對「中國之春」有什麼看法？您原是搞新聞的，您可以理解我們做的工作，就是一步一步地爭取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同時傳播民主、人權、自由和法治的思想。我們想聽聽您的看法和建議。

陳：「中國之春」讓別人有機會了解一些東西是很好的，你們能出來做這樣的事，應該說是很勇氣的。你們認為是對的事就應該做下去，還要多聽取別人的意見。

王：我們曾要求在大陸和台灣發行我們的雜誌，我們想能在實際上爭取到言論自由的權利。

陳：台灣現在有很多的黨外雜誌，批評政府的也有不少。

王：大陸現在在這個方面仍然控制得很緊。

陳：這很不好，「人民日報」有什麼真正的東西可看？

王：希望您下次訪問大陸，能夠和北京方面談談這個問題。要讓大家講話，把智慧都集中起來。我們這樣在海外辦「中國之春」也是希望國家富強，並走上一條民主和法治的道路。我希望您也能把我們這種為國出力的心情傳達給他們。

陳：好的。

王：最後感謝您在百忙之中抽出時間接受我們的採訪。我代表「中國之春」和「中國民聯」對您的支持和幫助表示感謝！

從胡耀邦「洩露軍事機密」看——

# 北京軍事戰略

## 大轉變

(北京) 柳平

中央軍委戰略研究所稱，最近廿五年不會發生世界大戰。中國已取消「美帝」、「蘇修」為假想敵的戰略部署。中國軍隊大裁軍、大復員、大規模投入地方建設，是為了省錢。最近向蘇聯靠攏，目的是要挾美國和西方，迫使他們借錢給中國。中國想處於「左右逢源」的境地……。

### 一、洩密的特權

四月十九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在澳洲新西蘭向外國宣佈，中國人民解放軍即將裁軍一百多萬。第二天，大參考進行了詳細報導。其實，解放軍裁員工作，一直都在進行，這次宣佈之所以引起人們注目，是因為宣佈人為黨的總書記，而不是軍委主席鄧小平。這顯示，胡耀邦要利用一切場合強調「黨指揮槍」的原則，也是胡耀邦即將接管軍權的一個信號。我們這班同情魏京生的人，又在軍區大院議論起來了：胡耀邦的這個宣佈，算不算洩露

國家機密？這麼重要的消息，不先公佈給全國老百姓，甚至連黨員和部隊中某些高級將領都不知道詳情（我的一個同事的舅舅是某總部的部長，軍級幹部，事先不知道大裁軍的確切數字），而先主動報告給外國人，這不叫向外國人洩露軍事機密又叫什麼？魏京生只說出了人人皆知的越戰前綫指揮官許世友和楊得志的名字，就被扣上洩露國家機密的莫須有罪名，被判刑十五年！如果魏京生像胡耀邦一樣，洩漏一項像大裁軍這樣全國人民都不知道的真正軍事機密，恐怕要被槍斃了。

在我們國家，到底誰在一直洩密呢？高級領導人掌握了黨和國家的最高機密，他們大多不把這些機密向自己的人民透露，甚至不向自



4月19日，胡耀邦訪問新西蘭時向外國人「洩露」了中國將裁軍百萬的「機密」。



養兵千日，用兵一時的格言古已有之，但什麼時候多養？什麼時候少養？這却要因勢而定了。  
圖為龐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

已黨報——人民日報的記者透露，而專門向外國記者、外籍學者、外國議員、外國官員透露。如鄧小平對台統戰的「鄧六條」、今年即將召開黨的特別會議進行大換班等，都是鄧小平、胡耀邦先透露給外籍人士的。這不是另一種形式的崇洋媚外嗎？

有一種解釋說，黨和國家領導人說出去的，都不算是「機密」，老百姓說給外國人的，才算是「機密」。原來，國家機密都掌握在老百姓手裏，你說，這樣的國家有多危險？總之，我國洩密也有特權。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這是歷來的習慣。

## 二、胡耀邦「洩密」

### 引起軍人不滿

不管胡耀邦這次洩漏的算不算軍事機密，他這次在新西蘭的透露，確已引起了北京軍界

某些人的不滿。

北京軍官後勤部一位軍級幹部看到大參考報導胡耀邦在澳洲的裁軍講話後，大發雷霆。他罵道：「誰授權你胡耀邦到外面去亂講話的？軍隊的事，用你管嗎？告訴外國人我們準備大量裁軍，不等於向敵人通風報信嗎？」

「二炮」參謀部的一個頭頭看完大參考後生氣地講：「裁軍一百多萬，這個數字我怎麼不知道？政治局討論了，為什麼不先向軍內傳達？為什麼先要通知外國人？」

軍隊將領們一直是不服胡耀邦的，這點，在北京的各軍區、各總部大院中，已成了公開的秘密。軍隊將領們會抓住每一個機會譏諷胡耀邦。一次，我父親的幾個老戰友（有的已成了顧問）一塊喝酒談天。當電視上出現胡耀邦時，一位舉杯道：「為我們的胡司令乾杯！」有人問：「為胡傳揆嗎？」（胡傳揆為文革樣

本戲「沙家濱」中的土匪司令——編者注）回答曰：「不，為胡耀邦，聽說他要當司令啦！」於是，大家開懷大笑。鄧小平硬是要把軍權交給不受軍隊高級將領尊敬的胡耀邦，不知心中是怎麼想的。

## 三、裁軍的理論基礎

不過，話說回來，大量裁軍是一個重要決策。中國人民解放軍原有指戰員四百五十餘萬，加上後勤部門，數字遠不只這些。這次胡耀邦宣佈裁軍四分之一，的確是個大手筆。為什麼中央要這樣大手筆地幹呢？其原因有二。

其一是有理論基礎。中央軍委有一個軍事戰略研究所，由前副總參謀長伍修權上將任所長。我的一位朋友與伍修權的女兒伍星很熟，據說，戰略研究所對鄧小平、胡耀邦的影響力很大。伍修權經過研究，曾向中央軍委和鄧小平打過一個報告，中心內容是「未來二十五年世界局勢穩定，不會發生世界大戰，中國也不會受到大的戰爭威脅。」

在這一戰略理論的指導下，鄧小平採取或即將採取數項重大措施：一是命令大批軍隊投入地方生產；二是加緊軍隊裁員；三是準備取消十大軍區編制。

其二是國民經濟實際發展的需要。中國當前的經濟改革，關係到國家的命運，也關係到共產黨自身的命運，連共產黨的領袖們都承認，搞不好就有「亡黨亡國」的危險。搞改革，最急需的就是錢，有錢能使鬼推磨，有錢就能使改革順利一點。錢從何來？一是外借（胡、趙、彭真、李先念一齊出動向外國借款）；二是節約。大量裁軍，一下子裁掉四分之一，就

是爲了壓縮巨大的軍費開支。裁下來的一百多萬指戰員，還可以投入地方經濟建設。

#### 四、中國軍事的戰略大轉變

中國人民解放軍龐大的軍隊編制，是在五十年代初朝鮮戰爭結束後建立起來的。當時，編制數百萬軍隊，是以「美帝」爲假想敵。以「美帝」爲假想敵的狀況一直維持到六十年代後期。在該期間內，美國在日本、南朝鮮、台灣都有駐兵，越南更是中美直接衝突的戰場（越南戰爭，實際上是中國出兵、蘇聯出武器的一場對抗美國的戰爭——見中國之春雜誌八五年元月號第十九期四十三頁報導——編者注）。

中蘇分裂、中美關係緩和後，中國龐大的軍隊編制，則是以蘇聯爲假想敵。蘇聯不但在中蘇邊界陳有重兵，而且支持越南和印度對中國造成壓力。

本來，按照鄧小平的主意，中蘇是不能表面修好的。鄧小平想用中國軍隊箝制蘇聯的代價，換取美國的實質支持——借給大量美元並輸入高級科技來恢復中國的經濟。然而，這個夢想並未實現。主要原因是美國政界和金融界對中國政策的穩定性不抱信心，對鄧小平辭世後政局穩定性也不抱信心。老美不願意把錢扔到不保險的地方，他們要等一等，起碼等到鄧小平辭世後，看看幾年再說。

可是，外國財主這一等二看，使中共領袖們着了慌。明年的雨，解不了今年的旱。在經濟改革急需金錢和高級科技的情況下，胡耀邦、趙紫陽的目光移向了克里姆林宮。

胡、趙等人開始了一個新的構想：從美國及西方搞不到一手的高級科技，或可能從蘇聯搞到二手的高級科技；與蘇聯的近鄰貿易，可



去年十二月，阿爾希波夫訪華時，陳雲與他親切握手達一分多鐘。陳雲說：我們是搞計劃經濟的老朋友了。

解決中國對木材、鋼鐵和紙漿等材料的急需；與蘇聯緩和，雙方裁軍，對雙方都會減輕包袱。

據說，胡、趙等人的設想，獲得了軍委戰略研究所所長伍修權的支持，伍在理論上認爲，蘇聯雖在中蘇邊界設有重兵，但其真正的恐懼不在中國，而在美國。伍修權向中央報告：根據他們獲得的蘇聯軍方情報資料，蘇聯軍方戰略家最近一致認爲，對蘇聯的威脅來自美國、日本和西德，並非來自中國。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毛澤東掌權時，中國對蘇聯的軍事威脅已隨毛的去世和鄧小平的經濟改革政策而逐漸消失。伍修權的看法是：與蘇聯實質上修好，已是時機。

在上述戰略思想指導下，中國軍方正進行着一場新的戰略大轉移。那就是：

一、消除美國爲假想敵的構想。伍修權向中央報告還稱，美國自越戰後，已不願再陷入第二個越南戰爭。即使中國武裝進攻台灣，美國五角大廈也只是袖手旁觀，至多口頭譴責而已。因此，中國的軍隊編制，不能再以防範美

軍的進攻爲前提；

二、逐漸消除蘇聯爲假想敵的構想。至少蘇聯在最近二十五年內，不會進兵中國，蘇聯的着眼點在提高戰略武器的素質及蠶食美國的勢力範圍。因此，中國也沒有必要以防範蘇聯大舉入侵爲理由而保持龐大的野戰軍編制。

據知道內情的人透露，胡、趙等人，對伍修權的戰略思想極爲欣賞。他們正想削弱軍方的實力哩！

有人概括今後中國軍事的戰略是：「鷸蚌相爭，漁翁得利。」即挑撥美蘇兩霸的關係，使他們互相交惡，而中國在旁坐收漁人之利。中國希望有一個喘息時間恢復一下千瘡百孔、病入膏肓的經濟。

鄧小平指示，今後中國的軍事戰略發展，要重在「精」字上，而不在數量上。兵要精，不要衆；武器要先進，不要以數量壓人。

總之，毛澤東和林彪鼓吹的「人民戰爭」思想，鄧小平認爲已經落伍。

#### 五、厲害的一着棋

在戰略大轉移理論指導下，中蘇明顯地修好了。這個跡象，在去年年底蘇聯第一副總理阿爾希波夫訪華時，即已顯示。阿爾希波夫這次訪華，受到了中共中央的破格接待。趙紫陽、陳雲和彭真都與之進行了友好會見。據報導，阿爾希波夫曾爲五十年代初蘇聯派往中國的專家組組長，與陳雲和薄一波有過老交情。陳雲和彭真見到阿時，都直呼「同志」，握手達一、二分鐘之久。陳雲還直率地告訴阿爾希波夫，中國和蘇聯都是搞計劃經濟的，應該坦誠合作。本來，蘇聯第一副總理的這次訪華，並未預期取得什麼大的成果，只是一次例行的低

調訪問，目的是簽署一個小的貿易協議。沒想到，趙紫陽、陳雲和彭真出人意料地「親熱」，使蘇聯方面受寵若驚，阿爾希波夫連忙向克里姆林宮報告，莫斯科指示：順水推舟，擴大訪問成果。阿爾希波夫延長了訪問，使雙方貿易額比預計的增加十倍之多。

中蘇靠攏在契爾年科逝世、戈巴爾契夫接任蘇共總書記時達到一個新的高潮。中共中央派出曾留學蘇聯的副總理李鵬前往蘇聯，參加契爾年科葬禮。中共中央為「蘇修」正了名，開始稱蘇共為「同志」，稱蘇聯為「社會主義國家」。

中共靠攏蘇共這一着棋確實厲害。四月份，外交部向中共中央書記處報告：中蘇靠攏已造成美國白宮的尷尬和緊張。北京認為，向美國伸手要錢的機會又來了。

北京的如意算盤是：利用美國急於聯華反蘇的心情，向美國索取美元及高級科技，以挽救國內癱瘓的經濟。如果美國完全滿足北京的



中蘇靠攏談和，白宮尷尬不安。

要求，則北京保持與蘇聯的距離，並與美國保持「準結盟」狀態。如果美國「不聽話」，北京則打出第二張牌：靠向蘇聯，由蘇聯進口二手的高級科技，同時脅迫華盛頓：再不給錢，我就和蘇聯完全好了！

現在，北京已按預訂計劃打出了第二張牌，因為在前一時期，美國借給中國的外匯還不夠北京需要的一個零頭。

北京的策略是想來一個最佳選擇：左右逢源。美國不給錢，就向蘇聯靠；蘇聯不幫忙，就向美國靠。北京設想，美蘇兩強會為了爭取中國而爭着向中國送「禮」，形成競爭局面。

## 六、左右逢源會成功嗎？

現在，中國最關鍵的問題是經濟改革。可以說，共產黨的命運也決定於經濟改革。中國的經濟問題，當前就是一個「窮」字。沒有錢，一切事情都做不成。為了將改革推行下去，中國外交活動的總目標就是搞外匯，向洋財主借錢。胡耀邦訪澳、彭真訪日、今年李先念即將訪美，都是集中力量爭取外匯。另外，向華僑統戰，也是吸引僑界外匯，向蘇聯靠攏，最終目標還是向西方索錢……。

問題是，為什麼收效甚微呢？這值得我國領導人深思。

我們的看法是有三個根本性的原因。

其一，我國法制不健全，經濟領域內的法制（尤其是保障私有產權方面）更是殘缺不全；其二，我國領導人缺乏法治觀念，迷信人治，使經濟改革沒有在法律改革的保障下進行。我國領導人不尊重法律，甚至不尊重憲法，這是一貫的現象。憲法上規定有言論自由，被胡耀邦一篇關於新聞必須為黨的喉舌的談話粉

碎了。鄧小平洋洋得意於他親自發動的打擊刑事犯罪運動，稱該項運動獲得了老百姓的支持。我們承認，打擊刑事犯罪運動的確為普通百姓歡迎，但據從國外回來的朋友說國內大張旗鼓地宣傳減罪運動，不按法律辦事，給外國留下了恐怖的印象。這種沒有法治的狀況，怎麼能吸引外資呢？怎麼給投資者安全感呢？鄧小平圖一時之快，為什麼不考慮它的副作用呢？為什麼不能按照原來的刑事法來懲辦犯罪份子呢？

我們還常聽到，外商抱怨在和中國合作過程中，中國方面不遵守合同；

其三，中國領導一再強調，中國的經濟改革，千改萬改，國家所有制主導這一條不能改。這樣一來，外國的私人資本怎麼會有膽量進入中國大陸投資呢？憲法上不保障私有產權，反而強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外國的資本家聽了能不害怕嗎？

總之，我國領導人如果不從自身的制度上找原因，而只從玩弄蘇聯牌和美國牌上打主意，恐怕「左右逢源」難以實現。

中國的軍事戰略大規模地轉變了，其動向無疑將會受到世界的進一步關注。

補記：此文完成後又接到一個外交部傳出的內部消息：中國撥款軍一百多萬，是和蘇聯達成默契後宣佈的。中蘇雙方的高層最近接觸較為頻繁，據外交部的人說，雙方討論重點是邊界撤軍及裁軍問題。中蘇雙方都在邊界上駐紮重兵，而且都被龐大的軍備開支壓得夠受。經過談判，雙方都有意緩和邊界壓力。中國已單方面宣佈大規模裁軍，雖然蘇聯方面尚未宣佈採取同樣措施，但據外交部人士透露，蘇聯將悄悄撤走一部份中蘇邊界駐軍，並適當裁減常規部隊。

# 皮包公司的興衰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黃嘉明

## 「皮包公司」之罪

在大陸的市場上，人們現在可以發現這樣一種現象，任何屬於國營的商店，包括上海、廣州和北京的超級百貨公司，商品短缺，市面蕭條，凡是高檔商品或者質地優良的東西，一概無貨；而自由市場，包括那些在秘密角落裡進行的交易，則完全相反，上到國家的「通行證」，下到農副產品，供應充足，應有盡有。問題是，不同的市場有不同的物價，這種差價有時小到幾分錢，有時則高達六、七倍。這種情形，看起來好像是價格圍繞着價值上下波動，商品的供求關係正起着市場機制的調節作用，北京的改革似乎也頗有成效。然而，隨着通貨膨脹的加劇，銀根的緊縮，人們意識到大陸的經濟改革面臨着危機。北京政府一方面趕緊剎車，採用小心穩妥的辦法來修補價格政策；另一方面則大張旗鼓地宣傳打擊經濟犯罪，制止不正之風。中共還列舉了不正之風的種種危害，並號召全黨起來加以抵制。給人的印象是，黨內的不正之風已成了改革失利的重要原因，而「皮包公司」則為其中之一。

## 不新的「新生事物」

「皮包公司」這名詞對年輕人來說也許陌生，但對上了年紀的人來說，它只是不新的「新生事物」。說它不新，因為古已有之，說它是「新生事物」，則因為它是新形勢下的產物。

北京從來就認為，鄧小平上台後的形勢都是新的，特別是農村經濟改革收效可觀，北京領導人信心倍增，要求形勢一新再新。他們提

出：對舊有體制要大動手術，對價格政策要大膽改革。於是，「開放」、「搞活」成了這場改革之形容詞。

無可否認，這兩個形容詞道出了北京決策人物的主張，但是對更多的人來說，它們還有別的内涵。「開放」意味着放開膽子掙錢，「搞活」就是疏通各種關係渠道為己所用。這種理解一方面很自然地反映出人們的某些本性，但另一方面也說明中國老百姓對當局的懷疑心理。北京的政策素有一日十八變的美譽，老百姓在向前看不到的時候，自然會很實際地向錢看。「皮包公司」是在這種向錢看的形勢下產生的。

## 官辦「皮包公司」

在很多人的心目中，賺錢是時髦中之最時髦。既然大陸盛行「一窩蜂」，像「皮包公司」這種純粹以賺錢為目的的買賣就更不待言。



大陸的私營牛仔褲「公司」。



以北京為例，北京原有各種公司二千一百八十五家，但在去年最後三個月裡一下子增加到四千一百二十二家，上升了八八%。這樣的速度，何止是「一窩蜂」，而是旋風式的。

如果對「皮包公司」產生的速度、組織方式和經營方式略加深究，人們會發現北京政府斥其為不正之風並非用詞不當。我們首先從「皮包公司」的組織方式來看，大部分的「皮包公司」是在黨、政、軍、幹部直接參與下開辦的。所謂「皮包公司」就是仗着手裡擁有的公文、批件和圖章來進行貿易活動，有些「皮包公司」乾脆只需要一張營業執照即可謀利。如此條件除了少數四通八達的能人可以如願以外，只有做官的人才能辦到。現在舉兩個例子：上海市吳淞區政府去年四月成立了吳淞區經濟開發總公司，十五名董事中有十二人是區級機關的幹部；另一個例子是福州軍區僅去年就相繼開辦了各種公司單位一百八十個，其中十九個貿易公司從去年九月到十二月，利用各種渠道做生意，獲利三百六十多萬元，另外簽訂的合同，則高達八百多萬元。如此大宗的買賣和暴利，除了身居要職的官員能夠做到，一般的平民百姓恐怕連想像都不可能。從上述兩個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到「皮包公司」除了是賺錢公司以外，還是「權力公司」和「後門公司」。它具有典型的「官商一體化」的特徵。一位身為北京某公司副總經理的高幹子弟曾坦率地對筆者說，通過權力和後門得到的資本比馬克思講的「赤裸裸來到世間的資本裏流出的血還要骯髒」。

## 「皮包公司」的價格政策

「皮包公司」的組織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決

定了它的經營方式。可謂無奇不有，除了買空賣空的基本形式外，大致的「皮包公司」還採取赤字經營，超業經營，有的乾脆「買空賣空」，有的甚至倒賣「倒賣的權利」。下面我們舉幾個例子說明。

前面提到的福州軍區，他們從事的貿易活動純屬買空賣空。他們雖然不從事任何實際的生產，但是由於他們有軍產、商品配給，公章帳號等一系列便利，可以輕易地組織到充足的貨源。他們用合同的方式，大量轉手和倒賣汽車、電視機甚至軍械；他們牟取之暴利不是來自於商品的價值，而是看不見、估不出的權利價值。

太原市紅星貿易公司倒賣鋼錠採取的是赤字經營和超業經營的方式。其過程是，一個修繕工業購銷站向太原重型機器廠購買了三百五十八噸鋼錠，每噸五百五十元。合同簽訂後，該站既不付款，也不提貨，轉手賣給了另一個供銷處。供銷處再用同樣的方式轉給紅星貿易公司，最後這批鋼錠到了浙江省金華市建築材料公司手裡。經過四個月內四易買主，鋼錠的身價已提高四四·四五%，達到了八〇〇元。還有一個倒賣鋼材的公司——丹東市風城縣工業二局供銷公司，他們雖然只轉手三次，却使第一次買進時的七百元增加到一千三百二十元，上漲幅度八八·六%，幾乎為鋼錠買實的一倍。在大陸，鋼材屬於嚴格統配物資，憑這一點，就身價百倍，在供不應求的市場上，許多企業因為申請不到配額，不得不高價從黑市求得，而那些轉手的單位根本沒有支付能力，也不需要此類產品，他們斗膽先除賬，再轉讓出去，全靠關係和後門的威力。鋼材等於利潤，商品價值加後門價值等於價格，就是此類「皮包公司」的致富公式。

## 令人吃驚的「數字之最」

與玉田縣（河北省）林寶貿易公司的買賣額相比，前面所舉的那些數字不過小巫見大巫。這個公司先與石家莊華生公司簽訂了三千台電視機購銷合同，繼而在北京召開了訂貨會，與十二個單位簽訂了合同，隨後又在一個月內與各省、市、自治區的十五個單位，簽訂十九份購銷彩電的書面合同，總值高達一億六千四百八十四萬元。林寶貿易公司先後收到訂戶預付款一千二百六十三萬元。如此之巨的數目自然利潤可觀，但是這場交易乃是建立在空買空賣的基礎上，所謂二十萬台的彩電出售，純屬烏有，根本就不存在這批貨物。各訂貨單位在合同簽訂後，再層層加價轉售，層層收取預付款，最後合同簽訂到第六層，共涉及十多個省、上百個單位。到目前為止，已被披露的此類買賣，該公司在各個方面都達到了「三最」：轉手次數最多，涉及範圍最廣，行騙金額最巨。這項空買空賣的交易之所以能從「零」達到「最」，是因為得到了官方的庇護，財政局、物資局、商檢局包括公安部門都直接和間接地參與並促成了此事。這樣權力、關係和後門有機結合所包含的價值，自然可觀，無人可比。

## 不可思議的買賣

買空賣空也好，空買空賣也好，都是在官商結合下才得以進行。按照商品的交換原則，權利和後門具有追加的價值也並非沒有道理。在大部份「皮包公司」的商業活動中，都默認前面提到的經營公式，無形的權力既然有時會在商品流通過程中變成價值，並形成有形的價

格，我們自然不會吃驚，權利也可直接轉為商品，出現在市場的交易中。

在前面提到的各個例子中，我們可以找到這樣一個事實。鋼材、汽車、彩電等國家重要配給物資是「皮包公司」賺大錢的主要買賣。根據北京的統計，僅去年九月一日到十二月二十日，北京倒賣彩電的單位就有一五二家，倒賣汽車的有九家，倒賣這類物資沒有權力是無法辦到的，這個權利的外觀形成，一個是「國家物質配給證」，一個是「國家進出口商品許可證」。擁有了這其中之一證明，就意味你有買賣一定數量緊缺物質的權利。如果在有貨源，又有賣主之情況下，一張證明的身價就可以進行討價還價，移植到物價中去，不過這只是一種常見的形式，另一種形式則是直接拍賣此類證明，使其包含的價值獨立成為商品標價出售。北京相當一部份的黨政領導和高幹子弟就專做這門行當，對有權有勢的人來說，這宗買賣既不費神，又不傷時，且「一本」萬利。一位專幹這類買賣的幹部曾向筆者透露，在討價還價地倒賣中，這類證明已經有了自己比較穩定的價格，以彩電為例，凡得到一台二十吋彩電的進出口配額，公價是八十元，一張有一千台進口額的許可證就值八萬元。他還說，買不到這種證明不可能倒賣彩電之類的產品，買到則等於賺了大錢，所以他自己的買賣是倒賣「倒賣的權利」。這個比喻真是叫人拍案叫絕。

## 北京掀起清除

### 「皮包公司」旋風

面對「皮包公司」所暴露的種種問題，北京當局不久前發出了通知，要求切實採取措施，堅決制止黨政幹部經商和倒買倒賣的行為。

二月五日結束的全國檢查長會議也要求在這一年的特別加強對經濟犯罪的檢察工作。北京市委則進一步制訂了條例，今後市委領導一律不得接受各種公司、中心及任何經濟實體聘任為名譽董事長、董事長、顧問等職務，已經承擔的宣佈無效。隨着北京的指示，眼下清洗公司的旋風替代了數月以前公司出現的旋風，以上海為例，上海在今年年初開始的清理，已使九百多家新開張的公司關閉了四百六十多家，凍結了另外二百多家的資產和營業執照，對剩下的公司則實行審核和管制。在這些被關閉和被暫停營業的公司裡，除了少部份黨政幹部直接開辦並已發現有嚴重問題的公司外，絕大部份則是民間自己集資創辦的小公司。這些公司資金較少，既無專職人員，又無辦公地點，除了一張執照使他們能夠偶而做些小本經營的買賣外，在各方面都沒有能力從事商業活動。以此看來，似乎北京採取的這些強制性的措施有利於經濟改革的繼續進行，而且並無「收縮」之嫌。

### 為「皮包公司」講幾句話

問題常常不能輕易地作出結論。「皮包公司」旋風既然出現在八十年代，如同新生事物，那它的產生和存在就有現實的理由。在沒有分析這些理由以前，採用一棍子打死的辦法比前面列舉的事實，問題還要大，還要糟糕。因為這種做法杜絕了社會內部的調節，窒息了人們對事物發展的探索和認識，並使新的生命失去了滋長的可能。因為嬰兒在搖籃裡不能思索就殺死他是最愚蠢的。

「皮包公司」存在的問題無法否認，但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它並不能推及到問題的

全部。除了黨政幹部開辦的公司和另一些有名無實的公司以外，還有一部份則是由民主黨派人士、過去的企業家及一批有創業精神、有魄力的人創辦的。當年赫赫有名的「傷痕作家」盧新華，在報上公開辭去「文滙報」記者職務轉向商界，與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在深圳創辦公司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筆者在上海旅行的時候還曾有幸地參觀過一個名叫「大中華貿易公司」，該公司由退職人員自己投資創辦的，他們在一個里弄裡租賃了別人的底樓客廳，並將其裝修成一個簡潔的辦公室。該公司經營的業務主要是為農村的中小企業提供諮詢、技術轉讓等服務，並在服裝訂做、兔毛加工方面為城市廠家組織貨源。在短短的一個月內，該公司就簽訂了數十項合同，成交額一五〇萬，獲利十七萬元，使原先二萬元的資本增加了八五倍。上述的這個例子說明民辦公司對商品的流通，對市場機制的強化有很大的作用，同時對農村中小企業的設備更新、技術更新也有實際的推動。這樣的「皮包公司」我以為不但不應取締，而應該加以扶植和推廣。

### 不要行政干預，要經濟立法

除了在本政策上應許可民辦公司的存在和競爭，另一方面對其間暴露的問題，不要採取行政手段來進行干預，而應該加強經濟的立法和公證制度，用實際的經濟利益來制約他們的商業活動。只有這樣，「皮包公司」才能建立自己的信譽，並在經濟的領域裡發揮積極的作用。如果北京當局承認這個基本事實，承認體制改革需要放鬆控制，實行有彈性的市場調節，那麼他們也應該承認取消「皮包公司」是因噎廢食，得不償失。



被「球迷」青年打壞的外國人的汽車。

# 項莊舞劍意在沛公

## 北京球迷暴亂

(中國大陸留學生) 高 岑

五月十九日晚，在北京市工人體育場內舉行的世界盃亞洲區第四組A外圍賽的結果是中國國家足球隊以一比二敗給了香港隊，失去了一九八六年進軍墨西哥世界足球賽的資格。當比賽結束時，許多青年觀眾便立刻高聲

鼓噪起來，辱罵聲、汽水瓶、垃圾、石塊紛紛飛向香港隊。當北京市副市長張百發，發現到事情不妙而即刻進入香港隊企圖陪伴香港隊躲開暴亂時，竟然仍有一個玻璃瓶子直向他投來，幸他被一隊員拉開，才免被擊。場內的暴動延續約一個小時後，才被馳援的警察緩和下來。

外電報導說，這次暴亂有「排外」情緒，因為外國及香港記者也成了中國觀眾發洩情緒的對象。中國青年觀眾向外國人吐口水，羞辱外國人，高呼着反外國人的口號，並且在街上阻擊威嚇駐北京的外交官、記者等，幾輛屬加拿大與西班牙外交官、蘇聯「塔斯社」記者及日本商人的汽車均遭亂石擊損。

在暴亂中，據說約有三十名公安人員挨打，四人受重傷。一名駐北京文匯報記者也在暴動中遭到圍攻。

在這次由運動比賽引起的暴亂之前，亦有

類似小型的事件發生，如一九八〇年英國諾威奇足球隊訪問中國時，五十名中國觀眾因鬧事而被捕；一九八一年十一月，近廿萬北京青年不顧當局的禁令，興奮地擠往天安門廣場，歡慶中國女排奪取世界冠軍；一週前，中國遼寧足球隊在香港與精工足球隊比賽時，也曾發生打鬥，然而，十九日在北京的這場暴亂，却是建國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

據說，已有一百多人被捕，並將接受公審。我們認為，這次暴亂事件由運動比賽的失敗引起，並不是單純的「排外」情緒的反映，而是青年們對當局政策及對本國一些社會現象不滿情緒的發洩。事實上，北京副市長張百發、中國記者及警察也在暴亂群眾的打擊範圍內。

這次暴亂，首先反映了人民，尤其是青年人對當局崇洋媚外政策的不滿。回顧中國近代史，幾百年來的中國人基本上一直處在崇洋媚外和盲目排外的矛盾中，這種矛盾有時是外國人製造的，如八國聯軍和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燒殺掠奪；有時却是由中國政府製造的，如晚清政府「寧予洋人，不予家奴」的政策。

在三十多年專制制度和閉關自守政策導致

經濟崩潰之後，中共領導人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大轉變，他們為了吸引外匯，一味地向外國資家討錢（這些人以前均在他們打倒之列）；他們把黃埔公園門口「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摘下來，却把更多無形的「中國人及動物不得入內」的牌子掛到了「北京飯店」、「錦江飯店」和各地「華僑商店」的門口；他們不允許用人民幣購買高級商品，只允許用外匯券購買；他們給外國人和華僑種種方便和特權，却限制自己的老百姓；一些有權的人利用與外商做生意賺了大錢；有些中央高層領導買通外商和僑商，把子女一個個送到國外，並讓他們謀求外國的居留權；作為中共第一把手的胡耀邦，竟然提倡使用刀叉，丟棄中國的筷子……。

這種中共高級領導人帶頭刮起的崇洋風，激怒了老百姓，激怒了青年人。人們要利用一切機會來抗議這種崇洋媚外的政策，這次暴亂事件，只是一種不文明的低調抗議形式而已。其次，在抗議當局盲目崇洋媚外政策的背後，實質是抗議當局的腐敗與專制，抗議最近的物價暴漲政策。為什麼當局那麼崇洋？為什麼國內經濟如此落後？還不都是獨裁的制度和腐敗的政策造成的嗎？

在中國，沒有罷工、罷課、遊行示威的自由，沒有出版及新聞自由，人們不能循合法的渠道宣洩他們對當局的憤懣，只能借題發揮，尋機鬧事。球打敗了，可以成爲觸發因素，球打贏了，也可以成爲觸發因素，中國女排得了世界冠軍導致北京廿萬青年上街，幾乎釀成暴力事件，就是最好的說明。

項莊舞劍意在沛公。表面上，一些酒瓶、垃圾砸向外國人和香港人，實質上的目標卻是中共腐敗的制度！我們向在該事件中無辜受害的外國人表示慰問，我們相信，你們總有一天會明白「項莊舞劍，意在沛公」的意義的。■

# 各民主黨派壽終正寢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劉斯杰

中國民主黨派的前途如何？也許是個見仁見智的問題。今年三月二十五日，北京召開了政協六屆三次會議。從這次會議的報導和所作的配合宣傳來看，人們似乎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中國大陸的民主黨派已是夕陽晚唱，不日將壽終正寢。對於這樣一個冷酷的結論，那些經歷了「反右」及「文革」但仍倖存下來的人必不甘接受。這些人或許還有志於重整雄風，與共產黨再試鋒芒。但這些人到底半截已入黃土，除了「遙想公瑾當年」以外，別無作為。

在共產黨「統戰」與「革命」的虛實政策之下，民主黨派實際早已成了一空設的架子，一個附和和響應的角色。日後隨着這批元老領袖的相繼辭世，各民主黨派恐怕將名實雙亡。

我提出的這種看法，不是一種廉價的新聞炮製。中國的民主黨派在三十多年來的湍流激流中，仍能高榜列名，全仗這些黨派的「識趣

達禮」和共產黨的「豁達胸襟」。從共產黨幾次恢復「統戰政策」，為民主黨派人士的恢復名譽來看，就知道往事幾何，西風蕭瑟了。

翻開毛澤東選集第五卷，我們可以看到毛澤東先生最早對梁漱溟先生的怒罵，理由是梁先生在二十七屆人民政府委員會上，「不適當」地批評了共產黨的農業政策，而且歷史上，梁先生曾與某些國民黨要人來往較密，因而為共產黨所不齒。五七年章伯鈞、羅隆基兩位先生，在共產黨主持的會議上，深刻地檢討了自己的「不赦之罪」，原因是他們所領導的民盟，要求在縣級以上的單位發展自己之組織，並要求參與政府的決策工作。當章羅兩位成了衆矢之的，他們自己的領袖地位就像梁先生當年一樣，被共產黨解除了。隨着共產黨對民盟的清洗，中國其它的民主黨派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指控。在共產黨以後發動的文革中，民主黨派不僅整個的土崩瓦解，而且每個「異黨的分

子」都成了專政的對象。共產黨這種排斥異己，獨斷專行所造成的信仰危機，應該說是咎由自取。如果他們當時能多多少少接受各民主黨派的合理建議和老百姓的意願，中共目前的處境不至于如此難堪。現在從這次召開的政協會議來看，共產黨並沒有對自己的錯誤有比較深刻的檢討和認識。

在一篇官方的報導中（《活躍的政治協商與民主監督工作機構》，作者寫道：一九四九年十月，在第一屆政協會議上，根據周恩來的提議，政協分為八個工作小組，其主要任務是「協助政府審議法案，搜集和反映意見，宣傳政策，溝通思想，調整關係。」在六五年召開的四屆政協上，周恩來要求工作組「提出問題，提出見解……供我們研究政策作參考。」文革結束以後，特別自八三年以來，被恢復的工作組把重點放到了「改革，開放及落實方面」。從這篇報導中，我們可以看到民主黨派從早先的「協助政府審議法案」到今天的向共產黨要求落實政策的歷史發展過程。共產黨對這樣一個歷史的結果不僅沒有表示慚愧，反而表示了贊賞，彷彿現在能讓民主黨派講幾句無關痛癢的話，已是很大的一種仁慈。共產黨還專門作了一個落實政策的情況報導，對已經落實政策的百分比表示了很大的自豪，可是共產黨一點也沒有意識到，民主黨派時至今日還在向共產黨要求落實政策，而且還有百分之十以上的人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這難道不是對共產黨的統戰的一個巨大的諷刺嗎？如果美國的民主黨有一天跑到共和黨那裡，要求給他們自己落實政策，我真不知道美國的公衆輿論將如何反應。

在一個政治國家裡，一個政黨如果失去了自己的獨立性，失去了發表政見和自由批評執

政黨的權利以後，仍然繼續存在，它必然只能依附在佔統治地位的政治集團上。中國民主黨派目前的情形就是這樣。北京政府這次爲了配合統戰的宣傳攻勢，在海外發行的《瞭望》雜誌上，以「歷盡坎坷志愈堅」爲題，專門介紹了民革濟南市副主任曾天民的事跡。

曾天民的父親曾做過孫中山的私人秘書，曾本人是個民主主義者。四九年以後，曾出于對共產黨的敬仰，特別是在系統地學習了革命理論之後，堅定了跟共產黨走到底的決心。由於種種原因，曾從反右開始一直到文革，先被下放勞動，後被發配原籍，遭受之苦難以筆盡。然而曾對「中國共產黨的信念始終沒有動搖，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也始終沒有懷疑，」因爲「他想，在我們這樣一個人口衆多，情況複雜的大國，在進行一項偉大的事業的時候，出現偏差，錯誤，遭受挫折是難免的」。「他堅信黨一定會排除干擾，克服各種錯誤傾向，最終回到正確路綫上來。」令我吃驚的是：這篇文章從題目到內容，都把一個歷盡坎坷，執迷不悟，最後屈服和歸順共產黨的民主人士的命運當作共產黨的業績來歌頌。從曾天民的例子來看，共產黨依然把迫使民主黨派人士就範，作爲彼此合作的基础，共產黨到今天還沒意識到老子黨的不良作風，也沒有清除自己一黨天下的封建意識。像作者談到曾對黨的忠誠和信仰，即使這是一個事實，這也是一個悲劇的事實。按照作者的刻劃，曾不應是個身在曹營心在漢的角色，而應是中共濟南市委的副書記。否則曾目前的地位只能作這樣兩種解釋，一是曾雖贊同共產黨的大方向，但對共產黨某些所爲仍有顧忌，因而仍留在民革以示抵抗；二是曾在共產黨的高壓之下，放棄了自己的政治立場，充當了共產黨在民革的代理人。總之

結論不管如何，共產黨這樣的統戰宣傳只能適得其反。如果共產黨在自己控制的範圍內，都不能容納民主黨派的獨立存在和發展，共產黨目前所推行的香港模式有什麼意義？共產黨對台灣的親善政策又有什麼價值呢？

我認爲，共產黨若想在國內外重新樹立自己的形象，就應該首先放棄這類宣傳，並在意識深處認真檢討自己的霸權意識，同時共產黨應該考慮這些問題：其一取消所謂的統戰政策與知識分子政策，用完整的法律體制來代之。歷史證明，一種政策往往是政局的特殊產物，它是權宜的，可變的。其二共產黨不能也不應該把自己的信仰和觀念強加給其它的民主黨派，在法律上，民主黨派和共產黨應該是完全平等。其三民主黨派應有發展其組織，宣傳其思想，的自由，執政黨無權加以干涉。其四民主黨應享有平等競選，參與國事的權利和機會。其在共產黨執政期間，其它民主黨派有權利對共產黨進行監督和批評，雙方的矛盾應當根據法律，或由人大會議仲裁解決，共產黨無權進行打擊迫害。如果共產黨在這些基本方面無意改變自己的態度和立場，那麼我相信：共產黨也許在經濟上會取得很大的成就，但在政治上將永遠和幾十年前的國民黨一樣的落後！

共產黨假使只打算在表面上搞統戰宣傳，把民主黨派僅僅作爲人才資源來利用，那麼最近由統戰部副部長李定先生出面強調的「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胆相照，榮辱與共」的十六字方針，只能被理解爲是「共存長期，共說榮辱」這樣的八字方針。與其讓各民主黨派作爲被長期監督和羞辱的對象，不如讓民主黨派接受一個壽終正寢的結局來得更好，如果這是中國民主黨派唯一能夠對命運作出選擇的話！

# 爲了一個人

（中國大陸新移民·美國）華 旒

詩人

不再將頌歌

獻給太陽

（儘管它是多雪後善良的太陽）

以及北斗星

（儘管它是救星，懸於迷途者的視線）

以及向日葵

（儘管它是給人嗑上半天的好零食）

以及東風

以及永恒

以及峰顛

只因爲，一個人

早已把諸如此類的讚詞

壟斷於水晶棺中



# 變調的 「拍手歌」



(中國大陸留學生·日本) 黎音



北京政府告訴人民：發財時不忘文明——本刊記者攝。

離家不覺數載，今年春節前夕，我由海外回鄉探親，感到家鄉確實有了變化。這個座落在遼河岸邊的小城，由於是水陸交通要道，歷來對外界的事物反應靈敏。所以隨着「改革」之風的吹來，又出現了許多意想不到的新事。短短幾日見聞，使我慨嘆不已，忍不住提起筆來向讀者報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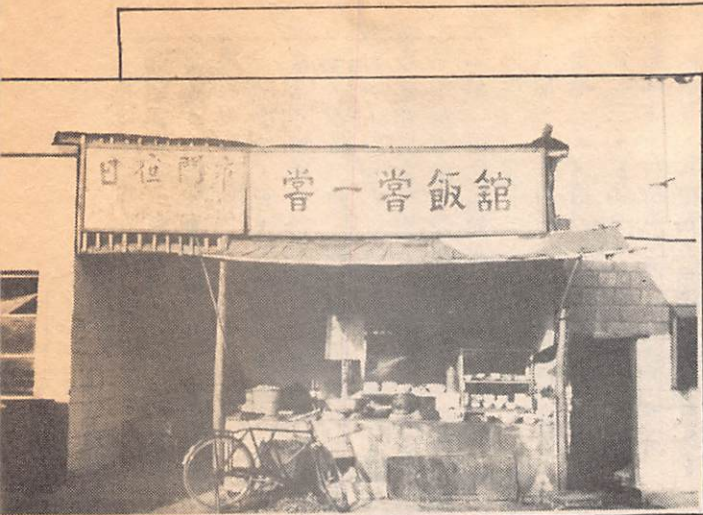
## 五花八門的生財之道

故鄉小城的火車站是我最熟悉的地方。記得讀中學時，學校要求我們學雷鋒，每天要做幾件「好事」，所以課後總要和同學三、五成群跑到火車站去，扶老携幼或幫旅客義務提行李。那時常常苦於旅客稀少，唯恐「好事」做不成。然而這次歸鄉，一下火車就嚇我一跳。不僅搶上火車的旅客蜂湧不斷，而且站外邊大隊成龍。仔細一瞧，原來是購買火車票的旅客從售票室一直排到站前的小廣場，隊伍還拐了三道彎。一看便知多數是經商跑買賣的，他們手提肩背，携帶着大包小袋，擁擠着，叫罵着，一片混亂。我心想：這要學雷鋒可有事情好做了。

我正觀望間，忽然有幾個人圍上來。一個人問：「先生，從國外來的吧？我用車送你去找一家舒適的旅館，車費我不要，換點外幣給我行。」

又有一個人操着很濃的本地口音說：「先生，咱告訴你實在話，打這場往南三里多地有個旅遊村。進村如到家，炕暖屋子熱，活雞活鴨現宰現殺，出門有車迎送，捶背修腳有人侍候，專門接待外賓。可比那有暖氣的高樓賓館別有風味呢，便宜呀！請吧。」他說着伸手示意，要我上他那輛又舊又破的汽車。

我還沒來得及回答，覺得衣袖被人扯了一下，回頭一看，是個三十多歲的漢子，他小聲對我說：「請您到這邊說話。」他拉我邊走邊說：「您人生地疏的，可別受騙上當。」我一時感到這人很不錯，心想：莫非他是來做「好事」的？接着又聽他說：「您準備在此地住幾



中國大陸簡陋的私營飯館。——本刊記者攝

天？我給您介紹一位女嚮導吧，人年輕漂亮，保您開心，一天只收四十元外幣兌換券，怎麼樣？您別看這個城市不大，玩的地方可多啦！——我心想：糟糕，還是這一套。於是我急忙解釋說：「老鄉，我是本地人，回國來探親的。」這句話不要緊，呼啦又引來一些人，只聽他們七嘴八舌嚷道：「老鄉！那好哇，老鄉見老鄉，伸手幫一幫，給咱換點外幣行吧？」「喂，老鄉發財了，別那麼小氣嘛！」——

正當我受到「圍攻」無法脫身之際，忽然看到姐夫和姐姐遠遠跑來，知道他們是來接我的。我立即撥開人群，衝出「重圍」，喊道：「姐夫、姐姐，我在這裡！」向他們奔了過去。他們看有許多人圍着我，以為出了什麼事，我邊走邊將方才的情形對他們講了一遍。姐夫皺着眉頭說：「他們這是響應發財致富的號召，生財有道啊！」

家鄉的春節前，白雪鋪地，滴水成冰。星期天姐夫陪我去逛街，只見街上有許多年貨攤子，擺着憑票供應的凍豬肉、凍雞、凍魚、瓶裝酒以及爆竹、雜貨。攤前排着長長的隊伍，人們在凜冽的寒風中抱勝縮頭，兩腳不住跺地取暖，耐着性子排班等待購買年貨。這情景和我數年之前離家時並沒什麼不同。我好奇地問

### 反映心態的拍手歌

回到家裡已經傍晚，姐姐正在包餃子，她身旁坐着一個小女孩。姐姐指着小女孩對我說：「這就是我孫女茵茵，四歲啦，今天領她來吃餃子。」茵茵睜大眼睛，指着我說：「猜着啦，你是我舅爺，從日本國來的，對不對？」我說：「對呀！」她又問：「你怎麼沒帶彩色電視機來？」這一問可使我有點發窘。我忙說：「彩色電視機下次來再帶，這次給你錢好不好？」我說着掏出一張十元的人民幣給她。她接過去看了看說：「這是中國錢，不是外國錢呀！」臉上露出失望的神情。我問她：「中國錢不是可以買糖吃嗎？有什麼不好？」茵茵天真地歪着頭說：「用外國錢不用走『後門』也



有了錢，才能娛樂——本刊記者攝。

姐夫：「聽說現在國內市場物資豐富了，怎麼買東西還是這樣難？」姐夫苦笑着搖頭說：「這要看對誰而言，腰包裡錢多的人可以到自由市場買高價貨，也可以去商店買議價貨，那裡商品『豐富』，可是咱這些靠固定工薪生活的人不敢光顧啊！」他說着指一指攤上的凍魚：「比如這憑票供應的河魚，國營牌價九角錢一斤，春節每人只供應一斤；自由市場賣兩元二角錢一斤，隨便買，可咱買得起嗎？一天的工薪不夠一斤魚錢，只有望魚興嘆了，哈哈！」姐夫說着竟哈哈笑了起來。我聽得出這笑中含着嘲諷，帶着辛酸。

在回家的途中，我們長久的沉默，都在想着心事。姐夫忽然小聲問我：「你在國外也經常能聽到國內市場繁榮、形勢大好的消息？」我說：「人民日報還是經常看的，好消息不少。」姐夫「哼」了一聲說：「當然啦，不走『後門』買不到煤取暖，天天停電買不到蠟燭照明，連火柴都脫銷要憑票供應這些事，是不會登到報上去的，是不是？唉！莫非我們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麼？」

能買到好東西，外國錢好花。」姐姐嘆息着搖搖頭說：「有什麼辦法，連孩子也變成了『外幣迷』。」

晚飯後，大家圍坐在桌邊聊天，茵茵忽然問我會不會唱「拍手歌」，要和我玩拍手遊戲。我告訴她我會，同時順口唱道：「你拍一，我拍一，黃雀落在大門西；你拍二，我拍二，黃雀落在樹當間兒……」茵茵忙搖着小手說道：「不對不對，我來教你吧！」她說着就把小手一拍一拍的唱起來：

你拍一，我拍一，買台彩色電視機；  
你拍二，我拍二，屋裡擺上四大件兒；  
你拍三，我拍三，茅台美酒鳳凰煙；  
你拍四，我拍四，請客送禮好辦事；  
你拍五，我拍五，兜裏有錢腰包鼓；  
你拍六，我拍六，油炸丸子紅燒肉；  
你拍七，我拍七，出國參觀笑嘻嘻；  
你拍八，我拍八，發財致富戴紅花；  
你拍九，我拍九，腦瓜靈活樣樣有；  
你拍十，我拍十，不走「後門」是白痴。

茵茵唱的「拍手歌」使我感到新奇，同時引起我的深思。有些童謠往往是通過孩子們天真的語音，來表達一種深刻的寓意。這首「拍手歌」不正是目前國內一些民衆心態的寫照麼？它像一面鏡子，將人們心中的所思所想如實地反映出來，而這又是一種怎樣的精神境界呢？我一時難以尋出恰當的答案。

姐姐說：「這首『拍手歌』現在孩子們都會，不知是從哪兒傳來的。」我說：「這大概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吧！」姐夫不以爲然，他說：「這怎麼談得上是大勢所趨？這是畫餅充飢。」我想他的話是有道理的。

## 遍地流行的五子登科

臘月二十三過小年，連降了一整日的鵝毛大雪。天剛黑，外甥和他的妻子來了。我這個外甥三十出頭了，「文革」中到北大荒插隊，六年前返城，至今沒有正式職業。最近兩年開始跑小買賣，搞些南貨北運、北貨南銷的小本生意。他當採購員，妻子擺攤出售，倒還可以糊口。我們相見，自然十分親熱。閒談中我帶着玩笑的口氣問他：「這幾年做買賣，沒熬個『萬元戶』當當？」外甥一本正經地說：「還想當什麼『萬元戶』？當個『望簾戶』倒差不多。」我好奇地問：「什麼是『望簾戶』？」外甥答道：「『望簾戶』就是整天望着屋簾發愁啊！」大家都禁不住笑了起來。外甥並沒有

昆明街邊的眼鏡攤。

——本刊記者攝



笑，神情悵然地說：「舅舅在國外，不瞭解這幾年國內的事，以爲做生意就能發財，錢是那麽好賺的嗎？」外甥的妻子接着說：「咱第一關係不活，第二腦瓜不靈，第三腰桿不硬，發財輪不到咱的份兒。」

吃飯的時候，外甥喝了兩盅酒，臉也紅了，話也多了。但是話題一接觸到做生意，他總是說難。我問他究竟難在何處？他告訴我：如果是八仙過海，各顯其能，單憑能力競爭還好，可現在在中國無論做大小生意都必須託「門子」、「拉關係、尋「靠山」。有權有勢的近水樓台，處處佔先，可以欺行霸市；「門子」廣、關係硬的手眼通天，以強凌弱，可以爲所欲爲。什麼買空賣空、投機取巧、行賄受賄、連詐帶騙的勾當都幹得出來。他說着忽然想起了什麼事，手拍了一下額頭道：「對了，現在流傳着『五子登科』的說法，聽來倒很實際。」我問：「又是新鮮玩意兒？你說說。」於是，外甥扳着手指頭一一數說起來：

「一、空對空，遍地皮包公司，冠冕堂皇，打腫臉充胖子；二、爲撈錢，做事不擇手段，連詐帶騙，像個瘋子；三、拉關係，到處磕頭求援，低三下四，像個孫子；四、跑買賣，成年東奔西走，千辛萬苦，像個驢子；五、刮油水，專佔國家便宜，損公肥私，是個敗家子。」

外甥的妻子在旁插言道：「這『五子』之中咱佔一『子』——像個驢子。」外甥苦笑點頭說：「不假，不假，驢子只能受累，誰叫咱沒能耐……」

屋外不知什麼時候刮起了呼嘯的西北風，捲着大雪片鋪天蓋地壓下來。透過窗子，隱約可以看到行人在黑夜的風雪中艱難地邁着步履，我的心中油然而生起一股空虛、悵惘之情。■



翻開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三十日的「人民日報」，你會看到這樣一個消息：中共將在一九八五年為原國民黨投誠起義官、兵頒發證書。初看，不免一驚，細閱，又不覺得奇怪了。

這可憐的一百七十萬國民黨起義、投誠官兵，早在四十年前，被迫成為中共的宣傳品，成為「棄暗投明」的榜樣，今天又成了「出土文物」，再次為中共的宣傳機器服務，真是叫這些「鬍子兵」哭笑不得。曾記否，剛一起義或投誠時，他們頗受中共的「歡迎」和「信賴」，可是「老太太過年，一年不如一年」，在

民黨投誠起義官兵們對中共的支持。大概這就是中共決定頒發證書的原因之一吧。似乎這「證書」能當「護身符」使用。——可惜中共行的是「一朝天子一朝令」。鄧小平為首的這幾屆中共中央委員會簽署的一道道法令，頒發的這些證書究竟能管幾年？鄧小平先生百年之後，新的中央委員會將誕生。那麼，鄧的一整套方針、政策、路線，頒發的「證書」等等能被新的中共領導人接受和認同麼？衆所周知，鄧小平先生在毛澤東在世時，慷慨激昂，上書毛澤東：永不反悔，永不翻案，可是不到幾年功

### 國內快訊·時評

## 從給「投誠份子」

## 發證書說起

（中國大陸新移民） 童萬菁

這建國後的三十多年中，每逢運動，這些人總是少不了挨整，尤其是在「文革」中，這些人均成了地地道道的「國民黨殘渣餘孽」，遭到殘酷的鬥爭和打擊，而且連親友們也受到連累，在那「黑雲密佈」，「暗無天日」的時代裏，他們被打得皮開肉綻，或被打死，或被迫自殺，或被趕到農村「修理地球」去了。他們的罪名是：混入革命隊伍內部的「間諜」、「特務」。——儘管在文革之後，中共一再宣佈為這些人平反昭雪，但始終消除不了廣大人民對中共的不信任感。為此，中共決定採取頒發證書的辦法來爭取民心，爭取這一百七十萬國

夫，鄧已把毛的一系列方針、政策、法令等等全拋到九霄雲外去了。所以說，當鄧小平先生去馬克思那兒報到後，如果反對鄧小平路線的人上台，誰敢保證這些投誠起義份子的「證書」不會變成一張張廢紙？！

中共頒發證書還有一個用意：那就是做給國民黨各層人士看的。——看看中共統戰部副部長李定是怎麼說的吧：「大批國民黨部隊的起義和投誠，使解放戰爭加快了進程，……起義人員不論是早起義，還是晚起義，不論是地下的還是空中的，都對人民、對革命立了功，黨和人民是不會忘記的。」啊！原來，中共搞

的「一國兩制」，以及希望第三次國共合作的根本要求乃是：大批國民黨部隊快快起義、投誠，無論是從地上來，從天上來，中共都是歡迎的，是愛國的表现。按中共的邏輯來說，中共是代表全體中國人民，代表國家的，因此，國民黨各層人士，特別是在台灣、在台灣的國民黨將、帥、官、兵，祇有向中共投降，才是愛國、愛人民的表現，不然，就你打成反革命。但是中共忘記了一個根本點：那就是今天的時代與四十年前大不相同了，今天的中共遠比四十年前要腐敗；而國民黨政權却在經濟上取得一定成功，此點，連鄧小平本人也不得不承認。中共以為四十年後的今天仍會有大批國民黨官員向中共投誠或起義，恐怕不太實際吧！

常言道：「人貴有自知之明」，中共奪得政權以來，經歷了卅五年，大陸人年平均收入僅是三〇〇美元左右；而國民黨統治下的台灣人年平均收入已接近三千美元，是大陸的近十倍。而日本和美國的國民年平均收入則分別是大陸的卅二倍與四十倍。比一比，想一想，為什麼同樣是卅五年，在中國台灣省和香港的人民竟然把生活水平提高到如此地步，這難道不值得中共領導者們好好反省、反省麼？——我們還要勸告中共領導人「要識時務」，四十年前由於國民黨政權專制、腐敗、無能，導致八百萬大軍，全綫潰敗，才有一七〇萬官兵向中共投誠，如今還有那個傻瓜願意放棄三〇〇〇〇美元的收入而向中共投誠起義，去拿三〇〇〇美元的年收入呢？！中共領導人應該痛下決心，不僅在經濟上來改革，更要在政治上來個徹底大變革，允許中國海內外各階層人民起來自由發表批評意見，允許中國國民聯合法在國內存在，並虛心改進自己的「一黨專制」作風，這樣才能得到全體中國人民的擁護和信賴，才能給中華民族帶來繁榮與昌盛。

# 馬克思主義與

# 中國傳統文化

(上海) 黃萬勝

八四年入春以來，上海學術界舉辦了許多專題報告會，打破了「精神污染」後的沉悶空氣，其中由復旦大學研究生主辦的「現代西方哲學思潮」系列講座尤為轟動。參加這些演講的人多為從事哲學研究的青年民主派。他們思想敏銳，敢於突破禁區，引起很大的反響。上海一位參加過講座的聽眾最近轉來了一本由上海哲學學會編輯、內部發行的演講集，並向本編輯部推薦了黃萬勝的文章，在國內的政治空氣下，黃萬勝能這樣坦率地發表見解是難能可貴的，本刊現將其文略加節選公開發表。中國之春還將有計劃地介紹一部分國內的研究新作，使讀者了解國內思想界的新貌。

黃萬勝，男，二十八歲，在上海社會科學院哲學所工作。

從一八四〇年開始到「五四」前後，中西思想文化的交流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從興實業、辦洋務到「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辨，從維新變法提出向西方學習到辛亥革命的立憲、共和，一直到「五四」運動提出「德先生」「賽先生」。短短半個世紀之中，中西文化交匯的浪潮屢踏屢起，其間經歷了實業、體制、政體、法律和教育諸階段和環節，而其最高形式則是哲學，「五四」就達到了這一最高形式，圍繞哲學的主題進行了對社會、歷史領域中諸多課題的思索探討。「五四」以來的中西哲學交流，與以前歷史相比，有一個重要的特點需要注意：對西方哲學的尋求是和對本民族傳統哲學的批判同步發展的。一方面是對傳統哲學時代精神精髓——科學與民主——的追求，另一方面，則是對傳統哲學的無畏的否定精神，批判孔學、打倒孔子，既是中國思想界學習和接受西學的基本前提，又是其邏輯產物。「五四」開了風氣，向西方尋求真理的大背景下，很多西方哲學派別在「五四」前後湧入中國，影響較大的有實證主義哲學，包括孔德的學說和斯賓塞的社會達爾文主義；還有以伯特蘭·羅素為代表的邏輯實證主義；有以杜威為代表的實用主義哲學；有以柏格森、尼采、叔本華為代表的唯意志和生命哲學；特別值得指出的是，在五四前後，馬克思主義傳入了中國，並且得到了廣泛的傳播。上述哲學都曾在中國取得一定的影響，其中邏輯實證主義哲學家羅素到中國講過學，傳播其學說；實用主義者杜威也來中國講學，國內還出版了「杜威三大講演」和「杜威五大講演」等。

## 實用主義與馬克思主義

### 同時傳入中國

比較起來，上述哲學在中國社會生活發生更大影響是兩家：實用主義和馬克思主義。這是為什麼呢？我以為主要的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滿足中國當時實際需要的程度，二是和中國傳統文化背景有沒有一致性的問題，從影響的持久和深遠來看，更重要的原因是文化背景的問題。實用主義哲學特別強調的是有效性問題，主張以對主體的實用性作為判斷推測，這和中國文化中注重實際功用的一面有很大的相似性，中國哲學強調「道在倫常日用之中」，「用」是中國傳統思維判斷體系中的重要原則，中國有趙州橋，但沒有力學；有火藥和煉丹術，但沒有化學；有各種「本草」和醫治經驗，但未形成病理學；有數不清的能工巧匠，但沒有物理學；中國的科學擁有強大的技術傳統，但沒有達到理論思維的高度，這與傳統哲學不無關係，恐怕很重要的就是「用」，費孝通先生曾說：「我時常自覺我們中國對實利的注重，非但我們的感情生活貧乏得可憐，除了母愛之外人與人之間似乎全被利益所支配，而且使我

「我時常自覺我們中國對實利的注重，非但我們的感情生活貧乏得可憐，除了母愛之外，人與人之間似乎全被利益所支配，而且使我們成了一個最缺乏宗教的民族。我們並不是沒有鬼神的信仰。我們對鬼神有的是恐懼。恐懼之餘，我們敲詐、欺騙他們，為的是風調雨順，為的是免災逃禍，脫離不了我們生活上的實利。我們的祭祀是請客、疏通、賄賂。我們的祈禱是許願、哀乞。鬼神在我們是權力，不是理想；是財源，不是公道。」

們成了一個最缺乏宗教的民族。我們並不是沒有鬼神的信仰。我們對鬼神有的是恐懼。恐懼之餘，我們敲詐、欺騙他們，為的是風調雨順，為的是免災逃禍，脫離不了我們生活上的實利。我們的祭祀是請客、疏通、賄賂。我們的祈禱是許願、哀乞。鬼神在我們是權力，不是理想；是財源，不是公道」。這話雖然說得不免尖刻，但對中國的實用精神不失為有力的針砭。有這樣的實用傳統，接受實用主義的一些思想觀點，應是不乏基礎了。

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來說，也同樣存在着文化背景的問題。當然，首先起作用的是馬克思的科學共產主義學說對於解決當時中國社會實際問題有重大的實踐意義。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以及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理想，對於到處潛伏着社會變革危機的動亂的中國，恰如黑暗中的一盞明燈，令中國的被壓迫者和進步的知識份子歡欣鼓舞。但馬克思主義學說的自然觀、社會觀、歷史觀是完整的統一體。科學共產主義學說沒有其堅實的哲學基礎，如果只要其社會學說而排斥其哲學，我們不能設想馬克思主義會在中國發生持久的影響。而長久地接受馬克思主義，必須有一實際條件，這就是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而這一點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取決於中國傳統文化作為母體對馬克思主義這一外來的導體文化的容納程度，即兩者之間有沒有相通的因素。不難看到，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宇宙圖式、樸素辯證的思想方

式等哲學的基本因素，與馬克思主義有較大的相似性，這是中華民族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文化心理條件，也是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之後，能在一定程度上改造傳統文化的前提之一。當然，這也相應地產生了馬克思主義可能在不同程度、不同方面被傳統文化所同化的可能性的不利因素。事實上，這個過程也就是雙向的，一方面是在相當長的時間裏，馬克思主義改造和調整傳統文化，成為佔統治地位的特定的意識形態，另一方面是中國文化不斷地對馬克思主義產生同化功能，把馬克思主義打上中國印記。但無論怎樣，在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之後，中國文化、哲學的發展開始了一個嶄新的階段。今天，不管孔學在人們心裏結構中還有多大的影響，我們不會再把孔子作為精神偶像，把孔學作為國家學說了。但在香港，台灣則很不相同，孔學在那裏還是名符其實的國學，外來哲學思潮始終處在社會外圍，不能成為征服民族心理的哲學因素。在這個意義上，就開放世界背景下人類文化的新的發展和構成而言，經過馬克思主義改造和調整過的中華傳統文化可能會比純粹的國學發揮更為深刻、更為強大的功能；就中國走向世界而言，雖然起步較晚，但可能更加成熟，更加迅速，意義也更高深。

## 實用主義遭到淘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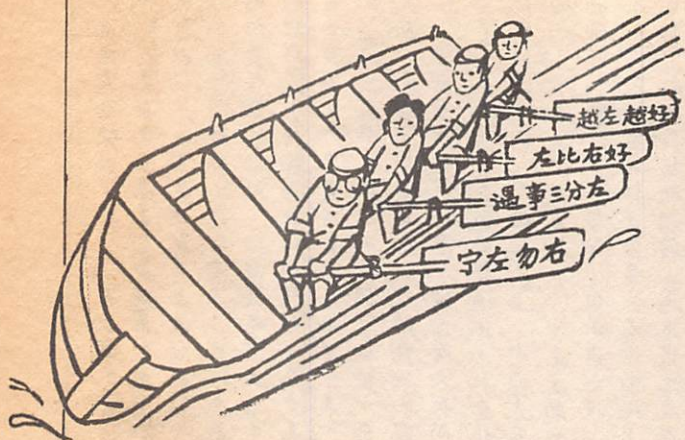
需要進一步研究的是，比較馬克思主義和實用主義，為什麼前者最終在中國站住腳跟，而後者最終却被淘汰了？以往我們在思考這一問題時，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兩種哲學的不同性質上，這個出發點無疑是對的，但在研究中也絕有絕對化和片面化、簡單化的作法，比如，我們習慣做這種結論：馬克思的哲學是無產階級的哲學，實用主義是帝國主義的哲學，壟斷資本主義的哲學，其實，這個結論對解決上述問題並無直接意義。如果僅僅是帝國主義、壟斷資本主義的哲學，那為什麼它在別的帝國主義國家却不能流行傳播呢？事實情況要比這種結論更為複雜。實用主義是美國的國家哲學，它不僅是資產階級哲學的一種流派，而且還是美國的民族精神。如果不理解美國的工業、美國開發西部的拓荒者精神、美國的科學就很難理解它的實用主義哲學。從靜態分析上看，這種哲學確實與辯正唯物主義哲學有根本不同，不能設想兩種哲學的和平共處。但從動態形成和效果上看，却可以把握更深刻的因素。實用主義哲

學與美國的發展有很大的關係，我們知道美國的民族構成是以歐洲諸國的移民為主體，加上世界各地的移民和北美印第安人形成的。在哥倫布發現北美之後，歐洲各地的移民海潮般地湧入這片新大陸，就文化而言，移民的作用有二，一是移民作為載體帶去了天下各方的文化傳統，而各種文化傳統的綜合，本身就是對傳統的否定，它所綜合的是區別於各種傳統的新文化，哪一種傳統文化都不能作為判斷準則，唯有在開拓這片新大陸的實驗中獲取成功的，證明是「有用」的，才能站住腳，傳統讓位於經驗，實用主義是在這民族構成的背景中生長起來的，移民的另一種則是本身就對傳統失去好感的亡命者，北美則給他們提供了一個活動的舞台，成功或失敗就靠主體的判斷，這種精神情緒所導向的也只能是「事實」和「有用」。而對效果的崇拜是工業崛起的心理條件，同時，工業的發展和科學的發展又強化了注重效果的觀念，在工業的背景之下，早年拓荒者形成的實用精神不是被拋棄而是被發展壯大。前不久，我問美國一位哲學教授：現在在美國諸多的哲學流派中，那一種哲學對美國社會的影響作用最大。他加思索地回答：當然是實用主義。離開了美國文化構成的背景，能夠說通實用主義的持久影響的原因嗎？所以，理解實用主義哲學，僅僅只注意國家制度的帝國主義性質，而忽略其構成的民族文化背景恐怕是遠遠不夠的，不光是對實用主義這樣，對任何哲學都是如此。唯其如此，因為實用主義生長在美國，所以不能為中國從根本上接受。因為兩個國家的文化傳統在質的規定上不同。不僅中國不能接受，任何一個自身文化傳統比較悠久的國家都不能接受實用主義哲學。小農眼界的有用與工業眼界的有用是很不相同的。中國不能在根本上接受實用主義，與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國長期以來在農業小生產背景下形成的文化心理結構有重大的關係。

## 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

馬克思主義則不同，它的產生背景與實用主義很不相同，思想來源要遠為複雜。列寧曾經講過，馬克思主義集合了人類創造的文化財富的精華，人類的成就曾被馬克思一一地批判吸收。這個觀點也表明了馬克思學說構成背景的多樣化。任何學說終究是人所創造的，因而都邏輯地

受到人自身的限制。馬克思也是人，而不是神，因此，馬克思主義的產生、形成同樣不可避免地受到歷史的文化背景的限制和思想材料的限制。如同恩格斯所說：「每一個時代的哲學作為分工的一個特定領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驅者傳給它而它便由以出發的特定的思想資料作為前提」。馬克思是德國人，受到德國哲學的影響比其他民族哲學的影響要大得多。從馬克思青年時代世界觀的形成來看，他的文化背景，主要是德意志民族的影響。我們可以比較一下德國與法國，這兩個國家的民族傳統是很不相同的，表現在哲學上，德國人強調整體、習慣於創造體系，具有高度的抽象思維的能力，在社會學說上以整體論為基礎的專制學說多出于德國，例如生活意志論、權力意志論、集團主義、法西斯主義，等等。而在法國，它的哲學往往介於經驗論和理性主義之間，到了近代突出地表現出經驗論的特點，這與德國的理性主義是很不相同的，康德非常贊成法國大革命，但對法國的哲學卻很不以為然；法國的社會學說不崇拜權威，浸透了還原論的氣息，自由、平等、博愛是法國提出的，無政府主義在法國最有勢力，自由主義、浪漫派在法國找到了最適合生長的最廣闊的土壤。這兩種傳統的不同，是由經濟、文化的差距共同造成



馬克思主義到了中國，  
使得中國人都成了左撇子。

的。在歐洲，德國的資本主義發展較晚，相比英、法較為落後，普魯士容克的封建力量非常強大，貴族專制統治也相當森嚴殘酷。恩格斯也曾指出：「德國是一堆正在腐朽和解體的討厭的東西。……一切都爛透了，動搖了，眼看就要坍塌了，簡直沒有一線好轉的希望，因為這個民族連清除已經死亡了的制度的腐爛戶骸的力量都沒有」，他幾次講到：德國資產階級宣告反對貴族專制政府是從1840年開始的。因此，儘管德國也有自己的聲勢壯大的啓蒙運動，但是，比之法國，他的封建文化要強大得多。我們可以說，馬克思主義產生的德國背景與中國有較大的相似性，它們有封建專制的同一性質的社會環境。馬克思生活在德國的環境中，不可能完全超越德國民族在農會社會背景下形成的文化傳統，經濟的改變與文化的變革並不完全同步，文化比之經濟有較大的穩定性。我們以往在研究哲學家時較多地注意他的經濟地位、階級立場，而較少注意他本人的文化形成的背景條件，這是不足的。我贊成羅素對哲學家個人的遭遇、心理素質、文化修養與其學說之間關係的研究，還是那句話，哲學是由人來完成的，人不是無意志的機器，也不僅僅只是執行時代意志的機械手，他的學說總要經過他的心理、情感、意志、經驗、理性的組合加工，因此，脫離文化背景的理解，總還是不完善的。可以說，馬克思也不能擺脫德意志民族文化心理的影響。在馬克思的思想中可以看到他被加工改造過的德意志民族的大一統的觀念，體系化的世界模式、整體論的思想方法等傳統文化的痕迹，而這些與中國傳統文化有很大的相似性，很容易為中國人的接受，體現在馬克思思想中的決定論、因果論等思想，與中國社會結構中宗法等級所造成的決定論性質的心理質素和農業村社會背景下的因果報應觀念也比較接近，也容易被接受。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可以說是中國用自己的文化傳統接受馬克思。

但是，另一方面，馬克思的學說來源又不僅僅局限在德國背景中，在德國受到影響也不僅僅是普魯士容克、貴族專制統治文化傳統這一種影響，德國狂飈運動所體現的文化精神也給了馬克思很大影響，馬克思在德國被驅逐後，在法國、比利時、英國等地都生活過，歐洲各國、尤其是英、法資本主義文化對馬克思學說的形成也提供了豐富的思想材料。但是，我們看到馬克思在資本主義文化財富上提煉的思想精華却由于中國傳統文化中缺乏資本主義文化的薰陶感染，而不能被接受，比如人

## 哲學並未完結

的學說，人道主義的觀點，在我們是犯諱忌的，甚至當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把人的自由與共產主義聯系起來，作為前提和條件時，我們的一位教授可以說，這不是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既然，他可以把馬克思的話不當作馬克思的觀點，那麼是不是可以允許我按照他的思想方法，也不把他的話當作他的觀點，而認為是舊式的小農借教授之口表達他們對馬克思的理解呢？再比如自由的問題，馬克思主義認為人類是從必然王國走向自由王國，認為實現自由是共產主義的重要內容，走向自由是人類活動的趨勢和目的，但是，我們民族較少自由的傳統，中國大地上到處都有孔廟、文廟、到處都有祖宗的靈館和家族的祠堂，但是沒有「自由女神」，唯有廣州黃花園有一個空有火把而沒有火焰的小塑像。在馬克思那裏，共產主義是自由的普遍化、社會化，在我們這裏，自由化是個令人發懼的貶義詞。再比如民主，中國先秦哲學中，有很多民本思想，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孟子的「民為貴，君為輕，社稷次之」，墨子的「兼愛」，等等，但兩漢之後，就幾乎斷絕了，不是沒有這種要求，而是形不成社會力量，西方的民主是在資本主義戰勝中世紀的封建專制中成為思想綱領的，馬克思主義在這個基礎提出他的民主觀點，這裏包含着歷史和人類思想發展的邏輯。中國有漫長的封建專制統治的歷史。我們對馬克思的無產階級比資產階級有更大的民主，資產階級是假民主，無產階級是真正的民主等觀點的理解，往往不自覺地受到我們自己的文化背景的影響，比如，把集中看作民主，把無產階級專政看作民主本身。這樣，民主就越搞越少，少到老百姓不能給幹部提意見，提意見不是右傾就是精神污染；唱歌也不行，流行歌曲、通俗唱法也是精神污染；把我們黨搞成不堪一唱的形象；穿衣服也不行，一條喇叭褲、牛仔褲，就傳播了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如是，那西方的工人階級要與資產階級劃清界綫就只好光屁股了。這叫真正的民主嗎？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農業文化的背景制約了我們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我們在實際上沒有完整地弄懂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有很多珍貴的思想還沒有為我們認識消化。既然我們接受馬克思主義還不是完整的，換句話說，就是選擇的，那麼，選擇就涉及價值體系，而價值體系是由文化背景所決定。因此，可以說，我們是在我們自己的文化背景上接受馬克思主義，理解馬克思主義，在一定程度化是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了。

我們常常持這種看法，認為馬克思主義產生之後，西方哲學就一無是處，都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因此，我們往往對其橫加批判。這種保衛馬克思主義的願望當然是好的，也很可愛，但却未必達到了保衛馬克思主義的效果，可能正好相反，反而窒息了馬克思主義的發展。請冷靜想一想，哲學是人類認識世界、理解世界、改造世界的最高產物。怎麼能夠設想，馬克思主義之後，哲學就完結了，就不會有發展了；同時，也可以考慮一下，中國人口雖多，畢竟只佔人類總數的四分之一，還有四分之三的人。這四份之三還有沒有認識世界的活動，他們不是在接近真理，而是拼命地遠離真理回到史前社會去？如果他們有哲學，難道一點也不反映他們認識上的成就？我們這種態度，到底對不對？我絕對認為馬克思主義本身就不能容忍這種排外的態度。馬克思主義並沒有窮盡真理，而且開闢了認識真理的道路。我們經常這麼講，但為什麼在對待西方哲學的態度上就要採取把馬克思主義封閉起來當作最終真理、絕對真理的態度呢？馬克思主義這個全人類的精神財富，到了今天只有中國才有，而西方却沒有了，這不是馬克思主義本身的悲劇嗎？我們可以承認西方科學發達，因為這是可以通過物質直接顯現出來的，但是為什麼不進一步思考一下，科學也是認識世界的產物，科學的成就也會導致哲學的發展，西方的哲學是不是也部份地反映了它的科學成就呢？比如科學哲學，以「三論」為背景的哲學方法論，和量子力學為基礎的認識理論，以及以份子生物學、遺傳學為背景的研究歷史和人類學問題的哲學見解。學生關注自然科學發展成就的恩格斯在晚年還中肯地講到：「像唯心主義一樣，唯物主義也經歷了一系列的發展階段。甚至隨着自然科學領域中每一個劃時代的發現，唯物主義也必然要改變自己的形式」。為什麼我們總是擔心肯定了西方科學的哲學成就，就會貶低馬克思主義，因而對其採取先入為主的敵視態度呢？這方面，蘇聯曾吃了不少的虧，他們把「三論」也看作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的偽科學，加以排斥、反對，現在開始糾偏。這種教訓我們有沒有呢？現在，文學藝術界、學術理論界都在提倡肅清「左」的流毒，我們在對待西方哲學的態度上有沒有「左」的流毒，是不是也應當加以肅清呢？

# 中、日派性之根源

(中國大陸研究生·美國) 唐文方

編者按語及作者簡介：

唐文方，男，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畢業，現在美國堪薩斯大學攻讀政治學博士。本文為其碩士論文的主要部分。本刊希望中國大陸文科留學生將碩士和博士論文寄給我刊摘要發表，以顯示留學生的研究成果。

## 一、前言

中日兩國的政治制度不同，但是兩國都有派系問題的存在。

討論日本政治的教科書，均視派系問題為日本政治生活的根本事實。巴克斯（Barks）的標準本教科書就談到當政的自民黨與在野的日社黨內派系間的錯綜複雜的種種關係。

史加拉匹諾（Scalapino）和 Masumi 合著的教本，認為日本各政黨乃派系的組合和聯盟。兩位作者把派系界定為日本政治的「主要單位」，並暗示政黨中派系的利益時有超越政黨，甚或國家利益的趨勢。華德（Ward）認為自民黨與日社黨均係派系的結合，自民黨本質上乃數個派系為選戰與立法的目的而聯合起來的一個鬆弛組織，而非團結的國家性的政黨。Ike 在其頗負盛名的論日本政治的教科書中，認為自民黨與日社黨基本上乃是「派系的聯合」。有兩本教科書各花一章篇幅，詳論自民黨的派系。總而言之，政黨派系是廣為各方承認的日本現代政治的特點之一。

目前，研究中國的派系問題的著作也在增多中。派恩（Lucier Pye）在其新近發行的論中國派系的書中結論道：中國人相信只有在特殊的關係中才有安全，也正是這種根深蒂固的觀念，造成了派系問題。奧克琛保（Oksenberg）和高斯坦（Goldstein）認為中國政治中有四個派系。一個人是屬哪個派系，由他對現代化政策的立場而決定——有的極端，有的溫和。惠特生（Whitson）著名的「野戰軍」系統，是多數學者採用的方法。他指出初期的中共野戰軍，便是爾後人民解放軍派系的根源。哈丁（Harding）認為基於各種官僚利益的派系，諸如黨的領導份子、重工業的經理人物、參謀總部或地方軍隊等，才是關鍵性的派系。不論中國的派系是如何劃分，派系問題成為研究中國政治日趨重要的課題。

雖然研究中日兩國派系的文獻甚多，却有一點鮮為人觸及，亦即這兩個國家派系根源的問題。中日都有長久的歷史，傳統的態度及文化在兩國都有很大的影響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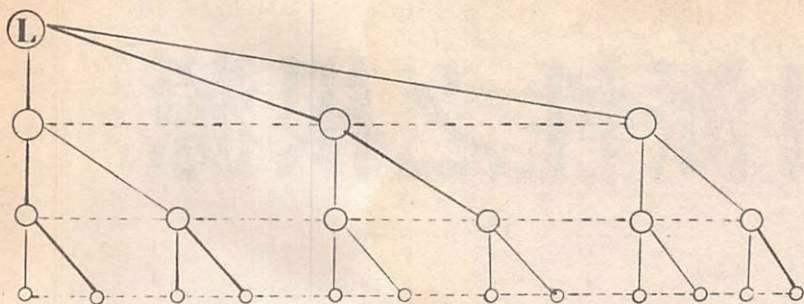
本文是要從政治人類學的觀點，探討中日兩國派系問題的根源。是什麼造成兩國的派系發展？兩國內有那些意識型態可以算是派系的根苗？兩國過去的政治系統與現在政治系統有何關連？要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得簡略地看看中日派系的形式及其結構與功能。

## 二、二個模式 一個理論

Nakane 發展了一個典型日本政黨中派系的模式理論。根據這個模式，一群人物猶如金字塔一樣各有其階級地位。頂端是首腦，其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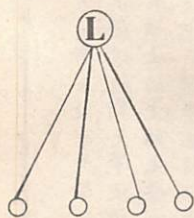
為高級領導，他們跟首腦的關係為人際的、感情的、特殊個別的。領導下面的成員與領導的關係，猶如領導與首腦的關係，成員透過領導與首腦連成關係，然後依此類推，下級領導及成員亦有相似的關係。這種垂直型的各層領導與成員間關係，主要為直接的，可行的人際關係。同等地位成員之間的聯結幾乎完全沒有，縱有也是非常薄弱。此一模式可用圖一以明之。

L = 領導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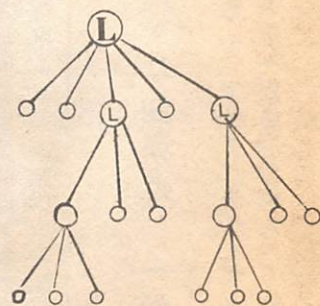
(圖一)

在此模式中，首腦乃是別人無法取代的某一特定人物，因為忠誠乃特定於某人，非可轉移的。首腦、各級領導、與成員皆屬對待「二價式」關係。由上圖即可知，它乃從內部分成單位，而每一單位也就是潛在的個體（派別、派系、小圈子等）。首腦必需依賴各級領導的忠誠與統率來維持他們的支持與合作。因此，契約性的關係幾乎不存在。雷希瓦（Raischar）指出，在日本大組織內的小組織並非意識觀念上的劃分，而是功能上的組合。納盛（Nathan）則按保護者與被保護者的關係敘述中國的派系問題。兩造在地位、財勢方面常常懸殊，兩造之間存有權利與義務的默契。但是，這種關係可以由任何一方隨時中止，而各方亦可同時另結與第三者的關係。納盛稱這種結構為派系（原文 faction，乃指大團體內，特別是政治團體內的小團體，可以譯為小派系、小圈子、小組織等等。）我們可藉圖二及圖三，瞭解得更清楚一點。



(圖二)

而非團隊為中心；(3)使此一系統結合的乃是上下型「二價式」保護委託關係；(4)使領導人與其跟從者結合的是特殊利益；(5)領導人追求權力與聲望，而跟從者則尋求保護與恩澤；(6)領導人與跟隨者的關係為相互依惠；(7)領導人愈有辦法，跟隨者的群眾人數也愈擴大；(8)這套政治系統內均是直線型的二價關係，首腦與低層人物透過各層領導人物而有間接的關係。派恩也從中國人口語上的「關係」一詞探討人際關係。他認為中國人所謂的「關係」，乃指友誼、義務、個人間的特殊關結和人際結合的型式。「它便是中國政治權力網的基礎。」此乃意謂在上者得酬償在下者，在下者得支持在上者的利益。「它有確實客觀的存在。」兩人一旦有了「關係」，該「關係」影響所及可以達到任何其他人物。派恩所指的「關係」，是社會上的泛泛關係。這種關係表示共同特點，例如同鄉、同年、同學、世交。派恩沒有清楚指出此種關係的內在結構。本文將以一對一的保護與委託關係，敘述中日兩國的派系問題，我們先從兩國經濟地理的情況入手。



(圖三)



### 三、經濟地理

歷史上，中日兩國均係農業社會，以水稻為主要作物。兩國的農業受天候的影響較小。土地耕作在日本依憑灌溉，因此使得日本農民緊密地結為一體。在耕種的時期，村民一起工作；同區村民如何引水灌田，以及各村之間如何分享河水，統統使得農民們體認到相互依存的重要。

遠在日本開發水利、從事稻米耕作之前，中國黃河中下游一帶，因黃土覆蓋而頗利於耕作，由西北風吹來的，長時間累積的黃土，既無石礫又無叢林；黃土鬆軟易於吸收水份，因而滋養作物。雨量通常足夠，雖然不很規則，因此，這兒可能較早發展了灌溉離型，因為土



傳統的水稻耕作需要大量人力。

質鬆軟，易於挖掘渠道。拉鐵摩耳（Latino）認為：「水土保持有賴團隊合作，彼此相互幫助挖渠築堤。」另一位學者鮑迪（Borde）認為，當時防洪比灌溉更為重要。不過，儘管看法有異，總之都是控制水源的需求使得中國古代的農業人口密集，人際依存關係強烈。

灌溉對水稻之重要不言而喻。今天日本全部耕地的百分之四十為水稻，而中國的南部水稻幾乎是唯一的作物。灌溉水稻需要大批人力。耕地、播種、插秧、收割全靠雙手。挖溝、築堤、改變水道更需人力。因此，古來的中國和日本由於地理因素與農業技術的影響，產生了人際相互依賴感。由於水稻耕作食糧充足，中日人口乃特多。十七世紀初，日本人口約二千五百萬，遠超過當時歐洲人口最多的法國，比之英國人口多出數倍。今天日本人口約一億一千五百萬，是西歐四大國任何一國的二倍左右。十八世紀時，中國人口超過三億。今天，差不多佔全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

中日兩國歷史悠久，長期以來人口眾多又密集，當然人際接觸也密集。因地理因素，日本可以從事農作的平地，不足總面積的五分之一。約百分之十五的土地在耕作中。中國只有十分之一可耕地。這樣的情況下，人們要想彼此生存，密切的合作乃是必須的條件。因此中日兩個民族，比之西方民族更具團隊傾向，更具人際互存意識。一旦某人失却某一團體的認同感，他立刻感到不安全。而一旦他隸屬於某一團體，他也不能輕易中斷此種關係。他將永遠忠於一個「更大的我」。

除了經濟地理的情況外，我們還得回溯一下古代中日的封建制度，以理解此種人際關係的內在結構、性質、程度和方向。

### 四、制度上的根源

十二世紀後期，日本發生了甘倍戰爭，源賴朝擊潰了平氏家族，建立了幕府制度，產生領主與封臣的關係。源賴朝頒給封臣土地權，作為他們在戰爭期間，效力疆場的報酬。源氏要他們無條件、完全的、始終的忠於他，並稱他們為「御家人」。戰時，他們得隨時奉獻生命，平時得到京都或鎌倉守衛。（鎌倉即現在的東京。）「御家人」的制度為源賴朝帶來他所信任的人，並賦予他們地方行政權，省級的官員稱為守護。一一九〇年後，全日本各省都有這樣的守護設置。

### 五、日本幕府制度中存有相當的人際化關係

幕府是相當人際化的政府，源賴朝跟其御家人的關係仍然要延續到子孫身上。後來幕府雖然易主，將軍與封臣之間的關係，仍按源賴朝所開創的方式延續。因此，迄今日本政治中，還有這種從封建時代遺留下的強烈忠誠、責任、自律、自抑等精神，表現在二價式的人際關係中。

中國的封建制度亦有這種情況。周天子為王，諸侯為臣屬，有公、侯、伯、子、男等階級。諸侯的土地謂之國，其爵位乃是世襲的，各國亦且自主的。諸侯可以任官、徵稅、練兵、執法。農民得向其頂頭上司納糧，並且接受國家徵召服役。只有諸侯可以晉見周王，這種關係結構與納盛所言的當代中國政治中的成員直接跟其頂頭領導接觸的二價結構相類似。宗教儀式在周朝的政治制度中，有重要的

心理作用。周王與諸侯祭祀後稷，各小封領祭祀他們自己的土地神。農民團體在他們的土地內也祭祀他們當地的土地公。此種地方方式的祭祀儀式，可能跟中國今天的派系中講究地方關係的現象有關，因為中國人久已慣於按地理區域形成政治派系。

中日的封建制度並不完全相同。古代中國的周人原在中國西方，征服商朝後，君臨中東，在中部與東部建立了許多城市堡壘，後來這些城市便成為工商中心。商人階級與貨幣經濟的興起，以及許多其他因素的影響，原來屬於「被征服者」的土地為貴族及城市居民所買進。因此出現了地主與佃農的關係。這種關係雖然也跟封建制度的模式相似，却缺乏忠誠事主的道德約束，缺乏權利與義務的相互性，因為它乃或多或少是屬經濟性質的。至於日本方面，雖然農業在分配方面相當商業化，生產方面却遠非如此。日本的城市雖有許多財政交換機構，但製造業仍在起步階段，既無工廠地區，賺取工資的勞工為數也不多。因此，封建時代的日本，領主與臣屬的關係特性有二：(1)兩者的關係人際的成份大過經濟的成份，亦即忠順比利益為重；(2)領主與臣屬的關係為不對稱，即契約性成份非常小，臣屬可以算是封建領主大家庭的成員。如此相較，我們可以說東周時代地主與佃農關係與封建日本的領主臣屬關係不同。前者根據經濟利益，後者築基於臣屬對領主的單向忠誠。假若此一立論正確，那麼今天日本政治派系裡注重忠誠，及中國政治派系的追求利益（個人權勢、升官等）也就其來有自了。

有些學者聲稱，中國歷史多為中央集權制。科舉制度公平正大，因此中國政治裡的人際關係不彰。這種見解顯然與現代中國政治上的

派系鬭爭事實不符。實際上，中國傳統官場裡派系甚多。哈佛亞洲學報號十二期刊有一論西漢的中央政府一文，文中指出：「西漢的官僚體制是由多種派系組成的，這些派系均想爭權。官僚體由一派的當權或各派勢力的均衡而維繫著。」在中國精神是派系的中堅。但是精神內却有不同利益的派別。這些人物包括地方上的大小地主、豪族、軍人組織等。宋代經濟極為發達，商人階級也踏入了官僚體內。宗教團體如佛、道兩派人氏致力於發揮影響力，都想把他們的觀念注入政治系統內。漢代某一品秩以上的官員，其子嗣可以承父蔭而授官銜。歷經唐朝而至宋朝，此一風氣更形昌盛。所以整個帝國的制度可謂十分人際化，而官僚組織提供了中國政治黨派的形成與維繫。

## 六、意識觀念上的根源

制度上的人際化也在儒家學說裡生根，而儒家學說是周朝以後中國的主要思想。儒家強調德治而非法治。孔子說過：「導之以德，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有一學者詢問孔子是否可以殺歹徒而就守法的善民，孔子回答：何必一定要用死刑呢！「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像這種不重法治的思想對中國政治影響很大。領導要以德服人，不可視其優越地位為當然。跟隨者要追求德智兼備的領導。這樣的結果便是以人為中心的團體，而非法治的制度。中國文化對日本影響甚大，儒家不重法治也大大影響了日本的封建制度。歐洲有著羅馬法做基礎，領主與臣

屬的關係為契約性、相互性，也就是法律性。中國和日本強調德性，在上者所以有權支配治理眾人，乃因智德兼備所致。因此，領主與臣屬的關係，乃是臣屬這一方面的絕對忠誠，而非二者間的法律關係。如此，也就難怪不易發展出民權觀念了。

公元第六世紀時，日本聖德太子實施改革，把來自中國的皇權觀念發展成日本的天皇體制，全國人民應該向天皇盡忠。隨着皇權觀念而來的是法統理論。這些理論乃受佛儒兩家學說的影響。儒家認為統治者應致力維持人間世界和宇宙世界的和諧。佛教認為天堂之道乃在信仰——對某一教派或某一大德菩薩的信仰。這樣的理論導致中日兩國人民相信：安全乃建立於與在上位者的個人關係上。儒家的忠君源於忠於家、忠於長者，亦即所謂的事君如事父。中世紀的日本特重家族譜系與榮譽，因為繼承事關權力、聲望、與財產。選擇繼承者，以子嗣中最為忠家者為條件，如果沒有男嗣的話，也可以養子、女婿、親人等繼承。今天日本政治上這種類似領養的方法仍然相當普遍。

雖然中日有同樣的儒家傳統，兩國仍有不同處。中國沒有超越價值的觀念，却有一「承天命」的以萬民為重的觀念。政府如果喪失天命，人民便有革命的權力。所以每次改朝換代後，新朝總要以真命天子自居。反之，天命一說從未在日本生根。儒家經典引進日本時，日人巧妙地避開天命之說，因為天皇乃萬世一系，其先世與歷史同時出現。就此意義，中國的法統體系較為普遍性，而日本的却是較特殊的。這一個劃分，可以用來說明中國的派系時有倒戈的道理，而日本的派系却較株守死忠於自己的領袖；中國可有承「天命」而易位的情況發生，而日本只有萬世一君。

另一差別在於，中國的家庭與地方跟中央政府的關係較日本的情況疏遠。傳統的中國人，只要個人或地方的生活沒有受到干涉，便抱着「天高皇帝遠」的觀念，誰當皇帝都無所謂。但是日本却有着天皇是一個大家長的信仰，集體的祖先祭祀培養成全國性的忠誠。

這一分別又造成現代中日兩國派系組織的某種差異。第一，在中國派系的規模大多較日本的為小，因為中國的社會階級較不連貫。第二，日本的派系較易彼此合作，因為畢竟各派同屬一家庭。這也就是說，中國的派系鬭爭比日本的偏於「零或整體」的遊戲。第三，日本整個國家為一大家庭的觀念，可以把本文前述的日本黨派模式說明得更清楚。由 Nakano 的模式圖中，可看出黨派領袖跟隨從成員的距離不等，他跟有些屬員較近，有些較遠，就好比大家庭中族長跟其直系較近旁系較遠一樣。如果我們再看看納盛之中國派系模式圖，我們可看出領袖與各隨從之間的距離均相等，這就是因為黨派成員間的人際紐帶一般說來是根據彼此互惠的利益計算而成的。

### 七、結論

派系的現象中國與日本都有，且均以二價式的人際關係為基礎。這種現象部份是因為二國有着長久的水稻農業而形成。種稻需要大批人力，因而導致人口快速成長。水稻有賴灌溉，古時灌溉只能侷限一定範圍內，人口因而集中稠密。由是而發展出人際的合作，及團隊傾向。個人只有當他附屬於更大的團體時，才感到安全。

從制度上說，二價式人際關係，根源於領主與臣屬關係。領主憑軍力及賜封保護臣屬，臣屬向領主提供服務和勞務。此種人際關係出現在日本的幕府與中國的周朝。日本封建時代的領主與臣屬的關係，強調臣屬片面對領主的忠心，而東周以來地主與佃農的關係，則多少具有「純粹經濟關係」。這一差異意味着：日本黨派內的成員比中國黨派的成員，對其領袖較為忠心。中國帝制時代的官僚組織，並非不是人際化的組織。但它奠定在封建的人際依存關係上，是一種講求人際關係的官僚體系。

從意識型態上說，儒家思想對中日兩國的政治哲學均有極大的影響力。儒家不重法律及強調德治，是人際關係發展的一般理由，而官僚機構的擬人化則是人際關係發展的特別理由。不注重法律的精神也使得日本的封建形式不同於歐洲的封建形式。前者強烈着重人際認同，後者則較具法律契約精神。佛儒講謙卑及信心，使得人們必得找到一個比自己優越而可寄身的人物時才感到安全。今天的中國與日本，人們仍然刻意尋求卓越的領導人，然後忠誠的做為一個跟隨者。中國的「承天命者可為君」的觀念，日本未曾採用。中國革命者可以替天行道來改朝換代，日本人却自稱全國一家，「天皇即是大家長」。因此，日本的黨派猶如一棵家庭大樹，枝極各有長短的現象好比領袖與成員間各有不同距離。由於日本黨派均屬同一母樹，它們比較容易趨於合作。中國的黨派組織較小，也不易彼此合作，因為國家幅員太大，而中央政府的影響力也較弱。中國黨派人物更關心於彼此的互利，少關心於忠心問題。

（本刊編輯組譯自美國中西政治學雜誌三月號）

## 尋人啓事

史昕（真名），浙江籍，父母為中共的革命烈士。據親友們推測，史昕於多年前已流亡海外。

現本人受史昕的知友委托，刊登此尋人啓事，謹吁請全球各地熱心人士，幫助打探尋訪，如有消息，或史昕本人見此啓事，請即致函香港九龍旺角郵政信箱79024號，與本人聯系。

史昕的知友表示：尋訪目的，純為探悉史昕生死存亡於何處，此外別無他意。

——鍾華 1985.4.28。



張諱大學畢業照。

# 巴黎的狂思

## 「愛國主義」質疑

(中國旅法作家·巴黎)張 諱

初春的巴黎，好似一位善愁的哭娘，有落不盡的淚水，抹不去的陰鬱。

走出巴黎第七大學化學系的大階梯教室，身影立即被夜色和細雨侵吞了。初春的巴黎，好似一位善愁的哭娘，有落不盡的淚水，抹不去的陰鬱。

「中國的不進步是因為中國人太笨！」「打倒愛國主義！打倒民族主義！」，我喊完這三句話，正在大教室聚集的「中國之春理論討論會」一下子熱鬧起來，一位先生說：「不，恰恰相反，中國人是全世界最聰明的民族！」馬上，有人用掌聲來支持他，還有人乾脆站起來反對我們「打倒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口號！「你是不是連中國文化也要打倒？」一位先生氣憤地質問。

「中國茶就代表中國文化！」一位小姐說。「我是中國人，我一點也不覺着自卑！」這是位太太。

每一句話聲落畢，就激起雷鳴般的掌聲，這掌聲無疑是對我的絕大的反對和諷刺。會場洋溢着一片往往可以令人感動的愛國熱情，我呢，有點像一個被「口誅筆伐」的不恥於人類的「民族敗類」，當然是傳統意識中的「民族敗類」。

「去吃一點飯吧，這附近有不少家中國飯店。」與我有着同樣不平心情的丈夫說。自我到法國以後，每天問他吃什麼，他總愛我給他做中國菜，在文化上，似乎是我在「同化」他。

座落在巴黎五區 RUE LAGRANGE 的「全家福」餐廳，竟是一家地地道道的北京味的餐

廳。老板娘已經六十四歲了，可我見她的第一眼，却錯認為是一位姑娘！蓬蓬的頭髮，黃黑白三色相間的緊身長褲，紅色的寬鬆的毛衣上別着一只醒目的白色蝴蝶結，步伐的輕盈跳躍，和那筆直細瘦的腰肢風韻無限，連過于纖弱而不免衰意的量根夫人也要讓上一讓了。

「你是北京人嗎？」她聽了我的口音隨即停止了她的法語，用了甜美的讓人感覺親切的北京話問我，我也一下子興奮起來：

「是呀，我是北京人。」  
「我也是呀，出來四十年了，唉，『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呀！」

可能因為我們是這雨夜裏唯一的兩個顧客，又加上老鄉的緣故，她對我們那樣熱情，停下手裏的活，就站在旁邊與我們閒談，談北京，談家裏的事。

「吃一碗北京的炸醬麵吧，又好吃又不貴，」她說，一點也不想賺我們錢，「吃了就飽了。」

「再來一個海蜇和一份酸辣湯吧。」我們說。人家這麼熱情，怎麼好吃一碗麵就走掉了呢？於是酒和點心也要下了，儘管並不熱心吃點心。

拌海蜇的味道及酸辣湯的調製都很有北京味，炸醬麵端上來了，我嚐了第一口，就彷彿回到北京的家中。

「好久沒有吃過這麼地道的北京飯了。」我稱道。

「想吃就來吃，八寶飯，冰糖葫蘆我也會做的，只要先打一個電話來就行了，糖葫蘆還放上豆沙和瓜子仁兒，又好看又好吃呀！」她對我愉快地說着。

「哎，你不要大蒜呀？」她很內行地問

炸醬麵離了大蒜味道就會減低一半，也不合北京人的規矩，我說「好呀」。

我曾確認這個世界舞台上必有我的一個角色，然而當我看到那伸着火紅的毒舌及滴血的牙爪在屠殺的人時，我氣餒了。

從這饒有鄉情的小店出來，方才自會場中染上的激動和不忿似乎平息了一些，只是神經病似地開始狂想了……

從婆婆家接了孩子，三個人直接地回家去。孩子躺在小車裏，兩點兒細綫樣地落在小小透明的塑料蓬上，這胖嘟嘟的小臉上全是睡意。

「她多麼幸福！爲爲，別長大，長大了儘要吃苦。」我和她重彈着這彈了無數次的老調，忘了她還聽不懂大人的話。

心境冷淡時，我時常懷疑生下她來是一個錯誤，是自己感情懦弱的產物。

在北京有一個朋友，婚後二十年沒有孩子，夫妻的感情還是如膠似漆。

「爲什麼不添個孩子，也顯得熱鬧些？」我問。

「自己一輩子辛辛苦苦的，何必再生個孩子來陪我們受罪，少造點孽吧！」他說。

我十分驚奇，又十分愕然，同時又感到幾分的深奧。

我曾自信過，曾經確認這世上必有我的一個位置，必有一個角色等待我去演出。可是後來，我漸漸地發覺哪裏有什麼屬於我的位置，舞台是這樣的小，露面而又顯耀的角色都待人們撕破了臉面，用無數的大小計謀和心血力氣

去爭取，除了刻苦努力外，必要時還得伸出燃着火的毒舌，滴着血的爪牙去廝殺一番！我有些氣餒了。待到悲哀時刻，便常常自問何必要在世界上？于是便把罪責的根源推到父母身上。

「你何必要生了我，讓我活着受罪？你爲什麼不在我剛生下來的時候捏死我！」

二年前，我因爲個人生活的痛苦而與父親兄長矛盾了起來，發出這樣無情的呼喊。

我是多麼軟弱呀，早已對生命產生了十分的懷疑，然而又始終下不了死的決心。我猶豫着，徬徨着，不願意進入社會工作，逃避人生種種的險惡，幸而有妳的父親愛我，拚了命用他菲薄的薪水養活我，使我在這小小的陋居中過着半隱的生活。可是，誰知又有新的煩惱侵來！——我慢慢地找不到一個理由來解釋自己爲了什麼而活在世界上了，一個新的寂寞，——自己與生活的需要關係又來侵擾我了……似乎僅一個丈夫還不夠，因爲我靠他養我，那麼誰需要我去關心，誰可以離開我難以生存呢？——是你，我的孩子，母親從孩子身上最能爲自己必須活着找到一個冠冕堂皇、氣壯理直藉口。

你就是這樣來到了世界，我的孩子，當你看得懂文字時，你肯定痛恨爲母親的自私，但當你領略了生活的滋味或許可以同情你的母親了，而且你會發覺，我沒有欺騙你。我永遠不會欺騙你，生活再醜陋，我也給你，我絕不會用了美麗的神話像傻瓜一樣地教育你，給你這花一樣的心多添些失望的痛苦。

你似乎早知人生的多舛，我生產你時，曾在醫院的產床上恭候了你這「千金」整整十二個小時，而你，仍賴在娘胎裏，拼命地踢打我，讓我萬分疼痛，却不肯出來，若不是那可愛

的法國醫生擎了一支讓人忘記痛苦的麻藥對我說：

「這是你們中國的『道』，得了『道』，你只有快樂沒有痛苦」。

果真，麻藥入了身體，媽就如得了道般地悠然起來，又況你的小爸爸陪在一旁給媽媽讀莊子的「逍遙遊」，否則媽準讓你折騰死了。但是你愈發固執，仗了麻藥的效力竟在我腹中睡起覺來。我此刻不得不承認感激人類的聰明睿智，醫生們終於用了薄巧的刀和無影燈，在我身上演了一齣「刀剪交響曲」，半威脅半強制地把我腹中準備自殺的你請了出來。

醫生剛對我說：

「貝貝出來了。」

我就聽到了你響亮的哭聲，緊接着，護士把滿身尚是粘液，拖着一條一尺多長的紫藍色臍帶的你送到我面前，我看到你不乾淨的小臉因痛哭而扭曲時，于本能的心疼中又生出一些失望來：

「從肚皮裏到肚皮外，不過是一層皮肉之隔的距離，這麼一點點變化，你就驚慌恐怖如此，今後幾十年的生活之巨變，你可承擔得住嗎？」可見人生之始就是痛苦的。

第一個夜裏，你躺在我身邊的嬰兒車裏不斷的哭，我聽了難過，想抱抱你，無奈全身仍在麻痺之中，動彈不得，于是自己也哭，——因爲可憐你。

直到護士拿了奶瓶來餵你時，你才乖了下來，但爲娘的我又有一種不安，——這樣的貪吃，今後的慾望可能會很高，痛苦自然要少不了。于是，我更加堅定了原定的計劃，給你起名爲：「無爲」。

在這慾橫流的世界，願你少受點爭名利的折磨。

我曾為自己是中國人而無限驕傲，為有長城而感偉大，然而我終於感到做中國人的不幸和卑賤。

可能，我的種種的顧慮是荒唐和多餘的，我的經驗與你可能無關。你出生在法國，你身上混有阿拉伯、瑞士、西班牙、中國四國血統，你幾乎是個「世界兒」，因此國家和民族的概念在你心目中渺小起來，你會把它們統稱為「世界和人」，你的眼界將比我寬廣得多，你對待生活也會自由得多。

我是個「純種」的中國人，我曾經為之無限驕傲。特別是剛剛識字的時候，從報紙上看到「西方世界的兒童為資本家做工」，「勞動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的文章後，我是多麼慶幸自己生長在甜似「蜜罐」的社會主義中國呀！在北京住的時候，每次走到「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全世界人民嚮往的地方」——天安門廣場，我又是多麼激動于自己是一個中國人呀！文化大革命的那幾年，我只是個八、九歲的小孩子，當聽到「紅衛兵」大哥哥大姐們高呼「解放台灣，解放全世界，把五星紅旗插到美國白宮頂上」的口號時，我志動而又心急，深恨自己年齡尚小，擔心自己不能參加解放台灣和美國，消滅資本主義的偉大革命，我本是非常喜歡熱鬧的呀！

然而……

一九七〇年的元旦，我隨了父母到京郊的八達嶺長城去遊玩，年僅十二歲的小孩子，對長城並無什麼自我的自覺，有關的一點認識，多是因為自己熱背的毛澤東詩詞裏有一句：「不到長城非好漢」。

為了當「好漢」，我興高采烈地一口氣向長城北面的烽火台頂爬去，累得氣喘咻咻了，

文革時期的宣傳畫。



也不肯停下腳步來。突然，我發現了許多穿得花花綠綠的外國人，他們舉着照相機拼命地拍攝，我好奇地看着他們，心境逐漸地有些變化，似乎有一種「偉大」的情緒在心底抬了頭，升騰了起來：

「外國人也來看長城了，外國人也喜歡長城，中國的長城！」

長城建築于蜿蜒起伏的高山峻嶺，借勢而顯示出了凌駕世間的巍峨的氣概，從而自覺感到了「了不起」。

我的身邊，有一位身着紅大衣的洋太太，她苦于穿着又細又尖的高跟鞋，站在近七十度陡斜的坡道上進退兩難，伸伸左腳，怕摔了跤，換換右腳，仍是不敢邁步，後來竟嚇哭了。我極輕蔑地看着她，心想：「這些外國人真笨。」

為了展示一下我心中中國人的優點，我邁

開自己穿着黑布棉鞋的小腳，勇往直前地向山下走去，走到最陡的地方，我索性坐在地上往下滑。那條藍布褲子和爸爸給我的舊軍裝是不怕弄髒磨破的！

山下的停車場上，我和家人準備登上「北京牌」越野車回家去了，與那些在寒風中凍得面紅耳赤，搓手跺足等公共汽車的中國老百姓比，有一點點「特權」的優越感。可是突然，我發現了那個「紅大衣」的洋太太和她的同伴們，在一大群穿着大棉襖、色調灰暗並不乏土氣木訥之表情的中國人的「圍觀」下，從容地登上幾輛漂亮的小臥車，隱入白色的紗帷後面，隨着車尾一股藍烟的飄散，迅速地轉上公路馳去了……

「他媽的，這個笨女人也有小汽車坐！」我心中頗有不平，同時，又有一些惆悵，——不遠處，豎起大衣領子抵禦寒風的中國人，正在拼命地往一輛敞蓬的大卡車上硬擠着。

十年以後，我認識了你的父親，很不幸，他是一個洋人，於是娘開始受點洋氣了。

北京城裏故宮外護城河的岸邊，環繞着一圈垂腰招展的柳樹，背着紫禁城的紅牆，遠襯着黃色的玲瓏角樓，景緻甚是幽古秀明，你父親常說這是頂能代表中國文化的一處美景。又加之你娘我總穿着一件藍底白點的西式大襟布衫，更喚起你父親對中國文化的贊賞，我們便常常携了手在這裏漫步，娘心中時常泛起一種莫名的傲意。

可是有一天，我們正在河邊走着，忽聞身後有人大喊一聲：

「洋奴！」

我回過頭去，果見兩個十幾歲的男孩子在我，而且又一次地喊了一句，「洋奴」。

我明知這是在罵我，但當你父親問我他們

說什麼時，我竟十分僥倖他沒聽清，虛偽地回答：

「沒說什麼，和我們沒有關係。」

但我心中悻悻地，與你父親在一起，無論做什麼他都問我的意見，並無「主僕」關係，我怎麼會成了他這個洋人的「奴」了呢？

北京的飯館是很進不得的，不說那一地的雞骨魚刺，還有粘痰濃涕，雙腳常常有被粘在地上的感覺。你就是對服務員賠盡了笑臉，用孫子對爺爺般的恭敬請他給開上「三兩米飯，一盤辣子肉丁和一碗榨菜湯」，也難贏他們的一個笑臉。這當然也難怪他們，他們本是不願意做這種工作的，其中很可能有當國家主席和外交部長的人材，只是苦于沒有擇業自由，被迫當成一顆螺絲釘被擰到社會主義大機器的「飯館部分」當「跑堂」來了。

我和我的父親爲了可以舒舒服服地吃頓飯，有時就到只給洋人開的大飯店去。因爲「禮儀之邦」的面子，又可能由于是給洋人做洋差事，所以服務態度遠優于對同胞。

「同志，請問你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

有一天，我和你爸爸剛要走進北京一家古色古香的園林式賓館——「竹園賓館」時，一個年青的中國看門人攔住了我，我一怔，不知這話用心何在。

「如果你是中國人，請你登記一下姓名單位。」他怕我不明白，特別解釋了一下。

你的洋爸爸生氣了，他說：

「她是我的未婚妻，我們馬上就要結婚了，她快不是中國人了，還要登記嗎？」

「結了婚可以不登記，如果還沒有結，最好登記一下，這是我們國家的規定。」

「你們是這樣對待自己的同胞嗎？」爸爸要和他吵架了。

我怕惹下禍，息事寧人地說：

「好了、好了，我去一下吧」然後，我在專供公安局監視與外國人接觸的人，以及在賓館偷東西的人之名單簿上簽了字。

爲了讓你爸爸息怒，我強作歡笑，然而翠竹擁抱，雕欄玉砌的中國古典院落中，我作爲唯一的一個中國食客而顯得尷尬萬分，中國服務員用了看動物的眼光看我這「黃色同類」。

「爲什麼我不是一個洋人？否則也免遭了這些敵意和侮辱」。我竟產生了這樣自卑于本民族的想法。

以後再有這類情況，你父親就不讓我說中國話，他故意當着飯店看門人的面講幾句外文給我聽，我也假裝應付個「YES」，「YOU



北京這家古色古香的賓館，却極少中國人光顧。

I」，雖然免遭了登記的侮辱，這是我第一次覺得中國話是一種「低級」的語言，講着中國話是不配進「北京飯店」的。

一九八三年的夏天，我住了北京的監獄。七、八個人同睡在一張木板大坑上，連翻身也要聯合了左右的人，否則不是碰了左邊的胳膊就壓了右邊的腿。一天四個半玉米麵窩窩頭，乾而硬，外加砂礫錢頭。

「怎麼就給人吃這個？」我恨恨地說。

「想吃好的嗎？誰讓你不是外國人？外國人住監獄頓頓吃肉罐頭，大米飯，一天一包大中華香煙，炮局胡同拘留所的洋監獄裡面還有沙發呢。不當外國人當華僑也行，前不久有個香港人住在這兒，每天給她一頓肉吃，吃的窩頭也是專門放了糖的。」一個久住監獄的女犯告訴我。

大概就在此刻吧，我徹底地感到了做中國人的不幸，徹底的感到了自己民族屬一種「下賤卑微」，我想，我一定要從監獄裏掙扎出去，一定要和你的洋爸爸結婚，一定要放棄中國籍，爲的是當犯人也當一個「高級犯人」！

審訊時，公安局的人罵我：

「你和一個外國男人在馬路上拉拉扯扯，整天在屋子裏混，不覺得丟人嗎？不覺得在污染社會空氣嗎？當然，對於一個外國人來說沒什麼，可是你是中國人，這樣做是有失國格人格的！」

我心想：「放心，警察老爺，本人只要換一個國籍你這些話就等于放屁，我日後一定當一個自由的外國人，也省了你這些臭口舌」。

等你看懂了這些文章，你會笑，會說「他們真笨！」可是你知道嗎？這些侮辱媽媽的人們，他們都是我的同胞呀，你身上也流着這個民族的血呀！

# 千秋功罪 我們評說！



文革時的宣傳畫。

民族禍福絕非一人或一黨的責任。文革是毛澤東發動的，但其內容却是造反派乘機完成的。豈不知「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

是的，我常常認為人們說起中國來，把中國的所有的災難都歸結于毛澤東和共產黨是有欠客觀和不公的，就像過去唱「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而共產黨則「像太陽」一樣的有欠客觀和不公，民族的禍福絕非一個人和一個黨可以完全掌握的。

不錯，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所發動的，但毛澤東沒親手殺一個人，是你的發了瘋的中國同胞相互迫害，互相殘殺了幾千萬中國人。同樣，毛澤東沒有親手砸一座古跡，沒向港商走私一件中國文物，是你母親這一代的紅小兵紅衛兵們搗神廟，毀千年古壁畫，將四十五萬件古代珍貴文物當做「封建殘渣」，兩塊五美金一件賣給海外的商人呀，有一位老伯伯，在「革命群眾」的監視下，跪在地上，將鄭板橋、八大山人等的真迹，一點點撕成碎片往火裏燒，燒了兩天兩夜呀，你可以想像嗎？這絕不是毛澤東親口指示這樣做的！

愚民哪，中國人！敦煌千佛洞的千本經書是怎麼流出中國的？不就是那個看廟的和尙爲了五百塊錢的賺頭就拱手賣給洋人的嗎？他倒真大方，不曉得狠賺洋人一筆，把達芬奇的「蒙娜麗沙」換到中國來。

八國聯軍用刺刀刮去了紫禁城裏銅鑄大缸上的金護衣——這不假，而承德一座古廟中上千的鍍金小佛被紅衛兵砸得還剩四十來個。

八國聯軍的確燒了圓明園，罪惡滔天。但文革十年造反派群眾拆燒的古迹又何止一個圓明園可以媲美？十個八個也是有的，可謂罪惡滔天者也！

至于長城，老百姓拆來蓋豬圈茅廁又何足爲奇？山西一個縣長一下令就拆了六十華里「中華民族的脊梁」！我的女兒，你不痛心嗎？不羞慚嗎？假如你把自己當中國人來看。當然，如果你以你的出生國法國來自居，你會說：希特勒雖然混蛋，然而酷愛藝術，他曾命令納粹搶竊盧浮宮的珍藏，可我們法國人事先都藏了起來，他一件也沒拿走。

是的，這是你們法國人的光榮，至于你們的祖先侵略別國時橫搶外國文物雖屬可惡，但

如今能完好地保存于巴黎各大博物館是人們事先沒料到的「善事」，盧浮宮的中國壁畫古物若還在「老家」，恐怕早喪生于烈火和巨斧之下了。歷史呀，你這個善變的巫婆。

你不曾見過中國，媽可是于中國的土地上扎扎實實地生活了二十六年。媽的血肉是在中國土地上凝成的，媽是喝黃河水食中原穀長大的，沒有這一切就沒有媽。但是，這半生也是有「春夏秋冬」的，媽受過陽光的溫暖也受過寒風凜冽。中國歷史上除了暴君混蛋外，雖也有了不起的豪杰英雄，但媽一直以爲這世界上美好的原是應該的，無須去頌揚它太多，而惡，則是一分一秒也不能停止對它的詛咒和攻擊，就像醫生只注意患了病的人，而不大關心健康人一樣。兒，你可能理解我所以在此惡罵中國人？甘冒天下之大不韙？

媽對中國人的不滿不全是因為歷史的緣故，僅我自身的經歷，也足以使我覺得他們的愚笨。

七年前，媽在中國上大學，班上有個學生幹部，忠于「職守」，很善于觀察同學的一言一行，積極向系裏領導匯報學生的「思想動態」，「小報告」一串一串地往上交。不少人爲之氣憤，女生們先決定將學校的公用電話塗上黑漆，而後派一個代表請他接電話，弄他一手一臉黑，後因爲覺着這不夠君子之德，就免了，又決定在全體學生幹部會上「彈劾」他。等到開會時，班主任老師先發制人，說他是個好同學，對組織對領導忠心耿耿，敢和班裏的「自由化」傾向作鬥爭。如此一來，本來發誓要在會上「罷他官」的人們都不吭聲了，只有我這個最年輕的站起來連珠炮似地將準備的話說完了，等到發現啞場時，才知我被衆人「玩」了，于是憤然摔門而去。



七九年的時候，是大學生們「自由化」嚴重的時候，對共產黨亦懷有小視的態度。不少人說：誰願意參加共產黨，等于在自己本來自由的脖子上多了一條「緊箍咒」。故而，輪到班裏上黨課，所有的人都露出不屑的神色言語，更有幾個人決定在會上一言不發，我也是一個。

會一開始，先學黨章，學完了，讓大家發言，此刻，一位平時最愛表現追求自由的女生站起來，流着我不知從那兒擠出來的眼淚說：「黨和人民送我上大學，可我今天不能參加共產黨，我真覺得對不起黨，對不起人民。」而後就失聲泣泣起來，忘了西單民主牆遊行時，她會站在前列，口號喊的最響。

更有一位「民主運動」的積極參加者，底下原是對共產黨深為不滿的，並聲明過自己不願意上黨課，不料會場上他竟用了詩人的激情聲音發抖地說：「我希望自己可以靠近黨組織，和黨站在一起。」

「他媽的，咱們被出賣了！」我對另一位沒發言的人說。

會後，我們問這兩位怎麼會動了感情，那兒來的眼淚，他們說：「我也不知道，只是覺得這種會的氣氛很莊嚴，我可能被感動了」……

其實，說自己虛偽，缺少知識份子該有的坦白和骨氣才對。

在監獄裏，我常常苦悶不過，于是就諷刺幾句共產黨的監獄制度和兇神惡煞的女看守，本以為都是倒霉的犯人，不會死到臨頭了還去拍黨的馬屁，誰料想，我的每一句話都被犯人準確無誤的匯報了看守，連已經被判了死刑緩期的人也不例外地出賣我，如此奴才性！也許是爲了「向黨立功」，減輕自己的「罪惡」，

但手段之卑劣實不可仿效。我是唯一一個沒犯罪的「犯人」，自由之日是有指望的，因此對這些犯了罪而判刑過重的人們懷了一點同情，可他們的人格，低也低的太過了。

有個東北人販子關在我住的女牢，是「無期徒刑」的下場，屬她罪大，也屬她最會向看守揭發別的犯人。于是大家聯合起來報復她，故意少給她分飯，儘管她戴着腳鐐，人們也不幫她做一點生活上的事。她也不軟，上報看守說大家欺侮她。我們幾個人事先商量好誰也不承認，讓警察無以發作，誰知她很狡猾，不想得罪所有的犯人，知道我和另一個女孩因爲是幹部子弟，在獄中也不失傲氣，讓警察恨透了，所以警察來了後，她指着我和那個女孩說：「是她們出的主意，領頭幹的。」

先不說這是冤枉，警察則趁機對我們實行報復，馬上煽動所有的犯人說：

「你們說，她們怎麼欺侮你們的。」

本來是大家商量好的團結起來和壞女人鬥，不讓警察抓我們毛病的，可現在倒好，警察一問：

「你們說，她們怎麼欺侮你們？」

可隊長一句話把我噎死了，她說：

「你不主動向隊長揭發號裏的壞人壞事更不對。」

「對不起，我不是警察。」我只好找了這麼一句頂。

是的，那些民族自愛心強的會說：

「中國人不是都笨都愚，都會踐踏自己同胞自尊心的。」

我說，幸虧，幸虧不都是，否則中華民族早見鬼去了。

是的，還有人會說：  
「外國人也有笨的。」

有良心的把頭低下了，不說話，可警察很會發揮，很會理解，她說：

「呵，我知道，你們怕她們，不敢說，不用怕，有我撐腰。」大有文革時鼓動群眾鬥群眾的意思。

一個賣假藥的老太婆突然站起來說：

「我說，我有一次吃肉，我去打菜可菜裏沒有肉，可能是大師傅沒放肉，那個平平呢，她硬說我路上偷吃了。」說完就傷心地痛哭，竟想不起她和平平對罵時的威風。

警察再問還有誰受了欺辱，大家都不說話，全低了頭，好像有苦難言似的，我傻了，怎麼也沒想到又被出賣了，那情形好像在開「憶苦思甜」大會。我真氣極了，站起來一腳踏在床上，把黑西裝外套一拉，雙手叉腰當着警察就罵了起來，先把事情的經過說了一遍，最後說：

「監獄不是好地方，人人的日子都不好過，空間小，地方窄，翻個身能撞着別人，說不好聽的，放個屁也能薰着別人。又加上每人肚子裏一肚子苦水，難免有痛快發牢騷的時候。我是沒孫悟空那點本事，否則我早打地洞逃出去了。所以說，今天咱們倒霉都進了這鬼地方，有什麼不對火的，聽着別人說了些牢騷話就該包涵着點，犯不着動不動就跑到隊長們那兒『扎針』（『扎針』就是獄中對打小報告的稱呼）隊長，」我對看守說，「說實話，這獄裏的犯人沒有不恨你們的，沒有不叫你們外號講怪話的，但是你說，我張諄什麼時候和你講過別人一句壞話？我就是覺着這裏面的人都活的不容易，看不慣的聽不慣的該忍就忍了，誰也不是在這住一輩子的。」

我說，當然，可誰讓我是中國人，所以關心中國人的問題超過了對其它國家的考慮，這

大概是我民族性的狹隘吧，否則中國的生死禍福于我何干，我學了法語去賺法國人的錢享福好了，誰讓我沒出息，心不鐵？

女兒呀，你不是中國人，這是你的福份，中國人沒有說話的自由呀，沒有思想的自由，中國人難做呀。你想為真實講話，你就要得罪官方，官方總願意聽「一片大好」，可大好了還何必搞四化，還何必說「解放思想」？你要提點新思想，連老百姓也要反對你，因為中國是個五千年的古國，因為古，所以傳統特別多、特別強，足以影響、干預今天人們的思想和生活，老百姓無形中做了傳統的奴隸。這是所有「古老文明」國家的不幸。

但是我還要說，中國社會的不民主、不自由、貧窮落後，中國近幾十年來出現的政治、社會悲劇，不完全是毛澤東和共產黨的錯誤，每一個中國人都負有責任。

法國有句名諺，「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此話不無道理，中國人如果聰明一些，何至幾十年來十億人被毛澤東一個人玩弄于股掌之上？殘殺自己的同胞、破壞自己的文化、毀滅自己的國家？誰不明白，文革是毛澤東發動的十億愚民大造反？否則，也用不着用歷史的口氣說：「文革讓中國人民覺醒了」，「不再昏睡了」等廢話。

當然，有遇羅克，有張志新懷疑文革，但他們馬上被革命群眾送上斷頭台，他們死時，沒有人同情他們。

別老說中國落後是受了封建思想的影響，受了毛澤東的影響，如此地開脫國家的問題無補于事，西方國家也曾有過黑暗的封建時代和昏王暴君。人唯自省才能進步，何況一個大民族？要找自己民族的劣根，連根拔，不怕疼，這才有希望。

別在那兒空喊什麼「中國人是最聰明最偉大的民族」，希特勒還活着，準為這事和中國來一場火併，也可能煽起中國民族自大狂，像成吉思汗那樣進軍歐洲，為全世界隸屬大漢民族而向白人宣戰。當然，如果空喊了這些無聊的口號就可以使中國步入一個民主、自由、法治、人權、繁榮富強的世界，那麼我，雖然沒有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氣概，魯迅「我以我血荐軒轅」的風度，但能拼出去一條破嗓子，站在巴黎凱旋門頂上，三天三夜狂喊，直到嘔血而死！只要有補于事。然而，可能嗎？

中國歷史上，革命是不不少的，但都是不徹底的、失敗的，因為從古至今，都是為了一「吃飽肚子」的農民革命。所以封建制的權杖從一個大獨裁者手裏轉到另一個大獨裁手裏，除了極少知識份子，民主這個概念中國人是陌生的，至于「自由主義」，報紙上是天天批判的。

如今中國的經濟改革，給不少人帶來了信心。我在為「父老鄉親」生活改善的喜悅中偏又生不測。見前「中國之春」一文例舉四川一老農婦，路遇鄧小平問其生活之近況，初言比過去好多了，後知問話者是鄧後，忙朝其背影重叩響頭，口中連稱「青天爺」，祝鄧長命百歲。這樣依靠「救星」的農民，可知幸福生活之真正保障，不在所謂「明君」的臨降，而應該由人民自己作主的嗎？

北京的知識份子，包括一些「青年民主派」，也因為最近腰包里人民幣多了幾張而樂觀于眼前，不再那麼吵吵嚷嚷地要「民主、自由」了，錢真是可使「鬼推磨」。陶潛「不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原是不如錢的神通大。當然，中國人這三十多年真是窮瘋了，目前追求物質也是難怪。

但是沒有法律保障的經濟開放是可靠的嗎？濫發的鈔票（不顧通貨膨脹）是好使的嗎？總之，國內的同胞們之改革，是新時代的「飽肚子」革命，意識形態方面，仍在共產黨封建式的專制下，我因此不敢樂觀！

我常想，毛澤東出現在二十世紀中葉的中國，假如他是一位近代的法國總統，法國人民會把權杖送給他嗎？不會的！因為法國人民在一百多年前為民主和自由與統治者的血戰中，已經懂得了什麼是民主，已經懂得怎樣做人！

如果有人，可以把民主和自由，人權與法治講給所有愚昧中的中國人聽，我今生唯一肯跪下磕頭感激的人，就是他！

愛國主義最容易被統治者用來欺騙人民，民族主義亦未免失其狹隘，只有人道主義才有較高尚的精神境界。

那天回到家裏，我本是疲倦不堪，原想是該睡了，誰知却睡不着，那會場上的聲音情形總在腦子裏，這一夜我失眠了，而後的整整一個禮拜，我都失眠了。

的確，我對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這兩個口號心懷不滿已有一些時候。首先，我覺着它們來的糊塗。

衆所周知，歷史上第一個統一中國的是秦始皇，儘管他是「焚書坑儒，殺人如麻」的大暴君，而完成「祖國統一」大業，則是「不朽的」功勳。

那麼，秦統一之前中國這個地帶曾分成七國，各國不時火併，秦國勢力最大，很有吞食

它的威猛。於是楚國的大夫屈原，看透了秦國的狼子野心，多次上書楚國君，要求「抗秦」而楚王不聽，反信讒言將他逐出宮廷，迫他著書『離騷』以傾憂國忠君之懷，後投汨羅江「以身盡忠」。但是，從此他的英魂却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偉大的愛國主義楷模了。

兩個「第一」，使我不解。假如秦始皇因是第一個統一中國的帝王而「流芳」，那企圖反抗秦國吞併諸國的楚國屈原豈不成了反對中國統一大業的「歷史罪人」了？相反，屈原若稱為偉大的愛國詩人，秦始皇不就成了二千年前在亞洲東部大肆侵略別國的「歷史罪人」了？當年愛國抗秦的諸國將士都是「分裂主義者」，秦國在別國領土上姦淫燒殺都是愛國行動了。

這荒誕嗎？這就是歷史。

再者，我覺得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總與侵略、流血分不開，而且歷史上人類的幾次大不幸都和某個民族的民族主義擴張有關。

歐洲的希特勒，自視其大日耳曼民族為世界最優人種，猶太人則是最賤的，應該徹底消滅的。在他的「日耳曼民族至上」的精神下，近乎整個歐洲，那些上等的白人們都做了日耳曼人的奴隸。我們黃種人可能還不至於像猶太人非死不可，但最好也要降到日耳曼人之「豬狗」的地步。

地球東半邊，日本人在軍國主義的愛國狂熱下，瘋狂地為實現「大東亞共榮圈」進軍中國，「東亞病夫」，千百萬地被「優秀的日本民族」屠殺了。

我還要說，希特勒一個人殺不了幾個人，是被他的大日耳曼民族情緒煽動下的德國人們，野獸般的殺人。日本也一樣，是武裝成兵士的日本人們殺中國人們。

就是在目前，世界上仍存在着種族歧視的嚴重問題，南非的黑人連行動的自由都沒有，不如白人的一條狗。至于喜歡玩火的幾個國家，像越南、兩伊、敘利亞，居然會有那麼多人願意跑到別的国家去殺人，多是因為聽信了當局「愛國、衛國」的宣傳鼓動。



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但屬於人民的一切權力却被他們的「公僕」剝奪去了。

當然，一個守本份的國家如受外強入侵時，也常常用了同樣的保家衛國的口號，借助愛國主義精神來捍衛民族利益，此時，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便顯得莊嚴起來，只是，它仍然沒有脫離戰爭和殺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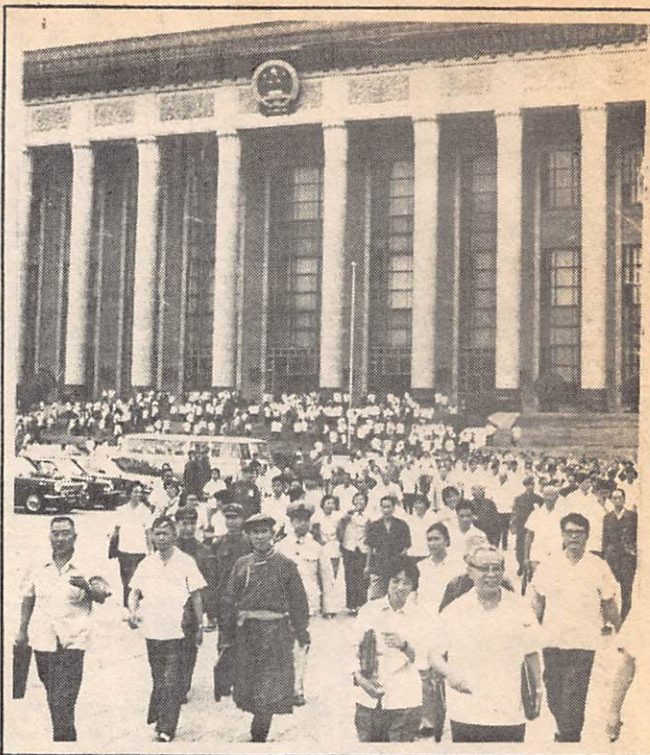
愛國主義、民族主義只是一種精神，不同

的人懷了不同的動機使它產生出不同的效果。人們可能把它分成真愛國、假愛國，或者正義的愛國和非正義的愛國。其實，它已經暴露出了容易被人利用、篡改行騙的弱點，我們又何必花時間口舌去分辨它？難道不能超越它，尋找一個更高尚些的精神嗎？這用不着誰去創造，先人們早給我們預備好了，它就是人道主義。

中國是我過去的祖國，法國是我目前的一祖國，但無論是那一個，如果發起戰爭狂來，野蠻無理地侵入殺害另一個國家，我是堅決站在被壓迫國一邊的，我心甘情願地當「民族敗類」，「國家的叛徒」，我不會孝順不配孝順的長者。所謂「愛國」，不過是「孝」字的擴大而已，是愚子愚孫們的事體。我忠于未來和正義。更何況愛國主義民族意識原是封建時代社會封閉，排斥外邦，君主們借以鞏固個人勢力遺留下來的東西，往往「忠君愛國」不可分，較之後來的資產階級提倡的人類共同的人道主義相差甚遠，做為一種精神追求，不免太舊。

至於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並列時，它們原是矛盾的，睜大了眼睛去看，幾乎所有的國家都是一個強族統治了幾個頗弱的異族，組成的國家的歷史往往是民族壓迫的歷史。中國人以國大自驕，別忘了，內蒙、新疆、西藏和邊疆五十多個少數民族與漢人長的不同，人家有人家自己的文化，是被中國歷代的君王搶了來的「殖民地」，只因為年代久了，順理成章地成了「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

如果愛眼下的中國，我們可以說它們確屬中國，如果提倡民族主義，大漢族最好還是讓人家紛紛獨立自治，也省得共產黨的政策錯了，讓人家這些小民族也跟着遭殃。如果分封起



全國各族代表出席了黨的十二大會議。

來，中國的四周恐怕不僅僅有一個繁榮的香港，一個富饒的台灣，還會有更多發達的小國家，歷史的對錯，時常在一念之差呀。

法國在太平洋上的一個殖民地小島，這幾天鬧着要獨立，胡耀邦出訪太平洋列國前發表講話，說他堅決支持這個島的少數民族獨立。先不說這有犯「干涉內政」之嫌，爲什麼中國不「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把要獨立的西藏交給西藏人自治，又何必爲了愛國，在六十年代的內蒙大抓所謂要求內蒙獨立的「內蒙人民黨」，將他們剝光衣服，在蒙古包中的火堆前烤得大汗淋漓後，再趕出蒙古包，讓他們在水天雪地「降溫」，死不了的再槍斃。難道爲了維護「國家利益」就可以這樣滅絕人性的對待要獨立的少數民族嗎？在新疆、西藏的監獄裏，有多少要求民族獨立的人被判終身徒刑，

我就知道了。胡氏不提國內的民族獨立問題，大概是怕人罵他「賣國」，那又何必鼓勵密特朗先生「賣國」呢？

國家是統治者管理人民的機器，  
開機器的人若是瘋子、混蛋，這  
個國家準是一塌糊塗。

提到密特朗先生，倒叫人想起我們這些在法華人及所有外籍人的命運。

奇怪得很，世界上所有的法西斯右派都喜歡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提倡，法國的右派人亦如是。這十年來法國的經濟隨着西方世界一同下墜，幾任總統更換也難力挽狂瀾，這經濟規則的問題竟不是人爲可以控制的。可法國右

派深信這危機多少是由于太多的外國人湧入法國，搶了法國人的飯碗，搶了法國人的法郎造成的。因此，對外國人的不滿開始出現。巴黎市長說假如一個外國人在法國犯罪，須立即驅逐出境，無需什麼法律程序了。高層的議策中，也醞釀着驅逐外國人、控制外國人入境和居留的種種設想。不久前，法國的南方，還有右派恐怖分子出于純粹的「種族仇恨」殺害了兩個外國僑民。

我不知道那天開會的華人可知道法國目前政局對自己在法居留命運的險惡。密特朗政權因重整經濟無效而遭民衆不快及右派奮起反擊，下屆競選不甚樂觀。萬一右派掌權後，真正實行起排斥外國人的政策，將你我他驅回「神州大地」，那時，諸位該作何想？

我想也沒什麼好講的，諸位都是深明愛國及民族主義「大義」的，人家法國人爲了本國家和本民族的利益「清除外患」也是正舉。再則諸位也是愛國華僑，回到自己的民族懷抱中，何樂而不爲？總比強寄他人籬下，受已經開始討厭外國人的法國人的氣好。

據說，美國那邊的右派們，種族主義者，譬如「三K黨」的後代們近來「白人覺悟」也頗高，對有色人種產生了一「不良印象」，是否也要驅逐一下呢？難說。

但是，密特朗先生最近一個公開講話使我很受感動，他在談及是否驅逐外國人時說：「我們不要強調民族主義」，而且，又提出給居法的外國人投票選舉的權力，這可謂「創舉」。

不管密特朗這樣做的動機是什麼，（有說他是爲了給自己樹立一個「民主」的形象，爲下屆競選拉選票）但是，這個舉動到底是人道主義的，是超乎狹窄的民族、國家概念的更廣



今日香港已成為東方的一顆明珠。

泛更徹底的民主精神，我實在欽佩。儘管他不免「賣國之嫌」。

我相信共產黨沒這個胆量，一心想讓全世界信仰共產主義，他們怎肯信仰基督和自由的外國人參加他們的「投票」？

我贊成胡適先生的一句話，「少談主義，多談問題」。不管什麼驚天動地的口號，不管提倡什麼精神，都應以客觀的眼光，看它于人類有無益處。否則都滾它的蛋，當心別上了統治者借口號來欺世瞞人的當。

關於殖民地的香港和所謂「經濟殖民地」的台灣，曾讓大陸認為是「丟人」的，而目前人家靠了洋錢發起財來，人民豐衣足食，又是

當年自力更生，今朝衣薄食劣的中國人沒估計到的。既然歷史已經開玩笑的讓這兩個離開「祖國」的小島發達富足起來，人們就要承認它，維護它，如果談收回香港或統一台灣，我對這兩個口號不感興趣。如若兩地人民投票，願意回歸大陸，而大陸又確保兩地人民生活不會衰退，我自然歡喜，但是如果達不到，我看還是不收回，不統一為好。特別是大陸某主席，為了完成「否定文革，收回香港，統一台灣」三件「大事」，以滿足「青史留名」的個人欲望，而不惜在有生之年動用武力或經濟封鎖的辦法進攻台灣，將大陸台灣人民推入戰火和苦難之中，這種反人道的「愛國統一」之舉將是徹頭徹尾的塗炭生靈！他是第三個秦始皇，我不是荊軻，如果是荊軻，就該拿着匕首上殿行刺去了。

清楚不過，愛國主義、民族主義兩個口號從來都是一筆糊塗帳，注重事實的人和着眼于未來大同世界的人又何必「作繭自縛」于種種觀念之下。我甘犯眾怒在中國之春的理论討論會上提出「打倒」二字時，則是出于對民主運動的實際考慮。

中國的一黨專制海外人是清楚的，中國法制的健全，人權的無保障也常看在眼裏，中國經濟落後西方幾十年盡人皆知，我初到西方，看着滿街花樣繁雜的商店，買不盡的雞鴨魚肉，想到中國吃糧食還要限制，一年吃不上二斤魚，曾氣呼呼地罵：

「這老天爺為人真不公，同是活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為什麼有的國家富得流油，有的國家窮得喝水？」

當然，這是委屈了不通人性的「老天爺」。假如真愛中國的人民，真希望中國的人民也可以富得流油，那麼這個人就應該關心中國

的政治，關心中國的改造和建設，對於執政的共產黨該進言勸的就勸，該學的時候就學，如實在腐敗了，該打倒的打倒好了，這才是真愛中國人民，換句聽順耳的話就叫「真愛國」。但是在海外的中國人，儘管享受着自由世界的思想言論自由，朋友間私下裏對中國社會的問題亦常有議論，然而公開起來確不敢。

從商的華僑，在毛澤東時代都是「剝削人民的資產階級」，還有「特務、間諜之嫌」，連國都是不敢回去的，怕被當成「吸血鬼」讓革命群眾打死。鄧大人經濟開放以後，凡拿出錢來向中國買東西或投資的華僑，從人民的「壓迫者」之身份一躍為「愛國華僑」，回國後上賓相待，這是沾了共產黨「向錢看」的光。自然，共產黨是不會白花錢請在外國飯館打工的華僑無產階級回國參加什麼「國慶大典」之類的。

無疑，目前的共產黨的理论與實際是完全脫節的，他們理論上反對資產階級思想，而實際上則不擇手段地向外國資本家和僑商手裏討錢，難道資本家的錢好使而資產階級思想就不好使了嗎？

但不管怎麼樣，華僑為了商業的經營，也為了國內的親屬不受迫害，更怕人誤會自己「不愛國」，因此為做愛國華僑，也就把中國的政治放在腦後，對共產黨的問題只做看不見。更何況新近從大陸出來的有些人還不做着「衣錦還鄉，光宗耀祖」的設計，一旦招惹政府，此夢則成「黃粱」矣。

海外部份知識份子，為了與中國大陸保持「學術合作」，更不敢得罪執政的共產黨，不是常去使館拍馬屁，就是閉門死讀聖賢書，為關心中國的未來和人民直言批評中國政府而擔負「反華反共反人民」的罪名似乎不值得。

還有一些人，在海外飄零半生，儘管洋政府沒有虧待他，給了洋學位，洋老婆，洋房子，洋汽車，當了洋官洋教授，但仍有一念，就是故土的情思，——死到中國去！用電影《牧馬人》的話叫：「買一塊一米寬，兩米長的墓地」，所以儘管一生歷經滄桑，對中國社會已看清看透，却仍不敢發表意見，因為中國的墳地只埋「愛國華僑」吧！

愛國主義這個最容易讓人強姦了歪曲了來使用的名詞，既然有人又用了它來威嚇那些真愛中國的人們，它就變成了一個打人的棍子，壓人的帽子。又何況，國家不是籠統的，從古至今，國家是統治者管理人民的機器，開機器的人如是瘋子、混蛋，這個國家準是一場糊塗，令人無從生愛。我不拜「聖人」，就因為「聖人」的話一旦被拜，無條件的百分之百服從時，「聖人」就不聖了，反而成了阻止人進步、防碍人思想的「攔路虎」，就該一脚踢開了。如今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等，亦不幸被共產黨用來簡單劃分「敵我友」的分界綫，扼制華僑華人公正坦白看待中國社會問題的心靈，那麼，所謂「愛國華僑」就很可能是一個不值錢的，其意含貶的「桂冠」，而「不愛國」的人，倒有可能是更好一點的人了。

當然，我可能是胡說八道，否則在理論討論會上我一喊，「現在特別要打倒愛國主義」時，竟遭了那麼多的反對和冷笑。我斷不敢說我一個人竟比那麼許多人高明，又況眾位也都是關心中國民主運動的先進人物，我又天生是個喜歡異端邪說的不規女子。

或許，我的口號激烈到了偏激的程度，但是當一個傳統思想根植於社會時，人要反對它，就必須要用激烈到偏激程度的語言去反對它，否則引不起對立面的注意，引不起爭議就等

于白說了。蔡元培先生提倡新教育時主張老師要向兒童學習，課堂上實行問答制時，恐怕也沒去想狗屁不通的兒童向先生提什麼問題這檔子事的，但是，至今人們仍不能否認蔡先生教育改革的功勞。我這偷來的法子，明知不妥，挨罵的心思是早準備下了。對於會場上某太太的竊語和高人一籌的嘲意，權當自然了。

近代中國人動輒搬出「五千年文化」及「萬里長城」與洋人比，好像那是一筆永遠吃不盡的顯赫遺產。

某先生不是怒問我「是不是連中國文化也不想要了嗎？」非常遺憾，在我家兩間斗室裏，除了幾千冊中國書，再沒一樣值點錢的東西。絕不敢說研究，但興趣還是有的。當今中國于世界上所以可以吸引人，主要有三：

- 一、未充份開發利用的自然資源。
- 二、大批廉價的勞動力。
- 三、古人留下的文化遺產。

然後就實在沒什麼可以特別驕傲的了。我既沒錢回中國投資開發，又沒錢雇廉價勞力發財，只剩下一點讀書的小愛好了。

但是中國人有一大特點，就是一和西洋人比較起誰的國家「更可愛」時，動不動就搬出「我們中國有五千年的文化」，一副洋洋自得的樣子，好像那是一筆永遠吃不盡的顯赫遺產。特別是前幾年美國的宇宙飛船自太空拍攝地球後，公佈了地球遠觀人類的建築時只能看見中國的長城和埃及的金字塔後，凡華夏血統的子弟們都欣喜若狂，彷彿自己就是那長城金字塔似的。

別搞錯，長城是二千年前的祖宗們建的，而令人興奮的太空消息，却是建國才二百年的

美國人發現的，而且是高高飛躍于祖宗的長城之上，以「俯視」的姿態拍了這張照片，先不說古人之功與我們現代人無關，而長城在人類建築史上的偉大竟讓高于它的美國飛船發現也夠讓我們這代人丟臉的了。

埃及金字塔下據說盡是些出售真假古董的法老王後裔，幾千年前的文明可以輕易地用紙造的「美金」換走。我們的長城呢，前幾年我去時，屁股後面也追了一大堆賣古錢的炎黃子孫，對我身邊的「法國佬」說：

「您買吧，這是真的，不貴，您隨便給幾個錢就行了」。

北京飯店門外的大街上，也有擱着破書包兜售百年老書，千年古玩，以換取盛唐時代，曾大大落後于中國的洋人們的臭紙錢的。

假如孔、老、墨、孟等諸子在天有靈，假如杜甫蘇軾、韓愈還魂，這些曾造就過中國文化的古人見到子孫們在出賣古老文明，而且是向「外夷」，他們是羞是愧？大概要一頭撞死在泰山腳下吧。

沒有誰想抹煞五千年文明史，沒有誰想拋棄中國文化，只希望我們這群現代的中國人，別以古人之功自居，別躺在古人的成績上睡覺，須繼續發展和光大才有臉「拜見」古人。

可惜，如今的中國人，但凡有路子的都渴望離開自己那「美麗的河山，富饒的土地」，跑到西方外夷的「黃金」國度享受自由和現代文明。

古老的中國文化，你若沒死，就來個復興吧！

關於中國的象徵，——長城的偉大，已經是過去的事，眼下去看，它只不過是一片廢墟而已。（編者按：文中小標題和提要編者加的。）

# 文化背景與科學技術結構的演變

中國科學技術落後的原因（下）（國內）金觀濤、樊洪業、劉青峯

## 七、社會化的途徑：

### 示範作用

用我國古代一個著名的寓言可以很形象地說明原始科學結構所起的作用。據說伯樂寫了一本怎樣找千里馬的書「相馬經」。伯樂的兒子根據這本書去找千里馬，結果找回來一隻癩蛤蟆，他認為癩蛤蟆完全符合書上所說的特徵，搞得伯樂哭笑不得。我們可以設想，如果伯樂的兒子不是僅僅根據「相馬經」去找千里馬，而是牽着伯樂找到的一匹千里馬，對照着這匹馬去找千里馬，那麼至少他不會找一個癩蛤蟆回來。這裡，第一匹千里馬就是一個示範。

在科學研究各個領域裡去建立正確的認識結構，正像許許多多人獨立去發現千里馬那樣困難。但是一旦出了一個伯樂，他找到一匹千里馬，並研究了它的結構特徵，根據這匹千里馬的示範去找別的千里馬就容易得多了。原始科學結構對近代科學結構建立所起的作用，正是它確定了一種示範。

我們知道，近代科學結構是很複雜的，從系統組織原理來講，根據一種已有的模式（雖說比較簡陋）去構造一個模式相同的體系，是比較容易的。如果沒有樣板，要建立兩個複雜而結構相同的體系則不可思議。關於在科學發展中示範所起的獨特作用，庫恩曾作了很有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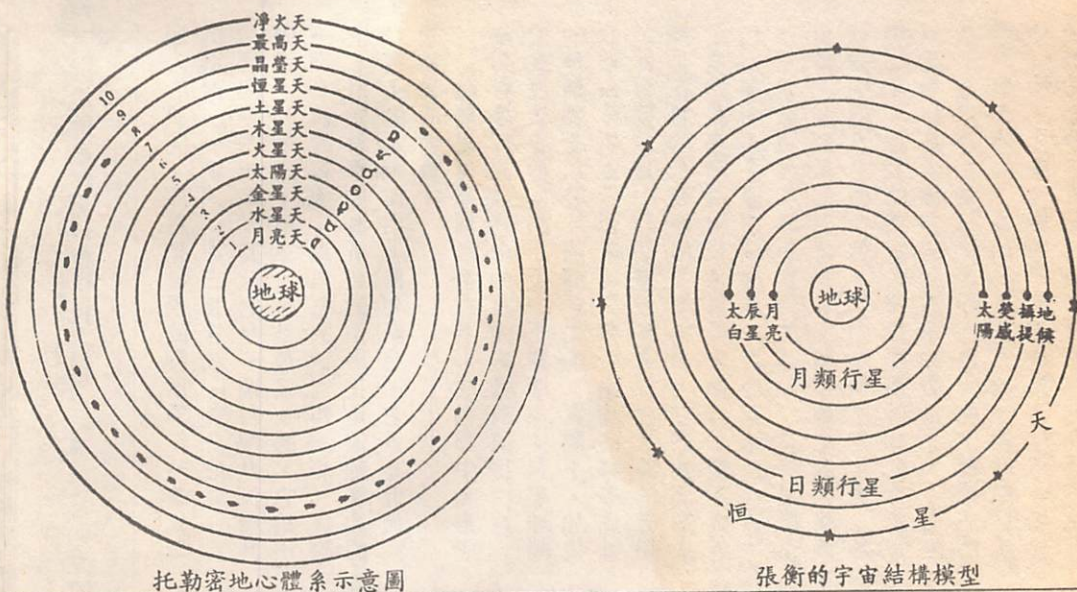
服力的研究。庫恩把科學的發展看作「範式」的演變。「範式」有三種含義，首先它是一種處理問題的規範；其次它是一個科學共同體共同遵守的準則；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它給出一個具體的範例，為科學家研究作示範。實際上，原始科學結構所起的作用正是這種廣義的結構上的示範作用，換句話說，它就是近代科學結構的模板。

歐幾里得幾何體系在其形成過程中和形成後對科學理論成長中的巨大影響很值得注意。它在歷史上前後出了近一千種版本，科學理論的傳播總是以它的翻譯居先的。實際上，如果我們去分析古希臘羅馬文明所達到的科學成就，就會發現其中最發達最具有現代意義的部份都是在它的示範作用下取得的，它們共同形成了原始科學結構對後世科學家進行示範。對近代力學和天文學起到奠基作用的圓錐曲線研究（它是微積分和解析幾何的基礎）實際是歐幾里得理論體系的直接延伸。阿波羅尼的圓錐曲線論中四八七個命題，均由幾何原本十個公論導出<sup>13</sup>。伽利略對近代物理學劃時代的貢獻可以說是阿基米德方法和道路的發揚光大。而阿基米德則完全是以歐氏幾何為示範來構造他的靜力學理論的。喬治·伽莫夫的「物理學發展史」中，生動地說明了阿基米德怎樣用不證自明的力學假定推出著名的槓桿原理和浮力定理（正如歐氏幾何從公理推出定理那樣）<sup>14</sup>。托

勒密在建立他的天文學體系時不僅系統地引用了幾何學成果，而且在理論構造上也以歐氏體系為示範，他改進並發展了三角學，執意要把他的工作建立在「算術和幾何的無可爭論的方法」之上。他強調了構造理論必須遵守的原則：「在解釋現象的時候，採用一種能夠把各種事實統一起來的最簡單的假說，乃是一條正路。」他所強調的原則正是原始科學結構所要求的構造型邏輯體系。由於天文學實驗本身的侷限，使得托勒密天文學理論不可能像歐氏幾何本身那樣直接成為近代科學的一部份，但是如托勒密天文體系中若不以歐氏幾何為示範來建立，它就不可能具有相當的邏輯構造型框架，這樣，哥白尼革命也就會困難得多。幾何光學的進展是原始科學結構示範作用的另一個例子。光學實驗是人類最早進行的實驗，但從這些實驗中得到近似於近代科學結論的多數屬於古希臘科學家。歐幾里得本人無疑是利用它的幾何理論規範來構造光學理論的。正是他提出光沿直線傳播，並把它作為光學的最基本公理，沒有這種示範，是無法發現反射定律的。希羅進一步指出：「光的反射線的路徑是最短的路徑。」而托勒密則利用幾何規範對光學進行了更為透徹的研究，他不僅給出了凹面鏡成像的數學定律，而且還研究了折射，發現光線從一種媒質進入另一種媒質時，入射角與折射角成正比。這些結論和現代幾何光學結論幾乎完

全吻合。

如果不存在原始科學結構的示範作用，古代科學理論將會怎樣發展呢？這方面中國古代天文學的發展給出了極好的例子。中國天文學觀察之精確在世界古代科學史上是屈指可數的，闡述宇宙結構的天文理論也很早，如在殷周之際就產生了蓋天說，漢代又出現了「渾天」和「宣夜」兩種宇宙模型。宣夜說和渾天說從哲學上看是相當先進的。按理說，它們應該成為天文學理論向近代科學逼近的良好發端。但是由於缺乏原始科學結構示範作用，中國天文學理論一直沒有形成類似近代科學理論結構那樣的體系。我們可以把與托勒密幾乎同時代的中國大天文學家張衡的理論與地心說作一個比較。我們知道，在肉眼觀察看來，太陽、月亮衆星都在繞地球運動，因此，從認識次序來說，天文學理論中首先確定地心說模型是很自然的。張衡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系統地發揮了渾天說，他在「靈憲」中說：「幾文耀麗乎天，其動者七，日月五星是也。周旋右回，天道者貴順也，近天則遲，遠天則速，行則屈，屈則留回，留回則逆，逆則遲，迫於天也」。這明顯表明，張衡認為日月五星繞地球轉動，其視運動速度取決於該天體離大地的遠近。有人根據張衡的假說畫了一張畫（圖十三）<sup>(15)</sup>。它與托勒密地心說是十分相似的。但是張衡並沒有明確提出托勒密那樣的地心說理論模型。令人驚奇不已的是張衡製造的渾像幾乎就是一個物化了的托勒密地心說模型。從渾像到地心說只有一步之差，中國天文學家從來沒有打算邁出這一步。爲什麼呢？一方面，這要歸之中國科學理論的技術化傾向。另一個更爲重要的原因是：缺乏原始科學結構的示範作用。托勒密爲了用歐氏幾何體系的示範來建立天文學理論



(圖十三)

托勒密地心體系示意圖

張衡的宇宙結構模型

，他必須首先選擇能在天文理論中作爲公理的假說，他自然會把圓周運動看作是最基本的，然後用圓周運動的均輪和本輪建立了他的地心說。張衡雖然理解日月星辰在作圓周運動，但由於沒有原始科學結構邏輯構造型理論的框架的示範，圓不會被認爲是基本的。中國天文學家的主要興趣在於抽取行星運動的代數特徵，即周期大小來建立天文理論。這樣，天文學變成了對天體視運動周期取公倍數和公約數的算術運算。雖然從天文觀察和計算來說，中國古代天文學家可以和西方一樣準確，甚至更爲準確，但作爲理論結構，古希臘天文學比中國更接近於近代科學。

在關於地球形狀的認識上，原始科學結構示範作用的意義更爲顯著。如果把古希臘科學中對地球認識的知識系統進行分析，歐氏幾何構成了它的理論結構，測量儀器和方法構成了受控實驗結構。而大地測量（航海等）可以看作相應的技術活動。這三者在其所限定的範圍內完全構成了與近代科學結構一樣的體系，那麼理論、實驗、技術之間的循環加速機制肯定可以推動這方面科學知識不斷進步，從而得到大地形狀的基本正確的認識。科學史的事實證明了這一點。古希臘幾何學家當中很多人不僅是天文學家，而且是地理學家。他們在對大地形狀認識上一直遙遙領先。公元前3世紀，塞莫斯的阿利斯塔就利用幾何方法計算月球與地球的大小，巧妙地指出太陽與地球直徑之比一定大於19:3，小於43:6。這個數太小，但錯誤不在於計算方法，而在於實驗數據。實際上只要有正確的科學技術結構，錯誤是可通過不斷改進而逼近真理的。事實上，在希帕克那里，計算相當準了，他算出地球到月球的距離是地球直徑的卅三又三分之二，月球直徑是地球



的三分之一。這兩個值和實際數值三〇·二與〇·二七很接近。而埃拉托色尼達到的成果更為驚人，他認為地球是橢圓形的，還估算了處於同一子午綫兩個地方希恩和麥羅的緯度和距離，算出地球大小為二萬四千里，地球到太陽距離是九千二百萬英里，這兩個值幾乎和在算得數值完全一樣。托勒密不僅對經緯度作了正確的觀察，發明了製造地圖的坐標方法，還綜合了大量資料，畫出了一幅相當現代化的古代世界地圖。我們無須為這些古代科學成就感到吃驚，因為原始科學結構已在這一領域中發揮示範作用。

中國古代對大地形狀的認識和古希臘構成了明顯的對照，就大地測量的技術和儀器而言，中國比西方更為先進，張衡和裴秀發明了繪製地圖的網格方法。唐政府曾組織過世界上古史上最大規模的大地測量。一行創制了一種簡便的儀器「復矩」，得到「大率三百五十一里八十步，而極差一度」的科學結論。它相當準確，相對誤差只有百分之十九。66。元朝的耶律楚材已明確提出「里差」概念，提出了一個相當精確的經驗公式，蘇天爵又進一步提出了地方時的概念。如果僅僅從測量精度和技術來看，中國古代天文學家完全可以計算出地球大小的。但是中國古代連大地是球形的觀點都沒有明確提出來過。落後的蓋天說到清代仍有人信奉。中國天文學家在理解日蝕和月蝕時可以明確指出它是太陽被月亮掩沒或月球被地球掩沒所致，但這些結論孤立存在着，沒有和大地形狀理論構造性結合起來。由於理論結構中缺乏原始科學結構的示範，所以儘管從唐朝一直到清朝大規模的大地測量一直在進行，科學知識體系却並沒有加速其進化。

中國古代科學發展中是不是不存在示範作

用呢？實際上，科學的發展是不能沒有示範的，差別在於是什麼樣的示範。從「周髀算經」開始的天文學和代數算術結合的傳統以及理論技術化傾向本身是一種示範。儒家的直觀合理外推的思想方法和倫理中心主義一直是強大的示範。中國儒家思想「述而不作」模式的示範作用，突出表現在中國古代科學家大多是用「注經」的方式寫著作，而不像古希臘科學家按歐氏幾何為模板構造自己的理論。

## 八、示範作用的極限：

### 原始科學結構社會化的障礙

我們在討論原始科學結構通過示範作用不斷擴大其社會化過程時，一直沒有分析示範作用的重要前提，這就是科學對社會的影響。示範作用是指科學家在某一領域中已明確的模式去搞新的研究，但有多少人能在科學研究中運用這種模板，却取決於科學對社會的影響。今天，科學技術對社會的巨大衝擊只是近代科學結構建立的結果，由於近代科學技術的循環加速效應使科技成果如滾滾不絕的江水那樣洶湧澎湃地奔瀉出來，充斥到人類生活一切領域，才使人們普遍認識到科學的意義。而在近代科學結構建立以前，社會上絕大多數人甚至根本不知道科學，科學的示範好像陽春白雪，它的聲音在古代世界是如此微弱，在歷史大合唱中，附合者寥寥。特別是原始科學結構，它只是一顆深藏在眾多的思想體系、學派及專門知識貝類中的一顆珍珠，雖然它有極為珍貴的價值，但它外面包圍着一個堅硬的難以被人理解的專業性外殼，只有極少人才能識別它，其社會化過程是障礙重重的。

古代科學體系（包括原始科學結構）示範作用第一個巨大障礙是科學本身的專門性和複雜性帶來的。技術雖然也是專門的、複雜的，但古代技術由於存在着相當的社會需求而社會化了。一般說來，古代社會對科學的需求比技術的需求小得多，特別是對於純粹科學。中國大一統帝國對天文學的需求使中國天文學家比世界各國有更高的社會地位。但即使在中國，天文學算畢竟太複雜了，很多知識份子鑽研一輩子都沒有最後搞懂。張衡在「應閑」中感嘆道：有人擔心我搞這套東西沒有用，我還恨不能把這套東西教給別人呢？另一個著名的例子是郭守敬創造了授時曆，可以說達到了中國古代天文學的頂峰，但他的方法到了明朝居然連官方天文學家都難以理解。用屠龍之術來比喻古代純粹科學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是很恰當的。它不僅很難學，而且看來不大有用，這樣，它的示範作用自然很弱，社會化是很難的。實際上，東漢就有人把張衡的學問看做屠龍之術。

我們前面曾提出古希臘科學成就絕大多數是在原始科學結構示範作用下取得的，但我們必須看到，這種示範作用的極限正是古希臘科學的天然界限。其創造精神雖然出類拔萃，却是處於古代愚昧和迷信的海洋之中的。當羅馬士兵把正在專心研究幾何圖形的阿基米德砍倒在地時，壓根兒沒有意識到科學是怎麼回事。希臘科學的成就只是古希臘文明花園中的花朵，它被迷信和愚昧的荊棘包圍着，它的種子也不可能傳到更廣大的地區中去。

科學結構社會化的第二個巨大障礙是科學結論與直觀相衝突，特別是它的成長必然和古代文化背景（社會結構）相衝突。在絕大多數人的心目中，科學的命題是難以置信的，甚至是有辱神明的。古希臘科學家根據原始科學結

構示範算出大地是圓的，但對於大多數人，並不相信這種結論。因為這和人們大地是平直的直觀印象相矛盾。所以即使在古希臘羅馬，關於大地原始模型如丁型圖、輪型圖仍然在流行。中國古代渾天說的傳播也遇到類似困難。「晉書」中有這樣一段話：「此則儀象之論，其來遠矣，綿代相傳，史官禁密，學者不覩，故宣、蓋沸騰。」這一段話一語道破了中國官方天文學家在傳播渾天說時所感到的苦惱。他們認為由於天文儀器保密，社會上一般學者得不到，不能進行天文觀察，所以蓋天說盛行。實際上，根本原因在於：渾天說雖比蓋天說符合實驗觀察，但却比蓋天說離直觀更遠，它的傳播就來得困難些。天文理論尚且如此，其它科學理論傳播特別是方法上的示範遇到的障礙更是可想而知了。

科學不僅常常和直觀相矛盾，而且和人們的宗教信仰、價值觀念、思想方法相抵觸。亞歷山大的女數學家希帕蒂亞被狂熱的基督徒在街上抓住撕得粉碎，在基督徒的心目中一個不按神的意志來思索的數學家 and 女巫、異教徒是大同小異的。教廷譴責科學家是「科學之樹欺騙了生命之樹」。羅吉爾·培根的科學精神被教廷看作大逆不道。所以在一種普遍與科學相抵觸的社會觀念中，一個敢於用原始科學結構作為示範來指導研究的科學家，一定比魯迅所說第一個吃螃蟹的人還要勇敢。他必須在普遍的不理解和敵視中堅持科學精神。由於原始科學結構發展到一定程度就會和一般文化背景相抵觸，我們就不難理解古希臘科學衰落的原因了。在古希臘、羅馬奴隸社會中，原始科學結構的示範作用主要是歐幾里得幾何學公理體系。它只是在一個小範圍內發揮示範作用，主要限於科學理論結構，對於受控實驗示範就幾乎

不存在了。因為它和奴隸制社會結構相衝突，做實驗被認為是不光彩的。像阿基米德這樣的實驗大師都為自己製造儀器感到羞耻。柏拉圖甚至指責兩個希臘人製造裝置來解決幾何問題是在「污染思想」。我們知道，古希臘科學理論雖然發達，但學者和工匠之間的鴻溝是不可逾越的。科學是生長在奴隸主和自由民花園中的花朵，而技術則掌握在會說話的工具——奴隸手中。儘管那時也有亞歷山大里亞工程學派，並製造出虹吸器、測溫器，甚至有原始的蒸汽機，但一般說來，奴隸主知識份子對技術是蔑視的。羅馬一個皇帝會拒絕用機器搬運放地上的神殿大柱，因為那會使搬運工失去工作。這樣一來，雖然在幾何學中建立的原始科學結構中在某種程度上包含了受控實驗和開放性技術（它們是在成千上萬年實踐中積累起來的），但在奴隸社會結構中幾乎不能發揮任何示範作用。圖4A表明，古希臘時期科學技術水平中主要是科學理論，實驗與技術增長遠比理論為低，其原因正在於此。而且這種示範作用必然很快就發展到它的極限，古希臘科學發展也必然漸漸陷於停滯狀態。圖4A中，理論與實驗淨增長漸漸趨於減少正是說明了這一點。很多科學史家用羅馬人重視技術而輕視科學來解釋古希臘科學在羅馬全盛時代居然停滯之謎。實際上當托勒密用歐氏幾何理論的示範完成他那劃時代的「至大論」和光學實驗後，原始科學結構已完全佔領與它有直接關係的一切科學領域，示範已到極限狀態，古代科學家幾乎已經沒有什麼可做的了。

羅馬帝國衰落之際，基督教興起，整個古代西方社會文化背景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奴隸主自由民的古代宗教以及相應的理性主義精神消失了。對上帝的虔誠代替了哲學家對自然和

人生的思索，封建制度代替了奴隸制度，對於社會來說，這是一個進步。但古希臘科學之花得以生長的土壤也隨着古代社會解體而流失了。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當亞歷山大圖書館被烈火焚燒，柏拉圖學園被下令關閉的時候，本身已經奄奄一息的科學之花也就枯萎了。無辜的希帕蒂亞被基督教徒所殺可以看作古希臘原始科學結構示範作用結束的象徵，因為希帕蒂亞的主要貢獻之一就是和她父親一起注釋歐氏「幾何原本」。當基督徒把一卷又一卷的記載着古希臘科學成果的羊皮紙刮得乾乾淨淨而重新用來書寫聖經時，這無疑被認為是廢物利用。能夠理解古希臘科學規範的人（雖然是極少一部份人）已經死去了，能夠容忍這一小批人生存和活動的社會制度和價值觀念已經變化了。匠人們在荒蕪已久的四通八達的羅馬官道上建築起哥特式教堂，另一種社會結構在社會激變中興起。我們并不能譴責歷史，因為原始科學結構在古希臘羅馬的社會化程度實在太小了，人類社會在進步中必定要遺忘一些東西，如果這些東西包含着不引人注意的古代科學，這又有什麼可奇怪的呢？

原始科學結構示範作用的第三個大障礙是缺乏必要的通訊交流手段。思想和社會化需要通過出版和印刷，跨地域的科學交流需要發達的通訊渠道。據說，回教徒征伐埃及，焚毀亞歷山大圖書館時，在長達六個月的時期內，焚燒成卷羊皮紙居然成爲亞歷山大浴室之熱源。書寫一部聖經就要用幾百張羊皮，可以想像，在這樣一種通訊交流工具的背景上，科學示範的擴大幾乎是不可能的。用紙草和羊皮紙書寫的手稿只能供極少一部份特權人物使用。

理解了科學社會化過程中必然會碰到的三大障礙，我們就能用這些障礙的大小來估計科

學在歷史上某一文化背景社會化的程度。不同的社會結構所允許其相應的科學社會化規模是不同的。科學的成長必然隨着社會結構的改變而變化。兩千年來，中國社會結構和文化背景沒有出現過從古希臘羅馬到基督教文明這樣大起大落的變化，所以科學的發展一直是連續的，沒有大跌落，但是任何一種示範都有自己極限。不僅是原始科學結構如此，中國古代以「周髀算經」為代表的天文一代數理論示範，

表5 歷代在天文—代數學影響下的理論成果積分

朝代	春秋戰國	秦	西漢	東漢	魏晉南北朝	隋	唐	北宋	南宋	元	明
分數	95	0	70	170	146	17	2	48	70	30	21

也有自己的極限。為什麼自元朝以後，中國自身的天文學和數學發展日益趨於停滯狀態？實際上到郭守敬時，在這種示範下能做到的，一切已經做完了。授時曆已經改造得如此精確，在古老模式指導下的天文觀察儀器已做得這樣完善，理論技術化要求天文學的目的就是為了大一統帝國服務，這種要求幾乎已經完全滿足了，後世天文學家在這種示範下已沒有什麼可做的了。明朝實際上一直在沿用授時曆，沒有做什麼改進。表5給出中國式天文學——數學成就在各朝理論中的比例，我們可以明顯看到示範作用日趨縮小。明朝如果不算西方天文學成果對中國的衝擊，中國傳統天文學成就幾乎微乎其微。在杜絕外來影響和社會結構不變的條件下，這種極限是難以突破的。

### 九、科學在文明中的擴張： 基督教經院哲學和 大一統技術所起的作用

如果不是某種特別的社會因素克服了原始科學結構示範作用所遇到的三大障礙，那麼近代科學結構的確立幾乎是不可思議的。在這方面，基督教的經院哲學和中國的「大一統」技術起了重要的作用。基督教把古希臘科學結論納入教義有助於克服科學專業性的障礙。而中國的大一統技術傳到西方則賦與了原始科學結構社會化所必須的通訊交流工具。

科學史家常常不厭其煩地強調文藝復興對近代科學結構建立的作用，這當然不錯，但是科學史上一個十分重要的階段常常被人們忽略，這就是文藝復興前二百年經院哲學的高度繁榮。歷史表明，沒有這一階段，近代科學結構的建立是不可思議的，因為它標誌着原始科學

結構被納入基督教體系。人們一提起中世紀基督教文明中的科學，就會想到亞里士多德的學說，會說托勒密的本輪如何如何，實際上，西歐知道亞里士多德和托勒密是十二世紀以後的事情。從公元七世紀基督教佔統治地位到十一世紀這漫長的四百年中，古希臘科學幾乎被遺忘，西歐科學知識幾乎回到了希臘科學出現之前的那種蒙昧狀態。這種倒退給歷史學家留下了「黑暗的世紀」可怕的形象。但正是在這四百年中，歷史慢慢地奠定着一個可以容納更高科學水平的社會基礎。

首先，基督教作為對奴隸制的否定，它至少在教義上填平了把處於奴隸主地位的學者和作為奴隸的工匠之間在上帝面前的鴻溝，從而便準備了原始科學結構中受控實驗結構有可能發揮示範作用的社會條件。基督教宣稱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我們姑且不論其欺騙性的一面，從另一方面看，耶穌的養父約瑟是木匠，阿波斯特爾斯的君主是漁夫之類聖經典故的說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於填平學者與工匠之間的鴻溝，基督教把手工勞動看作閱讀虔誠的著作使自己接近上帝的精神生活的一部份。正如小林恩·懷特所指出的，中世紀「修道士是第一批人數很多的指甲下有污垢的知識份子」<sup>18</sup>。匠人和學者的鴻溝一旦在宗教上首先被填平，那麼隨着技術的進步和積累，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不斷擴大的匠人隊伍就開始自然交匯了，自然這需要漫長的時間。當然，僅僅憑以勞動作為鍛煉意志來接近上帝的修士是不足以建立受控實驗結構的。但是一旦中世紀學者在禁慾主義的長袍下發現了美麗的肉體，他們的興趣從天堂轉入到現世，那麼這種潛在的潮流馬上會洶湧澎湃地奔瀉出來。文藝復興之所以會迅速完成受控實驗結構的建立，其秘密正在於

此。

其次，基督教佔統治地位後的西歐正在締結一種文化交流、生產水平比古希臘羅馬更廣泛的社會共同體。基督教義無疑比羅馬自由民的尚武精神能把更多的人組織起來。八世紀發明的重輪犁和三圃輪作制使得農業能養活更多的人口，從中國傳來的新軛馬法和馬蹄鐵普遍應用，導致農業技術和交通運輸的革命，促使了小村莊的衰落和都市生活式的大農業村落的興起。確實，到十一世紀就原始科學結構示範的社會土壤說來，基督教文明比古希臘羅馬文明更為肥沃了。一個明顯的例子是十一世紀後大學的興起。第一所大學是十一世紀末在意大利建立的博洛尼亞大學，接着，法國的巴黎大學、英國的牛津大學、意大利的薩勒諾大學和巴勒摩大學、西班牙的薩拉曼加大學、德國的海德堡大學、法國的奧爾良大學、英國的劍橋大學相繼成立<sup>(9)</sup>。這些大學大多是由教堂學校轉變而來，其中以巴黎大學最著名，學生來自四面八方，數以千計<sup>(10)</sup>。一二〇〇年左右的教堂、教堂和修道院如繁星一樣，密密麻麻地散布在整個基督教文明之中。

如果我們把原始科學結構的建立比喻成生長在古希臘羅馬貧瘠土地上難以進一步長大的一朵小花，那麼十一世紀的西歐則是一塊肥沃的土地，它只是缺乏原始科學結構的種子而已。然而歷史上文明接觸的狂風遲早會把種子帶來的，所需要的僅僅是機會。古希臘羅馬文明衰亡後，大量古代科學成果被阿拉伯科學吸收了，雖然十一世紀之前，阿拉伯文化和基督教文化不斷進行接觸，但只有十一世紀西歐基督教文化內部具備了接受原始科學結構的條件後，科學史上極為重要的大翻譯運動才開始興起。翻譯工作在與阿拉伯文化接觸最多的西班牙

最為活躍。大翻譯高潮持續了一個世紀，到十三世紀初，亞里士多德全集被發現。把古希臘系統的科學知識加以消化使它包容到基督教文化體系中去的主要功績要歸之於托馬斯·阿奎那。他依照亞里士多德的邏輯學和神學權威對基督教理論進行全面的改造，摒棄了古希臘思想中和基督教不相容的部份。阿奎那的工作做得如此細緻，以至於把亞里士多德學說改造得連細節都與神學相符合，他還接受了托勒密的天文體系，把它當作一個工作假說<sup>(11)</sup>。自阿奎那以後，西歐的經院哲學趨於全盛時代。

如果僅僅以科學內容的傳播來說，阿奎那的工作並不值得格外稱讚，他沒有真正理解古希臘的原始科學結構，他甚至把古希臘科學給闡割了，在其中加進神學的胡說、偏見和迷信。但是如果沒有阿奎那奠定的經院哲學，近代科學結構建立幾乎是不可能的。為什麼呢？如果不把古希臘科學和基督教義結合，原始科學結構和基督教文明是不適應的，它不可能在中世紀後期起到廣泛的示範作用。大翻譯運動造成了一種歷史性的結果：原始科學結構的珍珠被嵌入了一個更大的可以讓其進一步成長的基督教文化珍珠貝中了。亞里士多德學說、托勒密體系和蓋倫的醫學成爲基督教自然觀的一部份。哪裡有基督教，哪裡就會傳授學習這些學說。本來科學是專門化的，是難懂的，但現在却成了人們必須接受和研究的教義。宗教吸收了科學成果，使宗教一時變得強大了，但它也把科學的種子傳遍了它們能及的每一個角落，如果僅僅靠古代科學本身的力量，是決難做到的。宗教雖然暫時闡割了科學，但是也使原始科學結構的示範作用有可能克服它的專業性障礙。科學的種子廣泛地撒播到更遠的地方，使它有一天能發芽、成長、開花結果。我們知道

，到一二〇〇年左右，亞里士多德的各種著作都已經家喻戶曉了，若作爲思想家的亞里士多德能知道他那在代頗爲深奧的、只爲少數門徒接受的學說會這麼快地社會化，一定會目瞪口呆！

文化的接觸不僅促進了大翻譯運動，它也幫助克服了原始科學結構示範作用的另一個障礙——通訊工具的缺乏。阿拉伯人把中國古代大一統技術的結晶——四大發明帶到了西方，從而克服了原始科學技術結構示範作用所碰到的通訊交流障礙。如果沒有造紙技術，那麼亞里士多德和托勒密學說靠羊皮紙來傳播，其範圍是可想而知的。活字印刷的貢獻更是巨大。大約一四一五年，活字印刷術傳到歐洲，到一四七四年，數學、天文學以及占星學等方面的書籍就以印刷品形式出現了。特別值得提出的是，活字印刷術很快就被用來印歐氏幾何原本。Johannes Campanus (十三世紀)所譯的幾何原本拉丁文版，第一版於一四八二年出現於威尼斯，接着阿波羅尼的 *Conic Sections* 前四冊，巴伯斯的著作，土奧費多斯的 *Arithmetica* 以及其它科學作品均以印刷品形式紛紛出世<sup>(12)</sup>。從活字印刷在西方出現到歐氏幾何的活字印刷版發行只有短短的三十二年，可見印刷術對原始科學結構示範作用的貢獻。

羅盤和火藥對原始科學結構建立的貢獻則是不言而喻，航海技術一直是西方科學傳播有力的槓桿，而火藥除了它是一種摧毀封建堡壘的使社會成爲一個更大的政治經濟統體的物質武器外，它同時使物理學家開始意識到拋物體研究對於火炮製造和使用的意義。拋物體研究則直接使原始科學結構的示範作用第一次完全脫離幾何、靜力學與光學而直接進入到動力學的領域。

總之，西方中世紀後期原始科學結構示範作用的增強完全是由於西方中世紀社會結構與大一統技術克服了其內在障礙的結果。理解了這一點，圖4所示的西方兩千年中科學技術水平淨增長曲線就可以得到解釋。

我們知道，西方科學技術水平淨增長曲線（見圖4）自古希臘羅馬文明衰落後一直處於低水平，但在八—十世紀有一個技術峯，這是中國的造紙術傳到西方引起的。而在十二—十三世紀，有一個理論水平的增長高峯，這是大翻譯帶來的。在十四—十五世紀又出現一個新的技術發展高峯。表6給出這一時期技術中「大一統」技術的比例。可見這是大一統技術在西方普及的結果。顯然，只有經歷過這三個高峯，西方才可能出現十五—十七世紀標誌着近代科學的新發展高峯。如果沒有歷史上的這三個發展高峯為基礎，近代科學結構在西方出現是不可能的。這樣，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自然擺在科學史家面前：近代科學結構是否能在一種孤立而單一的文化背景（或社會結構）中出現？回答是否定的。大一統型技術結構是和中國封建社會特殊的大一統形態相應的，它只能生產在中國這樣的社會結構之中，而原始科學結構示範的擴大同時又需要與基督教文化相應的封建社會結構。近代科學結構建立的內在條件幾乎包含着本質上的二律背反：它既需要歐洲中世紀後期的那種社會結構，又需要中國封建社會那種完全不同歐洲封建社會結構所提供的技術。這一切無非表明：科學是屬於全人類的，原始科學結構本身的出現，它也是古埃及文明和古希臘文明融合的結果。它的成長也是一樣，必須集中融合全人類一切民族所創造的文化精華才能發展。因此，哪一個地區哪一個民族能夠開明地吸收這些精華，它就會成

表6 西方「大一統」技術和近代科學結構建立之關係。

時間（世紀）	10	11	12	13	14	15	16
技術淨增長	0	20	185	190	1825	1795	1060
其中「大一統」技術佔的比例	0	0	5%	11%	99%	37%	18%

為原始科學結構社會化的發源地，如果這些條件都消失了，那麼科學就會夭折或者轉移。

阿拉伯科學同中國古文化的接觸同樣給原始科學結構在中國發揮示範作用的機會。據考證，至少在元朝，波斯語的托勒密「至大論」和歐氏幾何原本已經被帶到中國皇家圖書館中了。但是這一切並沒有引起注意，它的示範作用也沒有發揮。中國封建社會雖然具備發達的大一統技術，它可以提供使科學社會化的工具，但是其社會結構本身却是封閉性的。只

要這種社會結構不改造，四大發明遭到的所謂「牆內開花，牆外結果」這種歷史性悲劇是不可避免的。

### 十、否定性放大： 社會科學化的特殊機制

我們發現，十六世紀後原始科學結構迅速社會化最後導致近代科學結構建立是通過了一種頗為微妙的機制。這就是基督教早期對科學的吸收和後期的對立。經院哲學傳播了原始科學結構的種子後，一系列放大程序就開始起來了。隨着宗教的一天天衰落，這些種子就開始發芽成長了。對於科學的發展來說，最可怕的莫過於：「社會對它不感興趣。」但這早期被人們對宗教的熱誠所克服，而後來又被宗教和科學的鬭爭造成的社會影響所戰勝。原始科學結構每壯進一步，都必然和教義相矛盾。它引起統一教會的反對，而這種反對立刻又引起了社會的注意，結果出現了這樣的歷史性進程：科學掀起了反對它自己的狂風暴雨，而狂風暴雨傳播了科學的種子。宗教為了擴大自己的力量利用過科學成果，結果科學借助它的力量傳播了自己的精神，教廷為了戰勝不再服從神學的科學而把它付諸火刑，但人們却發現了科學的價值和力量，結果在這場人和神的戰鬭中，科學革命席捲了整個歐洲。

我們只須列舉一些科學史上著名的事件就足以證明這一點。哥白尼學說本是很難懂的，它的方法直接是中世紀已擴大的原始科學結構群示範的結果。哥白尼在「天體運行」中聲明這本書是為數學家所寫的。我們可以設想，要不是托勒密地心說是宗教的教義，很難設想一本專業性很强的天文學專著會有這樣大的社會

影響。如果沒有與宗教的對立，很難想像作為醫生的哈維會向哥白尼的學說求救。而哈維發現血液循環却完全是接受了哥白尼學說示範的結果。他從天體作循環運動，太陽是宇宙的中心而認為血液也在作循環運動，心臟是人體的大太陽。科學史家都承認，哈維能完成他那偉大的發現並不僅僅在於他嚴格而細心地實驗（在哈維之前，許多人文主義者也做過人體解剖），而在於他第一次把構造主義數學方法和受控制實驗結合起來。他是先從數學計算中肯定血液一定在作循環運動的。無疑，哈維的方法是原始科學結構示範的擴大（從幾何到天文，從天文到力學、生理學）的結果。而哈維能接受這一示範的重要原因可能要歸之於哥白尼學說與宗教對立造成的社會影響。實際上，哈維的工作並不是原始科學結構示範的終點，它又進一步引發了示範的放大作用。哈維推翻了作為教義的蓋倫學說，這樣它的影響大大超出了醫學和生理學。當時整個歐洲都在議論哈維學說，甚至戲院舞台上都表現了有關血液循環的事件。

如無宗教和科學的對立造成示範的放大，示範的連鎖反應是不會持續下去的。科學上的發現即使做出來了，也會由於它的高度專業性而被特定在特定學科之中。我們知道，早在十五世紀，阿拉伯醫學家就對蓋倫學說提出批評。有一個叫伊本·阿爾·納非（IBN-AL-NAFIS，公元一二〇一—一二八八）的醫生，從大馬士革來開羅主持那西里醫院，他就指出心臟的隔膜很硬，不像蓋倫所設想的那樣有細孔可以讓血液通過，他認為血液必然要通過肺從右心室流到左心室。實際上他已經提出了小循環理論。但是，蓋倫的學說並非伊斯蘭教的教義，阿拉伯人無論對這種學說還是對與之相反

的學說都是寬容的，既不格外重視，也不特別反對。結果，納非的學說沒有產生什麼影響，他的著作到本世紀才被發現<sup>(24)</sup>。

在什麼條件下，宗教和科學的對立會放大的影響？我們前面說過，原始科學結構的成長會和社會結構文化背景發生衝突，這會帶來示範作用的極限。這不是自相矛盾嗎？實際上，宗教和科學的對立只有發生在宗教自身的衰落時期，科學才能通過過宗教相對立，宗教也可以輕而易舉地扼殺科學的傳播。羅吉爾·培根就是例子。他差不多是阿奎那同時代的人。今天科學史家都把羅吉爾·培根看做近代實驗科學的祖師爺，是他把火藥最先介紹給歐洲人的。但正如丹皮爾所指出的，「他一生的悲劇，一半是外在的悲劇。」他處於經院哲學全盛時代，雖然他比阿奎那更接近於近代科學，但在那個時代他和宗教的對立除了給他本人帶來受迫害和社會的不理解外，並沒有發生多少影響<sup>(25)</sup>。

而一旦宗教與科學的對立出現在宗教自身趨於衰落、舊社會結構趨於瓦解時期，情況就大不相同了。人們對腐朽的教會和僵化的教義的懷疑造成了舊文化背景的四分五裂，佔正統地位的意識形態已不是鐵板一塊了，特別對於那些思想活躍的渴望創新的知識份子，它明顯缺乏吸引力。整個社會的思想真空造成了科學乘虛傳播的大好時機。一些人把中世紀經院哲學的衰落看作是科學與宗教鬥爭的結果，把科學興起看作宗教衰落的終極原因，這實際上是本末倒置的。在一個以宗教佔主導地位的社會結構中，科學的力量與宗教相比是太弱小了，它完全不能構成一種普遍的對宗教的懷疑。宗教的衰落是由社會結構自身的演變所決定的，它的動力主要是政治、經濟和文化自身的因素

。科學在宗教衰落中成長，這只是宗教衰落的結果之一，當然又能反過來加速其衰落。

在哥白尼遲疑不決地把「天體運行」付諸出版以前，波瀾壯闊的宗教改革運動已經開始了，路德和茨溫利名字已傳遍整個西方世界。宗教改革是宗教衰落的標誌。從宗教改革的那些主要目標可以明顯看到當時基督教義已與生動活潑的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發展不相適應，特別是統一教會已經腐朽了。那些新教徒本身就代表了對舊有意識形態不滿的社會力量，他們是容易被吸引到科學的營壘中去的。早在一八七三年法國植物學家阿爾方斯·德·堪多的科學史名著「科學與科學家的歷史」中就對這一點作了精彩的分析。他統計了自一六六六年建立的巴黎科學院兩個世紀中外國人當選為其成員的數目，指出法國之外的科學家選入巴黎科學院的新教徒比天主教多六倍以上<sup>(26)</sup>。分析一下在宗教衰落期宗教和科學的對立造成科學示範擴大的機制是很有意義的。由於人們對舊制度的不滿，有識之士對僵化的舊思想體系的普遍懷疑，這種懷疑必然促使他們去研究被宗教所反對的學說究竟是什麼，甚至僅僅憑着對僵化和腐朽的舊體系的反感而盲目接受新體系。我們把這種效應稱為否定性放大。為什麼叫否定性放大？因為絕大多數人並不是由於理解了科學的新學說正確而接受科學示範的，他們僅僅是由於科學作為對經院哲學的否定而接受科學的。

哥白尼學說的廣泛傳播本身就是否定性放大的結果。近年來，不少人對哥白尼學說傳播的歷史背景作了研究，特別是著名科學史家庫恩。很多人都指出，如果僅僅憑和實驗觀察相符合而言，當時哥白尼學說並不比托勒密學說更正確，特別是在慣性定律和萬有引力沒有發

現前哥白尼學說當時甚至和很多顯而易見的直觀現象相矛盾。實際上，社會上大多數信奉者是由於哥白尼學說和宗教的對立。我們知道，新教徒特別反對中世紀世界觀中的等級觀念，這種等級觀念在自然觀上表現為宇宙間佈滿一連串等級不同的人，處於世界邊緣的上帝是最高等級，地上的不完善的實體處於較低等級。而哥白尼學說至少是暗中否定了地上元素的等級，他把以前作為天體的特權象徵的圓週運動也給與地球了。哥白尼的學生萊克斯明確否定了高級天球統治低級天球的觀念。這種學說無疑對新教徒富有吸引力。像吉伯特這樣的大科學家就明確意識到哥白尼學說的傳播和否定傳統等級觀念有內在的聯繫。無疑，哈維、開普勒、羅伯特·費拉德、范·赫爾蒙脫等都在這種否定性放大效應的社會潮流中改變了對日心說的態度。

其實，早在哥白尼日心說之前，托勒密和權威的亞里士多德學說已處於思想敏捷的學者的普遍的懷疑之中。這種情況在經院哲學佔統治地位的時代中是沒有過的。哥白尼的老師波倫亞大學教授馬利亞·德·諾瓦臘批評托勒密體系太繁雜，不合於數學和諧原理。一五三六年，即在哥白尼著作出版前七年，RAMUS在一篇著名的論文中說：「亞里士多德所教的一切皆偽。」<sup>(8)</sup>實際上，並不是亞里士多德學說中一切都是錯的，在哥白尼、伽利略、牛頓一系列革命性突破之前，是沒有任何根據得出這一結論的。RAMUS 只是在對經院哲學反應的否定性情緒下作出這一斷言的。

實際上，作為伽利略本人也是在這種否定性放大氣氛中完成自己不朽的發現的。我們知道，古希臘早就有遠望鏡，一直到十三世紀，工匠們不斷生產透鏡以供遠視的人用。但透鏡

從來沒有作為觀察儀器進入科學領域。經院哲學對用透鏡觀察存在着一種根深蒂固的錯誤觀念：「以視覺為基礎的，無權成為科學。」<sup>(9)</sup>透鏡中的像是變形的，而且有色散，在其光學機制沒有搞清楚之前，這種信條貌似有理。伽利略用望遠鏡來觀察天體，並不能證明這一古老信條是錯的。他至死都沒有去研究望遠鏡為什麼能「放大」的機制。實際上，伽利略從拿到望遠鏡起，就根本沒有懷疑望遠鏡看到的東西是真的。因為他在感情上傾向於哥白尼學說，他要用望遠鏡來證實哥白尼學說。對於他來說，能證明哥白尼體系的就是真的。所以當他把望遠鏡指向夜空，發現太陽黑子、木星衛星和月亮上的山脈時，立即欣喜若狂地寫下了這些話：「我驚呆了，我無限感謝上帝，他讓我想方設法發現了這樣偉大的、多少個世紀都不清楚的奇跡。」實際上，如果要搞清楚望遠鏡原理，證明它是真的之後才去使用，望遠鏡就根本不可能使用到科學研究之中來。對於那些經院哲學信奉者，望遠鏡看到的東西沒有任何意義，他們使用望遠鏡觀察的目的是為了否定它。甚至連開普勒這樣的大師都是為了「證偽」去用望遠鏡觀察的。但開普勒畢竟是接受了原始科學結構示範的人物，他經過十天實驗，才開始相信伽利略是對的。這促使他去研究望遠鏡機制，寫了一本「屈光學」的書，奠定了幾何光學的基礎。這段歷史告訴我們，科學的成長，特別是示範作用通過否定性放大需要一定的時機，這就是舊社會結構的瓦解，新社會結構在對舊結構的批判和否定中興起。沒有否定性放大的力量，科學結構的社會化是困難的。這樣，我們得到了一個十分重要的結論：原始科學結構的大規模社會化只可能出現在社會結構面臨轉化之際。為什麼這樣講呢？科學結構

是依靠示範作用社會化的，而示範作用又取決於科學的社會影響。只有當社會結構中文化結構面臨轉化時，否定性放大機制才會擴大科學對社會的影響。而技術結構和經濟結構直接相關，技術結構的轉化需要政治和經濟的直接推動。這樣一來，整個近代科學技術結構的確立就需要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機，這就是文化結構、政治結構和經濟結構一起轉化，也就是整個社會結構的變化。近代科學技術結構正是在西方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轉化過程中確立的。前面重點討論了科學結構社會化的機制，這並不是說技術結構的變化不重要。之所以沒有討論它，一方面是因為開放性技術體系與資本主義經濟結構的關係比較清楚，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只有在近代科學結構確立後，開放性技術體系才能確立。這就意味着，只要理解了近代科學結構建立的機制，加上對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緩原因的探討，二者綜合起來就可以大體回答近代科學技術結構未首先在中國出現的原因了。

否定性放大機制不是十六、十七世紀西歐所特有的，在任何一個社會中，當舊有結構瓦解之際，舊意識形態結構的危機必然給形形色色新思想傳播造成有利時機。特別是人類的價值觀的轉化有一種反其道而行之的內在節奏，當一種原來被認為不可能動搖的信仰失去生命力之際，在一個時期內人們在感情上會傾向於和原來相反的東西。當腐朽的宗教過分強調權威時，整個社會會出現「反權威」傾向。當舊理論死守迂腐的教條、禁慾主義完全扼殺人性而主張贖罪時，人們會主張人文主義的個性解放，甚至原諒情慾放任……：。基督教對羅馬帝國的否定借助過這種力量，而人文主義對基督教的否定也借助過這種力量。它是人類文明

推陳出新、不斷進步的精神力量。但是這種否定性放大是否一定造成近代科學結構的建立，這就要看條件了。否定性放大是缺乏明確方向的，人們在感情上一時傾向的東西並不一定是正確的東西。否定性放大可以推動衆多的思想體系，甚至是病態的邪說發展起來的。在那歷史上動蕩激變的思潮中，常常是魚龍混雜、泥沙俱下的。曇花一現的學說、浮雲般掠過的人物，常常和真理、科學家混淆在一起。而真理要戰勝謬誤，科學要戰勝迷信，必須還要具備如下三個條件。

第一個條件是原始科學結構的示範作用存在，正如沒有科學的種子，僅僅有否定性放大的土壤，科學之花當然不會盛開，如果沒有中世紀幾百年來逐漸擴大的以幾何、天文、光學和力學為核心的原始科學結構群的存在，否定性放大並不會推動科學的發展，這是不言而喻的。第二個條件是不存在其他足以與原始科學結構相抗衡的示範體系。這就要求舊社會結構瓦解時，在其中形成的新社會結構對科學的發展有着比舊結構更大的容量。如果新結構的文化背景和舊結構一樣和科學規範是對立的，那麼雖然在舊社會結構瓦解之時，否定性放大效應推動科學繁榮了一陣子，隨着新社會結構穩定後，否定性放大作用消失了。由於新社會結構同樣與近代科學結構相衝突，那麼就會重新對科學的社會進行遏制。確實，西方十六世紀後興起的人文主義思潮對科學結構的傳播比基督教有更大的容量。所以當資本主義社會結構在西歐確立後，科學示範作用仍在擴大，比如科學共同體的形成，信仰自由，大學和商人以及資產階級政府在科學中所起的作用，這一切都使否定性放大效應擴大了的科學示範繼續下去，最後導致近代科學結構穩定的建立（這

一切不是本文的主題）。第三個條件是社會結構轉變時不出現毀滅性大動亂。科學在歷史上並不像人們吃飯、穿衣、生存那樣每時每刻不可缺少的活動。如果在社會秩序毀滅瓦解之時，最早的犧牲品往往就是地位脆弱的科學。我們前面談到古希臘羅馬文明在向基督教文明的轉變時，古希臘科學成就被掃蕩的乾乾淨淨，這和幾百年中社會秩序大動亂是直接相關的。總之，通過這些條件我們可以深刻地認識到，為什麼十六世紀後近代科學結構能在西方得以確立的原因。

## 十一、互補陷阱

如果我們用原始科學結構社會化的條件對中國科學技術史作一宏觀分析，可以發現，在十六世紀之前至少有二個時期是具備了這些條件中某幾個的。戰國時期、東漢後期、南北朝後期中國社會結構都面臨着轉化。但是在這些時期中國封建社會結構決定了近代科學結構建立的完備條件都不可能具備，這就造成了中國古代科學結構長期停滯的局面。為什麼富有科學精神的墨家學說會在秦漢之際消亡？為什麼東漢中後期會出現僅次於北宋的科學技術發展的高峰？道家、儒家各自對科學發展起了什麼樣的作用？這些科學史上頗難理解的問題都可以通過條件分析加以說明。

戰國時期，中國封建社會正面臨着從等級君主制向絕對君主制的轉化。佔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周禮」不可挽回地衰落了，中國處於百家爭鳴的時代。「墨經」和「考工記」無疑是中國古代科學家文獻中最具有現代精神的。墨經中包含有類似歐氏幾何的構造性理論要素。「考工記」比後世任何一部技術著作都重視

技術的一般自然觀，重視從儀器和實驗中抽取理論。比如提出角度作為幾何學基本概念，並把它和測量儀器結合起來。在秦漢後兩千年數學著作中很少有人這麼重視的。「墨經」中的光學研究和槓桿原理雖然沒有發展到托勒密和阿基米德原理那樣完善的地步。但它的社會影響却比阿基米德來得大，墨家是顯學，有數以千計的學者在研究它。圖9所示的中國歷代科學技術水平淨增長統計曲綫中，春秋戰國理論轉化期對科學發展是有利的。墨家正是在社會結構的轉化中成為顯學。但是，當時並不具備原始科學結構社會化的條件。一方面，當時中國並沒有完善成熟的原始科學結構種子；另一方面，「大一統」技術也沒有具備。更重要的是當時存在着兩個和墨家一樣強大、甚至更為強大的競爭性示範體系。這就是儒家和道家。儒家一反墨家重功利倡兼愛的主張，對科學不那麼感興趣。道家雖然對自然充滿了神秘的詩情畫意，但却具備反技術和反科學社會化的傾向，特別是秦漢之後儒家依靠着它在新社會結構中獨特的作用一躍成為正統，與其相對立的墨家連同其中的科學一起受到抑制，最後消亡了，其門徒越來越少，他們在人們心目中的形象從科學家、賢者退化到游俠，甚至是鬼怪妖仙了。為什麼墨家不是儒家的對手會在競爭中失敗，這不是本文的論題。但有一點必須在這裡提一下，這就是墨家具有反宗法觀念，儒家則把宗法結構外推到國家，主張建立家庭與國家同構體。古代中國，宗法組織從來沒有像西歐中世紀那樣被高級宗教瓦解過，因此，墨家的失敗是可以想見的。從這裡可以看到，宗法家庭觀念和科學的天然對立。關於中國的落後宗法關係對科學發展形成的障礙，一直未引起



人們的足夠注意。

戰國時期科學失去了社會化的第一個時機之後，是不是再也沒有機會了呢？歷史對於科學來說是慷慨的。世界上沒有永存的思想體系，任何一種固定的社會結構總有衰落的時候。它總會與潛在的生動活潑的社會生活發展相矛盾，否定性放大效應會重新開動起來的。為此，科學必須在某一個階段內積蓄力量，並耐心地等待時機。到了東漢的中後期，曾三百年佔統治地位的儒學明顯出現了衰落的徵象。儒學走進死胡同，整個社會圖識迷信流行，繁瑣而虛偽的經學對知識分子的吸引力明顯減弱了。西漢建立後曾一度消沉的諸子百家學派又開始復活了。歷史學家把自東漢後期到魏晉初期看作一次小小的古代學術的復興。在這段時間裡，不少學者對法家、名家、道家發生了濃厚的興趣，甚至墨家也受到了重視。中國封建社會結構又面臨着某種變化。東漢中後期到魏晉前期，中國古代科學技術淨增長是一個巨大的高峰（僅次於北宋）。我們知道四大發明之一的造紙技術最後成熟於東漢，中國科學史上罕見的全才人物張衡就是這一時代的代表。他的渾天儀、星圖和地動儀幾乎成爲後世難以逾越的高峰。被日本科學史家譽爲中國的歐氏幾何原本的「九章算術」也成書於這一時代。表4的統計表明，東漢一反理論技術化的常態，其理論總分中技術總結只佔六%，這是出奇的低。這一時期理論總分不算很高（這是缺乏原始科學結構示範所致），但實驗總分之高却在歷史上是少見的（見表2）。這是一個關鍵性的時刻，長期遏制科學社會化的漢代經學衰落了，如果那含有豐富科學思想的墨家可能迅速壯大起來，對科學結構的成長是很有利的，但是這種局面並沒有出現，因此原始科學結構種子始

終沒有形成。東漢後期中國古代科學理論的發展是在自身獨有的示範體系下成長的。東漢末年，墨家雖然又活躍了一陣子，但很快又消沉下去了。科學發展又一次陷入低潮。

第一個原因是社會結構在轉化中出現了毀滅性大動亂。東漢滅亡後，中國封建社會結構發生了某種變化，伴隨着這種變化是整個社會處於長達百年之久的動亂狀態。歷史學家承認，這一次動亂是中國歷史上最最大的一次。原來東漢五千萬左右的人口到三國時幾乎只剩下一千萬左右。科學在動亂中所受到的浩劫當然可以想象。據「漢書·藝文志」記載，漢朝醫經有七家，共二百一十六卷，醫方十一家，共二百七十四卷，但經過動亂後，只有「內經」流傳下來了，其餘醫書全都失傳。今天我們只能在史書的傳奇般的故事中知道有華佗、扁鵲神奇的醫術。秦漢時期重要農書「汜勝之書」、「四民月令」等沒有一部被完整地保存下來。醫書和農書是古代社會化最廣的科學著作，其命運尚且如此，其他著作更可想而知。張衡的數學名著「算罔論」也失傳了。他製造的渾天儀原來放在東漢政府的靈台上，戰亂開始後，一再遷移，西晉末年，又被遷到長安，公元四一八年，劉裕軍隊攻擊長安，獲得這架儀器，已經殘缺不全，以後就不知下落了。至於地動儀，關於描述其完整結構的書也失傳了。據說南北朝信都芳還在「器准」一書中繪圖描述其製作方法。但今天人們根據現代科學分析做出其模型，在準確測定地震方法問題上，和「後漢書」的記載還有出入。實際上，這種社會結構毀滅性的瓦解以後曾週期性地出現。在社會週期性崩潰中，即使出現否定性放大效應，其成果都是難以鞏固的。

第二個原因是東漢末年時墨家又一次碰到

了比自己更強大的競爭對手，這就是道家思想。關於道家對科學的貢獻，中外科學史家有不同的看法。李約瑟認爲，道家比儒家更有利於科學發展。他認爲「道不迷物」是科學態度。道家和儒家等級觀念相對立，認爲一切事物都是研究的對象。無論是「螞蟻」「稻草」「磚瓦」甚至「尿」中都有「道」。他還認爲，道家的「無爲」是不違反自然的意思而有利於近代科學的。如果李約瑟的觀點是對的，那麼在一個道家佔主導地位的社會結構中，科學技術發展得比較快一些。圖9表明，在道家玄學相當興盛的魏晉南北朝，科學技術淨增長幾乎處於最低水平。其中理論水平變化不明顯，而技術水平和實驗水平比起大一統時期都低得多。這說明我們不能僅僅憑某一意識形態中的某些特定的部分和現代科學內容接近的程度來評價它對科學發展的作用，而應該去分析它的結構和示範的作用。道家具有強烈的反社會化傾向，他們歧視技術比儒生走得更遠，以至於反對技術應用於社會。科學實驗的發展取決於學者對工藝的興趣，取決於工匠知識向學者轉移，特別是工匠與學者結合的程度。儒生雖然不可能和工匠結合，但是官僚機構需要大一統技術，很多儒生不得不成爲大一統型技術的官方部門的管理者，所以儒生和工匠的接觸還是會導致科學實驗緩慢發展的。而道家的反技術態度和反社會傾向無疑比儒家更不利於科學實驗的發展。我們不能僅僅憑道家注重煉丹養生從事某些化學實驗就在總體上認爲道家有利於科學。

爲什麼道家比墨家思想在否定性放大效應中具有更大的競爭能力呢？關鍵在於儒家和道家之間形成了一種奇特的互補關係。也就是說，這兩種意識形態在價值觀、處世態度與社會

觀上相反，而在自然觀上却有相通之處。儒家主張有為，道家主張無為，儒家主張大一統，道家主張小國寡民，但他們都持有機自然觀。這種互補體系形成一種陷阱：使否定性放大作用的結果只在它們之間發生轉移和振蕩，有效地遏制了科學的示範。否定性放大是基於情緒上的反其道而行之的力量。由於道家與儒家互補，這種情緒上對儒家的否定無疑最有利於道家的成長。這就使得在否定性放大中道家的競爭性遠遠大於墨家。這樣，在東漢末年，加上外來的佛教衝擊和知識分子對朝政的普遍失望，就出現了「儒墨見鄙，而道家遂盛」的歷史潮流。否定性放大效應促使人們更多地用道家來批判儒家，而不是用墨家來批判儒家。對於科學發展來說，結局往往是一種錯誤代替另一種錯誤。東漢的王充自認為是站在道家立場上批判漢代經學的。確實，他的「論衡」是一部偉大的唯物論著作，但是他在對圖讖迷信的批判中居然把「渾天說」也否定了。王充反而去主張一種蓋天說中落後的平天說，認為「天平正與地無異」（「談天」），他說：「人望不過十里，天地合矣」，所以「視天若覆盆狀」。

「視日若上下然，似若出入地中矣」。（「說日」）這種在否定中把讎水和孩子一起潑出去的現象一直存在於歷史上儒道鬥爭之中。儒家對道家的批評也是一樣。歷代儒生、儒醫對道士煉丹長生和方術的排斥極為激烈，當然裡面有正確的成分。但是包含在其中的很多可貴成果也在這種批判中喪失了。

由於儒道互補體系的形成，當中國歷史上第三次社會結構轉化時期來臨時，即南北朝後期和隋唐之初，否定性放大效應直接把儒家思想推向正統地位，而墨家在道家玄學的衰落之中連影子也沒有出現。這樣，隨着中國封建社

會發展到唐宋達到其鼎盛狀態，雖然它也把為這種社會結構所限定的科學技術水平推向一個新高峯，但在這樣一種社會背景中却不可能建立近代科學結構。

## 十二、偉大的嘗試 與社會化的壁壘

中國科學史上一個可能成為轉折點的時期是明末清初，需要我們去認真研究。這是一個頗為特殊的時期，當時西方近代科學結構已在形成之中，並開始影響中國。如果說在這以前中國科學中原始科學結構沒有成熟並不能發揮示範作用的話，那麼到了明末，則已有原始科學結構的種子傳到中國了。分析這段歷史，可以為我們提供一個具有說服力的證明：近代科學結構必須有與其相應的社會結構。否則，即使近代科學結構在外部形成並對其構成衝擊，但是由於它沒有紮根的土壤，其示範作用就不可能發揮，社會化會因不可抗拒的壁壘存在而中斷。

在圖9中，我們看到中國古代理論峯只有兩個，一個在戰國，一個在明末。關於戰國的理論峯，人們自然會把它與百家爭鳴的時代聯繫起來，然而，在崇尚理學、一統專制的明代，科學精神是貧乏的，在這裡却出現了少有的理論峯，不是令人費解嗎？具體考察一下，明末的理論成果來自兩個方面，一是明末對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的大總結，如「本草綱目」、「天工開物」、「農政全書」等，另一方面是由於耶穌會傳教士把西方科學傳播到中國。前者標誌着我國古代封建社會結構包容科學技術所達到的飽和極限，後者表明了西方原始科學結構的種子和正在形成之中的近代科學結構對

中國構成了一次衝擊。

以利瑪竇為先導的耶穌會傳教士自十六世紀八十年代起陸續來華，他們一方面用儒家經典解說天主教的教義，想使人們感到天主教可以「補儒易佛」，另一方面則介紹西方科學技術成就，吸引士大夫階層中的企望改革之士的注意。歷來自以為華夏乃世界中心的人們，當看到利瑪竇刊刻的「萬國輿圖」時，頑固者搖頭疑其為杜撰，開明者則已敏感地覺察到古老中華的閉塞與落後，他們也就切望要迅速了解和掌握西方的科學。令人驚異的是，徐光啓這位先覺者一下子就抓住了西學的基礎和關鍵——「幾何原本」。他受到利瑪竇的啓示，認識到「幾何原本」是「度數之宗」……此書未譯，則他書俱不可得。徐光啓大呼此書舉世無一人不當學，堅信「百年之後必人人習之」。他還闡明「幾何原本」的基本理論和方法是整個科學技術的基礎（「不用為用，衆用所基」），以「一度數旁通十事」指出了數學與天文、氣象、測量、水利、音樂、軍事工程、建築、機械、醫學等領域的重要關係。與徐光啓齊名的李之藻則與人合譯了介紹亞里士多德邏輯理論的「名理探」（即邏輯學），李之藻強調「欲通諸學先須知名理探」，邏輯「為百學之宗門」，這樣，他們就把幾何學與邏輯學擺到了科學之奠基石的地位。這一切證明，當時中國已經有一小部分知識分子是意識到了原始科學結構對科學發展的示範作用的。他們也力圖發揮它的示範作用。

徐、李等人不僅僅是振臂而呼，而且是實幹的翻譯家、科學家 and 組織家。他們聚集了一支隊伍，與傳教士們合作著、譯了一批介紹西方科學技術的著作，如「幾何原本」、「同文算指」、「泰西水法」、「勾股義」、「圓容

較義」、「西洋奇器圖說」等等，掀起了我國歷史上第一次學習和翻譯西方科學技術著作的高潮。儘管介紹的內容並非都是西方的當代科學，但它已足以構成對中國傳統科學技術的衝擊。

徐光啓也許是第一個意識到必須把近代科學精神與我民族文化結合起來才能振興中國科學事業的先驅者，他認為：「欲求超勝，必先會通」。一方面他以巨大的努力整理祖國的科學遺產，另一方面他又要用「幾何原本」所包含的數學知識、基本科學原理和思想方法構築中國未來的科學技術大廈。在主持修改曆法的工作中，他提出的「基本五目」為「法原」（天文學基礎理論和球面天文學原理）、「法數」（天文數據）、「算法」（天文計算所必需的三角學和幾何知識）、「法器」（天文儀器）、「會通」（把中國傳統歷法與西洋歷法融會貫通，根據中國實測編新歷法）；在「農政全書」中，他收入了「泰西水法」；在軍事方面，他一再強調用新法練兵（重視先進火器）；在手工業方面重規技術改革和先進技術的推廣，提倡「聚眾力」（即合股）建廠房。我們可以設想如果按徐光啓所設想的那樣，原始科學結構能不斷在中國放大其示範作用，那麼中國也許會和西方差不多同時建立近代科學結構的。然而，科學是社會中的科學，科學技術結構的種子只有撒在適宜萌發的土地上才會萌發。徐光啓通過傳教士之手取得了種子，但他的脚却踩在那種子難以萌發成長的土地上。

徐光啓在譯「幾何原本」時就構想了以幾何學為基礎的大規模的科學發展「規劃」。後來由李之藻上書建議皇帝「敕下禮部，亟開館局」，「係有益世用者，漸次廣譯」。正像西方當年「幾何原本」示範作用的第一個目標那

樣，徐、李等人也首先着眼於天文歷法。明朝的大統歷是承襲元朝的授時歷，對日月蝕的預報早已不准了。明朝開國一百多年後就陸續有人建議改歷，但禮部答說「古法未可輕變，請仍舊法」，甚至還常提出「祖制不可變」（朱元璋批准的明朝歷法）來嚇唬人，明朝法律規定民間不許學習和研究歷法，而欽天監的天文官們已無人能掌握郭守敬等制訂授時歷時所依據的原理和方法，甚至南北兩京觀象台的天文儀器都擺錯了位置。利瑪竇憑借西洋書本上的知識即可預測日月蝕，欽天監的官員們却一籌莫展。當徐光啓、李之藻等人打算用西法改歷而發動宣傳攻勢時，又引起了守舊勢力的反感。這些人採取頑固的排外立場，以為帶來西方科學知識的傳教士們會像白蓮教那樣活動而釀成農民起義，徐光啓的計劃受到了沉重打擊。後來當批准徐光啓主持修歷工作時，這位七十歲的老人抱病組織隊伍、擬定計劃、參與實測，推荐李天經主持修歷工作（未因徐去世而使工作中斷），但在後來應該頒佈新歷時又受到反對派的百般刁難。到崇禎皇帝下決心頒佈時，明王朝也就在這一年的春天滅亡了。與「皇運」緊密相關的修歷工作尚且如此，又怎能指望充滿了「蠻夷」氣味的近代科學結構會順利移植到中國呢？徐光啓的努力是把近代科學結構引入中國的一次偉大的嘗試。這一次嘗試的失敗的原因很典型地反映了近代科學結構在中國社會化所遇到的巨大障礙。其中互補陷阱無疑是一個重要方面，當時王陽明的主觀唯心主義學說風靡一時，弟子遍及全國。很多儒生僅僅從儒學的另一互補結構禪宗中尋找出路。一個頗為典型的例子是當是驚動大江南北的具有市民文化傾向的進步思想家李贄，他早先是利瑪竇的朋友，但後因對天主教態度問題而到處

指責利瑪竇，他對徐光啓的科學思想根本不理會，晚年反而沉醉在禪宗佛學之中。這和西方人文主義思想家對科學的態度是大不相同的。當時西方科學是傳教士傳來的，文化背景的衝突無疑使很多儒生在否定基督教時也拒絕了其中心滲入的科學種子。這就使得無論徐光啓等先驅者怎樣宣傳近代科學，但其社會影響是很小時。西方科學只在一個很狹窄的上層官僚圈子中引起興趣。而且，在官方科學中它也僅僅局限於天文歷算、軍械製造部門。我們知道，明中葉後，中國出現了一批優秀的民間科學家，如李時珍、宋應星、徐霞客等等。非常奇怪的是，這些人幾乎不知道西洋科學的存在。

另一個原因是社會結構瓦解帶來的大破壞。明末否定性放大效應雖不很顯著，但是徐光啓等一小部分意識到近代科學意義的進步分子的出現也可以說是明王朝危機導致否定性放大效應的結果。清王朝建立後，由於與又趨於穩定的中國文化背景相衝突，這種放大受到遏制。隨着清朝太平盛世的來臨，幾乎再也沒有出現過能理解近代科學結構意義的知識分子。一方面大多數頑固派拒絕接受西方科學。清初的很多學者接過「會通」的旗幟，開後來「考據」、「復古」之先河。可悲的是，即使是有些思想進步的知識分子，也只看到西方科學技術的內容，却排斥了近代學結構。他們中很多人花畢生的精力去證明西方很多數學成果是中國古已有之，他們是想把西方科學知識納入中國的示範體系。我們知道，科學知識如果不在近代科學結構中循環加速地進步，舊有的科學技術成果是會僵化過時的。實際上中國近代科學史的教訓也正在於此。西方的解析幾何、微積分、力學和級數論介紹到中國並不晚，中國製造蒸汽機、望遠鏡也不遲。但是學者們完全把

近代科學結構給拋棄了。結果起示範作用的仍是中國的注經傳統。實際上，真正的中西融合是應考慮近代科學結構和中國文化背景的融合，去建立一種適應近代科學結構迅速成長的中國式的新文化背景。就近代科學結構來說，它集中了全人類的精華，既不是西方的，也不是中國的。

綜上所述，中國科學史上有四個可能促使科學發展的轉折時期，但又都因缺少轉化的條件而夭折，如果我們把這些具體原因一個一個孤立起來，它們沒有一個能成爲造成近代科學結構不能在中國建立的終極原因。但我們把這些原因綜合起來就會發現科學發展和社會結構整體性的內在聯繫。只要中國封建社會結構不改變，促使近代科學建立的完備條件的同時出現就是不可思議的。

### 十三、結 論

科學史研究可以分爲內部論和外部論兩大派，內部論強調科學發展的認識論邏輯，研究科學知識體系本身發展的必然道路。而外部論則強調科學發展的社會條件。本文中提出的假說則從整體上分析了科學技術發展中的內在認識論規律以及它們與社會結構的相互作用，把內部論與外部論綜合起來。我們從近代科學技術發展的循環加速規律出發，提出近代科學結構，並且提出它只有從原始科學結構通過示範作用社會化而建立，這主要是內部論者強調的方面。而文化背景和社會結構的轉化是通過一系列機制如否定性放大等等影響到原始科學結構社會化的，這是外部論者討論的範圍。我們的研究指出，沒有這兩者的綜合整體研究，要真正理解中國十七世紀科學技術落後於西方的

原因是不可能的。

近代科學結構成長的歷史表明，近代科學技術不是屬於哪一個民族，哪一種文明的。它是全人類文化精華的產兒。但是，適合科學結構成長的條件却是隨着文化不同而不同的。

近代科學結構之所以出現於西歐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轉化之交，這只是當時全人類所創造的科學精華在那裡會聚的結果。近代科學並不是資本主義所獨有的，而且隨着近代科學進一步發展，它在資本主義文明中也會趨於自己的極限。如果偉大的中華民族終於在痛苦的歷史反省中認識了歷史，在科學的研究中認識了科學，那麼她就可能接過現代科學的火炬走向繁榮發達的新起點。（原載陝西科技出版社《科學傳統與文化》一書）（續完）

### 註 釋

① MORRIS KLINE: 「數學史——數學思想的發展」，九章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出版，上冊，第一八四頁。

② 喬治·伽莫夫：「物理學發展史」，商務印書館，一九八一年七月版，第七一十六頁。

③ 陳久金：「張衡的天文學思想」，科學史文集，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第6輯（一九八〇）。

④ 紐仲助：「我國古代天文大地測量發展及取得成就原因初探」，一九八〇年全國科學技術史會議論文。

⑤ MORRIS KLINE: 「數學史——數學思想的發展」，九章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上冊第一九三頁。

⑥ 小林恩·懷特：「是什麼加速了歐洲中世紀的技術發展」，譯文載「科學與哲學」，自然辯證法通訊雜誌社，一九八二年第一輯，

第五五頁。

⑦ 周一良、吳于 主編：「世界通史」中古部份，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第二一〇頁。

⑧ G·F·穆爾：「基督教簡史」，第一八三頁。

⑨ W·C·丹皮爾：「科學史及其與哲學宗教的關係」，商務印書館（一九七五），第一四三頁。

⑩ MORRIS KLINE: 「數學史——數學思想的發展」，九章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上冊，第二三三頁。

⑪ 戴內清編「宋元時代之科學技術史」，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一九六七），第廿五—廿六頁。

⑫ 斯蒂芬·F·梅森：「自然科學史」，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第八九—九〇頁。

⑬ 參見丹皮爾：「科學史及其與哲學和宗教的關係」，商務印書館（一九七九），第一四五—一五〇頁。

⑭ 斯蒂芬·F·梅森：「自然科學史」，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第一六二頁。

⑮ 本文的作者之一也對這個問題從認識論角度進行了分析，可參見金觀濤、華國凡：「認識論中的信息和反饋」，「自然辯證法通訊」，一九八二年第三期。

⑯ 貝爾納：「歷史上的科學」，科學出版社（一九八一），第一一四頁。

⑰ V·朗奇：「視覺科學發展中的複雜性、進展和設想：正在發現什麼？」，「科學與哲學」，自然辯證法通訊雜誌社，一九八二年第一期，第六二頁。

# 改革派之堅決性

## 與民運當務之急

(澳洲社會科學院院士) 黃有光

### 前言

我在「中國之春」第二十三期(一九八五年五月)發表了「從市場經濟談到民運當務之急」一文，論及市場經濟不但有助於經濟發展，並且能為民主政治提供有力的經濟基礎，因而主張中國民主運動當前應該着重打擊保守派，支持改革派的進步改革，確保走向市場經濟與自由企業的改革的完成，而不應在現階段就着重反對當權改革派在民主、法治、自由、人權等方面的缺點，造成「欲速則不達」的結果。限於篇幅，這篇文章的許多論點，祇是概括性地提及，未能深入詳細論述。從本文開始，希望對若干論點，作進一步闡述。本文從中國當前基本矛盾及改革派是否有把握經濟甚至政治改革進行到底的堅決性的問題，談及民運現階段應着重的一些具體措施，與大家磋商。

### 一、中國當前之基本矛盾

據中國當局的說法，中國當前的基本矛盾是人民的經濟需求與生產力相對落後之間的矛盾；其解決辦法是提高生產力，實現經濟現代化。這說法雖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經濟需求與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可說是盤古開天以來全世界各國都存在的矛盾，即使是像美國、日本生產力很高的國家，也還是不斷在設法提高經濟生產力。所以這個矛盾并不能概括和反映中國現階段的特點。

在發表於「爭鳴」一九八四年十一月號的「中國自由化前景」一文，我提出說：「中國現階段的基本矛盾，乃是人民和政府對現代化的要求與一個管制嚴密的經濟、政治體制之間的矛盾」。這矛盾表現在下列相互關係的幾個方面：

第一是既得權益者與新興經濟力量之間的矛盾。經濟與政治之管理與控制，必須有一個龐大的官僚機構來執行。這些官僚掌握着很大的權力，並享有不小的經濟利益。而經濟的改革，必須擴大市場管制的調節範圍。這不但在農村之責任制是這樣，在最近開始實行的城市經濟體制改革也是這樣；政治的改革，要求縮小官僚機構，並取消職位終身制，逐步採用選舉制。因此，許多官僚機構，對改革政策，陽奉陰違。

第二是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之間的矛盾。爲了提高生產力，使產品能符合人民之需求，必須擴大生產者(包括農民、企業、與個體專業戶)在生產決策上的自由，並由市場調節生產與消費。但這就影響到經濟之「計劃」性，尤其是指令式的計劃。

第三是爲其經、政體系服務的思想體系與思想、文藝自由化之間的矛盾。這種矛盾反映「白樺事件」、「反精神污染」、「人民日報批馬與更正」(見「中國之春」二月號董旭生的文章)等著名事件。

第四是中央領導集團之間的改革派與保守派之間及中央與民間民主運動之間的矛盾。這些派別，一方面反映不同階層的利益，一方面反映對上述幾個矛盾與其解決方法的不同看法。

上述幾個矛盾面，皆源於其經、政體制與現代化之基本矛盾。不過這幾個矛盾面，又互相關聯，互相影響，並左右着中國現階段的發展。(此段乃根據上述「爭鳴」一文改寫。)

### 二、改革派之堅決性

中國民主運動中，對中國中央領導有同的看法，大體說可分爲兩種。一種認爲中央領導之所以進行改革，乃是被迫於不得已。一九

五五年之後，毛澤東把全國推入社會主義之體制，由於這體制遠遠脫離生產力水平，造成不可避免的問題，加上「反右擴大化」、「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運動，把全國搞得經濟落後，政治不民主，人民產生「三信危機」。毛澤東死後，若不改革，可能政權難保，祇好進行改革，希望在經濟方面緩和和人民不滿之情緒，以延長政治壽命。有這種看法的人，認為民主運動不能對改革派產生幻想。但一旦改革派政權一穩，就對民主運動開刀。民主牆之被禁與民運人士之被捕，應該給民主運動一個教訓——不能信任或依靠改革派。這一看法也認為改革派並不會徹底改革，最多祇能在經濟上作有限度的改革，不會貫徹到政治上的自由民主化。有這種看法的人士，有主張把改革派祇稱為「改良派」(例如「中國之春」二月號王驚蟄的文章)。

另一種看法認為改革派有真心甚至有能力進行相當徹底的經濟改革，甚至可能導致政治上的自由民主化。有什麼理由能給我們對改革派有這麼高的信心呢？

第一，改革派如果祇是為了延長統治壽命，進行農村改革已經足夠了，實在不必再進行城市經濟體制改革。中國人口百分之八十在農村，近幾年來的農村經濟在改革後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人民大體上沒有太大的不滿。這一方面是因為這幾年的情形，比起改革前在各方面有很大的進步，一方面是因為中國人民向來沒有很大的要求，祇要不置之於死地，很少人會造反。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與改朝換代，都是統治者腐朽到了極點，加上自然災害對生產的破壞，造成饑荒的情形下才發生的。現在雖然有少部份知識份子有了自由、民主、法治、人權的新思想，對當政者有較高的要求，但還不能普及到工、農大眾，還不能對政府造成政權上的直接威脅。改革派祇要維持現狀，可以高枕無憂，實在不需要冒着與保守派開戰，

及冒着城市經濟體制改革而可能引起的混亂的危險，進行有相當深度的改革。

農村經濟改革，雖然影響到的人數(農民)比較多，但城市經濟改革，其涉及面比較廣，比較重要。農村經濟改革對既得利益者的影響，主要祇是削弱了一些縣、鎮黨委書記的權力。由於國家與黨幹部多數集中於城市，城市經濟改革可能會打擊到更多人的既得利益。價格體系的改革，又可能帶來暫時的物價上漲和人民搶購的現象。改革後各個企業擁有相當大的自主權，是否會出現新的問題，也是不能肯定的。改革派如果沒有堅決性，實不應有城市經濟體制改革之出現。

第二，從改革的步伐上看，也可看出改革派有真心進行徹底的改革。在相當短的六、七年間，改革派接二連三推行了許多改革措施。如果是被迫非改不可而改，應該不會有這麼快的步伐。

第三，從一些改革的大膽程度上看，也可以增加我們對改革派的信心。近年來開放得相當多，一個例子是讓大批的學生與專家到海外資本主義國家留學與進行學術交流等，包括人文學科上的。這些留外人士回國後，不免要帶回自由、民主、法治、人權的思想。改革派敢於實行這些開放政策，應該是有進一步繼續經濟上甚至政治上的改革的決心。

第四，從一些改革所可能引起的長遠影響來看，可以推論改革派並不祇限於經濟上的改革。上述城市經濟改革與留外學生都是很好的例子。改革派也讀過馬克思主義關於經濟基礎影響甚至決定上層建築的學說，他們應該會看到許多經濟上的改革會導致政治文化上的變革。

第五，從現有改革的範圍上看，也必須承認已超出純經濟上改革。例如有些地區推行比較民主的選擇，選人民代表用比較民主的方法，這是初步的民主改革。不久前召開的第四次作家協會全國代表大會不但採用了相當民主的

選舉，而且允許作家自由選擇寫作題材，保證創作自由。這個自由雖然還是有限度的，但比起以前，已有很大的擴大。

第六，從改革派領袖的言行，可以推測改革派的堅決性。尤其是胡耀邦與趙紫陽，敢作敢言，有些地方甚至超過人們原來想像的地步；有些地方甚至可說是開放得太過份(例如對西裝的鼓勵)。人民日報去年十二月七日「理論與實際」的「批馬」文章，據說後台就是胡耀邦。根據「中國之春」二月號董旭生的文章說，胡耀邦去年底在各省市宣傳部長工作會議上說，馬克思當年所寫的著作，不能照搬用來解決今天的問題，不能要求馬克思當年所說的一切都適用於今天的情況。這原是很合理的說法，但在中國奉馬列為神明的情形下，這是一個大膽的突破。另外，據「鏡報」二月號白丁的文章，以胡耀邦為首的中共中央書記處，在去年年底為作家協會的召開，舉行了一次重要會議，認為「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提法不恰當，應反對的祇是資本主義的腐朽思想和封建遺毒，並不反對自由，更不許給要求自由的人亂扣帽子。「中國之春」去年十二月號的國內快訊也報導了趙紫陽和鄧小平的自由開放觀點。據這個報導，趙紫陽主張實行市場經濟(雖然還是社會主義)，由於和保守派的妥協，才達成三中全會的半市場計劃方案。

第七，改革派現在還得向保守派作鬥爭，而且鄧小平去世後，改革派是否能控制住保守派，還是一個問題。在這樣的環境下，改革派已經敢於做到現有的成績，可見其堅決性。如果保守派勢力基本上消失後，改革派能放手大幹，一定會做得更有聲色。

從上述七點因素看來，我認為以鄧、胡、趙為首的改革派有貫徹經濟、政治改革的堅決性。不過，由於馬列主義框框的局限、保守派的阻撓、官僚既得利益者的陽奉陰違，有些改革不能順利進行，有些地方不得不妥協。加上



今日大陸為改革服務的宣傳畫。

中國長期以來專制制度的餘毒，在自由、民主、法治、人權上還遠遠未達到理想的目標。當然，以現在分析，改革派有其改革的堅決性，并不能肯定改革派將來不會改變，也不是說現在改革派沒有錯誤的地方。對這些錯誤的地方與將來可能的改變，民主運動可以加以批評。

### 三、經濟改革為什麼有助於自由民主化？

當前的經濟改革，有助於提高生產力的發展，因而能為政治民主化提供經濟基礎。普通人民在生活上掙扎時，着重在維持三餐，很少注意政治上的民主。其次，生產力發展後，教育水平之節節提高，也能使更多的人注意政治、要求民主。目前經濟改革的一個要點是擴大對市場機

制的應用。這不但能提高經濟效益，通過生產力之提高而促進自由民主化，也減少了官僚機關之管理範圍。

進一步的經濟改革，應該是給人民更多經濟自由，包括就業自由與企業自由。這不但能搞活經濟，減少失業，減少人材資源的誤用，而且可以為自由民主化提供經濟基礎。在沒有工作自由的「計劃經濟」(實際上是配給制)下，每個人的工作由國家分配。在這種情況下，除了少數敢於冒生死的義士之外，多數人為了飯碗問題，不敢反對當權者，甚至不敢得罪上司。在自由企業的情形則不然，如政府不僱用，我可以在私人企業工作。上司不喜歡我，我可以到另一家企業工作。這就是自由企業、自由競爭對民主的重要性。

經濟改革的結果，為了適應新的環境，政府不得不給人民較多的自由。例如以前農民被死困於農村，不能進入城市為居民。現在專業戶與農民商人的湧現，乃有允許農民穿州越縣的自由化。將來商業更發達，商人在各城鎮往來頻繁，而且時間寶貴，不但會對每一個地方必須向派出所報戶口的制度提出異議，派出所本身也可能有應接不暇的情況，因而可能要減少這些管理和控制。

經濟改革的成功，將會造成大批企業家、專業人士、專業戶、個體農民、知識份子階層的形成。這些新興階層，有其階層之經濟利益，就會有為其階層經濟利益服務的代言人出現，在政治領域活動，這樣就會造成政治上的多元化，有助於民主化的實現。這些代言人為了其階層的利益，會要求民主化，以方便其政治活動，並使之能起真正的作用。這種情形，出現在西歐資本主義興起時，導致後來自由民主化的成功。中國孫中山及其後人之民主運動不能成功，雖有其他原因，但是經濟基礎不夠，應該是主要原因。現在民主運動要能成功，首先必須確保經濟改革之徹底完成。

### 四、民主運動當務之急

根據我上述對中國當前基本矛盾和對改革派之堅決性的分析，我認為民主運動當務之急是打擊保守派，支持改革派，確保走向市場經濟與自由企業之完成。中國現階段的矛盾，既然是人民和政府對現代化的要求與其經濟、政治體制之間的矛盾，其解決辦法應該是對這個體制進行徹底的改革。既然當權的改革派有進行徹底改革的堅決性，民主運動應該支持其改革，打擊反對改革的保守派。等到經濟體制改革基本完成，新興經濟階層(企業家、個體戶、專業人士、知識份子等)成長起來，就有基礎進行進一步的政治改革。到時如果現在的改革派還能繼續進行適度的改革，則民主運動可以支持新的改革派上台，以期最終實現自由、民主、法治、人權的目標。

根據上述基本方針，現在談談一些具體措施。

第一，中國民聯之機關刊物「中國之春」應該着重發表打擊保守派的文章，在對改革派的評論時，措詞上要溫和，採取批評、討論的態度，而不是鬥爭打擊的態度。這並不是說民運承認當權者的「江山天授」，祇能充當統治者的諫臣，而是民運在現階段所採取的策略。

第二，應該鼓勵留外學生，尤其是公費留學生，除了少數須留在海外負責民運工作外，學成之後，應該回國工作，在工作上、言論上打擊保守派，支持改革。

第三、「中國之春」可以繼續發表介紹自由、民主、法治、人權的思想，及批評中國在這些原則上所犯的錯誤與缺點，以期將來在這些方面能有更大的進展。但另一方面，應該設法出版改革派能夠接受的刊物，以便在國內能得到更多的讀者，支持改革，介紹自由民主思想

的工作。這個刊物不一定要中國民聯直接負責。

第四，民運應該協助改革派，揭露與批判一些黨政軍機關與幹部濫用職權以謀私利。這種濫用權力與私人謀利的結合，可能使改革的結果，走不上自由經濟（自由競爭、自由企業、市場調節）的大道，變成類似國民黨時代的官僚壟斷資本主義加上「公」有制。由於這結果同樣不能給中國帶來真正的自由民主，民運必須加以注意。關於改革派應該如何剷除濫用權力的歪風，見敝作「如何剷除歪風？」（希望發表於「爭鳴」五或六月號）。

第五，在批評中國當局時，需要考慮到中國的具體情況。例如近年來之取締犯罪運動，由於其「運動」性及急於求成，另一方面由於法治基礎之薄弱，在執行的過程中，不免有一些違反法治與人權的地方，甚至有一些冤案錯案。但是犯罪事件之增加，若不從速加以制止，不但為害無辜人民，造成社會不安，影響生產與分配之正常操作，而且可能給保守派作為反對改革的理由，使改革難以進一步推行，甚至會開倒車。以我估計，鄧小平的反罪犯運動，在國內得到廣大人民支持，尤其是一些高幹的不肖子女被判重刑時，全國人心大快。對這類措施的批評，如果太過份，民運會有減低國內人民支持的危險。

第六，在國內一方面宣傳自由民主思想，一方面攻擊保守派，但更重要的是進行確保改革能進行到底的工作。在最近，這主要在於鄧小平是否能成功地把握最高權力（尤其是軍權）轉交給胡、趙等改革派領袖。民主運動在這方面所能起的作用可能是通過軍隊高幹的子女，影響高幹轉向改革派，或者至少保持中立。希望國內民運份子着重這方面的工作。

第七，當中國政府採取在民主化上開倒車

的行動時（例如取締西單民主牆、逮捕魏京生等），民運在海外可以示威反對，尤其是向中國大使館示威。但在平時，尤其是在像慶祝春節之類的活動上，應該避免反中國政府的活動。這個區別是因為民運一方面要施壓力使中國朝向民主化，一方面要在改革派還在進行進步改革時，避免過份打擊其在海外的形象及避免造成與改革派太大的分裂。

## 五、結語

我上述論點，未必完全正確。事關民主運動的策略方針，希望其他讀者共同討論。

記得「中國之春」開始出版時，負責人聲言要用和平的方式爭取自由、民主。我認為這是明智之選擇。第一，中國沒有實行武裝改革的條件。第二，武裝改革給人民帶來太大的損失，非不得已不用之。第三，武裝革命成功後，絕大多數（如果不是全部）成為新的專制制度，自由、民主的目標也一樣落空。這一方面是因為計劃經濟要求控制。

既然是要和平的改革，一方面要進行民間的宣傳，一方面要爭取當權者中的開明派，并設法影響其對改革之徹底進行，而不是在現階段就與之對立。

## 後記

本文寫於二月間，當時正傳出作家協會關於允許創作自由的消息，令人振奮。最近讀到在「人民日報」四月十四日所發表的胡耀邦關於新聞工作的長篇講話，覺得有對本文之樂觀程度作一些修正。

胡耀邦認為文藝方面所講的創作自由不適

用於新聞工作。新聞工作者必須在黨中央的統一領導之下，按照黨的路綫、方針、政策工作。新聞事業的自由，必須是限於「合乎中央的路綫和政策」之下的自由。更重要的，胡耀邦說，「無論進行什麼樣的改革，都不能絲毫改變黨的新聞事業的性質」。也就是說，在胡耀邦看來，改革之終極，新聞事業選祇能是黨的御用工具，祇有宣傳黨的路綫和政策的自由，不能批評中央的路綫和政策，不能起着自由民主國家不可或缺的自由輿論對執政者的制衡的作用。即使黨中央把國家推入像「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浩劫，「仍然祇能依靠黨和人民的集體奮鬥」，而不可能依靠輿論自由來防止。

作家協會也包括一些新聞工作者。在作家協會中強調創作自由，我還以為中國輿論自由前途有幸，現在談到向以開明、敢改革聞名的人物胡耀邦總書記之上述反輿論自由之談話，不能不令我對本文的樂觀程度，及本人對改革派之期望程度，作一些修正。看來除非是在改革的洪流之衝擊下，在民運帶動下之人民力量之迫壓下，改革派本身還未具有本文所述之堅決性程度。

本文之樂觀程度雖然需要修正，但本文的主要論點，我認為還是成立。大體上改革派還在進行進步的改革，經濟改革還是有助於政治之自由民主化的，民運在現階段還是應該協助改革派，打擊保守派，確保進步改革之進行的。不過，我原以為改革派即使不在民運與人民力量的推動下，也可能進行相當徹底的經濟政治改革。這個期望，看來很難實現。這使民運必須負起本文所想像的更大的任務。雖然本文第四節所論述民運當務之急各點，都沒有修改的必要，但在捍衛與促進自由、民主、法治、人權的工作上，不能鬆懈。



# 代丟「國格」

(中國大陸留學生·法國) 林 娜

上個星期六下午照例去使館教育處一遭。教育處的某個領導說：這裡就是你們的「家」，要經常來。但大家對這「家」似乎並沒有什麼感情，雖說同學們學習都很忙，可又不能長久不去，我們還是拿的中國政府的獎學金，當然去了還可以免費看次電影。

看完電影又遇到了在教育處工作的Q君，他把我拉到一邊說：「小林，你明天幫我買去PORTE DE MONTREUIL（巴黎最大的舊貨市場）買幾件衣服，一件西裝，一條褲子，毛衣也買一件，要便宜的，這個月錢不多了，我給你一〇〇法郎（約十元多美元）。」你自己去不就行了，我哪有時間跑舊貨市場呀！我還有兩個多月就要考試了，「我不情願地說，他看不願去，又解釋說：「你不知道，現在上面有規定，使館人員一律不許去舊貨市場，說是我們老丟了『國格』沒『面子』，被外國人笑話。」我看他那樣子也是怪可憐的，當然也不好拒絕，就接過了的一〇〇法郎，再說Q君時常還幫我在教育處辦點其他事；他既

然去了怕丟「國格」那我只好代「丟」了。

記得我剛到巴黎時同學們首先帶我去的就是舊貨市場，說是買幾件便宜貨使我「洋化」一下，在那裏有時幾個法郎就能買到很合適的衣服，這樣當然就是許多留學生和使館人員光顧的地方了。現在這位Q君冒出來個去了怕丟「國格」，確是使我有點迷惑不解。

中國駐法使館是我國駐西歐國家最大的使館，有大使館本部、領事處、商務處、文化處、教育處，還有駐國際機構的代表團和民航的辦事處，人員有好幾百，但他們工資却低得可憐。大使、公使只有四千法郎一個月，還沒有達到法國政府的最低工資標準，一般的工作人員也只有二千八百法郎，還要交伙食費，大家還要省錢買「八大件」帶回去，舊貨市場自然成了他們常去的地方，要不然怎麼省錢買彩電、錄音機等呢？不買這些回去對家人朋友也不好交代，現在使館把這樣的方便也取消了，并且以冠冕堂皇的理由說是去了怕丟「國格」，這聽來使人可笑。的確，中國相對西方國家來

說是要落後些，駐外使館人員工資低一點也是可以理解的，但用這種打腫臉充胖子的手法去掩飾使館人員的真實情況確是不明智的，難道說使館人員不去舊貨市場就保住了「國格」嗎？用這樣的辦法去保住這樣的「國格」才是可笑。國內一直都在提倡實事求是的作風，我看駐法使館在這方面採取一就是一，二就是二的實際態度比這怕丟「國格」的規定要好得多，一個國家的國格不是偽裝就能有的，真正的國格是應表現在對祖國的熱愛上，而決不是去了舊貨市場就沒有「國格」。

使館這樣的規定雖然使工作人員不能去，但他們可以叫留學生或進修人員幫他們代買，而且許多來訪或路過巴黎的各種代表團也都要去轉一轉，要不然他們手頭一點有限的錢能買什麼呢？所以在舊貨市場時常可以看到一些中國人穿着同色同款的國產西裝，來回地走動。有一次有個賣衣服的法國人操着法國腔的中文和我打招呼說：「你好！這個，便宜，十個法郎。」我還以為他去過中國，結果他告訴我許多中國同志來這裏，他已和中國人很熟了。他說：你們有些同志買幾十個法郎的衣服會把我的攤子翻個底朝天，他們真的很會買東西。是啊！許多人出國一次不容易，不帶點東西回國怎麼說得過去呢？要買東西也只能買些便宜的舊貨了。當時我真想問問這個法國人他在這裏賣東西是不是丟了法國的「國格」，但最終還是沒說出口，我怕說出來他會懷疑我神經是是否正常。

出了門，我想，大使館的人不能丟「國格」，他們只能托我們留學生代丟「國格」了。可是，什麼是「國格」呢？建國三十多年了，是誰真正丟了「國格」呢？

一九八五、四、廿二于巴黎■

# 糾正「不正之風」有感

(中國大陸留學生·法國) 林 娜

每天下課回來的第一件事就是開信箱，看看有沒有信或報紙，國內寄來的《人民日報》我每日必讀，雖然報紙到我手裏已遲到了四、五天，有的新聞也成了舊聞，但我還是每條消息都仔細看一遍，要不國內的動態不知道，回去以後思想可跟不上「形勢」了。

近來的報紙一直在報導糾正各種各樣的「不正之風」，並且中央對糾正新的「不正之風」又是開會又是發文件的，似乎這股「不正之風」是關係到改革成敗的問題；但當我把幾種所謂的「不正之風」仔細分析了一下，對這樣的糾正法頗為不解。現在談一談自己的看法。

在國內生活了近三十年，我感覺到中共的「運動」從來沒有停過，不是今天反這個就是明天批那個，反正大家總有開不完的會，學不完的文件，但到最後各方面還是問題成堆，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什麼。這幾年雖說要比以前好些了，但時常還是搞一些不稱運動的「運動」。我想這次糾正「不正之風」也應是這種「小型運動」之一吧。

中共成立以來一直不斷的在整黨，從毛澤

東的黨內十次路線鬥爭到「四人幫」整鄧小平，華國鋒的第十一次路線鬥爭（整倒「四人幫」）再到現在的鄧小平的整黨是越來越激烈，整到最後是大家對共產黨越來越沒有信心。現在的整黨已到了第二階段，整肅的範圍實質上已從黨內擴展到黨外，胡啓立在「第二期整黨工作會議」上說：第二期整黨突出任務就是糾正「不正之風」，而這些「不正之風」主要是黨政機關、幹部以權經商；違反物價政策亂漲價；濫發錢物；隨意提高工資；用公款請客送禮；還有濫發彩券和搞有獎銷售及不健康的小報也在此內。這些做法有的確應制止，像幹部以權經商辦企業等，但決不是與師動眾的開會，發文件這種方法就能解決的，而要分析一下產生這些問題的原因及社會背景，再根據法律條款或制定法律去解決。像黨政幹部以權經商、辦企業，在現在人人向錢看的社會裏，黨委書記難道就不抓錢嗎？他也會利用手中的權力搞點錢裝自己的腰包，不然黨委書記豈不是太傻？像許多人工資提高很快，要買的東西就自然多了，而國家許多規定的物價又沒有正確反映產品的實際價格，也跟不上工資的增長率，

能賣的東西又滿足不了人民的需求，那物價自然會漲，物價一漲工資不夠又加，導致了惡性循環，現在財經權力又下放，有些單位乘機可以巧立名目，給職工各種獎金，補貼。打通這些關節了，這一系列的問題也不只有中國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也同樣有，但從來沒聽說要開會發文件來解決，都是在法庭上解決，像日本前首相田中接受賄賂是在法庭上審判他。在西方亂漲物價會有消費者公會告到法院，西方做生意也一樣要請客送禮，所以這些問題的存是在是正常的。在中國目前的經濟改革中出現這些問題是難免的，出現了問題，用不着就大驚小怪，更不能因噎廢食的怪改革不好，而是要分析原因，找出根源，用合理的方法去解決。至於說發彩票搞有獎銷售也是「不正之風」那就不合情理了；發行彩票對發行彩票的國家、單位都能帶來一些經濟收入，老百姓買幾張彩票也不會對生活有什麼影響，如果中了彩得到一些錢物又有什麼不好呢？世界上許多國家都有彩票，像法國的六合彩（LOTTO）頭獎有時上千萬，國家也從中抽稅得益不少。有什麼「不正之風」可談呢？像「不健康」的小報也劃分到「不正之風」內就更說不過了，像這種東西不管怎樣禁止也有人會通過各種辦法找來看，不喜歡的人就是書店裏賣也不會買來看，出版物也可以根據出版法來解決問題，再說國內的這類小報離真正的「不健康」相距還是很大的。

總之，這些問題決不能用「運動」去解決，現在是在搞建設，不是在打仗，更不能從某個領導人的喜愛去做。中共建黨幾十年的時間裏這類教訓太多了，如果現在還按老一套去做，那要使改革達到國富民強的目的確使人不得不打幾個問號。

# 從「高薪挖人才」所想到的

(中國大陸研究生·加拿大)

劉田剛

從最近在北京召開的六屆人大和三屆政協大會上代表們的發言中，我們聽到一陣陣對目前私營企業以「高薪聘請」的方式向國營企業爭人才挖牆角的新形勢的抱怨聲。

我一直在納悶兒，這場荆棘叢生的改革中，從前視如洪水猛獸的資本主義，今天要施展拳腳。很多人要歡欣鼓舞，而另一些人要拼死抵抗才對，怎麼竟如此「輿論一律」地「國人皆曰善」？現在想來，原因可能是這樣的：前幾年，私營企業規模小，勢力薄，經營的不過是飯館、旅店、服裝廠、個體運輸戶這樣一些資金少勞力密集的小企業。它們的興起，當然地觸及了一些同行的國營「小霸王」，因之報上常常可以看到強行拆除生意興隆的私營飯館、小店，或主管部門拒發營業牌照一類的消息。這不奇怪，在競爭的壓力下，日子是要難過得多了，一些人要「發」起來了，另一些人就要惱火。但這問題不大，還是受益的人多，又是大勢所趨，人們還不擔憂。

現在不同了。私營企業（或社隊辦的集體所有制企業）在賺錢、擴大再生產和開拓新市場的速度和膽識方面，正在顯示出從未見過的活力。短短幾年時間，它們現在的資金規模已經發展到了可以生產冰箱、收錄機、鋼琴、醫藥這類技術資金密集型產品的時候了。具備了這樣的條件，下一個目標當然是人才和技術。這時候，人才對它們來說意味着生存、進展和

發財。它們不惜用令人咋舌的高薪去籠絡人才。到哪裡去找呢？當然只有到國營大企業去「挖牆角」。據朋友來信說，城裡的技術人員現在被聘到郊區社辦廠月薪二、三百元已是常事，個別有達五百元的。

於是乎，國營企業「人心思去」，「正常生產也無法維持了」，人大政協的代表們這樣抱怨說。有些人甚至要求「中央應該有個規定」，也就是要阻止這種趨勢蔓延。他們的理由是：「鼓勵人才合理流動應該是從那些人才過剩或用非所學的單位，流向可以發揮作用的地方。」而從「可以發揮重要作用的地方」調走，則是「不合理」的。據說上海鋼琴廠，四個主要技術人員被高薪挖走，生產已陷於停頓。而目前鋼琴市場上需要量極大，價格上漲，供應遠不能滿足要求，正是私營企業大展身手的好機會。

與前面提到的服務行業的「小霸王」的牢騷比起來，這些代表們的意見來頭就大多了，他們代表的是現行體制下養尊處優了幾十年的一整個受益階層，在他們看來，知識分子技術人員，能夠「合理使用，正確對待」，已經是好的面子了，現在竟有人給他們更高的待遇，豈不是讓他們「踩着鼻子上臉」，以後還會把我們放在眼裡！飯館旅店嘛，搞搞可以，補充補充。怎麼竟搞到我「影響國計民生」的大企業爭高低來了？上面再不下規定，社會主義還怎麼打得過這些討厭的資本主義？

如果上述人大政協中也有私營企業和「不合理流動」的人才的代表的話，他們肯定會對這些牢騷發出異議的，他們會理直氣壯地說：高薪挖人才，有什麼不好？不如此，你們會知道技術的價值、人才的寶貴嗎？他們為什麼要挖走技術人員？怎麼不去挖書記，挖黨員，挖「共青團積極分子」？「黨的領導」不是「決定一切」的嗎？怎麼我們幾個人走了，「生產就無法正常進行」？那麼書記呢？廠長呢？政工呢？都是吃閒飯的？早知如此，就該坦白呀！「他們在廠裡都發揮重要作用」，你們原來也知道？廠裡蓋的好房子是書記廠長的，調查提幹入黨作官是你們的親信的，出風頭的是黨政工青婦幹部的，得實惠的是上下逢源的，你們何曾想到過我們？我們的成績，你們說「在黨的領導下取得的」，是「集體的功勞」，我們的工資並不比別人多一塊，現在這些我們一點兒也沒帶走，你們還可以再做「更大的成績」呀！「第三梯隊」，你們選了不少人，據說都是「有才能，信得過」的。現在好呀，讓他們去幹呀！「正常生產無法進行了」？舊的不去，新的不來，沒有壓力，你們會想到改革嗎？你們以為已經把我們「合理使用」了？等着瞧吧，我們還要在新地方，幹出一番你們想也不敢想的大事業哩！

可惜的是，現在這些人還無法讓人們聽到他們的聲音。但對這個問題，我是樂觀的，只要經濟開放的方針繼續下去，他們的人數會由小變大，經濟實力也會增長，他們遲早會在政

治上找到他們的代言人，在國家論壇上，發出他們的聲音。

客觀地說，現在的改革形勢還是不壞的，標誌之一就是改革已經從文件報刊上，變成了人們的強烈願望。他們從私營企業高薪挖人才，消費品生產的超豐富這些現象上，已經感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強大生命力，「優越」的社會主義體制在它面前顯得多麼落後、虛弱、可笑。人才和技術一旦衝破了束縛，又可以變成多麼巨大的物質力量。

從前我們曾擔心，搞活經濟會不會只限於農村和城市個體戶？因為直覺告訴我們，城市經濟改革，阻力實在太大了。它直接觸犯着從街道委員會、黨政工團幹部到廳局部軍隊上層直至中央政治局的大小小人數在千萬之眾的官吏們的利益。搞活農村經濟，不高興的只有大隊長、公社書記之類，因為他們的威嚴已不復以往了。而城市改革，上述所謂階層的黨政官員的利益都要觸到，而且牽一髮而動全身，沒有哪一個部門可以單獨激進而牽動全局的。這些人要是聯合起來側目相向的話，改革的力量則相形之下難以樂觀。

今天我們看到了另一種力量，它來自城市機關企業內部，來自技術人員、職員、工人的力量，人民的力量，出自他們切身的利益。在新興的農民企業家面前，他們原來那種「比不上不足比下有餘」的滿足心理已不能平衡，他們要向新的標準看齊。對上面那種一步三顧、平衡各派既得利益的步伐已不耐煩。現行的弊端百出的體制對他們手脚的束縛使他們無法參與競爭，他們已經覺得越來越不能容忍了，他們對改變現狀的願望，是越來越強烈了。

從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經濟改革的形勢，已經不可逆轉。新的較量就在前面。

中共自成立政權以來，提出過許多口號，但歷史證明，它們都未能持久，有的只是曇花一現而已。在六十年代初期，毛澤東說要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提出了「大躍進萬歲！」「人民公社萬歲！」「社會主義的總路綫萬歲！」由於害怕群眾反對公共食堂，甚至提出了「公共食堂萬歲！」的口號，但是事實證明，這些事物都缺乏生命力，這些口號在瘋狂地呼喊一陣之後，也就銷聲匿跡了。在「文革」期間，人人都要佩戴毛澤東像章，家家戶戶除了供奉毛像外，還要貼出紅色的「忠」

這「五講、四美、三熱愛。」的口號，並未過時，但許多人已不記得上述的內容了，基於現實生活，約定俗成，產生了新義。請看下列報導：

三月份是大陸的「文明禮貌月」，合肥有一家百貨店作出規定：在三月份，營業員如與顧客吵架一次，將扣發該營業員當月的全部獎金。因此，有時營業員和顧客發生糾紛，營業員只得表面裝老實，表示禮讓，但背後却說：「老子這個月當兔子，下個月就變老虎，大丈夫報仇，四月不晚！」

## 「五講·四美·三熱愛」新義

(中國大陸訪問學者·美國)余典

字來表示「無限忠于毛主席」，「無限忠于毛澤東思想」，「無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綫」。現在看來，這種狂熱的「三忠于」「四無限」，是大可不必的。

在八十年代，中共又提出了「五講、四美、三熱愛。」的口號，即：

五講：講文明、講禮貌、講衛生、講秩序、講道德。

四美：心靈美、語言美、行為美、環境美。

三熱愛：熱愛黨、熱愛祖國、熱愛社會主義。

群眾反映：「五講、四美、三熱愛。」講了幾年，精神面貌反而一年比一年糟。於是，現在在群眾中流傳開「五講、四美、三熱愛。」的新解釋：

五講：講吃喝、講玩樂、講穿戴、講發財、講哥倆義氣。

四美：挑對象，長的美；找工作，舒服美；選住房，寬敞美；小家庭，佈置美。

三熱愛：愛名、愛利、愛老婆孩兒。

人民群眾為什麼把「五講、四美、三熱愛。」的內容忘記了而津津樂道它們的新內容呢？筆者不能解答，謹請教於讀者。

# 主觀的願望與客觀的事實

## —敬詢台灣獨立運動諸朋友

(香港留學生) 林樵清

一九八五年三月三十日，大紐約區台灣同鄉會在紐約法拉盛舉行演講會，邀請了非台籍人士俞國基先生和中國民聯的王炳章先生參加。頭一次用國語在台灣同鄉會作為使用語言。

演講後，由聽眾發問或抒發意見。一位倡議台灣獨立運動的朋友起來說道：「台灣要獨立，這是大多數台灣人民的意願；只要台灣人站起來，就可獨立，並不需要別人的同意。請問當初美國獨立，是不是需要別人的同意？孟加拉的獨立，是不是也要別人的同意？」(大意如此)另外還有幾位台籍人士起來發言，都認為台灣獨立是不是需要別人同意是個探討太久的問題，結論早就在那兒，不需要再加以討論。此時我舉手欲發言，但舉手的人太多，主持人沒注意到我，不多久會議就結束了。因此我欲說的話，只好在此以筆代言了。

首先，「台灣要獨立，這是大多數台灣人民的意願。」這句話就有值得商榷的必要。台灣一千八百萬人民中大多數是否都贊同獨立？我們不知道，也不敢說。因為到現在為止還沒有一個全民投票來讓台灣人民有表達他們意願的機會。而且在國民黨的統治下，這種機會的發生性也不大。

另外，關於台灣的獨立是否需要別人同意這點，雖然與會諸台籍人士都一致表示不需要，但我的看法則不同。我認為台灣的獨立不單是個主觀願望的問題，而且還是個要顧及到客觀事實的問題。台灣的獨立要經過誰的同意？答案是中共的。就算台灣一千八百萬人民全贊同獨立，但如果沒有中共的首肯，那是徒然的，強行獨立只會造成悲劇。

中共不贊同台灣獨立是盡人皆知的。他在收回香港的統戰中打出的口號是「港人治港」，但在統戰台灣的時候却不敢打出「台人治台」的口號。因為中共深知五百萬沒有武力的港人是治不了香港的，也根本搞不成獨立。但台灣就不同了，台人治台果真實施，那真是隨時都有可能獨立。一獨立，事情就棘手了，非動用武力難以解決。當初毛澤東對來訪的美國總統尼克松稱讚蔣介石，說他是個民族主義者，原因就是他堅持不獨立。只要不獨立，事情就好辦。因為從專制獨裁者的眼光和中國傳統的大一統思想來看，獨立是大逆不道和不可原諒的。外蒙古如果不是有蘇聯在後面大力撐著，恐怕早就和西藏在五九年一樣，被中共踏平了。至於台獨朋友所說美國的獨立是不是需要

別人的同意，那是不需要的。因為當時英國鞭長莫及，等到軍隊曠日費時、遠渡重洋到達美洲大陸時，只有捱打的份；再加上和英國國勢差不多的法國大力幫忙，才能很快打敗英國，取得獨立。基本上是不需要別人同意的。如果一定要說有誰同意，我們可以說是得到法國同意的。但我認為，就算沒有法國幫忙，美國也會獨立。可是今天台灣有美國當年的條件嗎？軍艦渡過台灣海峽只要半天，飛機只要幾分鐘；還有，台灣的法國在那裡？

另外，台獨朋友說到孟加拉的獨立是否需要別人的同意。我認為是需要的。如果沒有印度度的大力介入，孟加拉能否由巴基斯坦處取得獨立則很難說。印度的國勢較巴基斯坦為強，幅員廣大，又剛好鯁在東、西巴之間。再加上印、巴兩國又是世仇，「分化敵人是保障自己安全的最佳辦法。」所以，當印度決定支持孟加拉獨立時，則孟加拉很難不獨立。饒是如此，巴基斯坦還是在孟加拉殺得屍橫遍野，廢墟處處。直到今天，孟加拉仍是屬於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處處依附於印度。從民生和國家尊嚴的觀點來看，這樣的獨立所付的代價委實太大！

美國和孟加拉只是這位台獨朋友所舉的兩個例子，但還有一些其他的例子這位朋友沒有舉出來。如亞美尼亞(ARMENIA)事件。以前在土耳其境內有個叫亞美尼亞的民族，據說是上古腓尼基人的後裔，很會做生意。這民族和土耳其人一直處不來，也要求獨立。但人數和勢力實在太小。終於在一九一五年某一天，土耳其大軍開到，實施種族滅絕政策，結果共屠殺了一百五十萬亞美尼亞人，從此，亞美尼亞被土耳其從地圖上抹掉。這次屠殺的倖存者逃到國外，組成亞美尼亞復國組織。這復國組織因復國希望不大(人數太少，土耳其又太強)

## ARMENIAN SEEK THE LIBERATION OF THEIR HOMELAND OCCUPIED BY TURKEY

Armenian National Committee of New York

For nearly three thousand years, the Armenian people lived on their homeland—the last six hundred under oppressive Turkish occupation. The persecutions culminated in 1915. The Turkish government planned and carried out a GENOCIDE against its Armenian subjects. 1.5 million Armenians were murdered and the remainder driven out of their homeland. After years, Armenia was empty of Armenians. The survivors scattered through-

**TURKEY MUST PAY FOR ITS CRIME OF GENOCIDE AGAINST THE ARMENIANS BY ADMITTING TO THE CRIME AND MAKING REPARATIONS TO THE ARMENIANS**

**TODAY, TURKEY REJECTS THE RIGHT OF ARMENIANS TO RETURN TO THEIR ARMENIAN LANDS OCCUPIED BY TURKEY. ARMENIANS DEMAND THE RIGHT TO RETURN TO THEIR LANDS, TO DETERMINE THEIR OWN FUTURE AS A NATION IN THEIR OWN HOMELAND.**

亞美尼亞人在紐約的呼聲，其奈土耳其何？

只好復仇，乃在世界各地狙殺土耳其的外交官，結果竟被各國視為恐怖份子。

另外就是一九五六年匈牙利革命和一九六八年捷克的布拉格之春，他們只是要求更多的自由民主和更大的獨立自主權，結果遭致蘇聯大軍入侵和血腥的鎮壓。一九八一年，很多人惋惜波蘭的團結工會沒能揭竿而起，一舉推翻波蘭的共黨政權。但從另一方面來說，幸好沒這麼做，否則蘇軍入侵，又是一場血腥的悲劇。如果波蘭在悲劇上演後能得到像孟加拉那樣的結果，還算對歷史有個交待。但問題是：能有這樣的結果嗎？孟加拉的獨立有印度的大力支援，但波蘭的印度在那裏？西方國家嗎？西方國家要真敢管事的話，早就在五六年匈牙利革命時就插手了，何苦要等到八一年再來管事？五六年時美國國勢尚較蘇聯為強，都不願管事，二十多年後時移勢易，難道會不顧一切的介入？更別說經過越戰後美國人民的反應。還有，被蘇聯併吞的波羅的海三小國（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難道他們不想獨立？他們當然想，但他們能獨立得了嗎？

當然，我們能理解到亞美尼亞、匈牙利、捷克、波蘭和波羅的海三小國的處境，以及他們要求獨立自主的願望。但這只是他們主觀的願望而已，並不能代替客觀的事實。客觀的事實擺在那兒：如果不改變土耳其和蘇聯，則他們的現狀也無法改變。與其強調或強行自己主觀的願望，不如埋頭苦幹去改變客觀的事實，這樣反而更為有效。波蘭的海外流亡組織就已了解到這一點。最近我和他們談話，他們已把矛頭針對蘇聯，並對美國施加壓力，讓美國去影響。他們知道，沒有自由民主的蘇聯，就沒有自由民主的波蘭。同樣的，我也認為：沒有一個自由民主的中國，就不可能有一個自由民主的台灣，更遑論獨立了！

政治是個很現實的東西，它要講求實力。在民主國家，它是民意的支持與否。在專制國家，它則是軍事力量的強弱。今天，台灣的軍力在現階段是可以防守本島的。但在中共的大力統戰和實質影響下（自己向世界各國購買新式武器，却阻止世界各國和台灣進行軍事交易）軍事力量的此消彼長，沒多久可能連防禦都成了問題，那時台灣的前途就令人不敢樂觀了。另外，從國民黨政權近年來的演變和所作所為來看，似乎已走到了其生命的末期，如果再不勵精圖治，可能就要向歷史的舞台告別了。軍力的衰弱再加上政權的不穩，國民黨的前途是在風雨飄搖中。但國民黨政權的下台並不意味著台灣就能獨立。它牽涉到我前面所說客觀的現實問題。將來台灣不管如何演變，它肯定擺脫不了中共的干涉。如果現在不能改變中共，到那時由中共來改變台灣，受苦的就是廣大的台灣人民了。

台灣如果想要跳過中共這一關而取得獨立，則一定要有美、日或蘇聯的大力支持（主要是軍事力量）。可是這種情形會出現嗎？在可

見的將來，這種情形的出現是看不到的。美、日兩國討好中共還來不及，怎會幫台灣在軍事上對抗中共？雖然美、日兩國在心理上可能是希望台灣獨立，但客觀的事實告訴他們，這樣做將會得不償失。這兩國都是尊重客觀事實的國家，他們不可能不顧客觀現實來幫助台灣獨立。至於蘇聯，他和中共之間的矛盾屬於內部矛盾，任何時候都有可能修好，而且現在正在這麼做；他和台灣則屬於意識形態的敵我矛盾，他根本不可能幫著台灣和中共進行軍事對抗。在會後交換意見時，還有人說，「如果中共打來，我們就和他拼了，台灣到處都是山，是打游擊最好的地區，讓台灣變成另一個阿富汗。」但問題是：一、阿富汗的游擊隊並沒有打贏。二、把台灣變成第二個阿富汗對台灣人有什麼好處？當然，我決不是說阿富汗人應該起來反抗蘇軍，我只是說，如果能夠走別的路而避免走上阿富汗的道路，為什麼不走？

在五十年和六十年代，美、日可能是希望台灣獨立的。那時也有客觀的條件配合。（如中共貧困，又因內鬥自顧不暇，台灣在聯合國內有席位、美艦協防台灣海峽等等）但那時被蔣介石的主觀願望所否決了，（他要反攻大陸，收復河山）這也就是為什麼毛澤東要稱讚蔣介石的原因。今天，這些客觀的條件均已失去，只剩下一些台灣人的主觀願望，台灣想要憑這些人的主觀願望去達成獨立，是難乎其難的。

當今局勢，錯綜複雜，常牽一髮而動全身。因此不能光憑主觀的願望去理解和處理事情；沒有客觀事實的配合，或根本不考慮客觀的事實，遲早會釀成悲劇的。最後，讓我再重申我的看法：沒有一個民主自由的中國，就沒有民主自由的台灣；與其尋求台灣獨立，不如尋求改變中共。不知台灣朋友們以為然否？尚望台灣諸朋友不吝賜教。

# 漫談死刑 憶亡友

(中國大陸訪問學者·美國) 劉國平

我從小喜歡看熱鬧，尤其喜歡看槍斃人，在街上只要有遊街槍斃人的，我一定跟着人潮到刑場看個究竟。抗日期間，居住西安，那時我只有十三、四歲，西安槍斃人的刑場在玉祥門外，被槍斃的人五花大綁，背後插一根像令箭樣的木板，上面有犯人的名字和紅×，大多是吸食大烟或販毒的人，有人說裡邊有共產黨，也有人說共產黨都是秘密解決，一般不公開槍斃。總之，看個熱鬧吧！死刑犯都是坐在人力車上，西安人叫洋車，拉洋車的一般不願做這份差事，但也有貪錢給的多，願意拉的，我看到的死刑犯大多都很有精神，有的滿嘴白沫像喝醉酒的樣子，不停嘟囔着：「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還有的哼黃色小調，刑場在城牆凹處，車子停下，兩名刑警架住犯人雙臂就往城牆上甩過去，後面一名刑警舉槍射擊，大多擊中後腦門，腦漿迸裂，慘不忍睹，有時拉洋車的後撤不及時，都會濺上血。行刑後有不

少人從看熱鬧的人群中跑出來，用饅頭沾腦漿上的血吃，據說治肺癆病有神效。

解放初期的政治運動有清匪、反霸、土改、鎮壓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那時我已參軍在朝鮮志願軍部隊，部隊裡邊在打仗，換防回來就搞運動，大家坐在防空洞裡開鬥爭會。我年紀輕，歷史清白，被編入「打虎隊」，為骨幹份子。有一位姓尹的司務長，北京人，他是由國民黨起義部隊過來的人，據說有貪污行爲，問題很複雜，對他輪番吊打，逼供了三天三夜，最後經連部決定，解送上級黨委，沒想到押解到長歌洞附近就被解決了。我當時不相信是真的，認為黨的方針政策是光明磊落的，以後派我們去掩埋屍體，才證實是真的被槍斃了。由於給我印象很深，所以事隔三十多年，仍然記得清楚。

目前世界上有的國家沒有死刑規定，美國有些州也沒有死刑，所以出現對兇犯判徒刑一



百多年的怪現象。有些州執行死刑的方式是藥物注射或坐電椅，與中國大陸的遊街示眾，公開槍決是不相同的。但最大的區別是，民主國家對待政治犯判處死刑的幾乎沒有，對政治犯包括思想言論犯判處極刑的，除蘇俄外，以中共最甚，舉例說，魏京生等民主鬥士均被判有期徒刑，押送監獄，這是在老鄧時代，如果在老毛時代，早就槍斃了。

我有一位要好的朋友叫王格，他是沈陽南湖東北工學院冶金系的講師，一九五七年大鳴大放期間他贊揚章伯鈞「外行不能領導內行」的論點，被打成右派。我因同情胡風，也被打成右派。一九五八年元月三日這天，我倆同時被開除公職，送勞動教養，也同時編入右派大隊一分隊勞動，到「三年災害」期間，教養院每天都往外抬死人，大家饑餓的說話都沒有力氣了，我身高一米八一，體重只有四十公斤。早晨起來，王格和我拿一個鐵罐子到廁所的糞坑

裡打撈蛔蟲吃，那時吃蛔蟲的人很多，管教幹部眼看我們在撈蛔蟲，也裝沒看見，大概是他善心發作不願叫我們都餓死。蛔蟲撈出洗淨，從中間劃開，像洗雞腸一樣把裡邊的髒物沖掉，那時沒有鹽，就放在水裏煮熟了吃，味道苦澀，但能給人一種吃肉的感覺。以後蛔蟲也打撈不到了，看着往外抬的死人就眼饞，恨不得咬上一口充飢。

王格性情耿直，正義感強，他總是不停的寫上訴材料，表示不服，最後被扣上「死不認罪的反革命份子 判刑五年」，送往勞改隊當犯人，六個月後，消息傳來，說王格鬧監，死不認罪，已呼喊反動口號，污辱偉大領袖毛主席，經上級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判處死刑。王格宣判死刑的會場是遼寧省，凌源縣新生鋼鐵廠煉焦爐旁，我記得是一九六一年的十二月下旬，剛下過大雪，天氣很冷，教養人員和勞改犯人都被通知參加宣判大會，我這個從小愛看槍斃人的人，今天要看自己朋友的下場了。會場四周，軍警密佈，架着機槍，當擴音器裡宣佈：「將罪犯押進會場」時，一共五名罪犯被軍警扶持着押了進場，最後一名是王格。他的面孔蒼白，流着鼻涕，我都不太認識他的模樣了，他用左手提着腳鍊的鐵鏈，被兩名軍警幾乎架了起來，胸前掛着打了紅×的牌子，上面寫着：「現行反革命犯王格」，大會宣判罪行的時候，前四名有逃跑犯、雞姦犯、盜竊犯等，最早宣佈的都是八年、十年、十五年不等，最後是王格，他的罪名是「罪大惡極，死不悔改的現行反革命份子，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經最高法院批准，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宣判完畢，會場主持人在擴音器前頭呼口號：「

堅決鎮壓一切反革命份子」、「無產階級專政萬歲」、「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萬萬歲！」王格等人在一片口號聲中被架出會場，其實王格的死刑並沒有「立即執行」，而是一直拖到下午五時三十分，在凌源縣南木蘭山旁槍斃的，這中間的五個多小時是遊場示眾。凌源縣是全國勞改犯人集中區之一，王格被架在車上在各個勞改場所遊行示眾之後才結束掉他的生命。據說，打兩槍後，王格倒地，有位連長用樹枝試扎王格的腳心，見他還動了一下，連長的善心大發，在王格的後腦門上又補了兩槍才斃命。

一九六二年我解除勞改時，看見王格的愛人來認領遺物，王格有許多冶金方面的講義和書笈，都是很珍貴的，有一個叫「小李子」的問王格愛人，「你不要去木蘭山看看王格的墳？」她哼了一聲說：「誰願意看他這個反革命份子！」，臨走時在場的勞改幹部還同她握了手。

另外一個人就是我的同學張志新。

張志新同志是一九五二年，我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的同期同學，她是俄語系本科學生，起初我們都在西直門外校址，以後她們歸併到市內的鐵獅胡同，我們就不在一起了，但部隊轉業的學生經常有聯歡活動，所以常常見到她，我對張志新有着特殊的感情，曾經寫過信表達我的心意，她那時已經是黨員了，我只是團員，還未入黨，有一次在周末舞會上，她曾經質問我為什麼還沒有解決組織問題，我當時很窘，總覺得她的思想很積極，事隔二十五年——一九七八年，在她被迫認為烈士時，遼寧省委宣傳部調查了人大同期畢業學生的通訊錄，



張志新說：「要獨立思考什麼是錯，不要參雜個人的情緒，對一切要實事求是。」她却于1975年4月4日被害。

來信要我提供烈士的點滴事蹟，這時，我才知道張志新早被槍斃了。從省委宣傳部的介紹信看，張志新是被四人幫的死黨，老毛的侄子毛遠新策劃迫害致死的。她死的很慘，可以說比王格還要慘。張志新經過長期的小號關押折磨之後，精神失常，說胡話，她總是嘔叨：「我是緊跟毛主席的」、「黨的路綫是正確的」有時在監內大喊：「毛主席萬歲！」槍斃張志新的時候，有關領導怕她呼喊口號，叫一名姓紀的法醫，先割斷了張志新的聲帶，血流不止，最後臨刑時用橡皮膏貼在咽喉的刀口上，據目睹者說，當時張志新的上衣都染上鮮紅的血，姓紀的法醫和執行槍決的某指導員（據說這位指導員為表示革命的堅定，對張志新打了四槍）在追認張志新為烈士同時，被開除了黨籍。東北人經常說：惡有惡報，善有善報；不報，時間未到，時間一到，一切都報。

但願這幾句話靈驗。

九泉之下的朋友們安息吧！



# 我赤着脚在泥土上走

(中國大陸新移民·美國) 鍾道宏

在舊金山重修纜車的工地上，到處是掀翻的、堆積的、狼藉的土。我脫下皮鞋、脫下白襪，赤着脚在泥土上走，路人困惑地向我注目。我踢着土塊，揚起黃沙，像撒野的牧童，弄一身塵污。

多少年了，穿着厚底的鞋，在水泥鋪的、瀝青鋪的、地毯鋪的地上邁步，忘却了泥土的嚴峻、泥土的溫煦，太嬌嫩的腳板踩着碎石，疼得直打踉蹌，活該！誰教我聽任久經跋涉的老繭脫去？

自從我掙出母親的胳膊，便赤着腳踏在故鄉的土。從此，我的卑微的生命，在那丘陵連綿的大陸上生長和擴展——和泥土一樣，黃褐色的瘦瘠，和泥土一樣，沉默而起伏。兒時掘蚯蚓，壯時挖水渠，田裡割稻，臉整天對着，坡前小憩，背緊緊貼着，最親切的莫過於你啊，故鄉的土！春雨裡，犁動軟軟如酥的田壟，泥漿飛濺着你的活潑與滑膩，

旱天裡，挑水在山崗上澆花生，你吱吱地訴說着乾渴和滿足。

你呵，賜我以重擔、以坎坷、以摩擦，百煉千錘；你呵，養我以五穀、以果蔬、以詩情，慷慨大度，夜來，你把蛙聲送進疲乏的夢境，叮囑我：泥土是一切夢幻的依附。

若非長年赤脚，怎得親近泥土？若非長年赤脚，怎練就堅毅與耐苦？故國的土呵，比不上北美洲的膏腴，却正是你撫育了地球上最柔韌的種族。

是的，我的生命居然比故鄉的土地更為廣袤、更為自由、更為寬舒，這出產過標悍的牛仔的美洲西部。

真是失敬，天天離不了厚底的皮鞋，爲了生活，據說還爲了文明的習俗。似水流年，在光滑的地上匆匆溜走，久違久違，粘着腳板的粗魯的泥土，久違久違，蔚藍陽光下暖潤的泥土！我撫摸你，親近你，擁抱你，故邦異國，泥土一樣燃起我景仰的情愫。一樣是出產蚯蚓和蟋蟀的土呵，一樣是蘊藏着深厚的原始力的土呵，

你這繁殖惠特曼的傲岸的「草葉」的土呵，埋過千百噸金礦和衆多淘金者的土呵，長着歐羅巴的毋忘我和長安的蟹爪菊的土呵，

覆蓋着拖辮子的先輩之夢和屈辱的土呵，當我俯首貼着新掘開的街心軌床，聽到拓荒者伐木叮叮，聲聲如潮，聽到拖曳第一輛纜車的十八匹騾馬長嘶，聽到近旁唐人街雜沓的「四邑」土語……

就在軌床旁邊嗜嗜灰色的沙土吧，有點鹹澀，這是創業者凝固的汗珠，順便到車庫旁細察深深的井筒——泥層便是直立的史書（從底部往上讀）我讀到：開拓的偉大，競爭的血和智慧，一九〇六年大地震，廢墟和新生，新大陸怎樣在泥土上艱辛地成熟……

好的，這是泥土，漂泊的遊子找到依附，這是泥土，讓移栽來的生命紮進根鬚。讓高潔的人在泥土前掩鼻避走吧，（他們却饕餮色拉和鮮果無數），且讓癡脂似的美足對着泥土躊躇，且讓各式各樣的鞋子和輪子在平坦的寬闊的光潔的路上跋扈。

我不希罕，我不希罕，我赤着脚在泥土上走，鬆鬆的砂礫、尖尖的石陣、深深的泥濘，這較爲費力，蒺藜和蛇會來作阻。我的生命呵，慣於吃苦的生命，在泥里留下一行深深的、深深的印記，隨着每一步、每一步……

一九八四年春遊舊金山候纜車工地得此

優待券 \$3.00

附此券，減少訂費美金三圓，  
此券有效期至1985年12月31日

您想知道：

中國正在發生什麼？

明天將要發生什麼？

新的一代想些什麼？

您想聽到：

中國民主化的腳步聲嗎？

請您訂閱 **中國之春** 月刊

姓名：英文 \_\_\_\_\_ 中文 \_\_\_\_\_

地址： \_\_\_\_\_  
\_\_\_\_\_  
\_\_\_\_\_

訂費 (每年)

北美和世界其他地區 (港、澳地區)

機關：60美元 200港元

普通訂戶：24美元 72港元

學生訂戶：18美元 60港元

寄上 \_\_\_\_\_ 幣 \_\_\_\_\_ 元，訂閱由 \_\_\_\_\_ 年 \_\_\_\_\_ 月 (第 \_\_\_\_\_ 期) 開始

支票抬頭請寫：China Spring

北美地區： P. O. Box 243,  
New York, N. Y. 10185

香港及世界其他地區：香港九龍旺角彌敦道612號  
好望角大廈21字樓3E2室

Room 3E2, 21/F,  
612 Nathan Rd., Mongkok,  
Kowloon, Hong Kong.

贊助200美元或港澳地區500港元以上  
之訂戶為永久訂戶

除北美以外的世界其他地區，另加郵費：

航空：10美元 平郵：5美元

# 徵求中國大陸留學生及訪問學者通訊錄

目前，中國大陸在外學習的公自費留學生、研究生和訪問學者達二萬多人，每年進出數千人。他們很大程度上將決定中國的未來。

為加強中國民聯、中國之春與中國大陸留學生之間的交流，使大家共同關心祖國的形勢，探討中國的出路，我們特廣泛徵求中國大陸留學生及訪問學者的通訊錄。為推動此項工作的進行，我們制訂如下獎勵措施：

一、凡寄來包括中國大陸學生通訊名單在內的大學學生錄、中國同學通訊錄者，可獲免費贈閱中春雜誌二年；

二、凡寄上二十名以上中國大陸學生通訊地址者，獲免費贈閱中春雜誌一年；十名以上者，半年；五名以上者，三個月；五名以下者，獲免費贈閱中春簡訊。

民主的事業，需一點一滴的工作去完成。我們呼籲廣大讀者協助我們做好此項工作。

（因學生地址常變，最好寄所在系和教研組的通訊處；寄學生通訊名冊時，不必標出誰為大陸同學，我們可從名字的漢語拼音上辨認）。

感謝您的協助！

# 中國民聯爲您服務

近來，中國民聯總部及各地分支機構加強了對中國大陸留學生及外出人員的服務工作。中國大陸目前在全世界的公自費留學生達二萬多人，中國駐外機構人員數千人。此外，還有大批中國官方臨時外出人員。他們孤身外出，遇到很多困難。我們認為，幫助他們，是中國民聯義不容辭的責任。

中國民聯的分支機構及盟員遍及全世界，與僑界、學術界、國際人權組織、各國民主人士、外國服務界有着廣泛的聯繫，爲我們服務留學生和外出人員創造了良好條件。

中國民聯將擴大服務留學生及外出人員的工作。從買車學車的日常小事，到擔保親屬出國，或尋求居留權，我們均樂於協助。需提供幫助者，請與我們聯繫。我們雖不能保證完全滿足您的要求，但會盡力而爲。

## 中國之春近期徵稿啓事

一、中國之春近期專題如下，歡迎撰稿人圍繞這些專題寫稿：

1. 「經濟決定論」的研討：只有先搞好了經濟才能爭取民主嗎？
2. 改革的途徑：進入共產黨內部從事改革的作用與限度；壓力團體及反對派的價值；民主運動的價值；
3. 中國法律制度改革的探討；
4. 留學生專輯（在外學習、生活之體會，回國後的作用及遇到的問題，對留學生政策的建言等）；
5. 多元論的研討（多元論的產生、發展與實踐，中國社會的多元化趨向等）。

二、此外，凡探討中西方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的稿件，不拘形式、內容，均表歡迎。

三、本刊尤其歡迎國內快訊稿及一事一議的短評。留學生園地、文藝園地、鄧小平權力交接專欄等，都具有特色，請大家投稿。

四、本報稿件對投稿者一律保密。但尤其歡迎中國大陸公自費留學生及訪問學者投稿。編輯部對投稿者一律保密。

五、稿酬每千字十五至卅美元，優秀作品稿費更高。

### 民主 \* 法治 \* 自由 \* 人權

###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中國民聯）機關刊物中國之春月刊（中文版）

主 辦：中國民主團結聯盟  
(CHINESE ALLIANCE FOR DEMOCRACY)

編 輯：中國之春雜誌編輯部

通訊處：(美洲) P. O. BOX 4873, NEW YORK, N. Y. 10185, USA  
(香港) 香港九龍旺角彌敦道612號好望角大廈21字樓3E2室  
(日本) 東京都小金井市小金井郵便局46號信箱  
(歐洲) ALLIANCE CHINOISE POUR LA DEMOCRATIE  
B. P. 84, 75623 PARIS CEDEX 13, FRANCE  
(澳洲) G. P. O. BOX 376F, MELBOURNE (3001) AUSTRALIA

電 話：(美洲) (718) 429-6777 ; (718) 507-6442  
(香港) 3-318387

零售價：(美) 2.00 美元 (加) 2.50 加幣 (港) 6.00 港幣

SECOND CLASS  
PENDING  
FLUSHING N. Y.  
ISSN 0735-8237

Lee, T.P.  
19-25/8444  
Parkview Tower 1109  
701 West Gate Ave.  
St Louis MO 63130